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经 济 类

思想者的**足迹**

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

[美]史蒂文·普雷斯曼 著
陈海燕 李倩 陈亮 译

*FIFTY MAJOR
ECONOMISTS*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汉 译 大 众 精 品 文 库 》 经 济 类

精
品
汉
译

思想者的足迹

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

[美] 史蒂文·普雷斯曼 著
陈海燕 李倩 陈亮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0323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 / [美] 普雷斯曼 (Pressman, S.) 著；陈海燕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 吴源主编)

书名原文：Fifty Major Economists

ISBN 7-214-02868-9

I. 思… II. ①普… ②陈… III. ①经济学家-生平事迹-西方国家②经济学家-思想评论-西方国家
IV. F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4304 号

书 名	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
著 者	[美] 史蒂文·普雷斯曼
译 者	陈海燕等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责任监制	王 旭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页 2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868-9/F·642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对与错,都比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要强大得多。的确,世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些深信自己不受任何空谈家影响的务实主义者,却往往俯首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尾中如是说。凯恩斯指出,人们争论那些关键的经济学问题,总是置身于几世纪以来业已形成的环境与构架中。不懂得历史将使非正式的讨论次数减少,并导致更加蹩脚的经济政策。正如桑塔雅那^①所述,历史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那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必将重蹈覆辙,其价值还在于它所赋予人们的视角。与其他学科的发展历史相同,经济学也不是在真空中成长起来的。相反,经济学思想是由那些对所处时代的重要问题作出反应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孕育而成的。领悟经济学的崇高使命,深切地理解那些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怎样响应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都需要历史的洞察力。最后一点,历史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是因为从某

① 桑塔雅那(Santanyana, 1863—1952),西班牙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后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教,著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领域》等。

F138 / 15

种意义上来说,当判断哪些问题仅具有短暂的重要性,哪些问题才具有持久的重要性和意义时,历史是仲裁者。

不幸的是,20世纪末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同行逐渐抛弃了历史研究和历史视角。许多经济学家甚至瞧不起那些依据历史观点来研究经济学的人士。原因之一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家们开始重视技巧甚于思想。他们忽略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信守一种过时的、在社会科学领域被称作“真理”的观念。许多经济学家深信,我们能够知晓永恒的、普遍的经济学真理,因而忽视了历史;前人的思想要么被视为已包含在当前的经济学知识中,要么就是绝对错误的。

对于本专业领域地位的沦落,研究经济学思想的史学家必须引咎于自身。他们趋于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描述成那些已故的、思想毫无当代现实意义的人物的历史。他们也从不解解释如何研究这些伟大的前辈才能有助于启迪现实问题,或有助于理解经济学研究怎样缓解当代的重大问题。他们更少去钻研那些依然在世、继续为我们了解经济运行方式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们的思想。

当艾伦·贾维斯就编写一部关于重要的经济学家的书和我联系时,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想以此为契机纠正上述状况,并努力重新激起人们对漫长而伟大的经济学思想史的兴趣。从古到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被收录在本书中,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被誉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然而,历史并非终结在遥远的过去;它延续至今,并渗透到许多近代经济学思想中。因此,本书明确意识到了近代和当代经济学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可是,选择哪五十位经济学家纳入本书成了一个令人头

痛的难题。虽然前四十位左右相对较容易抉择,接下来却越来越困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选择的人数接近五十位时,越来越难以作出最后的决断。我决策的基本方针是衡量每位经济学家创立的思想的影响力以及他们的整体贡献的广度,当然还有历史的评价如何。在考虑后者时,我的指导方针是,历史如何看待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经济学家的贡献,以及我认为历史在将来可能如何评判他们的思想。

当然,关于谁该被收录、谁该被排除引起了诸多争论。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中,探讨“谁将成为第五十位?”成了我和众多同事热衷的趣味室内游戏。不过,这个室内游戏从未达成一致意见。从乐观的角度看,辩论那些在经济学的历史长河中最重要的思想和人物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和愉悦欢欣。感谢我的众多同事们在游戏中对我的配合,并在此过程中帮助我辨明在经济学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以及在经济学思想中什么是真正关键的内容。尽管我也许没能做到事事精确,尽管我确信人们将会举出许多被我忽略的重要人物——无法就第五十位达成一致意见的失败的游戏就表明,也许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正确答案——但是我相信自己已经尽最大可能做到了精确。我在本书中阐释其思想的五十位经济学家都是对经济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伟大人物。历史可能会将他们评判为值得继续研究的重要的经济学家。

在本书中,我提供了每一位经济学家的简短的传记和他们所传播的一些主要思想的精要。我还试图评价他们在经济学历史中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努力让读者知道,根据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人物的排名如何。我还公开发表不同意见,对这些经济学家的排名提出了自己的评价。

4 序 言

我明白这将引起我的同行们对这些排名的争论；当然，这些关于评定排名的意见可能也会像起初我选择将哪些经济学家纳入本书一样引起诸多争议。同样，尽管我的评价未必完全正确，但我认为自己在这一点上已尽力而为。

本书每个条目均以参考文献结尾，包括每位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著作以及一些现有的、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些参考文献将有助于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深入探究这些伟大人物的经济学思想。本书末尾附有一些关键术语，这样，那些经常被提到的概念就不必再反复定义和解释。

Fifty Major Economists

Copyright © 1999 by Steven Pressm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0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utledge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录

托马斯·孟(1571—1641)	1
威廉·配第(1623—1687)	8
约翰·洛克(1632—1704)	15
理查德·坎蒂隆(1687? —1734?)	22
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	28
大卫·休谟(1711—1776)	36
亚当·斯密(1723—1790)	42
杰里米·边沁(1748—1832)	53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	60
罗伯特·欧文(1771—1858)	68

2 目 录

大卫·李嘉图(1772—1823)	74
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1801—1877)	84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	91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99
里昂·瓦尔拉(1834—1910)	110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	118
卡尔·门格尔(1840—1921)	125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	133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1845—1926) ...	143
约翰·贝茨·克拉克(1847—1938)	152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	161
欧根·冯·庞巴维克(1851—1914)	169
克努特·威克塞尔(1851—1926)	176
托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	184

欧文·费雪(1867—1947)	192
亚瑟·塞西尔·庇古(1877—1959)	20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210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	222
皮耶罗·斯拉法(1898—1983)	229
贡纳尔·缪尔达尔(1898—1987)	237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899—1992)	246
西蒙·库兹涅茨(1901—1985)	254
约翰·冯·诺伊曼(1903—1957)	263
琼·罗宾逊(1903—1983)	272
扬·廷贝亨(1903—)	281
约翰·希克斯(1904—1989)	291
奥斯卡·兰格(1904—1965)	302
瓦西里·里昂惕夫(1906—)	311

4 目 录

尼古拉斯·卡尔多(1908—1986)	320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1908—)	329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	337
保罗·萨缪尔森(1915—)	348
弗朗哥·莫迪利亚尼(1918—)	358
詹姆斯·M·布坎南(1919—)	366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1920—)	373
肯尼思·J·阿罗(1921—)	381
巴巴拉·R·伯格曼(1927—)	390
加里·贝克尔(1930—)	399
阿马蒂亚·森(1933—)	408
小罗伯特·E·卢卡斯(1937—)	416
术 语	424

托马斯·孟 THOMAS MUN (1571—1641)

在 17 世纪的英国被称为“重商主义者”的商业经济学家群体之中,托马斯·孟德高望重,最负盛名。这些经济学家主张英国通过推行贸易顺差来实现经济繁荣。正如孟所阐述的:

“我们应当观察到这么一条规则,即增加国民财富的通常手段是对外贸易;每年销往国外的商品价值应超过我们消耗对方商品的价值……我们的商品存货如果未能返回仓库,就必须给国内带来财富。”

关于孟的生平我们知之甚少。他的祖父曾效力于皇家铸币局;他的父亲是位纺织品贸易商。孟在其早期生涯中是一名商人,长期居住在意大利,并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他开始介入东印度公司——一个主要在远东开展贸易的英国大型股份公司。1615 年,孟被选为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此后直到晚年仍保留着该公司的董事职务。在取得财富及社会地位之后,孟被任命到几个英国的委员会就职。这些委员会大多在发布报告时将孟的名字列入其委员会成员名单,尽管孟本人只写过两本经济类著作(1621)。

他的第一部著作主要是为东印度公司辩护,因为当时一些批评家认为,该公司在将出口黄金、白银至东方以换取对方的香料时,致使贵金属流失,严重阻碍了英国经济发展。《论

贸易》(*A Discourse of Trade*)一书在定位上是非重商主义的,与其说该书在提倡贸易顺差和黄金积累,不如说是孟在绞尽脑汁地罗列出所有论据以全力支持东印度公司。

他指出,国家与家庭实现富裕的原因是相同的,即节俭以及创造的产品要超过国民所耗费的产品。同样,挥霍钱财会使国家与家庭陷于贫困。因而孟推断,只要东印度公司赢利,英国就不会比原来穷。

孟还指出,食品、衣服及军需品都是必需品,因此进口该类商品可以改善英国的福利。相反,进口奢侈品则有损于国民经济。然后,孟继续论证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仅仅是供消费的必需品。

孟又换了个角度为自己辩护。他认为,与印度的贸易往来为英国的出口商品提供了市场。况且,由于英国与土耳其终止了贸易关系,这更说明与印度的贸易是有利的;孟指出,从土耳其进口商品成本太高,不如从印度进口同样的商品。

最后,孟阐明,并非所有奢侈品的进口都是有害的;一些进口商品通过英国公司加工与复出口,从而促使贵金属最终净流入英国。他还说,从东印度公司进口的商品,基本都是英国的出口商们所需要的商品。

如果说《论贸易》使孟成为东印度公司的辩护者的话,那么在他死后才出版的第二部著作(1664)则奠定了其作为一重要的早期经济学思想家的地位。这就是《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该书以其广阔深远的观点闻名于世。在书中,孟不再试图为东印度公司辩解;而是采取了将国家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立场。他综览贸易全局,而不是仅仅考虑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他证明了只

要获得贸易顺差即可增加国民财富。孟还研究了导致一国贸易顺差的种种因素。最后,孟就改善国家贸易地位的问题为英国的统治阶层提供了一系列可行性建议。

贸易余额仅指一国出口额与进口额之间的差额。当一国产生贸易顺差时,就意味着它的出口超过了进口。外销的商品超过从国外购进的商品时,必将获得国外进口商支付的报酬。当时 17 世纪的支付手段主要是贵金属——金、银。因此贸易顺差能够促进一国积累财富,实现富裕。与之相反,国内贸易不能为整个英国创造财富,因为一个人得到的贵金属正是其他人所失去的。孟在书中写到,要想保持贸易顺差,英国必须进一步自给自足,并且减少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国民还必须更加节俭,以使更多的商品能够出口。孟特别轻视和不赞成对奢侈品的消费。

当上述贸易顺差导致国内货币供给上升时,随之而来的潜在危险就是国民的购买力也许会受到刺激。这将造成国内商品价格上涨并最终导致出口损失,因为国产商品价格太昂贵,无法销往国外。不过孟阐释说,这些后果是很容易避免的。为了确保从国外流入的货币能够使一国真正受益,必须将所有新得来的资金进行再投资。再投资能够在将来创造出更多的出口商品。在这里,孟肯定了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并将正的贸易余额看成是积累生产性资本的途径。

除了解释贸易顺差的好处之外,孟还阐述了刺激贸易顺差的手段。首先是价格政策,孟想让出口商品在“最佳价位”出口;那就是指能带来最丰厚收入和财富的价格。如果英国在国际贸易的某些领域拥有垄断或近似垄断的地位,其商品就可以按高价出售。但是当国外竞争激烈时,英国商品的价

格就应该尽可能地低。这将促使英国占据更多的出口份额而赶走外国竞争者。孟建议,当外国竞争者消失的时候,可以提高商品价格,但不能高到诱使竞争者返回市场的程度。

其次,孟阐明,国际市场对优质产品的需求更为旺盛,这些商品能为英国带来更大的出口额。接着,他就英国政府怎样帮助改进产品质量作了解释。孟希望政府规范厂商,并建立贸易委员会(其行使的功能类似于美国贸易部),以便在有关贸易和工业活动法令方面为政府出谋划策。规范英国生产厂商的法令应非常严格,从而确保英国生产出优质产品。

最后,孟论述了如何利用国家的税收政策来激发贸易顺差。他指出,一些厂商可能会违背国家利益而进口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必须协调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孟企图通过税制实现该目标。出口关税水平应降低,因为它会损及英国商品的外销。对于那些进口后将复出口的商品应降低进口关税;而对那些将被英国公民消费的商品则应提高进口关税。孟认为消费税和销售税是无害的。尽管这两种税提高了食品与衣物的价格,但是孟相信它们将导致工资上涨从而被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虽然孟对此未作任何解释,但“最低生活工资理论”(subsistence theory of wages)可能已在他的脑海中成形(参见斯密)。

当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拉动工资上涨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依旧,消费税由富人承担。富人们要想避免支付消费税,只有两个选择——更加持久、勤劳地工作,或者减少对奢侈品的消费。孟认为,无论哪种选择都将使国家受益。

可是,孟并不赞成国家积累税收收入以用于过度的支出。税收予以保留,用于国家危急之时(如战争),这样才能有效发

挥作用。同时国家不应聚敛过多的税收收入而造成资本供给不足。因此孟提出的折衷办法是,国家每年积累的超出支出的税收盈余应相当于每年的贸易顺差。

孟和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在18世纪和19世纪招致了其他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大卫·休谟(David Hume)阐述了贸易失衡如何自动地恢复自身平衡。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均猛烈抨击重商主义者,宣称减少政府对贸易的限制将刺激国内生产。最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举出了关于自由贸易的颇具有说服力的案例。所有这些反对重商主义者的观点深得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人心。

然而到了20世纪,重商主义者的思想经历了一次所谓的复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称赞重商主义者们论证了贸易顺差产生的需求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他在《通论》(*The General Theory*)第二十三章(凯恩斯,1936)题为“关于重商主义的诠释”的文字中,肯定了重商主义者们对经济的理解,认为当货币流入增加商业投资时,国家可以通过产生贸易顺差的办法为国民创造工作机会和收入。

不过,对重商主义学说最强有力的支持也许是来自亚洲。20世纪下半叶日本经济的成功要归功于经济政策的帮助,而这些政策本质上是重商主义的,即使并非出于当政者的本意。日本之所以成为优质消费品的生产国,正是由于日本政府树立了产品质量的高标准。另外,使用关税和保护主义抑制进口,同时鼓励国内厂商出口也是其经济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尽管当今的经济学家们并不看重孟,尽管孟并未提出什么开创性的观点,但他的确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

印迹。其运用政府经济政策产生贸易顺差,以及通过扩大出口的途径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构成了他对经济学的不朽贡献的两个方面。

参 考 文 献

孟的著作:

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unto the East-Indies (1621) in *Early English Tracts on Commerce*, ed. John R. McCullo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 (1664) in *Early English Tracts on Commerce*, ed. John R. McCullo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涉及孟的著作:

Buck, Philip W., *The Politics of Mercantilism*,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4
Johnson, E. A. J.,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The Growth of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Magnusson, Lars, *Mercantilism: The Shaping of an Economic Languag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其他参考文献：

Johnson, Chalmers,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1936),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4

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1623—1687)

威廉·配第是最早系统地思考和著述经济学的人之一,也是最先将经济学原理应用于现实经济生活的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使人们洞悉了地租和税制的本质。不过,配第最杰出的贡献是通过运用他自己所谓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而使经济学成为计量和统计科学。

配第 1623 年出生于英国南部泰斯特河畔一个宁静的集镇——汉普夏的一个贫穷的裁缝家庭。他所受的学校教育主要是死记硬背,这是当时一种典型的低年级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尽管如此,配第还是在其早期的学习生涯中脱颖而出,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好奇心,阅读广泛,涉猎文学和科学领域。

十三四岁时,配第离开学校,在一艘往返于英吉利海峡的船上当了一名服务生。工作第一年,配第就摔断了腿。对雇主不再有用的他因此被抛在了海峡的法国海岸。配第决定留在法国,并进入卡昂的耶稣会学院。1640 年离开卡昂后,他在海军度过了三年时光,接着又前往荷兰学习解剖学和医学。

1646 年,配第返回英国到牛津大学学医。获医学博士后,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解剖学教授。他因救活一名被吊死的妇女而声名远扬。然而在他首次讲课的几周之内,他发觉学术生涯对自己并不合适,于是离开牛津成了爱尔兰军队的

首席医务官，同时，他还任爱尔兰首席检查官，他利用在这项工作中获得的经验聚敛了大量土地和财富。17 世纪 60 年代配第帮助建立了旨在改善自然科学知识的皇家学会 (The Royal Society)，皇家学会的日常工作沿袭了弗朗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的科学方法——运用观察和实验来研究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

配第将皇家学会的研究方法运用于经济现象，结果诞生了政治算术。在《关于政治算术的对话》(*Political Arithmetic*) 的序言中，配第宣称，他的目标即驳斥时下公认的信条，并揭示英国并未遭逢经济衰退或贸易萧条；相反，他断言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随后，他开始着手论证该命题。不幸的是，17 世纪的英国没有任何一家政府机构基于统一的口径公布经济数据，也没有哪家报纸能提供人们可能很想了解的经济和金融统计资料（更别提那些许多无人关心的资料）。这样，配第就担负起了为开展研究而收集必备数据的责任。

从本质上看，这种政治算术方法“依据数字或计量方法来表达思想；仅采用感性的论据；只考虑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他人还停留在那种依赖于特殊人物易变的思想、观点、欲望和激情的思考方法”。政治算术运用计量手段来分析经济和社会现象。这种新方法一方面用数字和计量描述现实，另一方面用数字推导出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论断。例如，A 和 B 显示为同时增长，配第便得出结论：要增长 A 必须要增长 B，要增长 B 必须要增长 A。政治算术的最终目标是试图使经济分析独立于人们所持的道德和信仰，从而使经济学研究更为客观。

众所周知,科学方法或实验很难运用于经济学领域。真实地监控一项实验要求我们首先将两个相同的经济事件或两列同样的人群恰好置于同样的状态,然后仅改变其中之一所处的条件。接着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一变化如何影响每个群体。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创造或发现如此理想的环境。政治算术尝试用统计分析方法替代实验方法,并确信这是经济学研究的最佳方法。该统计方法被沿用至今天的经济学领域,不过,近来经济学家们付出了诸多努力,探索如何开展受控实验才能使经济学更加“科学化”。

为了证明伦敦的财富及其一直以来的经济扩张,配第着手揭示伦敦比巴黎拥有更多的人口和房屋。配第首先检验了伦敦和巴黎前三年葬礼的中值数(伦敦 1683—1685 年,巴黎 1682—1684 年),发现伦敦的数字(22,337)远远超过巴黎(19,887)。假定两座城市的死亡率相当,配第推断,伦敦的人口大于巴黎的人口,因此伦敦比巴黎富裕。

该分析的一个关键假设是,国民财富取决于该国的人口状况。在穷国往往人口最庞大、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年代,该假设似乎有点怪异,但在配第著述经济学的年代,这却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在 17 世纪的英国尚无直接的手段来衡量财富,采取一些间接的手段是必要的,而配第正是选用了合理的间接手段。在现代生育控制方式问世之前,人口及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孩子的存活率。随之而来的是,这要求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多的国民财富。财富越多确实能导致人口增长越快;因此配第的分析也许是当时最具可行性的。

尽管配第因屡次提倡英国追逐贸易顺差而被当成是重商主义者,但他在许多方面都迥异于重商主义者。配第提倡贸

易顺差是为了增加就业而不是像重商主义者那样是为了积累财富。此外,区别于重商主义者的是,配第意识到了自由国际贸易的诸多益处。最后一个不同点是,配第并不倾向于以国际贸易刺激英国的经济增长。配第认为,决定经济福利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政府支出及税收政策,而非贸易政策或积累巨额的贸易顺差。

事实上,配第开始尖锐批评英国的公共财政,认为英国的税制是阻碍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7世纪的英国征税成本昂贵,人们的应纳税额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实际征税过程中发生的众多不公正现象令人叹为观止。所有这一切都将削弱人们努力工作和改善自身现状的动力,而缺少了这些动力,随之而来的将是经济的不景气。

不过,配第并不是反对所有形式的税收,也不认为税收有害于或有损于国家利益。问题是英国制定怎样的税收政策。配第指责人头税(poll taxes),因为这实质上是一种累退税(regressive tax)。他也谴责将国家彩票作为提高收入的手段,他视之为“对不幸的自欺的傻瓜们抽税”。相反,他偏好累进税(progressive tax),即人们依据“在公共和平方面的权益,也就是所拥有的财产或财富来纳税”。他有时也会支持对消费按比例征税。

但是,比如何征税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税收收入。依配第所见,税收仅在税收收入脱离资金循环时才会损害经济。若政府支出了税收收入,则其不利影响微乎其微。政府支出使资金回到循环中并促进就业,这将补偿因税收引起的循环中的资金损失以及就业机会的减少。

不仅如此,配第还意识到了税收可能起到的积极影响。

他先于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提出:若税收与支出刺激了高生产率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国民产出将得到增长。此外,政府支出税收收入,确保经济有序运行将增进国家财富。因此,配第认为投资于国防、司法、教育、扶贫和公共事业,包括高速公路、桥梁和港口等领域是政府的职责。最后,配第指出了政府支出——即使是用在无用的项目上——对于创造就业机会和消除懒散的重要性。在凯恩斯之前,他就写下了以下关于政府支出的文字:“即使将它(政府支出)用于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修建一座无用的金字塔,或将巨石阵的石头运到塔山上都无所谓。”真正重要的是实施了某种形式的支出。

抛开他那强烈的实验主义和实践性的倾向不谈,他也为经济学作出了重要的理论性贡献。他是首位对“盈余”(surplus)这个概念作出定义的经济学家,并最先以盈余为基础来解释地租。尽管地租是一种盈余的观点如今被称为重农学派的地租理论(Physiocratic theory of rent),但实际上该理论应该首先归功于配第而不是魁奈。

为了掌握盈余这个概念,可以设想一种原始的、仅种植玉米的农业经济。在年度中玉米既是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投入,又是一种经济产出。作为投入,玉米被用做种子和养活工人。年底收获之后又被用作来年的食物和种子。配第将经济盈余定义为玉米的全部产出(年收成)与产出所必需的玉米投入之间的差额。他认为地主乐意收取的地租相当于其所占土地产生的盈余。没人会支付比从土地上获取的盈余更高的地租,因为那样的话承租方会赔钱。另一方面,承租方之间的竞争将会把地租推升至盈余的水平。

不论他在公共财政研究方面的贡献,也不论他在定义和

解释盈余概念方面的工作,配第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主要是因为,他重视运用数据和资料来理解和诠释现实经济领域运行的规律。尽管他强烈要求发展更完善、更有规律的经济统计资料来协助这一努力,可还是要再经过 250 年才能方便地获取可靠的数据资料(参见库兹涅茨)。哈钦森(Hutchison, 1988)说的确实没错,配第对 17 世纪的英国采集可靠的统计资料的能力过于自信;但配第也是对的,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却想理解经济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配第试图创造这些方法并藉此来探索英国经济,这就构成了他最重要的经济学贡献,他也因此成为 17 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配第的著作:

The Economic Writings of Sir William Petty, ed. C. H. Hu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9

涉及配第的著作:

Hutchison, Terence, *Before Adam Smith: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662—1776*,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8

Letwin, William,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English Economic Thought 1660—1776*, London, Methuen & Co., 1963

Roncaglia, Alessandro, *Petty*,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5

Strauss, Erich, *Sir William Petty: Portrait of a Genius*, London, Bodley Head, 1954

其他参考文献:

Burtless, Gary, "The Case for Randomized Field Trials in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2 (Spring 1995), pp. 63 - 84

Smith, Vernon L. ,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Economics," i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 John Eatwell, Murray Milgate and Peter K. Newman, New York, Stockton Press, 1987, 2, pp. 241 - 9

Smith, Vernon L. (e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0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

洛克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作为一名哲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他首次为私有财产和经济活动中政府的有限参与提供了正当的理由。这就为 17 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并使这种观点在当时那个宗教思想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此外,洛克对货币、利率的研究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洛克 1632 年出生于英国萨默塞特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洛克的父亲是一名乡村律师,拥有许多地产,他的一位客户兼好友是亚历山大·波帕姆(Alexander Popham)。波帕姆于 1647 年成为国会议员,在他的帮助下,洛克得以进入威斯敏斯特公学求学,这是当时英国最具影响和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

洛克在威斯敏斯特公学成绩优异,并荣获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于 1652 年进入牛津大学宗教专业深造,分别于 1656 年、1659 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他留在牛津大学任教,在 1660 年和 1662 年曾分别教授过希腊语和修辞学。

当时,洛克及其同时代的人都对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有关血液在全身循环流转这一发现大感兴趣,于是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医学,并成为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当时的财政大臣的家庭医生,不久又成为他的私人助理。通过与阿什利勋爵的接触,洛克学习了那个时代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前沿课题,例如与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往来和利率问题。

由于对殖民地问题的深入了解,洛克于1673年被任命为贸易与殖民地委员会的部长。两年后他卸职离任,潜心研究他所热爱的其他哲学课题。在此后几年里洛克撰写了《论人类的理解力》(*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a)和《政府二论》(*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 1690b),这些著作使他在哲学界享有盛誉。与此同时,洛克对经济学领域的问题,特别是有关货币方面的问题仍保有浓厚的兴趣。直至他去世,洛克在英国的政界一直有重要影响。

洛克对经济学界作出了五大贡献,其中三种具有哲学性质,另两种则具有经济学性质。他首次对私有财产和政府作出了哲学上的论证,并摸索出一套使经济学“科学化”的方法体系——基于人们对经济变化会相应作出适当和理智的反应的假设之上。洛克对经济学的贡献涉及到货币和利率理论两个方面。他反对当时政府的利率管制,并反对英国将货币贬值的一项政府计划,因为这将给经济活动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洛克在哲学上的三大贡献中,最重要的也许莫过于对“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论证。17世纪的英国,蓬勃发展的商业活动与禁锢人心的传统封建制度发生了冲突。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地球是上帝赐予的,地球上的一切资源是人类共有的。然而,对某一物质的所有权就意味着其他人不得分享,这种“私有权”的观点让人很难接受。

洛克对此作了下述论证：他首先从一个没有争议的观点谈起，“人们有劳动的权利，并且对劳动成果有所有权”。在土地是足够分配的、人们从土地中获取的产品在消耗前是不会损耗的两个假设前提下，当与人们的劳动凝结在一起时，土地被人们认为是合法的财产。

由此，洛克将“私有权”的概念从小范围（可以被消耗的物质）引申到广阔的物质领域。他指出，无论是货币还是资本，都是过去劳动的产物，人们要通过劳动来获取货币，因此对货币拥有所有权；同时，由于货币在使用前是不会损耗的，人们可以不断积聚成资本。这种无限的积聚过程有时会偶尔中断；当土地、工作匮乏时，或某人由于生理原因而无力养活自己时，他有权得到保证其生活的收入。洛克认为，“私有权”的现实意义在于当人们可以通过劳动不断积累财产时，他们会更具有生产积极性。

洛克在哲学上的第二个贡献是论述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洛克和其同时代的人认为，政治统治最终取决于个人，政府之所以存在是由于个人愿将他们的权力上交给共同的统治者。洛克将政府视为一个公司，其股东便是人民大众。人民置身于政府的管制下并由此得到政府对他们的生活、自由和土地等的保护。所有的公民（最起码他们的土地和财产）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而管理者也应尽力保护公民的利益；否则他们将被推翻，由另外维护社会准则的管理者取而代之。由此看来，既然政府是个人对法律和规则的决策的产物，那么政府就应因对自然规律的要求而被视为是合理的。

洛克的第三个哲学方面的贡献是摸索出一套研究经济运

行的方法体系。洛克认为人都是理性的利己的个体,对经济刺激会作出反应,这与当时传统的宗教思想认为人都是利他的、遵从宗教信仰行事的观点大相径庭。因为人可以被看作以一定的方式来行事,所以就可以总结出经济的规律和原理。例如,当某种商品价格上涨时,人们会选择比较便宜的替代消费品,这种替代消费品的生产厂商会扩大生产和销售,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如同化学上的玻意耳定律和物理上的牛顿力学定律一样,经济也有其自身规律的可循。正如气体的反应会依照化学和物理规律中的数学方程式进行一样,人们在经济决策中也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领域中,洛克对利率、货币理论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7世纪中叶,乔塞亚·蔡尔德(Josiah Child)建议政府将利率下调至4%,因为低利率对商人和其他想为了有用的目标而贷款的人的事业大为有利,继而会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蔡尔德指出,利率下调的唯一受害者,是征收高利率的贷方。

洛克驳斥了这一观点,并阐述了政府管制利率的弊端。他指出,高利贷法(usury laws)只是将商业利润在借贷双方中重新分配;它并不会增加借款或投资行为,因此对国家经济的整体也毫无益处。例如,一个商人借贷资金获得的投资利润回报率是10%,而当时的市场利率是5%,则等于是商人和贷方将利润对半分;而如果政府规定贷款利率不得超过4%,则获取的利润中,60%留给商人,而40%流向贷方;对国家而言,并不会增加新的投资项目,也没有收益可言。相反,如果贷方不愿在4%的低利率条件下贷出资金,反而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净损失。洛克认为,由市场自然规律决定的利率水平

比由政府法令颁布的利率水平更为合理。

洛克所言的这种自然利率就是自由市场利率,即由市场的供求法则决定的利率。在货币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下,其价格(利率)便会上升,因为贷方知道他们可以索要高价。理性的贷方会抬高利率并产生更多的货币。相反,当货币量供过于求时自然利率会下降。理性的借方会到商店购物囤积起来,而只有那些主动降低贷款利率的贷方才能找得到愿意借款的人。

洛克在重铸硬币的问题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17世纪的英国,所有硬币都是由贵金属铸造的。由于这些金属本身具有价值,人们从其边缘割下零星的碎片,将其熔化后,可以作为金、银出售。因此,这些碎片可以积聚成财,并可以在商品、服务市场中流通。鉴于这种情况,托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爵士^①拟定出了第一条经济规律,即“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Gresham Law)。也就是说理性的人会将手中较为完整的硬币收藏起来,而真正在市场中流通的则是那些残缺不全的、含金银量最少的硬币。

早在1690年,英政府就试图通过减少硬币中的贵金属的含量的办法,来解决残损的硬币的问题,也就是将通货贬值。洛克反对这一举措,而赞成按惯常的贵金属含量重铸硬币。他认为减少硬币中的金属含量是于事无补的,因为货币的价值或其购买力不是由政府法令决定的,而取决于其贵金属含量的多少。通货贬值只会导致同样的商品需要更多的硬币才能买到(从而得到与以前相同的贵金属含量)。尽管对如何解

^① 格雷欣(1519?—1579),英国金融家、商人,创建伦敦皇家证券交易所。

决残损硬币问题这一领域涉足较晚,但他却说服政府机构不贬值通货并按惯常的贵金属含量重铸硬币。

减少单位硬币中的贵金属含量(生产更多数量的硬币)会导致物价上涨,洛克的这一论断使他成为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重要先驱者之一。此外,他从哲学角度对经济学作出的贡献同样影响深远,他的有关私有财产和让经济活动不受政府干预的论断,已经被历史上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

参 考 文 献

洛克的著作: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a), 2 vols., Dover, 1959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1690b),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3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1691, in Locke 1696

Several Papers Relating to Money, Interest and Trade (1696),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8

涉及洛克的著作:

Letwin, W. *The Origins of Scientific Economics*, London, Methuen, 1963

MacPherson, C. B.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 Hobbes to Lock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Vaughn, K. I. *John Locke : Economist and Social Scientist*, London, Athlone, 1980

理查德·坎蒂隆 RICHARD CANTILLON

(1687? —1734?)

理查德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有关他的出生和青年时期鲜有人知,而他在经济学方面的作为就如同他的去世一样始终是一个谜。尽管他以挣钱作为生活的目标,却写出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论著,主要阐述了经济体系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此外,他对货币理论也有所贡献,并且首次提出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意义。

坎蒂隆出生于爱尔兰岛西北部的巴利罗纳镇上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由于在17世纪的爱尔兰,教徒们没有保存出生日期的习惯,因此坎蒂隆的具体出生年月不详,大约在1680—1690年间。布鲁尔(Brewer)曾推测坎蒂隆出生于1687年,因为坎蒂隆于1708年加入法国国籍,而只有当他年满21岁后才有这一资格。

坎蒂隆幼年的成长过程及其离开爱尔兰的时间很少人知道。1711—1713年间,他受聘为英国驻西班牙的军需办事处的职员,负责为英国对西班牙作战的军队购买、添置设备。1716年,他来到法国接手掌管其堂兄的银行。

1720年,在密西西比淘金浪潮中,坎蒂隆通过出售密西西比股权获利丰厚。为了逃避法国对于高利贷的法律制裁,坎蒂隆将他的贷款伪造成外汇兑换交易,即用一种货币的形

式贷出,再用另一种货币的形式收回。频繁的交易使坎蒂隆经常陷于法律纠纷中。为了彻底摆脱这些麻烦,他决定带着从投资和高利贷中赚取的巨额财富,回到英国过奢华的生活。

如果说坎蒂隆的出生是难解之谜,那么他的死亡更是扑朔迷离。1734年5月14日,即坎蒂隆返回英国不久,一场大火吞噬了他在伦敦艾尔伯马尔大街上的寓所,当时人们认为这场大火是意外灾害或蓄意谋杀。但是墨菲(Murphy)在1986年指出,失火当晚,坎蒂隆并未在屋中,他推测坎蒂隆是假借死亡以终结他的财富所引起的法律诉讼。为支持这一论点,墨菲提出坎蒂隆在失火前夕从银行提取了1万英镑。一位坎蒂隆的邻居声称那具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此外,事发多年以后,在南美苏里南的荷兰殖民地一带,曾发现坎蒂隆的手迹,很难解释窃贼为何会偷走这些毫无价值的手稿,而且为何会出现在苏里南。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坎蒂隆本人携带的。

坎蒂隆的经济学著作至今尚存的仅有一部,名为《论商业的性质》(*Essay 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这本书于坎蒂隆的寓所遭受大灾两年后出版,文中应附的一些统计数据,至今没有找到。据说坎蒂隆还有一些其他的著作,但都没有发现过。

《论商业的性质》一书分为三部分,阐明了一套简单的解释经济如何运行的至关重要的原理。第一部分描述了实际经济运行的过程,以及商品生产和雇佣工人生产这些商品的原理。第二部分重点阐述了货币体系,解释了货币和经济的相关性。最后,在第三部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述了国际贸易和外汇兑换。

在书中第一部分,作者将经济视为一个相关的体系,或货

币和商品的循环流动,并解释了这一体系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坎蒂隆深入分析了生产交换的循环过程,指出其重点在于地主的货币支出。地主的支出不仅养活了城市中的工人,也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收入从而养活了一些农民。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农业部门的农民既需要购买工业制成品,同样需要购买大量的农产品,这些需求为这两种产业的劳动者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和收入。由于对农产品的需求远大于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因此货币趋于从制造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同时,农民需要向地主缴纳地租,所以货币又从农民手中流入地主的腰包,从而开始新一轮生产和支出的循环过程。

坎蒂隆注意到,各行业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对不同产品的市场需求量的大小。如果农场主需要较多的工业制成品和较少的农产品,则人力、物力资源将会从农业部门流向制造业部门,从而工业制成品产量提高,农产品产量减少。正如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如果消费者对软底运动鞋的需求超过对皮鞋的需求,皮鞋生产厂商的销量将会递减,并有可能破产,而从事软底运动鞋生产的厂商将会兴旺起来。这一市场需求决定供给的法则同样适用于区域之间的资源流动。如果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多于农村,劳动者便会从农村流向城市。

坎蒂隆还分析了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企业家的经济作用。“企业家”一词最初源于远古中世纪时代人们对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称呼。18世纪初期,人们将承包商,尤其是与政府签订合同的承包商称为企业家。由于通常由政府支付费用,因此这一行业毫无风险。坎蒂隆借用了这一名词并将其重新定义。他认为,相对于一般按时领取工资的人而言,企业家应是冒险者。坎蒂隆认为,未来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所有的经

济活动在本质上都是有风险的。尽管如此,还是要有一些人在现在冒险以期在以后获取利润,否则生产将无法进行。冒险的企业家对于循环的生产过程的良好运作和经济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

书中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货币在循环过程中的作用。鉴于他对货币的经济作用的深入阐述,坎蒂隆理应被称为古典货币理论的奠基者。18世纪的货币即金、银币,可以通过采掘金、银金属或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商品获得。当采掘者或贸易商拥有较多的货币时,他们对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需求将增加,这种需求会促使其他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多、出口增加。通常,需求增加往往会刺激物价上涨,但并不意味着货币供给量的同比例增加,因为物价上涨会促使产出增加,而且有时候虽然有更多的货币,但却没有更多的货币支出。

现代经济学家将货币对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称为“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完全取决于哪些人持有货币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些货币。如果主要是商人、出口商持有货币,他们会选择储蓄或投资,这样将会扩大生产,而不是支出,因此物价不会上涨。然而,如果货币主要是由地主和一些沉溺于物质享受的人持有,物价将会上涨,而一些奢侈品价格的上涨更是首当其冲。

坎蒂隆认为,由货币缔造经济繁荣的时代已经结束,货币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国际贸易上。物价上涨将会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而与此同时,由于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便宜,从而更吸引国内消费者,这就造成了贸易逆差,意味着要将国内的货币运到国外以偿付进口商品。货币外流,将会使国内货币供给量减少,国内生产企业陷于停滞,坎蒂隆称

之为“硬币流动机制”(specie flow mechanism)。

书中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贸易政策,并且相当一部分继承了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参见孟)。坎蒂隆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并希望制造业贸易实现顺差。然而,他赞成贸易保护主义更多的是为了军事目的,而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坎蒂隆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会使英国人口增加,制造业上的贸易顺差可以允许英国进口粮食,养活更多的人口,从而使英国日益强盛。

坎蒂隆在经济学界不甚闻名,人们只知道他对魁奈和重农主义者的影响,以及是他创立的“货币流动将不同经济部门联系起来”的思想。然而,坎蒂隆对经济学的贡献绝非仅限于此。他的著作堪称第一部真正的经济学著作。它把经济活动想像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并解释了该体系运作的过程。鉴于此,坎蒂隆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第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

参 考 文 献

坎蒂隆的著作: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1755), translated by Henry Higgs,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64

涉及坎蒂隆的著作:

Bordo, Michael "Some Aspects of the Monetary Economics of Richard Cantill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2

(1983), pp. 235 - 58

Brewer, Anthony, *Richard Cantillon: Pioneer of Economic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Murphy, Antoin, *Richard Cantillon: Entrepreneur and Economis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Spengler, Joseph, "Richard Cantillon: First of the Moderns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 4 (August 1954), pp. 281 - 95

Spengler, Joseph, "Richard Cantillon: First of the Moderns I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 5 (November 1954), pp. 406 - 24

Tarascio, Vincent, "Cantillon's Theory of Population Size and Distribution,"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9, 2 (July 1981), pp. 12 - 18

弗朗索瓦·魁奈 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

弗朗索瓦·魁奈是经济学模型的创造者,是重农主义(physiocracy)的倡导者,也是第一位学院派经济学家。此外,他还以对放任政策的建议、对经济盈余的产生和分配的分析,以及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各部分的紧密结合体的观点引誉经济学界。

魁奈 1694 年出生于自凡尔赛向西 15 英里的梅里。魁奈的父亲是当地的农场主和小店老板,所以他有机会接受了一些正规教育。魁奈酷爱读书,他经常步行到巴黎去购买一些二手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

魁奈 17 岁那年,立志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尽管对医科教育有些许不满,但他仍坚持读完了医科,在 1717 年通过了医科考试,获得了从医资格,并在巴黎南部的曼特斯开了一家诊所。在出版了几本医学方面的著作后,魁奈在医学界声名鹊起,1735 年应邀成为维耶瓦公爵的私人医生。他于 1744 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法国科学院的一员。五年后,魁奈在凡尔赛定居,为蓬帕杜尔侯爵夫人(路易十五强悍的情妇)当私人医生,同时也是国王的健康顾问。

魁奈在 55 岁时对经济学和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广泛的兴趣和与高层的密切联系,促发了他为狄德罗

(Diderot)主编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写作的几篇文章的创作灵感。这些文章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的信徒自称为“重农主义者”,这一词来源于法语,意为自然的法则。

魁奈载于《百科全书》上的文章将经济活动视为货币、商品、人员在各产业部门的流通过程,如同血液在人体中循环流转。“谷物”是其在《百科全书》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因为在此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在法国经济中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部门”的观点。这是因为,只有农业具备产出超过投入的特征,从而产生出盈余。魁奈认为这种盈余来自于自然界,是土地馈赠的财富。这一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强调社会财富来源于生产过程,而不是重商主义者所认为的商品交换过程。这一观点得出的另一结论是,制造业活动由于其本身不能创造盈余因而不具备生产性,但这一结论引起了众人的非议。

正如我们所知,坎蒂隆将经济的运作描绘为一系列的循环流动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魁奈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拓展,在其经济学模型中对经济活动中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深入地作了定量研究。这一模型是在经济研究中首次构建的数学模型,详细分析了经济活动中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魁奈的分析建立在经济体系可被分为三个阶层或三个部门的基础上,首先是农业部门,生产出食物、原材料和其他农业品;其次是制造业部门,生产制成品如衣服、房屋和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均需要的工具等。对魁奈而言,制造业部门还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服务业部门,为国内外的交易提供便利;第三个是地主阶层,不创造任何商业价值,但拥有对土地的盈余产出的所有权,地租便体现了对这种所有权的回报,这一观点就是著名的“重农学派的地租理论”。

在“谷物”一文中,魁奈明确指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性的。大多数模型显示对农业的投入将会得到双倍的产出,而产出与投入间的倍数关系完全取决于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在下文中,将会看到魁奈为促进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政策建议。

最后,魁奈假设所有收入都将被支出,而且这种支出平均分配在农产品和制成品之间,这些假设引出了魁奈著名的之字形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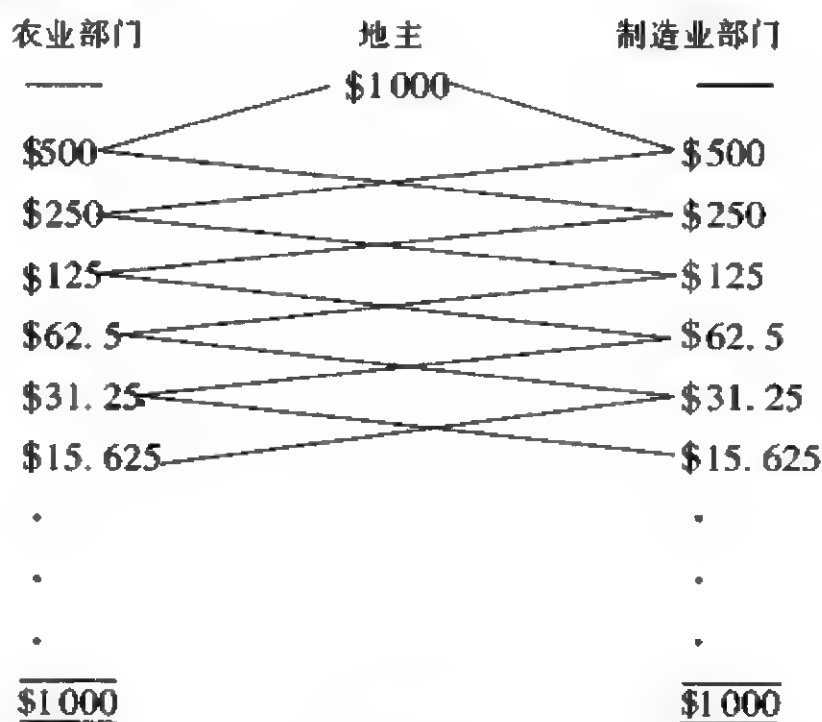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学模型

根据这个模型,地主将\$1 000地租平均分配,一半用于购买农产品,一半用于购买制成品,这样每一部门将得到\$500的收入。受雇于这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将会花费一半收入用于购买另一部门的产品,这样两个部门将会分别得到

\$ 250的收入。接着,这部分收入又会平均花费在两个部门,这一过程不断持续直至所能分配的金额趋于无穷小。我们将花费在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上的支出累计求和,如图 1 所示,均为 \$ 1 000。

研究各部门内部的运作远比研究各部门间的运作更具价值,这是因为只有在每个部门内部才具有生产力,才能创造经济上的盈余,因此让我们对各部门内部作一仔细研究。

土地所有者购买和消费了 \$ 1 000 的商品——\$ 500 用于购买食物,\$ 500 用于购买制成品。这一年中土地所有者没有任何产出,仅依靠这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出为生。例如,向农民征收地租作为土地盈余产出的回报,并将收取的地租用来购买消费品。

另外的部门将其首次得到的 \$ 500 收入用来购买必要的投入以保证来年能产出更多的食物和制成品。例如,根据图 1 所示,制造业部门购买了价值 \$ 500 的农产品,同时还有 \$ 500 现金。制造业部门又用这 \$ 500 现金向农业部门购买更多的投入,然后用其 \$ 1 000 的投入生产价值 \$ 1 000 的制成品。

农业部门生产出价值 \$ 2 000 的农产品,但仅出售了 \$ 1 000 的产品给土地所有者和制造业部门。另外,如图 1 所示,农业部门购买了 \$ 500 的制成品,同时向制造业部门销售了 \$ 500 的农产品,这两项交易对抵后尚余价值 \$ 1 000 的投入品和 \$ 1 000 现金,这 \$ 1 000 现金用于支付地租和下一个生产销售周期的投入。由于产出是投入的双倍,因此农业部门在下一年度中将获得 \$ 2 000 的农产品。如无外界因素干扰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将会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

与重商主义者一样,重农主义者也将经济理论视为制定

合适的经济政策的一种手段,而并非仅局限于理论本身。魁奈的经济学模型并不仅仅是用以阐述经济再生产和增长的规律,而是为了制定合适的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魁奈将自己定位于医生的角色之上,将经济视为需要帮助的病人。

针对这些政策目标,魁奈常常提供两个模型——一种受控实验。一个模型显示法国当时的经济现状;另一个模型则显示引入各种政策变革对法国经济的作用。魁奈的模型能够显示出,一个好的政策,将能促进经济增长,使法国经济趋向繁荣,这可由不断增长的农产品和制成品的产量来体现;相反,不妥善的政策将会造成法国经济的衰退和停滞不前。正如他们对自己的称谓中所流露的一样,重农主义者坚信只有符合自然法则的经济政策才是正确的选择。

从魁奈的经济学模型中引出的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是,政府只应对地主征税,而不对制造业部门征税,因为该部门并不创造可以征税的盈余。如果征税则将会减少制造业的投入,而由于在制造业中投入和产出比例相等,投入的减少将会直接降低其产出数量,由此造成加工制造部门的衰退。此外,由于农业部门也需要制造业部门的产品供给,所以将造成整个国家经济的衰退。

同样,对农业部门征税也会造成该部门可获得的投入减少并引起该部门的衰退。由于农业部门的产出是投入的双倍,那么\$1的税收将会减少\$2的产量,这种后果比对制造业部门征税更为严重。

既然对农业部门或制造业部门征税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那么只有对地主阶层征税,这一阶层不产出任何产品,而由于对该阶层征税并不会像对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征税那

样减少投入量,因此也不会致使经济衰退。

从魁奈的经济学模型中引出的另一重要的经济政策是,法国的农业体系应该重新调整,需要进行两大改革。首先,农业应走向现代化。小块的土地、落后的生产技术,都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只有通过扩大农民的耕种土地面积,新的、只有大规模才适宜的耕种技术才可推广使用。魁奈认识到,对新生产技术的投资,只有广泛普及到大量土地、大量农产品中才是有利可图的。其次,法国应以英国农业为典范,在农村中滋生出一部分资本家来。魁奈认为,为成功的农场主提供适宜的激励政策后,将会大大提高法国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并显著增加农业的盈余。而且,随着更多的农产品的产出,法国经济也将趋向繁荣。

从魁奈的模型引出的第三个经济政策是,储蓄或储藏货币都将制约经济的发展,因为它中断了货币、商品的循环过程。需求的减少会相应导致国家产出的下降继而导致经济萧条。从这一点来看,魁奈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理论的重要先驱者。

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背道而驰,魁奈赞成国际间实施自由贸易。作为一位重农主义者,他认为国家财富的增长有赖于总产出的增加而不是货币的累积;而产出的增加,需要农业生产力的增长。魁奈认为,国际间的自由贸易将会刺激对法国农产品的需求扩大,同时促使经济资源或投入从非生产性的制造业部门转移到生产性的农业部门。由于农业部门的投入增加,则其经济盈余也将相应增加,而经济盈余增加最终将带来法国经济的繁荣。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历史并不厚待魁奈。他与斯密一同

被称为“经济学之父”，但当亚当·斯密之名已家喻户晓时，魁奈的声名却仅限于专业经济学家才知晓。经济学家们人云亦云地批评——首先是斯密——魁奈的制造业部门不具有生产性的论断是错误的。此外，由于过于艰深而难以理解和模仿，魁奈的经济学模型也备受批判。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待魁奈又极其公正，几乎所有时代的经济学家都给予了他高度的评价。信奉数量化思想的经济学家盛赞魁奈是经济学模型的创始者，里昂惕夫(Leontief, 1941)认为魁奈的投入产出模型是优秀的先驱之作；传统经济学家认为魁奈对放任政策的建议和应对经济中的生产性部门征税的立场是有价值的，而更多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则为他将支出作为经济增长和衰退的重要决定参数的凯恩斯式的理论所吸引，甚至连马克思都对魁奈认识到经济盈余来源于生产，以及这种盈余如何引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和发展盛赞不已。无论何时，魁奈都是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

参 考 文 献

魁奈的著作：

L'Ami des Hommes, 5 vols., Avignon, 1762 with Victor de Riquetti, Marquis de Mirabeau

Philosophie Rurale 5 vols., Amersterdam, Chez Les Libraries Associates, 1764

The Economical Table, New York, Bergman Publishers, 1968

Quesnay's Tableau Économique, ed. Marguerita Kuczynski

and Ronald L. Meek,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2

涉及魁奈的著作：

Beer, Max, *An Inquiry Into Physiocra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9

Higgs, Henry, *The Physiocrats*, London, Macmillan, 1897

Meek, Ronald, *The Economics of Physiocracy: Essays and Trans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ressman, Steven, "Quesnay's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in *Economics as Worldly Philosophy*, ed. Ron Blackwell, Jaspal Chatha and Edward J. Nell, London, Macmillan, 1993, pp. 305 - 21

Pressman, Steven, *Quesnay's Tableau Économique: A Critique and Reassessment*, Fairfield, New Jersey, Augustus Kelley, 1994

Vaggi, Gianni, *The Economics of François Quesnay*,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其他参考文献：

Leontief, Wassily,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19—192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Marx, Karl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3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4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大卫·休谟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哲学家,就是他提出了知识只能来源于实践的论断。同时,他对萌芽时期的经济学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包括分析货币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

休谟 1711 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他的父亲是一名乡村绅士,在休谟幼年时便去世了,自此休谟由母亲抚养成人。所幸的是休谟的父亲在身后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从而使休谟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主要是请家庭教师在家授教。而后,休谟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然而,休谟很快便厌倦了学校的教育,于是他决定辍学到法国,以期成为一名伟大的哲学家。

尽管在此之前休谟已写过几本书(现在被视为哲学经典著作),但在当时他仍然无法在哲学界享有一席之地,也未能在苏格兰大学觅得教职。1745 年,他到一位苏格兰侯爵家当家庭教师。几年后,他又受聘为一位陆军将军的私人秘书。这些工作为休谟赢得了足够的金钱,使他得以在经济上独立,从而将许多时间用于阅读和写作。

1752 年,休谟被聘为爱丁堡公立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既为他提供了一份额外的收入,又使他有机会阅读

到大量的书籍,从而迸发出创作六卷本《英格兰历史》(*History of England*)(休谟作于1757—1762年)的灵感。1763年,休谟受聘为一位驻法英国大使的秘书,1767年成为外交部门的副部长。两年之后,休谟回爱丁堡定居,直至1776年去世。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休谟在货币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方面颇有建树。他分析了货币对利率、经济活动和价格的影响,阐述了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不能长时期失衡的原因。休谟曾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富国和穷国间的贸易往来会带来何种结果?”他的回答是,国际贸易无论对富国还是穷国均是有益的。

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重商主义者建议政府拟订政策以嘉奖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商人,然而对此他们却没有提出合适的理由,休谟通过阐述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解释了这一原因。休谟指出,商人之所以应受到嘉奖在于他们的节俭,他们节约开支和积累资金。充裕的资金引起利率降低,并促使其他商人增加贷款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市场竞争加剧,最终引起利润率下降。与商人相反,富有的地主通常会借款来满足其消费需求,这样将会减少社会资金的储备,刺激贷款利率上升。

这种分析不仅阐述了商人或企业家的经济作用,也提供了一种利率理论,现称为“可贷资金利率论”(Loanable funds theory of interest)。休谟认为,利率是由储蓄的供给和对储蓄的需求决定的。储蓄增加将会刺激利率下降从而有更多的资金可供借贷,储蓄减少则具有相反效应,将会促使利率上升从而抑制借贷。此外,休谟对储蓄和分析还解释了储蓄的合理性,储蓄是新的投资所需要的,也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

休谟还分析了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他解释了货币供给增加对经济的积极影响。从长远来看,货币供给的总体增加会促使价格上涨,出口和就业不变。最后,休谟还分析了货币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的经济效用,这一理论现今被称为“硬币流动机制”。尽管坎蒂隆是最初提出这一理论的人,但休谟却是第一位将此理论公开发表的人,因此通常将休谟视为此理论的创始者。“硬币流动机制”理论的发现使休谟脱离了重商主义者的局限,向古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迈进了一步,而宏观经济学体系在英国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纪初期才刚刚萌芽。

货币的短期效应是价格不会立即变化的结果,事实上,休谟认为价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通常几年内会维持稳定。休谟指出,当金、银金属被采掘后,通过支出进入流通,货币就这样逐渐集中到一部分商人手中,继而商人将手中的货币用于投资,因此工业生产规模扩大、社会就业机会增多。即使物价略有上涨,这种通货膨胀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提高了商业利润,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在某些时候,就业机会增多将会引起工资水平提高,同时,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流通的过程中的某些时候,商业企业将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其存货量日趋下降。这两方面的作用改变了货币传动体制。由于出口和社会就业保持不变,额外的货币将促使价格上涨而不是产生更多的产出和就业。随着时间的流逝,货币供给量增加将最终引起价格的变化,而生产和就业却比开始时没有增长。

继而,休谟分析了更多的货币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即“硬币流动机制”理论,它解释了经济力量是如何使得所有国家的

国际贸易自动趋向平衡的,他还解释了经济力量将如何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建立一个天然的货币分配体系。

再重新考虑一下黄金的发现和采掘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我们在上文已指出国内货币供给量增加将最终引起物价上涨,但是价格上涨对经济还有进一步的影响。高涨的物价将使一个国家的商品价格比国外偏高,从而减少出口;相反,由于国内物价高涨,国外物品的价格会相比便宜些,所以,国外生产的商品会大量充斥本国市场。由于出口减少和进口增多两方面的影响,将恶化本国的贸易平衡。流向国外以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远远超过流回国内购买本国物品的货币,造成本国货币大量流失。最终,随着货币量减少和消费支出的减少,本国物价将逐渐下降。

这一分析的重要结论之一是贸易失衡不可能长时间维持下去。实施贸易顺差政策的国家的货币供给量将会增加而导致物价上涨,这将会减少贸易顺差;相反,实施贸易逆差政策的国家将随着货币供给量的减少而导致物价下降,进而减少贸易逆差。这一分析得出的另一重要结论是,无论出口和进口贸易是否均衡,一个国家的黄金储量总将趋向相同水平,或一平衡状态上。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都将休谟视为重商主义者,但“硬币流动机制”理论的创建却对这一论断提出了很多疑问。重商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一个国家应力争贸易顺差,政府为实现贸易顺差应大力扶持民族商业的发展。但如依据“硬币流动机制”理论,这一目标将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任何时期的贸易顺差都将会造成贵金属流入和国内物价上涨,并进而减少贸易顺差。在休谟看来,重商主义者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

的,而且,他本人也并不赞成重商主义者为促进贸易顺差而推行的经济政策。

最后,休谟还对富国和穷国的贸易往来的结果进行了研究,这一问题自 18 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它之所以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因为它直接牵涉到国家经济的发展。20 世纪末,这一争论又集中到德国统一、将希腊和西班牙引入欧洲联盟、南北美之间的贸易封锁等经济事件上。

休谟认为,国际贸易有利于穷国的发展,亦无损于富国的发展。贸易往来可促进穷国快速发展,其人民的生活水平将逐渐同富裕的邻国和贸易伙伴接轨。而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则提出了相反意见,他认为累积的因果关系(cumulative causation)将会使国家间生活水平差距日益显著,因为,富国的富裕是以穷国的贫穷为代价的。

休谟指出,将先进技术从较发达国家转移到欠发达国家的机制可提高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香港为例,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水平接近较发达国家。此外,休谟还指出,发展不均衡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对富国也同样有益,因为这将为富国提供广阔的海外市场。因此,休谟提倡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者所建议的对国家间的贸易往来进行限制。

从对重商主义者和当时的经济热点问题进行研究开始,休谟通过阐明货币和贸易的互相影响以及货币和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经济学分析。然而他在经济学史中的地位却远未止于此。在从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演变的过程中,休谟是一位重要的承前启后的杰出人物。

参 考 文 献

休谟的著作：

History of England (1757 - 62), London: T. Cadell and W. Davies, 1802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 T. H. Green and T. H. Grose, 2 vol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75

Writings on Economics, ed. E. Rotwein,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5

涉及休谟的著作：

Cavendish, A. P., *David Hume*, New York: Dover, 1958
an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9

Elmslie, Bruce, "The Convergence Debate Between David Hume and Josiah Tucke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Fall 1995): 207 - 16

Johnson, E. A. J., "Hume, the Synthetist" in *Predecessors of Adam Smith: The Growth of British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65, pp. 161 - 81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尽管之前已有其他学者论述了一些经济学思想和原理，但亚当·斯密仍被世人尊称为“经济学之父”。这一称誉并非源于他富有创意的观念或经济学分析的技巧，而是源于他将资本主义确立为使每个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的一种经济制度。斯密是第一位将收益视作来源于更充分的竞争和提倡能够刺激更多竞争的政策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政府应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并应拟订政策来抑制垄断的出现。

斯密 1723 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一个名叫克卡尔迪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和关税审计官，在斯密出生不久便去世了，因此，斯密由父亲生前指定的监护人和母亲共同抚养成人。

虽然斯密自小体弱多病，但却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斯密 14 岁时，被送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伦理学、数学和政治经济学。1740 年，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在贝奥利尔学院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涯。

斯密发现牛津大学是一所荒谬的学校，授课无几，更学不到什么具体内容。由于在课堂上无法学习到很多知识，斯密将大量时间泡在图书馆做他最喜欢的事情——读书，尤其是关于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后来斯密(1776)提出的

“教师薪酬应由其课堂上的学生数目来决定”的建议就是根据他在牛津大学的经历而并不是主要出于激励学校竞争的目的。

1751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一年以后,他又改教伦理学。他有关道德的讲稿《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他的在文字上的第一次成功。

《道德情操论》阐述了人们是怎样具备辨别是非的道德观念的,答案在于人们必须要将自己放在公正的旁观者的立场上,这样在判断事物时才能不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更要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正如良知一样,这种公正客观的立场督促人们行事遵守正确的道德准则。

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在阅读了《道德情操论》一文后,决定将他的继子——巴克卢公爵拜在斯密的门下。斯密接受了汤森德的聘请,辞去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位,陪伴小公爵来到法国。这份新工作使斯密有了充足的时间来阅读和思考,此外,法国一行还使斯密得以遇到了著名的重农主义学者,包括弗朗索瓦·魁奈。1764年初,正如斯密曾在信中向老朋友大卫·休谟所提到过的,他开始创作一本书,以打发时间。

在三年的法国之行后,斯密回到克卡尔迪,花费了十年时间用来创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发表于1776年,这本书给斯密带来了巨大的声名和财富。与《道德情操论》不同的是,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人们总是依照利己主义来行事的,而且这种个人的利己行为最终会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在书中著名的一节中,斯密描绘了这一过程,“当每个

人行事时,他想要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但……一只无形的手将最终带来一种个人预料不到的结果。”这种没有预料到的结果就是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国富论》开始分析了引起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因,并解释了利己主义和竞争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此外,文中还分析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这些对经济学原理的研究都与重商主义信奉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参见孟)造成了冲击。

斯密认为是机械化流程和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促使经济增长。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初期,斯密目睹了工业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初步影响。18世纪30年代,比手摇纺织机速度更快的织布机的发明,使织布更加快速;1769年多轴织布机的发明使一个人可以同时织几根线。这些发明和其他技术创新使工人们的工作效率比没有机器帮助时大大提高了。

《国富论》开章便指出了劳动分工如何使工人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斯密在书中描绘了一个别针厂的生产过程:

“这一行业的生产方式现在展开……它被分成几个部分。一个人将金属线展开,另一个人将它拉直,第三个人负责切割,第四个人使它尖利,第五个人磨光针头,制作针头另外还需要二至三个工序……这样,别针生产的主要过程将被分为大约18个不同的工序。”

斯密指出,别针厂按生产流程分工后,10个工人每天可生产48 000个以上的别针,相反,如果这些工人必须单独工作的话,他们每天生产的别针不会超过20个,劳动分工使别针的产量提高了2 000倍。

通过劳动分工,工人们会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原因如下:首先,专门从事一项工作可提高工人的劳动技巧和熟练程度,因此工人的工作速度加快;其次,可节约从一道工序转到下一道工序的时间;第三,当只专门从事一项工作时,工人们将有可能发明一些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生产工具。

斯密认为人类有买卖商品的天性,人类渴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即自我利益)的天性是劳动分工及其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动因。但是斯密还看到劳动分工的一个重要的局限性。如果厂家不能卖出多生产出的别针,就没有必要进行细致的劳动分工,使用更多机器从而提高别针产量。因此,对英国商品生产而言,扩张市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基于这种认识,斯密支持国家间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可使英国厂商在世界范围内销售其产品而不仅限于本国内部。此外,斯密还认为自由贸易将对英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这将使英国的厂商获得国外更便宜的产品,从而最终降低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

自由贸易的倡议实质上是对重商主义者的批判。重商主义者赞成限制国际贸易,他们制定的政策将限制国内生产商的市场和抑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斯密认为重商主义者有关从新大陆的英国殖民地获利的观点也是错误的。英国获利并不是因为其销售商品到美国换回金币,而是因为销售了更多的商品、工人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同样的劳动力可产出更多的商品。

然而,斯密对自由贸易也不是无条件赞成。由于国防的重要性胜于国家财富的增加,因此,他提出无论何时只要自由贸易将促使别国的军事力量提高或英国的军事力量削弱,就

应反对自由贸易。斯密赞成英国《航海法》的颁布,这条法令要求美国船舶在将商品运往其最终目的地——欧洲的途中,应在英国停泊并将货物卸到英国的船舶上。斯密认为这项政策将会增加英国的船只和训练有素的海员的数量,而这两项资产在战争爆发时对英国这样的岛国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另一方面,斯密反对对一些限制英国商品销售的国家实施关税报复;他声称一种坏政策不应成为另一种坏政策产生的理由。他认为,只要行业协会规章不限制劳动力流向更新的行业和更具生产性的用途,由于自由贸易而导致的英国失业工人将很快找到工资待遇更好的新工作。考虑到这在现实中不会很快实现,斯密提议将防御性关税逐渐降低,而不是一次性消除,因此这一转变过程将会缓慢而平和。

斯密也反对流行的“幼稚工业保护说”(infant industry argument)倡议的保护性关税,幼稚工业保护说认为保护主义对一国的新兴工业是必要的,国内新兴工业厂商在经验和技术上都不如国外已发展成熟的同业厂商,所以面对国外对手,国内厂商将会陷入竞争劣势中,因此幼稚工业保护说主张,如果一国要发展在一个新兴工业中的生产技能,就必须保护国内的厂商,直到它们掌握了必需的经验。而斯密则反对该学说,认为它造成了无效率的垄断并使稀缺的资本资源转向了垄断企业。

垄断是自由贸易、英国商品的市场空间以及经济迅速增长的敌人。斯密认为垄断有四种负面效应,第一,对消费者而言垄断会造成物价上涨,损害消费者利益。斯密的解释是厂商会自动联合起来共同制定策略来提高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生产厂商越少,规模越大,它们就越容易通过价格提高来

共谋对抗公众。

第二,斯密将垄断视为“高效管理的大敌”。他认为,竞争可促使管理者尽可能高效地运作并积极思索提高运作效率的方法。由于竞争的存在,如果一公司没有尽可能地高效运作,而其他公司可以做到;或者一些新成立的公司运作更高效,运作低效的公司则会被其更具竞争力的对手淘汰出局。

第三,斯密认为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很有可能迫使政府保护其垄断地位并且很有可能取得成功,这将使一些消极的法令应运而生。斯密以禁止出口绵羊的法令为例。为了确保英国羊毛制品的行业垄断力,英国议会通过了禁止绵羊出口的法令,因为如果英国不出口羊,那么其他国家就不能生产羊毛制品卖给英国。

最后,斯密指出垄断将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由于垄断将造成商品定价过高,垄断资本家便可从中获取巨额利润,这将刺激生产的扩张。资源将流向垄断产品制造业,这既不是因为人们对这些产品需求最多,也不是因为存在提高劳动分工程度和降低成本的可能性,而仅仅是因为垄断的存在。

反对垄断也就是对重商主义者的驳斥。由于重商主义政策杜绝了外国竞争的加入而加剧了国内垄断,因此这将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和严重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

虽然被视为放任经济的信徒和政府的批判者,但斯密并非真的反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所有行为。事实上,他认为政府具有四项重要功能,首先,正如上文所述,政府具有防止形成垄断,确保竞争环境的作用;其次,斯密认识到只有政府才能保护整个国家抵抗外国侵犯,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斯密赞成《航海法》的颁布和政府在国防上的大量开支;第三,政府必

须保证国内的秩序和安全,也就是使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受其他人的侵害。政府有责任建立强健有效的警察、司法体系;第四,斯密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7)等保守派经济学家之先就建议如果一个国家外部性(externalities)过大时,政府可供应公共产品。

对大多数经济交易而言,所有的生产成本是由购买、消费商品的人负担的,同样,所有的生产收益也是消费者获得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许多在外部的人从经济交易中收益或亏损很多。这些被强加于交易市场之外的人身上的收益或亏损被称为“外部性”。例如污染就是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在受污染地区,没有购买该工厂生产的商品的人们也同时要承受污染带来的成本(一个较脏的环境)。而教育则是一个典型的正面案例,每个人都可以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中受益。由于教育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提供更多的商品,因此没有花费时间接受教育的人们也从他人所受的教育中获得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个人可以通过他人的努力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那么个人就不会有动力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接受教育。但是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则最终所有人都会蒙受损失。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人们将不再在教育上支出,除非教育由政府提供。

除了对经济增长的阐述外,斯密还尝试阐述了收入是如何从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中具体分配的。作为第一位分析收入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家,斯密作出了几点贡献,主要包括对商品价格和生产者收益如何确定的研究。

首先,斯密区分了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市场价格是人们在日常交易中支付的价格,其价格是由商品进入市

场的固定数量和社会需求决定的。相反,自然价格则是一个均衡价格,或是市场价格逐渐变动所趋向的价格。

斯密认为一种自动机制将会使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渐统一。如果某些商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自然价格,那么地主和雇主则会将土地和资金转移去生产更多的这些商品,这样将会降低市场价格并促使市场价格接近自然价格。另一方面,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其自然价格,那么地主和雇主则会寻求生产其他商品或将土地和资金用于其他用途,这样将会减少这种商品的供给,促使市场价格增加并逐渐向其自然价格靠近。

接着,斯密阐述了每种商品自然价值的决定因素,他采用了价格的生产成本理论,即商品的自然价格是支付地租、劳动力、资金等成本的总和。每种成本都按自然利率支付,因此斯密就需要解释是什么决定了自然利率。

斯密关于自然地租的解释是令人费解的。一方面,他认为由于土地的稀缺性造成了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另一方面,他也赞同重农学派的地租理论(参见魁奈)将地租视为使用土地种植庄稼取得盈余产出作为对地主的回报的观点;此外,他还提到级差地租理论(differential theory of rent),该理论认为地租是对生产率更高的土地所有者的回报。

斯密的自然利润率的理论比其自然利率的理论更差强人意。他提出自然利润是对由于储蓄而积聚的资本的回报,但这仅仅是对自然利润的一种定义,而没有解释是何因素决定了自然利润率的高低。

斯密用最低生活工资理论对工资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一理论在《国富论》发表后在经济学分析中占据支配地位达一个

世纪之久。最低生活工资理论认为自然工资率是工人正好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比率。如果工资低于生存水平,工人们将会死亡;由于提供劳动和服务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工资率将不得不上升。而如果工资高于生存水平,较高的生活水平意味着工人死亡率减少,从而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由于工人数量增加,将最终迫使工资下降到维持生存的水平。

无论斯密是否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之父”,但他的确是公共财政研究领域的先驱。正如前文所述,《国富论》描绘了在一个日益繁荣的经济中政府的适当角色,并讨论了政府如何最大程度地增加国民收入。

考虑到公共支出决策中的资金必须通过税收来筹集以支付这些支出,斯密拟订了向公众征税的四条规则。首先,他认为税率应该是同比例的,即每个人缴纳的税收占其收入比例应是相同的。现在许多税制(像个人所得税)在其纳税人中采取累进制,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比例高于低收入人群,而在斯密时代大多数税制是累退制的,对低收入人群的征税比例高于高收入人群。因此,斯密提出的同比例税率将会减少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增加高收入和拥有较多财富者的税赋。

其次,斯密认为纳税人不应对自己的应纳税额一无所知。他们应该事先知道纳税的数额和时间。此外,每年的税收政策不应改变过大,否则会使纳税人无所适从。

税收的第三个规则是应该一段时间内征收一次,而且征收方法应该尽量使纳税人感到方便,而且对资本收益征税应在其实现时而不是在收益产生时。如果每年都对每个利用拥有的资产增值的人征收资本收益税,则人们将会被迫变卖资产以支付税收而不是赚取收益。

第四,斯密认为最好的税收政策应尽量减少征收成本,税收征收政策不需要很多征收者;不应损害经济发展或不应促使偷税行为的增加(例如走私商品以免缴进口关税);不应对付偷税者实施过于严厉的惩罚而使他们倾家荡产。拟订这些税收规则的最终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税收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损害。

马克思、凯恩斯、斯密是经济学发展历史中最重要三位经济学家。斯密认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将会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共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唯一潜在的问题是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商业垄断行为或糟糕的税收政策。因此,斯密提出了反对重商主义对贸易实施限制,提倡英国政府控制垄断,对公民征税应谨慎等观点。

斯密对竞争的看法相对乐观,他认为竞争性资本主义将会提高生活水平,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加富有。在《国富论》出版后,这种观点逐渐被广泛接受,但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斯密没有能目睹到失业、污染、英国工人的贫困、英国工业城市的堕落等这些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严重而深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斯密的追随者们所必须探索的。

参 考 文 献

斯密的著作: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notes taken

by a student in 1763),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4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涉及斯密的著作：

Friedman, Milton, "Adam Smith's Relevance for Today," *Challenge*, 20, 2, (March - April 1977), pp. 6 - 12

Hetzel, Robert, *The Relevance of Adam Smith*, Richmond, Virginia,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1977

Hollander, Samuel, *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3

Rae, John, *The Life of Adam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895

Ross, Ian Simpson, *The Life of Adam Sm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杰里米·边沁作为一名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而闻名于世，作为哲学家的边沁的主要贡献在经济学方面，其中包括将效用(utility)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中。

边沁 1748 年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律师，因此边沁在幼年时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经济学界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边沁在幼年时便是一名小神童，据埃弗里特(Everett, 1931)记载，边沁在不会说话时便已经认得字母表。

边沁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公学接受了教育，12 岁时转入牛津大学国王学院。他 1767 年被授予学士学位，继而先后在伦敦的林肯法学院和牛津学习法律。1769 年获得律师资格后边沁却未从事过律师职业，这部分是由于他不喜欢法律行业，但更主要是因为他渴望改变世界，最起码是推动英国的发展。因此，边沁没有步其父之后尘，而是广泛学习哲学和政治理论。他渴望成为一名社会改革家，说服政府首脑和公众采纳他的方案，以提高英国的生活水平。

边沁提倡的一些著名的改革措施包括：生育控制、成年人(包括妇女)选举权、联盟的合法化和市民服务的开展，但他最突出的计划是监狱和处罚法令的改革。18 世纪 90 年代，边沁发起了倡议建造样板监狱的运动，即“全景监狱”(看守所

在中间),边沁希望“它能使无赖者变得诚实,懒惰者变得勤劳”。然而这一计划在当时的英国一直未被采纳,直至19世纪初期才在圣彼得堡初次建立。

这些改革建议使边沁一时间声名鹊起,跟随者云集,不久便成为英国改革者团体——“哲学激进者”的领袖。这一组织之所以得此头衔,是因为该组织的建议在18世纪末期的英国实属激进,但依据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的教义又很正确,或其实施将会使绝大部分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幸福。

边沁对经济学较为突出的贡献是其出版于1787年的被错误冠名的《为高利贷辩护》(*Defence of Usury*)一书。自中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对是否应限制利率这一问题争论不休。几个世纪后这一争论转变为对贷款征收利率是否合乎道德准则。20世纪末,这一争论又转变为对信用卡和消费者贷款的利率是否应设定最高限度。虽然争论的焦点有所转移,但其实质未变。争论的一方认为因为借款者大都很穷,极需资金,而贷款者则利用借款者的弱点和穷困征收高利率;争论的另一方认为由于贷款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因此需要征收利息来作为对贷款者风险的回报。

亚当·斯密(1776)提倡通过设置利率的最高限度来实行社会公众对利率的调控,而边沁则认为这与斯密的放任原则相违背,而且他指出“为货币的使用确定价格并不像为商品确定价格那样合乎情理”,同时,他认为既然一方愿意为贷款支付高利率,那么就很难解释法律规定禁止高利贷的原因。

反对法律限制利率高低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将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首先,贷款者由于无利可图而不愿将款贷出,旨在帮助贫穷人口的反高利贷法律,实际上将损害其利

益,使他们更加贫困,因为他们将很难筹集到所需的资金。其次,反高利贷法律使积极进取的商人和穷人一样无处贷款,这实质上将对所有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生活水平带来消极影响。第三,边沁认为如果穷人借不到钱,迫于生存他们会选择其他社会不怎么愿意见到的方式来取得资金。第四,边沁认为禁止高利贷将会滋生出贷款利率更高的黑市交易,这样,反高利贷政策损害的又正是政策旨在帮助的群体。最后,在某种程度上领先于新制度经济学(参见诺斯)的是,边沁指出,禁止高利贷的法律,将会导致人们对法律的蔑视,从而损害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在读完边沁的著作后,亚当·斯密也认识到自己所提倡的禁止高利贷的政策是错误的,政府不应调控利率的高低。

边沁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并不仅仅是提出了反对政府控制利率高低的理论,而在于他将效用、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ation*)的观念引入到经济学分析中来。与边沁同时代的学者曾将“效用”这一术语引入到法律、政治、道德和经济学讨论中,但他们对效用的解释均是含糊、不精确的,没有弄清效用这个术语到底意味着什么、效用应如何衡量、不同类别的效用应如何比较。边沁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试图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道德领域中的艾萨克·牛顿。

边沁在《道德和法制原理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948)的绪论中写到“自然将人类置身于两大君王——幸福或痛苦的统治之下”,然后他继续将效用的原理定义为道德的原理——对幸福和痛苦的思考决定了“我们应该去做什么”,而正确的行为就是使纯幸

福,或是总幸福减去总痛苦的幸福最大化。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在衡量他们的幸福和痛苦,边沁认为人们衡量幸福的七大标准包括:(1)强度;(2)持久时间;(3)确定性;(4)类似性;(5)多发性;(6)纯度;(7)广度。边沁列举了14种幸福,包括财富、能力、权力、声誉、回忆、想像力、仁慈和憎恨等;12种痛苦包括失望、遗憾和欲望等。他还列举了一些影响幸福和痛苦程度的因素,如健康、性生活、年龄、教育、思想的坚定性等。当其同时代的人还在对幸福和痛苦泛泛而谈时,边沁却已在具体研究这一问题,并试图专业、精确地对效用进行衡量。

边沁指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看电视的幸福可与看经济、哲学书籍带来的幸福相媲美,穷人和富人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也是相等的。既然世界上所有人在幸福的感受程度上是相等的,那么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就不应向富人倾斜,而边沁所处时代的绝大部分政策正体现了这种倾斜。

功利主义的进步的涵义是:教育和法律是推动一个国家幸福最大化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教育的意义在于它能为人们提供一份好工作,为人们增添幸福并使人们具有辨别不同行为会带来幸福、痛苦两种结果的能力;法律则是必要的、对人们没有带来幸福最大化的行为的处罚,并激励人们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或有利于使幸福最大化。边沁认为政府就是帮助人民提高幸福程度的机构。

功利主义的教义提供了一种评价政府拟订的政策、法律是否合理的方法:能提高全民族纯效用的政策就是好的,相反则是不好的,这种功利主义的计算方法实质上就是其当代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方法的雏形。事实上,边沁在《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首次引用了“成本—效益”的概念来评价公共支出是否合理。他提出评价公共支出是否合理应当将由“最恼人和最繁重的赋税”所产生的成本与其取得的效益进行比较。如果政府支出产生的效益大于向公民征税产生的成本,则这种公共支出是合理的;相反,如果征税带来的成本远远超过公共支出的效益,那么这种支出就不应发生,也不应为此而征税。

尽管功利主义思想具有道德规范和政策指引的作用,但其也存在令后来的经济学家困惑的很多问题。首先,虽然边沁试图将效用概念具体化,但仍无法解释清楚在实践中人们如何衡量这个模糊的概念,他也不清楚如何比较不同的效用,更别提将不同的人的幸福和痛苦累加计算了。其次,许多学者批评功利主义思想是一种不道德的教义,因为它忽视了在评价政府和个人行为中正义和公平所起到的作用。例如,在功利主义思想里,“歧视”也是合理的,只要它有助于实现一国最大程度的幸福。最后一点,边沁关于人类本性和道德观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人们依据本性在幸福和痛苦的支配之下或他们的行为总是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纯幸福,则他们想要做的和实际做的将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将很难讨论人们行为的正确或错误,或要求人们对其个人行为负责。

公平地说,边沁也意识到他的理论中所隐藏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他的这种理论仍旧是组织社会和运作政府的最可行的方法,否则只有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去选择政府和社会如何运转;边沁认为,如果这样,将会造成社会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由于对效用原理的深入阐述及其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具体应用,边沁赢得了“功利主义之父”的头衔,并在后来的经济学家心中成为一种哲学的引路精神的象征。

参 考 文 献

边沁的著作:

Economic Writings, ed. W. Stark, 3 vols., London, Allen & Unwin, 1952 - 4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entham 1952 - 4, Vol. 2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Riverside, New Jersey, Hafner, 1948

涉及边沁的著作:

Everett, C. W. *The Education of Jeremy Bentha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Halévy, Elie, *The Growth of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49

Mitchell, Wesley C., "Bentham's Felicific Calculu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33(June 1918), pp. 161 - 83.
Reprinted in *The Backward Art of Spending Mone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50, pp. 177 - 202

其他参考文献：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是一位在经济学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主要成就的人口学说如今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同 18 世纪末期试图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观点相反,马尔萨斯认为任何生活水平的改善都会造成人口数量增加从而又使生活水平下降。马尔萨斯还与同时代的经济学者在许多论题上展开辩论,如方法论(他认为经济学应该是经验性科学而不是演绎性科学)、理论问题(他认为经济可以经历较长时间的高失业状况),以及政策问题(他反对自由贸易以及国家对穷人的救济)。

马尔萨斯 1766 年出生于萨里郡的沃顿镇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乡绅,使马尔萨斯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早期教育。他的启蒙教育老师是他父亲和私人教师,之后他在一所一流的私立中学就读。18 岁进入剑桥耶稣学院攻读数学和自然哲学课程。

尽管他的父亲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建筑师,马尔萨斯却决定进入教会工作,1788 年他被任命为牧师——马尔萨斯牧师。1793 年他成为耶稣学院的会员和奥克伍德(沃顿的一所小教堂)的助理牧师。

当马尔萨斯在沃顿工作时,他曾与父亲就改善人类经济

状况的可能性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马尔萨斯的父亲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他却认为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这场辩论促使马尔萨斯针对该问题阅读了大量书籍和写作了若干文章,并在1798年首次出版了《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

《人口论》的出版使马尔萨斯迅速声名鹊起,并得以在伦敦附近的新东印度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商业和财政课程(1805)。东印度学院是一所职业学校,主要为东印度公司培养行政管理人员。教学生涯使马尔萨斯成为第一批学院派经济学家之一。此外,由于教学并不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这使马尔萨斯有许多空闲时间来使自己逐步融入社会,与朋友互相交流(尤其是大卫·李嘉图),并就经济学原理和政策等问题展开讨论。除了争论他的人口原理外,马尔萨斯与朋友们的争论话题还广泛涉及到英国的《济贫法》、《谷物法》、自由贸易的好处、食物过剩或短缺以及过剩或短缺的可能性等。

在18世纪中期的英国,工业革命正声势浩大地进行着。然而工人们却在基本生存线附近挣扎,生活工作状况在18世纪后期更加恶化。工作的单调重复、工作时间延长和生产流水线的速度都使工人们不堪重负。劳动分工的出现,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方法”,使工作变得如此程序化以至于妇女和儿童都可以与男子一样从事工作。而商人当然愿意雇佣女工、童工,因为他们的工资较低。

这期间涌出许多工人阶级的拥护者,其中较为著名的则有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孔多塞(1795)认为

更多的经济平等和安全保障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物质福利水平。他提倡实施两大改革,一是建立福利制度为穷苦的工人们提供保障,二是政府应管制信用贷款的利率以使贫困家庭可以低成本借到钱。欧文尝试在工业城镇中建立乌托邦团体,来帮助改善工人阶级家庭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戈德温(1793)的分析及其政策建议更具激进性,他将工人的贫困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他倡议应将财富从其所有者转移到能从财富中获取最大收益的人手中,他声称应铲除世界上所有的贫困、不公正和人类的苦难。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正是受到了这些人的激发,同时也驳斥了他们有关改善人民经济状况的可能性。马尔萨斯认为,由于贫困和苦难对每一社会中大部分人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还指出,任何试图减轻贫困和苦难状况的行为,无论最初的意图多么美好,无论经过多么完善的思虑最终都将恶化这些状况。这一观点也为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接受,他将经济学称为“令人沮丧的科学”,这种称呼一直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之久。

马尔萨斯认为人们的生活状况之所以不可能得到改善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他认为人们对性愉悦的永不满足的欲望造成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如果不加控制,人口总数将按几何级数递增——1、2、4、8、16等;其次,马尔萨斯认为农业生产遵循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规律;当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耕种时,每一块新土地的产量都将少于从前。因此粮食产量最多是按照算术比例递增的——1、2、3、4、5等。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粮食供给增长的速度,到某个时候粮食将不足以养

活所有的人口。如果再不控制人口增长,则将会导致饥荒的发生。

在《人口论》的第一版中,马尔萨斯只提倡用“积极的”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包括饥荒、自然灾害、瘟疫和战争等增加死亡率的方式。但在《人口论》的第二版和其后几版中,马尔萨斯又增加了一些“预防性”措施,如禁欲、生育控制、晚婚等,这些措施具有降低出生率和人口增长速度的作用。同时,对人口增长速度的预防性措施还可缓解人们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然而马尔萨斯仍然坚持由于人类对性愉悦的强烈欲望,人口增长速度不可能在预防性措施下显著减少;由此得出的结论仍然是改善整体的经济状况将是不可能的。

对孔多塞、欧文、戈德温等人的驳斥来自于他的以下分析。如果像戈德温的鼓吹那样——社会财富和收入能平均分配,或像孔多塞、欧文建议的那样——通过各种社会改革措施使穷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工人家庭将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使自己很快重新陷入贫困之中。正因为如此,马尔萨斯反对立法救济穷人和慈善募捐活动,他认为这样只会导致产生更多的穷人。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经济学者也作过类似的论述,即政府援助只会使穷人养育更多的孩子,从而加重其经济困境。

几年后,在《现今粮食高价原因之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一书中,马尔萨斯进一步提出反对对穷人的救济。他指出政府救济会造成英国谷物价格上涨。如此一来,政府救济不仅会损害穷人的利益,必需品价格上涨更会损害所有英国公民的利益。

尽管以《人口论》而闻名,但马尔萨斯对经济学还作出了

其他理论和政策上的贡献。

在理论上,马尔萨斯阐述了利润的合理性(见马尔萨斯的《地租论》*Essay on Rents*)。正如我们所知,亚当·斯密没有提出任何利润理论,也没有解释是什么影响利润水平,马尔萨斯填补了斯密留下的这一理论空白。他认为,利润是对资本家参与生产过程的回报。利用生产工具和机器的工人的生产率高于缺乏这些资金设备的工厂的工人的生产率。由于资本家提供资金用于生产过程,那么资本家就对生产作出了贡献,理所当然应得到相应的回报。

《地租论》还发展了级差地租的理论(参见李嘉图)。根据这一理论,地租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和地主对土地的改良而产生的。经济进步意味着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不太肥沃的土地也必须加以利用。由此一来,土地肥沃程度差异日趋显著,其地租的差异也扩大了。与李嘉图的观点相反,马尔萨斯认为高地租是经济繁荣的结果,也是衡量繁荣程度的一种方法。

在政策层面上,马尔萨斯竭力解释了经济萧条或过剩——商品卖不出去、社会失业率很高的原因。他的回答是过剩是由于社会需求或消费支出不足而引起。相反,他还指出物价上涨是经济活动中消费支出过度造成的。正基于此,凯恩斯(1964)将马尔萨斯称为“经济周期理论”(theory of business cycles)的伟大先驱者。

就在马尔萨斯投入《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的创作时,英国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马尔萨斯认为,这场萧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资本家的收入越来越多,并且远远超过可能

用于可获利性投资的金额。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新机器需要新工人,但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造好,而新工人则需要15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劳动力不足,工资将会上涨,利润率将下降,因此资本家倾向于将收入以现金的方式保存而不是用于再投资。其次,马尔萨斯认为新机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减少了对工人的需求。因为资本家获得的收入超过其可获利性投资,储蓄过多,这样个人的美德就变成了社会的邪恶——消费支出过少导致了商品过剩和工人失业。

马尔萨斯在他的分析中提到了针对经济过剩的对策。他建议政府应改变收入的分配,从而使资本家的收入降低而地主的收入增加。因为马尔萨斯认为地主会将所得收入的绝大部分用来消费;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则会雇佣更多的佣人,更加奢侈地消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尔萨斯赞成英国《谷物法》的实施(该法于1815年被批准,1846年被撤消),这条法律禁止英国从国外进口粮食直至价格达到一定标准。马尔萨斯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进口粮食的减少,英国将会有更多的土地用于耕种。根据收益递减规律,(级差)地租将提高,因此地主收入也将提高。此外,马尔萨斯还认为,由于贸易限制造成的谷物价格上涨将会引起工人工资的相应增加,这最终将使资本家收入降低、储蓄减少。

尽管对经济学理论作出了许多贡献,尽管被尊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先驱者,马尔萨斯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还是与其人口学说紧密相关的。“马尔萨斯主义”这一名词更代表了人类无法改善自身经济福利的悲观主义思想。

参 考 文 献

马尔萨斯的著作：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first edition 1798. A paperback edition of the Essay is published by Pengui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London, Murray, 1820

The Pamphlets of Thomas Robert Malthu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0

涉及马尔萨斯的著作：

Bonar, J. R., *Malthus and His Work*,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6

Grampp, William D., "Malthu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6, 3(1974), pp. 278 - 304

James, Patricia, *Population Malthus: 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Keynes, John Maynard, "Malthus," in *Essays in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1951, pp. 81 - 124

其他参考文献：

- de Cariat, Jean-Antoine-Nicholas, Marquis de Condorcet.
*Outlines of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London, J. Johnson, 1795
- Godwin, William,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1793), New York, Woodstock Books 1992
-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4
- Murray, Charles,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罗伯特·欧文 ROBERT OWEN

(1771—1858)

罗伯特·欧文是 19 世纪初期英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的领导人,也是一位实践性的社会、经济改革家。作为许多制造厂和社团的经理和合伙人,欧文总是尽力使 19 世纪的英国工厂更具人性和提高工人生活水平;作为一位经济和社会思想家,欧文坚信经济政策改革将会改善英国的经济状况,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

欧文 1771 年出生于距离威尔士很远的一个小镇——新镇。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零售商,因此欧文在乡村中接受了基础的启蒙教育,这仅使他具备了简单的读写能力,并掌握了一点基本的数学知识。由于在学校中所受的教育太过贫乏,欧文主要还是靠自学——广泛的阅读,并且对读过的所有内容都进行认真思考。

欧文 10 岁时离开威尔士去伦敦投奔他的哥哥,自此踏上了追求名利之途。他曾做过布料商的学徒工、零售商、纺纱机制造商和大型棉纺厂的经理。之后欧文和几个富有的合伙人一起从其岳父那里花 60 000 英镑购买了新拉纳克——一家位于苏格兰低地的简陋工厂。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工厂一样,新拉纳克距离城镇很远,因此工厂主必须提供给工人食宿和其他福利。这种制度使工厂主不仅控制了工人的工作时间,而

且完全控制了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

与他的合伙人希望获取最大利润的目标不同,作为新拉纳克的厂长,欧文将工厂看作进行教育、工业改革的实验室。欧文在新拉纳克推行的改革为其赢得了社会改革家的声誉。

当欧文接管新拉纳克时,该城镇有 1 500 户居民,另外还有来自附近的大城镇并一直在此地生活工作的 500 名乞儿。工人家庭被工厂安置在没有盥洗设施的一间狭室中。酒鬼和窃贼到处可见,而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一样糟糕,工作时间漫长而难熬,工资微薄,卫生保健等福利设施更不存在。

欧文首先在每间房屋上加盖一层,这样就使每个家庭都有了兩间房屋。此外,他修建街道,定期清理垃圾,并设立工人委员会改善室内的清洁卫生。然后,他买下了城镇中所有的私人店铺,大批量地购进食物、燃料和其他物品,不赚取任何利润地向工人们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这些举措使工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25%。同时,欧文还成立了一个全体社区福利基金,所有的工人都将工资的 1/6 贡献给基金,基金向新拉纳克的全体居民提供免费医疗救助。

欧文最突出的贡献还是为新拉纳克的孩子们所做出的努力。欧文认为必须在幼年时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这是塑造一个人的个性的关键时期。他坚决反对雇佣童工,他接管新拉纳克后做的第一项决策就是禁止再招收乞儿做学徒工,禁止雇佣 10 岁以下的儿童。而在当时,六七岁的孩子英国工厂里全日制劳动的比比皆是。此外,欧文还建造了公园和广场为孩子们提供玩耍的场所。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改革。在新拉纳克,1~10 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在普通义务教育已是理

所当然的今天,人们很难想象欧文实施这项举措的激进程度。在 19 世纪初期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上层阶级的人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没有受教育的必要;就连少数呼吁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也有受教育权利的改革家,也只是将教育范围局限在简单计算、会写字、看得懂《圣经》,而欧文却希望孩子们会学习、思考、唱歌、跳舞,明白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他坚信教育是塑造人类性格的基础,并使人们有能力去打破阶层之间的差异,使整个世界和谐统一。

在欧文管理的短短数年中,新拉纳克已转变为一个模范社团。工人们工作环境良好,产出质量良好,利润丰厚,工人们都很自足,并将欧文视为偶像,而欧文还希望为新拉纳克的居民作出更多贡献。然而,他却被以追求更大利润为目标的合伙人和不遗余力地压榨工人以缩减成本的竞争对手所制约。欧文逐渐认识到必须推广他的改革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工厂主以使用廉价童工、虐待工人、不给工人的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等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欧文(1815)开始报告了英国工厂中悲惨的状况,并提出评价工厂制度时应将其对员工的品质和健康的影响和其创造的财富作为同等因素看待。他还敦促立法当局制定法律以禁止雇佣童工,给予孩子们义务教育。

第一部《工厂法》正式出台于 1819 年,它对雇佣童工作了轻微的约束,但仅限于一部分工厂。这条虚伪、无效的法律阻止了欧文追求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尽管这条法律远未体现出欧文所希望和所提倡的内容,但毕竟由此诞生了一条重要的法律——政府首次制定出工厂主所应遵循的规章和规定了对无力自卫的弱小者所应负的责任。

禁止雇佣童工法律制定的失败以及日趋恶劣的经济环境,促使欧文将其斗争的重点转移。1815年,拿破仑战役结束以后,英国政府不再像对法战争中那样需要那么多产品了,需求锐减导致了农田供过于求,大量产品堆积在仓库中。军队大批裁员的同时,农场主和工厂主解雇工人。此外,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着失业率的上升,产品销量萎缩和经济问题愈加恶化——农民收入减少了50%,有接近一半的人沦为乞丐。

欧文(1812)指出失业和贫穷只有三个方法可能解决:(1)停止使用机器;(2)让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挨饿;(3)帮助穷人和失业者找到工作和收入来源。他指出政府不应通过设立失业基金来救助失业者,而应拨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扶持约1200人左右的小村落的发展。这些社区或合作社中的人们将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尽量少地购买外界的产品,将剩余产品用来和外界交换而获得自己无法生产的必需品。

欧文认为,在英国,只要给穷人们一个工作机会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同样也能为国家创造财富,并摆脱贫困的生活。然而他的这一提议却受到讥讽和断然否决,正如《工厂法》的流产一样,欧文有关合作社的幻想又以失败告终。

带着新大陆可能会接受他的观点的希望,欧文于1824年来到了美国。在印第安那州的新哈莫尼,按照他所设想的原则,欧文建立了一个合作社。但人们其中的生活并不是欧文设想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合作社中的人们不能自给自足,很多人逃避劳动,并且人和人之间不能友好相处。实验的失败使欧文幻想破灭,精神消极,在他后来的生命中再也没有过年轻时代的乐观积极的精神。

欧文没有发现过任何经济关系、理论、分析方法或其他令他千古垂名的技巧。他最大的贡献是他的政治思想,在这一方面他无愧于先驱者的称号。所有当代的劳动法律——如限制雇佣童工、确定最低工资限额、改善工作环境——的建立,欧文在其中功不可没;也正是欧文提出根除贫困在于教育,而且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观点也可以回溯到欧文那里。但他最突出的贡献还在于他的乌托邦思想。他既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也发现它导致了可怕的问题,同时提供了实行明智的政策从而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欧文的著作:

A New View of Society(1813 - 14), New York, Cassell, 1991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London, 1815

*Report to the County of Lanark of a Plan for relieving Public
Distress and Removing Discontent by Giving Permanent
Productive Employment to the Poor and Working Classes*
(1821), New York, AMS Press, n. d.

*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in Selected Works of
Robert Owen*, ed. Gregory Claeys(1836 - 44), London,
Pickering, 1993

The Marriage System of the New World, Leeds, J. Hobson,
1838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2 vols. (1857 - 8), New York,

Gordon Press, 1973

涉及欧文的著作：

Cole, G. D. H. , *The Life of Robert Owen* , London, Frank Cass & Co. , 1925

Cole, Margaret, *Robert Owen of New Lanark* , London, Batchworth Press, 1953

Johnson, D. C. , *Pioneers of Reform* ,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29

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

(1772—1823)

大卫·李嘉图是第一位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问题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他试图剖析“经济蛋糕”是如何在地租、工资、利润中分配的,并试图理解造成经济增长和衰退的原理。李嘉图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农业的收益递减则是一反作用力,它压榨了利润,减缓了经济增长速度。

李嘉图 1772 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他父亲希望他子承父业从事国际贸易和金融事业,因此他接受了相关教育。李嘉图 14 岁时该计划付诸实施,被送入他父亲的经纪公司。很快他就进入角色,被誉为相当出色的谈判者,尤其擅长像套利(arbitrage)交易这样困难而隐秘的谈判项目。

李嘉图的妻子是贵格会信徒,因此他改信基督教,这使他与父亲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为了养家糊口,一无所有的他四处告贷开办了自己的经纪公司。在渡过了最初几年的艰苦时期后,李嘉图迅速集聚财富,26 岁时便已成为富翁。这使他有闲暇时间来追逐其在智力和科学方面的兴趣,如设立实验室、收集矿物质和加入英国地质学会等。

1799 年,李嘉图和妻子度假时偶然翻到斯密的《国富

论》。据传,阅读此书后他决定将空闲时间用于研究经济学。李嘉图还参加了由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小团体,定期讨论一些经济问题,这个小团体中就曾有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边沁、马尔萨斯等人。

1819年,李嘉图在众议院中买到一职位,就任他从未去过的爱尔兰波塔林顿市的议会代表。公平地来说,当时的富人都流行在国会中鬻爵。不出预料,李嘉图很快就成为国会中一位备受瞩目的财政专家,经常对货币银行、关税、税收、农业萧条等关键性的经济问题发表言论。

经济学家们对李嘉图的关注主要是因为他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实际上每一位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都以此为依据。此外,李嘉图对经济学还作出了其他贡献。他解释了国民收入是如何在工资、利润、地租中分配的,并解释了不同时期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及其给英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他还发展了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某些商品方面更具优势,就应该出口这些商品,他称之为“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如果日本在生产汽车、计算机、食品、服装等方面比美国更具优势的话,那么日本就会将这些商品全部出口到美国,而美国将会向日本支付购买商品的大笔资金从而导致对日贸易的严重赤字。

李嘉图指出,只有一个国家在生产任何商品方面都不具优势时这种理论才可以成立。他认为贸易主要依赖比较优势,即相对效率,而不是绝对优势。接着李嘉图论证说明,一国将趋于销售那些生产效率相对较高或相对不低的商品,这种专业分工使每个国家都将从国际贸易中获利。

用数据来说明更易理解。假设日本和美国都生产两种商品——汽车和大米。假定一年中美国一个工人能生产一辆汽车或一吨大米,日本一个农业工人能生产两吨大米、一个工人能制造三辆汽车。对大米生产和汽车制造这两项而言,日本工人都比美国工人具有绝对优势。然而,日本工人在制造汽车方面更具优势,而美国工人在生产大米方面的劣势尚不太大。日本工人制造汽车的效率是美国工人的三倍,而在生产大米方面的效率只是美国工人的两倍。

李嘉图试图证明,只要美国和日本专门从事各自的确具备相对优势的生产,然后互相交换商品,那么双方都将获利。以下举例说明。假定美国有 200 名工人,日本有 100 名工人,将每个国家的工人在制造汽车和生产大米之间平均分配。美国一年将生产 100 辆汽车和 100 吨大米,日本一年将生产 150 辆汽车和 100 吨大米,两个国家合计生产 250 辆汽车和 200 吨大米。

现在考虑如果美国专门生产大米、日本专门制造汽车会有何结果。日本的 100 名工人将制造 300 辆汽车,美国的 200 名工人将生产 200 吨大米,通过专业分工两国合计产量将增加 50 辆汽车。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得到了这增加的产出,李嘉图认为这取决于两种商品的交换率。如果日本将 100 辆汽车用于交换美国的 100 吨大米,则日本将拥有 200 辆汽车(最初的 300 辆汽车减去用于交换的 100 辆汽车)和 100 吨大米,而美国将拥有 100 辆汽车和 100 吨大米(最初的 200 吨大米减去用于交换的 100 吨大米),这样专业分工后的收益将流向日本;而如果日本将 150 辆汽车用于交换美国的 100 吨大米,那

么美国将得到专业分工后的收益(50 辆汽车)。

在 1 吨大米换 1 辆汽车和 1 吨大米换 1.5 辆汽车之间的界限之内,将使两个国家都从贸易中受益,而且也只有在此范围内,两国才能从贸易中获利。再者,因为两国只有在交换率降到这个界限以内时才能从经济专业化和贸易中获利,两国就有强大的动力确保汽车和大米的交换率(或美元和日元的汇率)保持在此范围内。遗憾的是,李嘉图没有进一步解释实际交换率将可能落在此范围的何处,贸易收益是如何在两国中分配的,这一工作后来是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完成的。

李嘉图对经济学的第二个理论性贡献是他的收入分配理论(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他还根据这一理论得出了重要的实践性结论。

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地租理论、工资理论和利润理论。他解释了国民收入是如何在这三部分之间分配的,随着经济增长这三部分又是如何变化的。在分析地租时,李嘉图继承了马尔萨斯的观点,提出了级差地租理论。按照级差地租理论,地租是根据不同地块的肥沃程度来决定的。如果肥沃土地的供给是无限的,那么人们就无需为土地使用权支付费用,也就不存在地租。

然而,上好的土地总是有限的,当最肥沃的土地被用光时,人们就不得不去使用次肥沃的土地。拥有最肥沃土地的人很快就能积累起财富。如果最肥沃的土地每英亩产出 10 蒲式耳的玉米,而次肥沃的土地每英亩产出 8 蒲式耳的玉米,那么农民便宁愿支付约 2 蒲式耳玉米的价格使用最肥沃的土地而不是次肥沃的土地。

李嘉图提出,当肥力越来越差的土地都被人们用来耕种时,级差土租将相应增长,“当三等土地都被耕种时,二等土地的地租将立即增加,并按照土地的生产能力的差异进行调整。同时,一等土地的地租也会提高”。如果三等土地每英亩能产出 7 蒲式耳玉米,那么一等土地的地租将会提高到每英亩约 3 蒲式耳玉米,而二等土地的地租将增加到每英亩约 1 蒲式耳玉米。

李嘉图认为工资收入是由最低生活需求——人们生存的最低限度来决定的。与斯密的观点不同的是,在李嘉图的解释中,“生存最低限度”是一个惯用概念而不是物质概念,“它主要是由当时人们的习惯决定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应相应增加。20 世纪末期美国的最低收入与 19 世纪美国的最低收入水平是不会相同的。室内管道和私人浴室在 19 世纪时还很罕见,但在 20 世纪时已成为必需品,因此,20 世纪末期的工资水平应考虑到人们逐渐习惯的较高的生活水平这一因素。

最后,李嘉图提出利润是剩余,或当资本家支付给工人工资和向地主交纳地租后的剩余部分。他同时指出各个产业的利润率应趋于一致,因为如果某一产业的利润率较高,则将有更多资本涌入这一产业,从而导致该产业产品价格和利润率下降;与此同时,当资本撤出利润率较低的产业时,将会导致该产业产品价格和利润提高。

地租、工资、利润的理论使李嘉图得出一个较为悲观的结论,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国家逐步发展时,其人口也将同步增长。这就意味着要养活更多的人,就要生产出更多的食品。因此,比较贫瘠的土地也必须加以耕种,这样将会提高所有等

级土地的地租和支付给富裕的地主的地租。食品的生产成本将因地租开支的增加而上涨,食品价格必定随之上涨。而依据最低生活工资理论,价格上涨应导致工资提高,这样工人们才有能力购买生活用品以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平。

随着工资和地租的增长,资本家的利润率必将降低。地主收取较高的地租,工人的工资上升以跟上提高了的食品成本,因此利润率必然降低。当利润率下降时,资本家积累资本的动力也就消失了,这时经济增长便宣告结束,经济将停滞不前。

为解决这个潜在的危机,李嘉图提出了几条建议。首先,他建议废除《谷物法》。这一法律于1660年首次通过,最初的目的是用来稳定英国的谷物价格。当国内供给充足时,实行进口高关税和出口低关税;当国内农业欠收时,免除进口关税,增加出口关税以促使国外农物流入英国。这条法律最初可在农产品短缺时对谷物价格起到向下打压的稳定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法律便不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运行,到了19世纪初《谷物法》不再能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相反,却维持谷物的高价,并保护了一些凭借土地出产的高价谷物而获利的地主的收入。

李嘉图认为《谷物法》的废除将增加英国对外国农作物的进口,这将从两方面对利润产生有利影响。一方面,进口农产品可使国内食品价格下降,工资也将相应下降,这就杜绝了工资对利润的挤榨;另一方面,进口农产品增多可迫使国内减少农产品的生产,这将减少土地的使用。由于一些最贫瘠的土地退出耕种,根据级差地租理论,英国的地租将会下降,从而减少了地租对利润的挤榨。

李嘉图倡导的第二条改革政策是增加资本积累。资产设备的增加可提高土地的劳动生产率。如果所有土地的劳动生产率都能得到相同的提高,那么级差地租将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由于工资是由日常的最低生活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工资也不会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改变,所以资本积累带来的收益将主要转化成商业利润。此外,利润的提高将会促使资本家更多投资,增加雇佣工人,从而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

然而,李嘉图最终对资本积累将提高英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观点表示了质疑。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李嘉图,1951—1955)的第三版中增加了“论机器”一章,该章节论述了新机器将取代劳动力而给工人带来危害的可能性。而在李嘉图之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支持亚当·斯密的观点——机器有助于劳动分工并可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斯密一样认为机器化不会造成企业裁员。《原理》的早期版本也附和这种观点,认为机器的广泛使用将会造成商品价格下降而不是裁员,这将使整个社会都受益。

但在读了约翰·巴顿(John Barton)的《对影响社会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的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Condition of Labouring Classes*, 1817)后,李嘉图改变了看法。在这本书中,巴顿利用大量数据显示资本家是如何通过增加机器、减少工人来赚更多的钱的。在大量事例的基础上,李嘉图总结出工人们完全有理由反对新机器的引进,因为它可能将导致我们今天所说的“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在李嘉图新加入的“论机器”一章中,他赞同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机器将带来持续的高失业率。另一个结果则更让

李嘉图的经济学愈加悲观,因为随着技术性失业的涌现,不可能指望资本积累来改善社会福利。

最后,如果不提到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那么就没有完整地概括他对经济学所作的贡献。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起源于对以下的观察“商品交换价值的来源有两种:商品的稀缺性以及为获得商品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对于某些李嘉图认为是不重要的、但却是不可再生的商品而言,如稀有绘画、书籍、钱币、葡萄酒等,稀缺性是决定其价值的唯一因素。而大部分可再生的商品的价值是由其所需的劳动力数量所决定的。有两类劳动是必需的——包括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两种方式。直接劳动指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或所需的劳动者数量,间接劳动则是生产过程所耗费的机器设备。由于机器也是一种可再生商品,其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决定的。因此归根结底,每件商品的价值都可以归结为直接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和制造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机器设备而耗费的劳动量。

李嘉图强调可再生商品之间的交换率主要是由生产它们耗费的劳动量(直接劳动加间接劳动)来决定的。如果造一艘船所耗费的劳动是制造一辆汽车所耗费的劳动的两倍,那么船的价格就是汽车的两倍;如果制造一艘船所耗费的劳动是制造一辆汽车的三倍,那么船的价格就是汽车的三倍。这个价值理论中孕含的一则重要涵义是:(相对)价格只由生产和技术决定,对汽车和船的需求则与之无关。重要的是汽车与船各自是以什么方式被制造出来的,尤其是在制造过程中需要耗费多少劳动量。

李嘉图并不信奉总劳动价值论。他认为生产不同商品的

资本结构是不同的。例如两件商品都需耗费 1 000 小时的劳动,但一种商品全部都是通过直接劳动生产的,另一种商品的生产却利用了大量的机器劳动,这两种商品花费的成本就不相同。其根本原因是制造机器所耗费的前期劳动产生的利息成本造成了成本差异,这种利息在商品生产中只耗费直接劳动时不需要支付,但在耗费过去的劳动或机器时,就必须将利息因素考虑进去。李嘉图认为生产每种商品所耗费的资本量和劳动量都是大致相同的,因此生产每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就是衡量每种商品价值的很不错的近似值,但这并非是衡量相对价格的完美的方法。

从 18 世纪末期至 19 世纪末期,斯密、马克思、李嘉图是活跃在古典经济学界的三位伟大的人物。李嘉图对经济学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价值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同时,他还首次建立了严格的经济分配理论,并勾画出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此外,李嘉图还阐述了在经济体系中商品的相对价格主要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与其需求和效用无关或关系不大,他的这种观点后来被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引用和加以补充,并成为新李嘉图主义和斯拉法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础。

参 考 文 献

李嘉图的著作:

Works of David Ricardo, ed. Piero Sraffa, 10 v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1951 - 5

涉及李嘉图的著作：

Blaug, Mark, *Ricardian Economic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Hicks, John, "Ricardo on Machinery," in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68 - 71

Hollander, Samuel, *The Economics of David Ricardo*,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9

Stigler, George J., "The Ricardian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0(June 1952). Reprinted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156 - 97

Stigler, George J., "Ricardo and the 93 Per Cent Labor Theory of Valu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June 1958). Reprinted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326 - 42

其他参考文献：

Barton, John,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Society*, London, John & Arthur Arch, 1817

Malthus, Thomas Robert, *The Pamphlets of Thomas Robert Malthus*,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0

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 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1801—1877)

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对当代微观经济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是第一位描绘出需求曲线(demand curve)的经济学家,诠释了市场结构是如何影响价格的,并首次分析了市场是如何逐渐达到均衡的。但古诺最著名的还是对套利过程以及行业中仅存在两家厂商(双头垄断)时的定价行为的分析。

古诺 1801 年出生于法国第戎东部的小镇格雷。他 15 岁进入高中,在高中的四年时间中主要是通过自学方式学习了法律和数学。1821 年古诺被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录取,但后来由于政治原因这所学校被关闭,古诺便转到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

1823 年毕业后,古诺用十年时间为一位法国将军撰写回忆录,这份工作给古诺提供了充裕的自由时间。古诺充分利用了这段宝贵时间,写作了一篇天文学论文和一篇有关力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法律学位,并开始撰写数学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为古诺在法国数学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并使他最终有机会被里昂大学聘请为数学、力学教授。

古诺逐渐由一位优秀的数学家转变为一位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他成为格勒诺布尔学院的院长,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他担任过很多行政管理职位,如总教监、法国勋级会荣誉军团的官

员和第戎大学的校长。

1862年,古诺从管理职位上退休后回到巴黎,希望将余生用于学术研究与出版。不幸的是,由于视力的衰退,古诺在退休后几乎没有什么创作。

在早期任教期间,古诺发表的论文主要在数学领域内,之后他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并写作了有关历史哲学 and 知识理论方面的论文,后来古诺才转而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他著名的经济学论文——《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Researches into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Wealth*, 1838)是第一篇将微积分引用到经济学分析中的论文,并首次将微积分用于分析厂商的定价行为。

出人意料的是,与古诺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创新方法并不感兴趣。许多研究经济学史的学者认为古诺受到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其他法国经济学家既不懂微积分,也不理解微积分是如何阐明经济学原理的。而艾克朗德(Ekelund)与赫伯特(Hébert, 1990)则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古诺自身,认为古诺受到冷遇是由于他未能将其数理经济学方法应用于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中。

论文发表过25年后,古诺又在经济学上受到一次打击。由于希望其观点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接受,古诺从论文中删去了所有的数理分析,但仍旧无人关注。之后,古诺又对论文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简化,但依旧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其同时代的人并不欣赏他的观点,但后来的经济学家却认识到古诺为经济学带来的分析方法上的创新。这些创新包括发展了微观经济学概念和分析模式。古诺最重要的微观经济学思想包括需求分析、厂商成本和生产决策分析,以及

对套利保证了商品价格在全世界趋于一致的解释。

古诺(1960)是第一位描绘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经济学家,并指出对任何商品的需求,例如一瓶法国葡萄酒,都是由该商品的价格决定的。他指出价格上涨会引起对葡萄酒的需求减少,而价格下降会引起对葡萄酒的需求增加。古诺还首次勾画出葡萄酒价格和葡萄酒消费者购买数量变化的需求曲线。与今天的需求曲线中将价格放在垂直轴、需求数量放在水平轴不同的是,古诺没有认识到在两者关系中,消费者的商品需求数量是因变量而价格是自变量,因此古诺在需求曲线中将需求数量放在垂直轴,而价格放在水平轴。

古诺指出在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商品达到均衡价格。如果对一些商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当需求远远超过供给时,商家会发现存货减少;这就传递给厂商一个信号,可将每瓶葡萄酒的价格上调。而价格上涨后,需求会降低,于是供给和需求又会趋于平衡。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销售速度会减慢,商家存货会渐渐积压。在这种情况下,商家便知道如果想把库存葡萄酒卖出就必须降低价格,这将会增加需求并逐渐与供给接近。

古诺还引进了关于商业成本的几个经济学概念,他第一次区分了固定成本(fixed costs)和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s)。固定成本或经常性的成本,如保险费和葡萄酒装瓶厂的租金,是不随葡萄酒产量的提高而增加的,而可变成本是指在原材料、零部件和劳动力上的支出。厂商要生产更多的葡萄酒,就需要更多的葡萄、酒瓶、塞子和更多的工人。

古诺认识到对厂商而言,在实践中最重要的是明白产量变化时成本和收益是如何变化的。他定义了边际成本

(marginal cost)的概念,即生产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出的成本,并指出生产更多商品的同时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出的边际成本可能会提高、下降或保持不变。类似的,他又定义了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的概念,即生产或销售每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时厂商所获得的额外收益。

利用这两个概念,古诺分析了垄断厂商是如何谋取利润最大化的。他证明当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此时的利润是最高的,然后在该商品需求数量的基础上定价。如果上例葡萄酒生产中的垄断厂商认为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时,那么厂商会停止生产这种葡萄酒,否则将蒙受损失。相反,如果增加每一单位产出的葡萄酒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时,利润将会提高,而厂商将会继续生产这种葡萄酒。

一旦厂商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进行比较后决定生产产品的数量时,就必须决定产品定价多少的问题,这时需求曲线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厂商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赚钱,于是参考需求曲线,曲线反映了在该产量水平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然后再按曲线所表明的价格定价。

与垄断截然相反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古诺将完全竞争定义为具有下述特征的行业竞争类型:完全竞争需要社会中存在着大批小公司,而且对新公司没有设置行业进入壁垒,这种壁垒设置往往体现为政府管制或新公司进入成本过高。古诺认为,只有在完全竞争状态下,厂商才不可能凭借改变供给量的方法来改变市场价格。

古诺还分析了双头垄断(即市场中只有两家销售商)条件下的定价原理。他假设在双头垄断下没有一家销售商能设置价格,还假设每一销售商都清楚自身产品的市场需求量,两家

销售商的生产成本也大致相同。

根据这些假设,古诺得以阐明每个厂商的决策是如何影响市场价格,继而又影响另一厂商的产量决策的。如果一家厂商为增加利润而提高产量,那么这家厂商必须降低价格以使多产出的产品可以卖出。这就要求第二家厂商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也不得不降低产品价格。同样,第二家厂商也面临着确定产量的抉择,它也试图增加产量和利润。它所做的任何抉择都会影响到第一家厂商产品的定价及其利润。当第二家厂商改变产品价格和产量时,第一家厂商会根据新的市场信息来制定新的产量和定价的决策。该决策反过来又会影响第二家厂商所面临的形势,它也将根据新的市场信息来重新拟订产品产量决策。也许有人会想,各厂商针对其竞争对手的决策,而改变自身产品价格和产量决策的状况将永远持续下去。但古诺证明并非如此。他指出竞争的最终结果是任何一家厂商都不可能通过提高或减少产量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也就是赚取更多利润),这时就形成了双头垄断的均衡格局。

最后,古诺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国际价格或外币的价格上。他解释了套利是怎样保证在众多不同币种之间实现总体上一致的一系列均衡汇率的。

套利仅指在不同的市场上买进和卖出,藉以从价格差额中获利的过程。例如,如果1蒲式耳的谷物在墨西哥卖1美元而在加拿大卖1.10美元,这时人们就可以从墨西哥买进而在加拿大卖出从而赚取利润。再者,这种市场行为将会增加对墨西哥谷物的需求因而促使其价格上涨,而在加拿大,由于市场中谷物供给量增多将导致其价格回落,这样套利将会使

全世界谷物的价格渐趋一致。

谷物买卖价格的原理也可应用到国际货币兑换中,套利将使全世界所有货币的价格趋于平衡。1996年,在日本100日元兑换1美元,在英国1英镑兑换1.50美元,由于日元、美元对英镑的汇率应该是一致的,因此1英镑可兑换150日元。套利保证了这种情况的实现。

试想一下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会有什么结果——例如,在英国1英镑可兑换200日元,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1美元在日本可兑换100日元,但在英国100日元仅兑换75美分,因为75美分可兑换0.5英镑,0.5英镑兑换100日元。正如在谷物买卖中的套利行为一样,美国人可以在英国买进日元而在日本卖出日元赚取差价,这种交易将会促使英国的日元价格上涨(由于需求增加),同时降低日本的日元价格(由于供给增加)。套利的过程将会继续将会直到世界范围内三个国家的货币价格相等。

在经济学的历史中,古诺肯定是一位被低估的人物。虽然他创造了许多先进的经济学概念和分析方法,并在其中运用了数理方法,但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声名并不显赫。这其中部分原因可能应归咎于古诺对技术上的问题太过专注,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没有信徒将其观点和经济学研究方法广为传播。但尽管如此,古诺对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已经长久地保存了下来,并已成为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

参 考 文 献

古诺的著作：

Researches into 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Wealth (1838), trans. Nathaniel T. Bacon,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0

Princip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 Paris, Hachette, 1863

Revue sommaire des doctrines économiques, Paris, Hachette, 1877

涉及古诺的著作：

Ekelund, Jr., Robert B. and Hébert, Robert F., "Cournot and His Contemporaries: Is an Obituary the Only Bad Review?,"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7, 1(July 1990), pp. 139 - 49

Machlup, Fritz, *The Economics of Sellers' Competi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Moore, Henry Ludwell, "The Personality of 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 3(1905), pp. 370 - 99

Plantz, Don V., "Cournot's *Recherches*: Some Insights on Its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2(1964), pp. 195 - 208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经济学界是一位具有重要的转型意义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同斯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被称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是萌芽于 19 世纪末期的边际主义学派的先驱。

1806 年,穆勒出生于伦敦。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穆勒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上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希望尽可能地给孩子们最好的教育。穆勒曾回忆道:“我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希腊语的,但在 3 岁时就已经开始学习了。”穆勒 7 岁时就开始阅读柏拉图的哲学对话,8 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又增加了数学课程,包括基础的几何学和代数学,并学习了微积分和高等数学。穆勒 12 岁时开始接受逻辑和哲学的更高层次的教育。一年以后,穆勒进入了“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这一课程包括父亲和大卫·李嘉图的讨论。

但是边沁在家中的频繁出入给幼时的穆勒带来了巨大影响。通过和边沁的交谈以及阅读其著作,穆勒确立了追随边沁并成为社会改革家的志向。成年后,穆勒决定将边沁的思想信仰传播到全世界。在 1834—1840 年间,他编辑了《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这是一本在英国很有影响的科学杂志,还是传播哲学激进主义思想的载体。而后,他

又出版了一些关于经济学、哲学、政治和社会思想的著作。穆勒所做的这些工作使他在 19 世纪的英国成为一位家喻户晓和深受尊敬的人物。

在他的书籍和论文中,穆勒对经济学作出了几个方面的重要贡献,其中包括对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扩充和完整、通过分析关系和交易拓展经济学的新领域。穆勒在经济学和哲学交叉的领域也颇有建树。它诠释了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并为倡导个人民主自由、限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预等思想提出了根据。

《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穆勒,1848)是一本概括性介绍在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盛行的一些著名经济学思想的教科书。这本书被无数次地再版,50 年中一直在英国的经济学教育中占有统治地位(直至马歇尔的《原理》出版)。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分析,穆勒试图在斯密和马尔萨斯之间寻找到中间途径。正如我们所知,斯密认为随着自由贸易、技术创新、劳动分工和资本投资的进一步扩大,社会财富会逐渐增加;相反,马尔萨斯却认为由于人们受制于有限资源的压力,经济增长将会受到约束。穆勒认为这两种力量会同时起作用。他没有预测这些相互冲突的力量斗争的最后结果,而是对将来提供了几种可能性与设想。在这一点上,穆勒是第一位认识到人们不可能准确预测到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或结果,其最终结果应由各种对立的力量在漫长的时期内自己来决定的经济学家。在穆勒的设想中,第一种设想沿袭了马尔萨斯的思想,即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本和技术提高产出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

正如马尔萨斯所述,将会导致工人们的工资越来越低而资本家的利润越来越高,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低。

穆勒的第二个设想继承了斯密的分析,即资本积聚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时就会引起实际工资增加从而使工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在其第三个设想中,资本供给和人口呈同比率增长,但技术水平却保持相对不变。由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因此实际工资没有变化。但由于生产技术没有提高,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在肥沃的土地被首先开垦完毕后,较为贫瘠的土地也必须加以利用,这将会提高食品的生产成本。随着食品价格和地租的同时上涨,利润便会下降。这实质上就是李嘉图的结论。

第四种设想中,穆勒假设生产技术创新的速度超过了资本和人口增长的速度。这将会使粮食种植变得更为容易,并同时降低了工资和地租,最后将促使利润提高,整个经济也将呈现出繁荣景象。

穆勒认为在所有设想中,第三种设想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穆勒生活在工业革命中期,没有经历过长期持久的技术进步,他自然认为当时的技术进步已走到了尽头。同时,穆勒指出,正如李嘉图所预测的,随着技术进步的结束,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也将宣告结束。

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害怕经济停止增长的现象发生,而穆勒却认为这种静止状态也有许多益处。经济停滞不前的最大好处就是将使工业生活不再处于无休止的你死我活的竞争中。

“我从不赞同某些人关于生活理想的描述:人类的正常

状态是通过践踏、压榨、排挤他人以及互相拆台而奋力向上晋升。”(穆勒,1848)

穆勒还从其他方面完善了古典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国际贸易中的收益是如何在国家之间分配的。穆勒解释道,国际贸易收益中的大部分将流向具有需求较低和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较高特征的国家。如果需求是有弹性的,价格的一点变化将会导致消费者购买商品数量的大幅度变化;相反,如果需求是无弹性的,消费数量则不会随着价格的变化而变化。

穆勒列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如果美国不太需要日本汽车而且可以不从日本进口汽车(也就是说美国对日本的需求具有相对弹性),而与此同时,日本不能没有美国食品而且相当爱好美国的食品,这样专业分工和贸易往来带来的收益将主要流向美国,美国可以将食品向日本高价出售同时得到相对便宜的汽车。相反,如果美国非常依赖日本的汽车,除了从日本进口别无选择,而日本却可以从其他渠道买到食品,这样大部分收益将流向日本。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汽车的较高的、无弹性的需求意味着美国需要高价买进日本汽车,而日本的较低的、无弹性的需求意味着日本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美国的食品。

穆勒对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对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拓展,而在于他创新的思维方式。他是第一位描述供给和需求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在斯密、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供给和需求分别被视为市场提供的商品数量和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数量。而穆勒认识到数量是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商品价格上涨时厂商会生产更多的商

品,而当商品价格下降时消费者会增加对商品的购买量。

穆勒还是第一位提出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概念的经济学家。人类的任何行为都意味着失去了其他选择,所有行为的机会成本都包括财务成本和非财务成本。如接受大学教育需要花钱支付学费、购买书本和其他物品等,由于为了大学教育的费用而不能去购买其他物品是一种机会成本,也就是放弃了其他选择,丧失了消费机会。但上大学还包括另外的机会成本。当一个人去上大学时便不能去工作赚钱,这样就放弃了如果不上大学就能获得的收入。因此上大学的所有机会成本既包括为教育支付的各种费用,还包括因上学而失去的工资收入。

穆勒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工资基金学说(wage fund doctrine)的驳斥,该学说主张工人的工资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用厂商在产品生产之前积累的资金来支付的。按这种观点,对企业家来说,提高工资和就业率的唯一方法就是积累更多的利润。穆勒认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报酬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目,而是可变化的,是由资本家的意愿决定的。同时,穆勒指出企业家总是可以削减自身的商品消费支出,例如将住房消费由2 000万美元减为500万美元,这就可以增加工人人们的收入。因此,就不存在固定的工资基金,总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来增加工资或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在工资这个问题上,企业家和工人总是可以谈判的。

穆勒的声誉不仅来自于其对经济学的贡献,同时也源于他的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他将这两门学科与他的经济学研究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穆勒(1863)进一步巩固了由其父亲和边沁发展起来的功利主义哲学思想,后来这一理论成为许多经

济学的理论基础。

更重要的是,穆勒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义”(1844)是经济学家中首次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检验的尝试。穆勒想知道社会科学、行为科学以及伦理学(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否同自然科学相同。他的回答是“不同”,因为除了自然科学,其他学科开展受控实验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设置一个因素不同而其余各方面均相同的两种经济状况,以研究这个因素所产生的整体影响。由于经济学知识不能凭经验得到,因此穆勒认为应该依靠内省来获得。我们依据检验自身,了解到人们的行为总是力图获取最大程度的幸福,同时我们知道所有为了获取最大程度的幸福的努力都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如我们只能选择如此辛苦而漫长的工作,在给定的年限内只能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穆勒认为经济学是一门推断假设结果的科学,正如几何学从点、线、角的假设出发,证明出三角形、圆的有关原理一样。

穆勒(1859)在《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分析了政府和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他认为政府和社会不应限制个人自由,除非这种个人自由损害到他人的利益。《论自由》表示了对放任思想的强烈赞同。与斯密认为放任可使物质福利最大化的观点不同的是,穆勒赞同放任则主要是因为它将会促成最大程度的个人发展。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在提倡自我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妇女平等的观点。他认为妇女解放的最大障碍是公认的观点和习俗将妇女定位于社会的从属地位,这就限制了社会中一半人口的发展并将抑制社会发展的进程。穆勒认为,通过允许妇女与男性一同参与竞争就业机会和其他位置,社会中

的每一职位就有了最佳和最合格的人选。

在穆勒的一生中,他始终被视为当时最杰出的两至三名经济学家之一,但今天穆勒却未被列入最优秀、最重要的经济学家的行列。其中部分原因是尽管他为经济学分析增添了一些零碎的贡献,但并没有取得关键性的进步。此外,作为一位具有转型意义的经济学家,穆勒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吸引追随者深入并继承他的研究。另外一个原因是,穆勒涉足了众多而且是互不相关的科学领域——方法论、理论、政策、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和政治理论,却没能在任何一个经济学领域中专门研究并作出重大贡献。

参 考 文 献

穆勒的著作: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4), New York, Kelley, 1968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2 vols. (18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On Liberty(1859), Indianapolis, Indiana, Hackett, 1978

Utilitarianism(1863), Indianapolis, Indiana, Bobbs Merrill,
1957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70

"Thornton on Labour and It's Claims," *Fortnightly Review*,
5, May 1869b, pp. 505 - 18. Reprinted in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5, *Essays on Economic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p. 631 - 68

Autobiography (1873), Indianapolis, Indiana, Bobbs - Merrill, 1957

涉及穆勒的著作：

Hollander, Samuel, *The Economics of John Stuart Mil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Schwartz, Pedro,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J. S. Mil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2

Stigler, George J., "The Nature and Role of Originality in Scientific Progress," i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 1 - 15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尽管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相连，实际上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却很少。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问题。接着他试图证明，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其他一些措施都无法补救这些问题和改善这一制度的运作，因为它们是以资本主义为其最根本的特征的。马克思认为，这些问题将继续恶化并最终毁灭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 1818 年出生于德国特利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他在家中接受的最早的教育来源于他的父母和他父亲的密友兼邻居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接着他在特利尔读了高中。毕业时，他决定去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可没多久他就厌倦了法律问题，而培养了对哲学的兴趣。为了追逐自己的兴趣，马克思转到了柏林大学，那里一度是黑格尔哲学的中心。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人类的生命在不断地变化；每一种思想、每一种力量都会产生一种相反的力量，这两种相反的力量所形成的紧张状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变化。马克思吸纳了黑格尔关于“变化”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经济体系都会产生对抗性力量因而经历根本性变化的思想就源自于黑格尔哲学。不言而喻，这个先见之明对偏爱现状的政治当权者们构成了威

胁,也打击了那些认为马克思及其的追随者们图谋摧毁自己财富的商界领袖们。

1841年马克思获哲学博士学位,1843年娶了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女儿。马克思既无法得到一份教授哲学的学院教职,又没什么谋生的技能,于是就当上了一家左翼自由主义报纸《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的编辑。不到一年,报纸就被普鲁士审查机构封杀。眼看在德国发展无望,马克思于是迁居巴黎,在那儿结识了大批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还在巴黎遇到了弗里德里克·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恩格斯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纺织品制造商的家庭,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杰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4)描述了英国北部工业城镇中工人阶级家庭的悲惨境遇。马克思与恩格斯很快成了朋友与合作者。尤为难得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余生中一直为他提供经济资助。

由于马克思的激进思想,没多久他就被逐出巴黎。他试图居住在布鲁塞尔,但同样很快被驱逐出境。最后他辗转来到伦敦,尽管并未受到热烈欢迎,但那里的政治当局还是接受了他。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生命中剩下的33年,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大英博物馆里阅读和撰写经济学著作。

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试图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以及资本主义属于人类经济的历史发展中的哪一个阶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不过是所有经济形式必经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他认为人类经济活动始于狩猎与采集的原始社会,接着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形成了农业社会,随后很快又演变成封建经济。在封建制度下,地主为农民提供保护,而农

民将部分农产品上缴给地主。接着,封建主义又因商人的崛起而依次进化到资本主义,这些商人经营小规模制造业,并将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

正如经济发展的每一段时期都是真实的一样,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同样也兼具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积极的一面即它能够通过利用较为先进的技术与机器提高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并能将工人吸引到城镇中来,离开“乡村生活的愚昧”。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消极的特征凌驾于它积极的一面之上,而且马克思将这些问题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为试图缓解资本主义消极影响的改革措施也无法真正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或将资本主义从最终覆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倡议大量施行改良措施,例如建立免费公共图书馆、实施义务教育、废除童工、实行累进所得税制、取消一切继承权、由政府控制交通运输网络、建立中央银行等。但是马克思认为这些只是权宜之计,不过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熬得过去罢了;这并不会使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或避免自我毁灭。无论施行什么政策,资本主义都必将在自身所引发的诸多问题集聚到某一点时灭亡。马克思的绝大多数经济学著作都试图证实和阐述这些问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工人个体的剥削(*exploitation*)。为了理解“剥削”这个概念,有必要先理解马克思对于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继承了李嘉图的思想,采纳了“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该理论认为任何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这里

的劳动可以是体现当期劳动耗费的直接劳动,也可以是制造产品生产设备所投入的劳动量的间接劳动。

接着马克思将商品价值划分为三类——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固定资本指的是商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机器、厂房和设备;这个概念类似于所有会计专业学生都熟悉的折旧的概念。可变资本指的是当期工资,或工人们因辅助生产而获得的报酬。马克思将剩余价值定义为商品价值超过工资与折旧成本的那部分价值。这与大家更熟悉的利润的概念相接近。马克思为研究剩余价值开辟了另一种类似的视角。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占有货币(M),资本家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劳动力与机器),接着销售商品以换取更多的货币(M')。因此剩余价值也可以定义为 M' 与 M 之间的差额。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就构成了剥削。

由于工人们不占有资本,无法通过其他的途径谋生,不得不出卖劳动与工作成果,于是剥削就成为可能。工人们通过日常的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他们生产商品,制造能在将来产出更多商品的机器。然而工人们并未获得劳动的全部价值。他们所创造的部分价值被雇佣他们的资本家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掠夺走。在每个工作日的开始阶段,工人们生产出足够的商品以使这些商品的销售能够补偿他们的工资以及机器所损耗的价值。而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们的劳动只是让雇主的腰包鼓起来。

马克思注意到资本家有三种可供支配的手段来增加剩余价值,从而加剧对工人的剥削。首先,他们可以延长劳动时间,这样每天就可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其次,他们可以加

大劳动强度,这样工人在给定时间内就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加大劳动强度的一个办法是提高生产线的速度,另一个则是强化对工人的监督与控制,这样工人们就不敢再偷懒。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工人们的日产量增加;在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的产量将转化为更多的剩余价值。最后,资本家还可以通过减少工人的工资来增加剩余价值。这种方式的明显做法是降低现有工人的工资水平,或者雇佣妇女和童工替代男性工人,工资也给得更少。在 20 世纪末我们可以发现,将工厂转移到欠发达国家(那里的劳动力成本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是降低工资水平的另一种方式。这三种策略都收到了同样的效果——降低工资,增加剥削或剩余价值。

马克思确实意识到下列因素限制了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在生理上每天只能忍受一定量的工作时间,科技水平与生理极限也制约了资本家可能加速生产线的程度,家庭必须得到足够的补偿以购买必需品,满足未来生存与工作的需要。然而竞争迫使厂商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在竞争的环境中,并不是每一个厂商都能够赢利和生存下来。不能与众多竞争对手们并驾齐驱的厂商将不可避免地被市场所淘汰。因此厂商之间的竞争驱使每一个厂商都更大限度地剥削工人,以便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和维持市场地位。只有那些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剥削工人的厂商才能生存;其他厂商将因生产成本过高而消亡。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把工人们栓在糊口的边缘,从而最大限度地剥削他们。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它造就了异化了的工人。异化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工人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自身的生产方式而产生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类天生具备创造力并渴望主宰和塑造环境。然而与亚当·斯密的观点不同的是,劳动分工并未促进工人的灵巧与技能;相反它使生产过程变得简单而枯燥。工作变得令人厌倦,除了能提供收入来源以外别无意义;这破坏了工人所蕴藏的创造性、激情、审美和智力上的潜力。于是,工作不再是人类生活固有的一部分,劳动异化的一面导致了那句耳熟能详的谚语的诞生:“当工作结束的时候,美好的生活才开始”。

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异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工人对自己生产的商品失去了控制。马克思认为,个体工匠能够以自己的创作为荣,而生产线上的工人却寻觅不到这种感觉。这些工人不是最终产品的生产者,他们无法为自己在生产最终产品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一部分劳动而感到自豪。资本主义制度残酷的本质造就了低廉、粗劣的商品,资本家总是追求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商品。企业的生存再一次面临威胁。削减成本的一个方法就是走捷径。于是质量就遭到破坏,工人生产出一堆廉价的垃圾,根本就无法从制作中感到骄傲。随着对生产方式失去控制,工人与自己生产的商品发生了异化现象。

资本主义存在异化的第三个原因是,工人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却饱了雇主的私囊。人们终日里艰辛劳作,可是这些努力仅仅提高了资本家的绝对生活水平,却并未改善投入全部精力的工人們的绝对生活水平。工人们始终且仅仅获得基本生活工资。这就意味着工人们因努力工作而致使生活水准相对恶化。工人的生活水平仍停滞在聊以糊口的最低限度,而资本家却变得越来越富裕。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的这个特征源自于资本家对生产方式的垄断。工人们不得不为了果腹和

存活于世而打工挣钱。相反,资本家占有足够的财富,以至于他们无需工作或从事生产活动就能过上富庶的生活。因此相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况中,被迫接受基本的生活工资。

最后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劳动力成为资本家雇主的附属品。于是工人与自身产生异化。失去了个体的自由和自尊,就业对于工人来说已变成了被奴役的一种形式。

异化与对工人的剥削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占有生产方式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马克思认为,当工人遭受的压迫太重时,阶级斗争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将继续加剧和形成这种压迫。

马克思总是将他对阶级斗争的分析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反复论述资本主义崛起于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打破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因而如果资本主义被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所替代也不必大惊小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拥有生产方式,并自主决定工作条件、产品质量、价格、工资等等。此外,最终推动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力量也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首先,资本主义意味着攫取财富并运用财富去创造更大的财富。资本家需要大笔财富,因为它能带来权力与声望。每个资本家总是承受着来自其他资本家的压力,任何人停滞不前将被竞争对手迅速淘汰出商业圈。失去了权力与声望,资本家只得降格以工人的身份去求职(也就是说,被剥削和异化)。

第二,资本主义的特征还表现为追求垄断与经济集中的永恒的动力。垄断者能够赚取巨额利润;与之相反,厂商所处

的竞争环境总会使利润趋于分散。因此所有的厂商均渴望日益强大,并成为垄断者。在竞争的过程中,弱小者被压垮,或被强大的厂商所吞并。此外,厂商为保持市场竞争能力必须不断提高工人的生产率;但是科技进步需要日益增多的资本投入。因此规模越来越大的厂商必须能应付不断上涨的对资本的需求。垄断的趋势意味着小厂商将因大厂商的压力而破产,小本生意人和妇女很快将沦为大型垄断公司的打工者,于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憎恨垄断。

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最后一股力量即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无外乎千方百计地积聚越来越多的财富,要想成为竞争中的赢家,必须购置和使用越来越多的高效机器,因此生产过程开始依赖相对较多的资本和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利润率等于利润总额除以用于商品生产的原始投资额。在马克思的术语中,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与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既然剩余价值源于对工人的剥削,那么使用更多的机器和更少的工人只会减少剩余价值和利润率。

以机器取代劳动力的趋势还加剧了失业现象。失业者汇成的“产业后备军”致使工资下跌,从而抵消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高失业率与低工资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动荡。这 will 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容易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上述诸多压力,只有当资本主义最终覆灭时才会停止发生。正如马克思写道:

贫困、压迫、奴役、退化与剥削的总量在增长;但是工人阶级的反抗也随之风起云涌。工人阶级的人数在不断增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自身机制使得工人阶级形成训练有素的、联合起来的和有组织的群体……生产方式的集中化、劳动的

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束缚不相容的地步。这种束缚将被炸得粉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剥削者被剥夺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之后的经济生活或经济领域没有多加论述。他明白将来占有企业和工厂用于商品和服务生产的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传统定义。还有一点很清楚，马克思预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收入分配要比资本主义现存的制度更加公平。但是除此之外，马克思的著作中不再有其他内容。马克思对未来甚至还未形成清晰的预想，就不断鼓舞 19 世纪的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

马克思必将与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称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三位巨匠。斯密主要称颂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益处，而马克思与之相反，看到了资本主义阴暗的一面，并认为这将导致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马克思与凯恩斯也大相径庭，后者寄望于合理的政府政策，以挽救资本主义。而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将会出钱买通政府官员，因此政治家将不会施行任何可能改善工人阶级状况、避免阶级矛盾激化与革命性剧变的政策，如失业保险、福利制度、最长工作时间以及最低工资限额等。同样，马克思也认为政府将不会施行政策以降低失业率、承认劳动的合法性，或帮助工会赢得谈判权。然而在 20 世纪，世界各地都施行了许多社会政策，政府确实在帮助工会，劳资管理的冲突也减弱到了可以控制的程度。

最终，看来马克思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以及它为了挽救自身而变革的能力。似乎他还低估了民主政府的能

力——能够超越资本与劳工的冲突,实施一些政策以缓和资本主义尖锐、有时甚至是残忍的一面。然而,尽管他的预言存在上述缺陷,但是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以及各方参与力量之间所形成的紧张局势方面,无人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

参 考 文 献

马克思的著作: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8, (with Frederick Engels)

Capital, 3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7-62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3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3

Value, Price and Profit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Wage-Labor and Capit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6

涉及马克思的著作:

Heilbroner, Robert, *Marxism: For and Against*, New York, Norton, 1980

McLellan, David,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Robinson, Joan,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60

Sweezy, Paul,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Wolff, Robert Paul, *Understanding Marx: A Reconstruction and Critique of 'Capital'*,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其他参考文献: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Engels, Frederick,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4),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3

里昂·瓦尔拉 LEON WALRAS (1834—1910)

里昂·瓦尔拉主要因创建一般均衡 (general equilibrium) 分析而闻名。他抓住经济领域中所有市场怎样相互关联这个极其抽象的理论性问题,将复杂的数学应用于该问题,并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的方案表明,经济领域中的所有市场都能够同时达到均衡。

瓦尔拉 1834 年生于法国的埃夫勒(巴黎向西约 90 公里)。其身为教师和经济学家的父亲强调,数学将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社会科学。瓦尔拉崇拜他的父亲,希望能够实现父亲寄予自己的高度期望。中学毕业后,他申请了著名的综合工科学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被学校拒之门外,因为他缺乏必要的数学背景,两次入学考试均未能过关。结果他辗转进入矿业学院学习工程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由于对工程学丝毫不感兴趣,他把时间都花在了阅读文学、哲学、艺术、历史和社会科学书籍上面,并最终退学。接着瓦尔拉开始创作小说,但是他的努力也毫无建树。

1858 年瓦尔拉的父亲在一次夜间散步时向他提议,使社会科学近似于自然科学是 19 世纪有待完成的重大工作之一。瓦尔拉答应父亲辍笔不再创作小说,而把毕生精力倾注于发展科学的经济学。在古诺的著作以及父亲的激励下,他决定

将科学的经济学建设为一种数理经济学。

然而通向终点的进程是漫长而艰辛的。瓦尔拉撰文向经济学杂志投稿,但他全部的心血都化为了一沓沓退稿信。尽管如此,瓦尔拉仍更努力地学习数学,继续崇尚促使经济学进一步计量化的美德。19世纪60年代,瓦尔拉一边钻研数理经济学,一边以报纸专栏作家和一家铁路公司的管理人员的职位维持生计。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1870年他接受了洛桑大学法学院的教职。

然而瓦尔拉在洛桑大学的教学并不愉快。他那屈指可数的学生以及他所在的法学院对数理经济学都没什么特别的兴趣。然而他坚持不懈,继续写作。他利用因母亲去世而继承的遗产,把自己的论文免费发送给别人。这些论文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认可,而且鉴于他为经济学作出的贡献,无数赞誉蜂拥而来。在生命行将结束时,他被聘为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名誉会员。

瓦尔拉对经济学作出了几个重大贡献。与杰文斯、门格尔一样,瓦尔拉是边际效用概念的独立发现者之一。他是首批强烈鼓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人之一,即信奉应在个体选择的行为的基础上解释所有经济现象。但瓦尔拉最著名的成果是他创建了一般均衡的经济模型,将经济体系视为一系列相关联的数学方程。然后瓦尔拉阐释了如何求解系列方程中的所有价格和数量。

任何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均相互关联的观点在经济学史上由来已久;这种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坎蒂隆与魁奈。瓦尔拉为该观点增添了两个重要贡献——对所有市场如何相互关联的数学阐述和关于在所有市场中经济将向均衡移动的

论述。

瓦尔拉意识到,无论一个市场何时移向均衡,或何时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这些变化都将扰乱其他的商品市场。举个例子来说,20世纪70年代当欧佩克组织提高油价时,消费者勒紧了裤腰带,增加了对汽油与取暖用油的支出。消费者用于支付相关能源产品的美元越多,花在其他商品上的美元就越少。结果其他商品的生产厂商不得不削减产量和解雇工人。这些裁员继而又将进一步减少消费者的支出,导致进一步减产和裁员。

此外,能源危机还影响了产品生产成本。即使是那些在生产过程中不耗用能源的商品,在从生产地运输至消费者购买地时也需要能源。同样,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也得从别处运来。另一方面,因支出减少而酿成的裁员将使工资降低。因此能源成本上升将提高某些产品的价格(那些消耗大量能源而需要少量劳动力的商品),降低其他商品的价格(那些消耗少量能源而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商品)。消费者将倾向于减少对那些涨价商品的支出,而更多地购买那些跌价或价格不变的商品。但是消费者的这些变化将改变厂商所要使用的投入的数量(如工人与能源)。对投入的需求的变化将依次引起投入的价格的变化。周而复始,当投入的价格变动时,生产成本将发生变化,每种产品的最终价格也将随之变动。

一般均衡的观点提出的问题是,是否上述一切变化都将在某一点上趋于缓和与稳定,从而所有市场都达到一个任何商品或投入均不再受外力变化影响的点。瓦尔拉对此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是”。为了支持他的答案,他构建了一系列表述经济领域中每一种商品和投入市场的方程式。

他的经济模型包括四组方程。第一组表示消费者需求的每种商品的数量。消费者需求建立在个人偏好以及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每种商品价格的基础之上。卖给消费者的每一种商品都能用数学方程来表述,该方程将消费者的商品需求数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每种商品的价格联系起来。

第二组方程描述了决定家庭购买各种商品的价格因素。瓦尔拉假设所有市场都处于竞争状态,厂商无法凭借垄断权力高价出售。鉴于以上假设,瓦尔拉得以将每种商品的价格等同于商品的生产成本(投入的价格乘以所耗用的各种投入的数量)。

前两组方程只是表述了产品市场或出售给消费者的商品市场。但另有两组市场方程适用于整个经济领域。它们表述的是要素市场或投入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决定了生产要素的报酬——工人挣得的工资、地主收取的地租以及资本所有者赚取的利润。

要素市场造就了另外两组方程。一组方程表示提供给商品生产的投入或要素的数量(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要素的所有者(工人、地主和资本家)决定了他们乐意供给的要素的数量。对工作或为生产过程供给投入的厌恶程度,以及因辅助商品生产所获收入的购买力水平的高低,构成了要素所有者们决策的基础。反过来,劳动报酬又取决于商品的价格以及从劳动中取得的收入。

最后一组方程则表述了厂商希望购买的投入或要素的数量。这取决于对商品的最终需求(有多少消费者愿意出不同的价钱购买)、生产技术以及所有投入的成本(使厂商能够选出生产成本最低的方式)。例如,如果消费者决定在服装上花

费更多的钱,服装厂商将需要雇佣更多的工人和购置更多的机器。或者,较高的工资成本或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增加对机器的需求。

至此我们有了四组方程——一组表示商品需求的数量,一组把价格与生产成本联系起来,一组揭示了投入要素的供给数量,一组显示了投入要素的需求数量。我们还有待求解四组未知数:(1)每种商品的价格;(2)每一种最终产品的购销数量;(3)每种生产要素的价格;(4)厂商供给和购买每种要素的数量。

然而瓦尔拉又给他的数学体系增加了一条方程。该方程约定各种生产要素换取的全部资金必须被用来购买商品。可以是每个家庭花掉全部收入的直接行为,也可以是由某些家庭先储蓄,然后把钱贷给其他家庭的间接行为。

这个额外的方程给瓦尔拉出了一个难题:所有学代数的学生都知道,解一组数学方程的必要条件是,方程的个数应等于未知数的个数。现在瓦尔拉的方程比未知数多一个。为解决该问题,瓦尔拉任意选择了一种商品—— G_1 ;其他所有商品的价格将由 G_1 相关决定。于是 G_1 的价格成为比较标准,或称作货币汇率本位(numéraire)。此时在经济一般均衡的数学表达式中,未知数的个数等于方程式的个数。因而所有与 G_1 相关的商品价格体系都能够得到求解。该解法无法解释绝对价格水平,或者为什么一加仑的牛奶值\$2,而不是\$1或\$4。但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加仑牛奶的价格是一打鸡蛋的两倍,是一份日报的四倍。

将经济体系演绎成一组方程是极其抽象的。通过数理方法求证一般均衡的存在会自然而然地引发一个问题:“这对现

实世界有何用处？”毕竟，现实世界在不断变化；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专业精深的经济学家为判定每种商品的价格和工人所得的工资而去求解一大串方程。瓦尔拉坚信，他对方程体系的数学求解方法正是市场在现实生活中所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专业精深的经济学家来求解众多数学方程的话，现实世界怎能达到均衡？

瓦尔拉对此作出了回答，认为他所提出的抽象模型和数学方程恰当地描述了现实。他的答案是双重性的。首先，瓦尔拉主张所有的交易者都希望效用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与竞争将促使经济整体向一系列均衡价格移动，而均衡价格正是通过他的方程计算出来的。其次，瓦尔拉引入了拍卖师和卖方喊价（tâtonnement）的概念。

设想一个盛大的拍卖场面，厂商在这里销售商品，消费者到这里选购商品。厂商设定产品价格，交由拍卖师喊价。当然，在某些价位上，一些商品拥有太多买主，而其他商品买主寥寥。然后拍卖师注意到买主太多和买主太少的情况，在前一种情形下提价，而在后一种情形下降价。随后买方与卖方将修改购销报价。于是某些商品缺货而其他商品无人问津的情形也许会再次出现。拍卖师将考虑到这条新信息，再次对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瓦尔拉宣称，拍卖师通过上述过程的循环往复，将为整个拍卖摸索到一系列的均衡价格。只有到那时，交易才会发生，所有市场均在一系列均衡价格的基础上呈现有序。瓦尔拉认为市场价格自然会像虚构的拍卖师那样运作。买方多于卖方时，市场价格上涨；而当卖方多于买方时，价格将下跌。这样市场体系将循着这样一条路径达到一般均衡的状态。

遗憾的是,拍卖师与卖方喊价的过程无法完全解决在现实世界中的适用性的问题。这个卖方喊价的过程就像一组证明一般均衡的数学方程一样脱离现实。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卖方喊价过程最终达到一般均衡价格之前,交易已经发生。同样,在整个体系达到均衡之前发生的任何交易都有可能影响到最终的均衡(希克斯,1934)。

卖方喊价过程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现实世界中是供给方改变价格,而不是无所不知的拍卖师;而且作为一个人,供给方也许会犯错误,喜欢涨价而不是降价(反之亦然)。此外,在现实生活中,供给方依据未来的预期需求设定价格,而不是依照当前的形势。

最后,正如冯·诺伊曼(Von Neumann)很快意识到的,瓦尔拉的方程的数学解法必定包括负价格,还可能包括价值为零的价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厂商不可能免费发送产品;他们也不会生产出产品,然后付钱给消费者,请对方来购买。而当我们解出瓦尔拉的方程组,得到负价格时,本应发生这种反常的情形。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抹杀瓦尔拉的伟大成就。瓦尔拉促使经济学家们关注不同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创立了一般均衡的观点,并向经济学家们展示了将相互关联的经济当作数学方程组来研究的可能性。他提出了收敛于均衡以及经济均衡的稳定性的论点,并试图诠释经济是如何达到一般均衡的。鉴于这些成就,瓦尔拉必定被誉为经济学史上六位左右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参 考 文 献

瓦尔拉的著作：

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 (1874 and 1877),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1954

Correspondence of Léon Walras and Related Papers, 3 vols., ed. W. Jaffé, Amerstam, NorthHolland, 1965

涉及瓦尔拉的著作：

Hicks, John R., "Léon Walras," *Econometrica*, 2, 4, October 1934, pp. 338 - 48

Jaffé, William, *Essays on Walras*, ed. Donald A. Walk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Jaffé, William, "The Antecedents and Early Life of Léon Walra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1 (1984), pp. 1 - 57

Schumpeter, Joseph, "Marie Esprit Leon Walras," in *Ten Great Econom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74 - 9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因在边际效用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相对价格或交换价值理论而闻名于世。19 世纪初的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生产成本决定相对价格,而杰文斯却持相反的观点,辩称人们通过购买不同商品获得了满足,相对价格就依赖于这种主观评价。杰文斯还对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作出了贡献。

杰文斯 1835 年生于英国利物浦的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经营铁的商人,母亲出身于一个银行家和律师的富裕家庭。家庭的富庶使杰文斯得以接受优秀的教育。起初他在家里接受家教;接着上了私立学校和伦敦大学挂靠学院,在大学主修冶金和数学,师从举世闻名的英国数学家奥古斯塔·德摩根(Augustus DeMorgan)。

随着英国铁路兴旺时代的结束,家里经营铁的买卖破产了。为帮助家庭渡过经济难关,杰文斯 1854 年放弃了学业,接受了化验分析员的培训,到澳大利亚的悉尼造币厂任职。

关于在新南威尔士州投资一条铁路线的争论点燃了他最初对经济学的兴趣。他很快饱览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伟大著作,特别是斯密、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特别是促进祖国发展与繁荣的强烈愿

望激励着杰文斯继续学业。1859年回到英国后,杰文斯在大学挂靠学院学习数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历史。尽管他不满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觉得通过自学掌握的知识比上课听讲得来的还要多,但他还是继续学业,并在大学挂靠学院获得了大学肄业证书和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

随后他接受了曼彻斯特欧文斯学院的教职,在那里执教13年。1876年杰文斯离开欧文斯学院,成为伦敦大学挂靠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此番教学任务不重,也没什么行政事务,因而给了杰文斯从事写作的时间。然而到了1880年,杰文斯再次发现自己很难在教学的责任与写作的雄心之间挣扎,于是他辞职离开了伦敦大学挂靠学院,以便更加全神贯注地写作。不幸的是,那时他的健康因过度工作而恶化,两年后在游泳时溺水而逝。

杰文斯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煤炭问题》(*The Coal Question*, 1865),属于杞人忧天和马尔萨斯主义的著作。该书预测英国将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杰文斯在开头估计了英国煤炭的现有储量,接着又估计了煤炭消费的增长率。综合两项估计,杰文斯发现需求将持续增长而煤炭储备量将日益衰竭,结果只能是煤价急剧上涨。更糟糕的是,当煤的储量降至某一点时,将迫使英国经济停止增长。

杰文斯对能否找到煤的替代品并不乐观,他也不认为维持储量的措施除了稍微延缓经济停止增长的日期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帮助。更令人诧异的是,杰文斯忽略了两个明显的政策解决方案——对煤征税以及禁止英国煤炭出口。相反,他提倡偿还国家债务,这样当清账的日期到来时,后代除了现有资源储备已耗尽以外,将不再有其他负担。

《煤炭问题》旋即为杰文斯赢得了声誉。一时间,关于行将到来的煤炭短缺的故事充斥了英国的各家报纸。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议会盛赞杰文斯,一个专门调查该问题的皇家煤炭委员会也宣告成立。然而,关于能源危机的恐慌来得还太早了,杰文斯估计到 1961 年时,英国的煤炭消费将达到 26.07 亿吨(以 1861 年的煤炭使用水平为基础,19 世纪中叶的年增长率为 3.5%),而 1962 年英国实际使用的煤炭数量只达到他所估计的 10% 左右——1.92 亿吨。

杰文斯的估计偏离实际数字这么远的主要原因是,他没有预见到煤的替代品的发展,如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等。由于担心未来储备不足,一项私人安排显然也开始进行:因忧虑稿纸短缺,杰文斯买了一大堆稿纸,以至于他死了 50 多年后,他的子孙们也没把它用完。

然而杰文斯的声誉经久不衰却不是来自他对能源短缺的忧虑,而是源自他将效用分析引入经济学的努力。杰文斯、J. B. 克拉克(J. B. Clark)以及门格尔(Menger),均各自独立地发现了主观效用的概念以及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的规律。这些都是重大发现,因为他们第一次将消费者和消费者行为引入经济学分析。但杰文斯比门格尔更深入一步,因为他推导出了效用分析的涵义及可能的应用方式。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似乎是 19 世纪 50 年代末杰文斯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发现的。该思想被简明扼要地浓缩在 1860 年他写给兄弟的一封信中:“其中一条最重要的公理是,当一个人必须要消费的商品——如家常饭菜——的数量增长时,那么耗用最后一部分所得到的效用或收益程度将会降低。”

几年后杰文斯(1871)更精确地阐明了总效用(total utility)与效用程度或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之间的重要区别。该发现促成了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杰文斯注意到,当人们消费的任一种商品越来越多时,他们从消费该商品中得到的总效用基本是增长的。但是当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多时,他们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中获得的效用在减少。因而一个干渴的人从饮用的第一杯啤酒中获得的满足比第二、第三杯要多。喝到第五杯、第六杯时,这个人就开始厌烦啤酒,若再来一杯啤酒,他所获得的效用也不会再增加。

根据主观效用理论,消费者将购买那些能为他们提供最大满足的商品。杰文斯又进一步认为,当每个消费者任何进一步的支出变化都不能增加总效用时,就达到了均衡状态。只要消费者能够自由改变购买的品种,买更多的、能赋予大量效用的商品,买更少的、能提供很少或负效用的商品,那么消费者的生活就将富裕起来。

该学说为反对政府控制那些可供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奠定了基础。例如,如果香烟、酒、药品可供自由购买,消费者将仅仅购买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一定数量的商品。当政府阻止这些商品的销售,或通过强行约束生产厂商和对这些商品征税,使购买变得困难时,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或福利将在全国范围内降低。香烟和酒的情况是这样,那么其他所有商品的情况也会是这样。

接下来,杰文斯援引效用的观点来研究劳动力市场。为此,他首先阐明了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劳动力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他假定劳动是令人厌恶的,因此工人获得了负效用或无效用。另一方面,劳动也产生了正效用,因为工人的努力将

得到偿付,并能用工资来购买商品。因此个体必须在工作中的无效用和劳动成果所带来的商品的效用中实现平衡。只要消费的效用超过工作的无效用,人们将继续工作(杰文斯,1957)。当到达工作的无效用超过消费的效用的某一点时,人们将停止工作,享受闲暇。

将效用分析应用于劳动力市场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首先,最初由魁奈提出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区别被证明是错误的。劳动能为个体的工人产出效用,工人能够拿到工资,并用它购买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其次,将效用理论引入劳动力市场研究,使人们对古典的工资理论产生了怀疑(参见马尔萨斯)。人类并不完全受最低生活工资理论的支配,相反,劳动力的供给要取决于当前的工资水平。若工资太低,工人将从市场中退出,享受闲暇。第三,与李嘉图和马克思相反,杰文斯认为在劳资之间不存在对立。劳动者自主决策是否参加工作,在就业导致的收益与损失之间仔细权衡。资本家在决定是否投资和雇佣更多工人时也会作出类似的决策。

最后,若不提到杰文斯的经济周期理论,那么关于杰文斯的经济思想的阐述将是不完整的。杰文斯(1884)在广泛研究经济增长时,注意到了太阳黑子活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1721—1878年之间,经济周期平均持续10.46年,而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也显示为10.45年。杰文斯感到这种联系如此紧密,不可能是偶然的。他甚至为这种相似提出了几条创造性的解释。若太阳黑子活动影响天气,而天气又影响英国的农业收成,那么太阳黑子活动将与粮食价格相关。丰收将增加粮食供应,降低粮食价格,而歉收将导致更高的粮食价格。杰

文斯还借助国际贸易来解释太阳黑子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相似性。杰文斯认为,太阳黑子活动更活跃时,将影响印度的大米收成。印度的丰收将导致它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旺盛,继而促使英国经济的扩张。相反,太阳黑子活动减少意味着印度歉收,印度对英国产品的需求疲软,英国经济因此衰退。

杰文斯的同代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几乎没有认真看待过经济周期的太阳黑子理论。而且,最近更多的数据对杰文斯使用的数字发生了怀疑;天文学家将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增加到 11.1 年,而经济学家将经济周期的时限减至 7 年或 8 年(凯恩斯,1951)。与杰文斯不同,20 世纪末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是经济本身,而不是外部力量促成了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变化。尽管如此,杰文斯仍不愧为经济周期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且不说他通过对能源耗竭的担心实现了与未来的链接,也不论他作为一名研究经济周期的历史学家实现了与过去的链接,单看他创立的边际效用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解释消费和就业决策,就是杰文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杰文斯在他所有的研究领域中都堪称先锋,他在很多方面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因而成为 19 世纪三位或四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杰文斯的著作:

The Coal Question: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London, Macmillan, 1865

"Notice of a General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Statistical Journal*, 29 (June 1866). Reprinted as an Appendix in Jevons (1957), pp. 303 - 14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first edition, 1871) 5th edn., New York, Kelley & Millman, 1957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A Treatise on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 (1874), London, Macmillan

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 (1884), ed. H. S. Foxwell, London, Macmillan

涉及杰文斯的著作:

Collison Black, R. D., "W. S. Jevons, 1835 - 82," in *Pioneers of Modern Economics in Britain*, ed. D. P. O'Brien and John R. Presley, London, Macmillan, 1981, pp. 1 - 35

Keynes, John Maynard,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in *Essays in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1951, pp. 255 - 309

Könekamp, Rosamond,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Some Biographical Notes,"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30, 3 (1962), pp. 251 - 73

Schabas, Margaret, *A World Ruled by Number: William Stanley Jevons and the Rise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1840—1921)

卡尔·门格尔被誉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因为是他构建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两大支柱。第一,门格尔帮助建立了主观价值理论;第二,他主张只有从已知为真实的假设结论中才能推导出经济学知识。

门格尔 1840 年生于加利西亚的纽—桑迪兹(当时属于奥地利,现为波兰领土)。关于他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情况不详。他父亲是一名律师,门格尔继承父亲的衣钵,先是在维也纳大学,后转学至布拉格大学研修法律和政治科学。1867 年他从克拉科夫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门格尔起初当了一名财经记者,随后又任职于奥地利首相的新闻处。在这段日子里,他撰写了《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71)。

门格尔因该书声誉鹊起,1873 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讲师,三年后晋升为专职教授;但为了辅佐鲁道夫王储,他很快辞了职,跟随王储遍访欧洲各地。1879 年,门格尔接受了一个在维也纳的教职,从那以后便开始了学究式的经济学家的生涯——将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教学与写作。尽管他于 1900 年当选为奥地利议会上议院成员,但他对经济学事业

的热爱超过了参与任何政治解放运动或辩论。

门格尔对经济学作出了两大贡献。一个是关于价值理论,另一个则涉及经济学方法论。门格尔是最早发现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主观价值理论最早的鼓吹者之一。门格尔还卷入了关于经济学本质和正确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激烈论战。

19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在欧洲大陆声誉不佳,特别令人不满的是英国经济学的高度抽象和理论化的特性。门格尔寻求让经济学回归到现实世界中来。他认定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他的研究也从这里开始。

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相反,门格尔主张价值由主观因素(效用或需求),而不是客观因素(生产成本或供给成本)决定。在门格尔看来,价值源于人类需求的满足。人类需求创造了对商品的需求;人类需求成为经济交易的驱动力,有助于决定价格水平。此外,门格尔认为,既然人类需求大于能够满足需求的商品,人们将在所有可供选择的商品中作出理性抉择。

门格尔以图表的方式阐明了上述原理(见表1)。表中的每一栏均代表一种不同类型的商品,罗马数字下面的阿拉伯数字代表一种特定商品对某个人重要程度,或消费该种商品获得的满足程度。根据门格尔的观点,商品必须满足消费者的主观需求,并且,如果商品具有一定价值,消费者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

表 1

I	II	III	IV	V	VI	...	X
10	9	8	7	6	5		1
9	8	7	6	5	4		0
8	7	6	5	4	3		0
7	6	5	4	3	2		0
6	5	4	3	2	1		0
5	4	3	2	1	0		0

门格尔还意识到,当一个人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越来越多时,购买每增加一个单位数量,给予消费者的满足程度都将降低。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商品,当人们消费增多时,都将遭遇边际效用递减。因而表 1 表明,消费任何一种商品的第一个单位产生的效用最大,而以后每一个单位产生的效用则越来越小。

遗憾的是,门格尔并未就每种类型的商品举例说明。他宣称第 I 类指维持生命的商品;第 II 类指保健商品;第 III 类商品提供个人福利(即未来的生活与健康);第 IV 类商品指各种类型的娱乐。第 I 类也许代表食品;第 II 类为医疗保健;第 IV 类指娱乐。

门格尔也并不清楚表中数字所实际衡量的内容。但有一点十分明确,门格尔假设这些数字能够衡量相对需求,或消费不同商品所得到的满足。门格尔还明白个体在考虑消费什么或怎样消费时将如何作出决策。既然供消费者支配的收入有限,个体将首先购买那些能满足较重要需求的商品。主观价值为 10 的商品的消费将先于价值为 9 的商品,依次类推,主观价值为 9 的商品的消费将先于价值为 8 或更低的商品。

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所有产生主观满足的行为都是生产性活动。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相反,门格尔认为贸易也具有生产力,因为人们只有在感到获取的商品能赋予自己的效用比放弃的商品多时,才会进行交易。门格尔也不赞成魁奈的观点,他认为农业与制造业都是生产性部门,因为每个经济部门产出的商品都为消费者提供了满足。

主观价值理论的另一个涵义是,它推翻了古典的劳动价值论。门格尔这样写道:

“商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劳动力的数量或其他必要的生产资料,也不是产品复制的必要数量,而是我们所感知的这些满足的重要程度。”

根据门格尔的观点,既然价值来自于个体的感知,那么经济学分析必须从研究个体开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地位开始为人所知。

门格尔还认识到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也具有价值,因为它们间接地满足了需求;这些要素是生产人们直接需求的商品所必需的。为了确定某个要素的实际价值,门格尔认为我们应撤回一个单位的要素(比如说一个工人),然后观察产出的损失。这部分损失的价值就是那个工人增加的价值,代表该工人提供给消费者的满足程度。这样每个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均取决于它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每个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要素的收益或报酬将取决于该要素所创造的预期价值。

1875—1884年,门格尔就方法论问题全力以赴地与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也许,这场论战与其说是一场真正的学者

式的论战,不如说是一种极其委婉的互相侮辱。而且,如果考虑到门格尔将《原理》(*The Principles*)一书的献词给了历史学派的另一位领导人罗雪尔(Roscher),这场交锋本身也显得很古怪。

根据历史学派的观点,经济学法则只能从长期积累的历史事件中被发现。在事实未发生之前,发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显得为时过早。理解经济的正确方式是,研究历史数据,发现规律,然后作出经济如何运作的推论。历史学派反对抽象演绎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推导出的经济学原理源自于假设的人群和市场特征。与之相反,他们接受关于经济关系与经济政策的相对论。在历史学派看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世界呈现不同的运行方式。

与历史学派的观点相反,门格尔认为理论的发展超前于资料的积累。门格尔认为正确的科学方法应包括研究经济现象的基本特征或经济变量之间的必要联系(例如某商品降价促使人们去购买更多的商品)。而基于历史的和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有时价格降低,可人们希望进一步降价,于是他们现在购买的商品更少。因而基于历史的经济学不可能得出确定的结果。门格尔认为只有内省才能产生绝对的和必要的真理。企图通过指出现实世界中相反的证据,从而反驳经济学法则,就如同去衡量三角形的角是否等于 180° ,从而反驳几何学法则一样——这种企图显示了对几何学的误解。

门格尔的《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Untersuchungen*, 1883)一书寻求将经济学建立在理论和方法的坚实基础上。为此,门格尔捍卫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方

法,驳斥历史学派的方法。门格尔特别强调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以及经济学知识来自于先验,或超前于现实经济生活的经验。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包括研究个体偏好(或需求),以及解释这些偏好如何导致了值得注意的现象,如不同的商品具有不同的价格。

《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研究》激起了来自历史学派成员包括施穆勒在内的敌意攻击。这些攻击又遭到了门格尔的学生及其追随者们的还击。施穆勒拒绝在他的杂志上评论任何门格尔的著作,并公开宣扬门格尔的信徒不适合担任任何教职。

论战终于结束了,但这不是因为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而更多的是厌倦的结果。尽管还存在众多对方法论的尖锐批评,门格尔的方法还是开始被接受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许论战的主要影响是给用来获取经济知识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惹上了坏名声。正如熊彼特(1951)所述,大多数经济学家感到这场论战完全是浪费时间,他们从中概括了教训:所有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都是浪费时间。但这个结果也许有对经济学专业有害,因为正如哈钦森(1973)指出的那样,“对于假设、概念以及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批判性检验……绝不是浪费时间,即使它曾经如此”。

通常,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所留下的思想和理论遗产会为其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成为经济学宝库的一部分,传授给下一代的学生们。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迹,是因为他们敢于越出主流,独树一帜,并能够感召一批学生或追随者。门格尔就是罕见的这两类都符合的人物。门格尔对个体的强调,认为我们必须响应个体的

主观评价来解释经济世界的主张,使他成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但鉴于门格尔又发现了效用是价值的起源以及边际效用递减法则,他也属于前一类经济学家。

参 考 文 献

门格尔的著作: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Menger, ed. F. A. Hayek, 4 vols.,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34 - 6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rans. J. Dingwall and B. F. Hoselitz (1871),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Problems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trans. F. J. Nock (1883),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

涉及门格尔的著作:

Alter, Max, *Carl Menger and the Origins of Austrian Economic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0

Bloch, Henri-Simon, "Carl Menger: The Founder of the Austrian Schoo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8, 3 (1940), pp. 428 - 33

Caldwell, Bruce J., (ed.) *Carl Menger and His Legacy in Economic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Hayek, F., "Carl Menger," *Economica*, 1 (November 1934), pp. 393 - 420
- Hutchison, T. W., "Some Themes from *Investigations into Method*," in Hicks and Weber (eds) *Carl Menger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p. 15 - 37
- Schumpeter, Joseph, "Carl Menger, 1840—1921," in Joseph Schumpeter,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Keyn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80 - 90
- Stigler, George, "The Economics of Carl Meng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5 (April 1973), pp. 229 - 50
- Vaughn, Karen I.,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如凯恩斯(1951)所述,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贡献在于“图解经济学”,或将经济学概念演绎成简单的图表。他的功绩还在于将许多这些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最后,马歇尔帮助经济学成为依据自身而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这一点无人能及。

马歇尔 1842 年生于伦敦郊区伯蒙齐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英格兰银行的职员,母亲是屠夫的女儿。尽管家境并不富裕,但他们极其重视教育,并将马歇尔送到优秀的学校就读。像穆勒一样,马歇尔受到了父亲的严厉鞭策,并被迫学习到深夜。他父亲强调的是古典文学和语言学,可他置之不理(或许正因为父亲的态度),迷上了数学而不是人文学科。

在叔叔的资助下,马歇尔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去阿尔卑斯山登山旅行,找一个适宜阅读和思考的好地方,在那儿钻研哲学经典著作,但是他却决定成为经济学领域的专家。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曾穿越“几座城市中最窘迫的贫民窟……亲眼目睹过贫困无比的穷人们脸上的表情”。获得伦理学学位之后(当时剑桥尚无经济学学位),马歇尔在剑桥的圣约翰学院教了九年书,接着在牛津大学的布里斯托

尔和巴利奥尔学院短期任教。1885 年他回到剑桥,一直从事教学,直至 1908 年退休。

马歇尔引入的许多观点和分析模式为微观经济学的大学教育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入门课程。马歇尔孤立地研究了个别市场,尤其忽视了一个市场对其他市场的影响以及其他市场反过来对每一个个体市场的影响。马歇尔因此成为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分析的鼻祖。与之相反,里昂·瓦尔拉研究了经济领域所有市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亦称一般均衡分析。局部均衡分析虽然不像一般均衡分析那样完整和广泛,但却有利于针对特殊企业和产业的实际问题进行聚焦剖析。

为了研究个体市场,马歇尔创造了供给和需求分析工具。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表明了供给法则(law of supply)——价格上涨,则厂商产出更多,投入市场的商品量就更多。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表明了需求法则(law of demand)——价格下跌,则消费者购买的产品更多。供给和需求这两把剪刀决定了每种商品的价格和生产数量。该观点不同于杰文斯的需求驱动方式,也迥异于李嘉图的供给驱动方式,马歇尔强调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了价格与产量。

马歇尔认为竞争将促使实际价格回归均衡价格。若设定的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厂商将不可能卖掉自己的产品,眼睁睁地看着存货积压,这将提示厂商降价和减产。另一方面,若设定的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则会导致缺货。人们将排队购买有限的商品存货,众多消费者将被告知某种商品“脱销”,厂商将以此为信号提价和增产。如图 2 所示,厂商只有在处于均衡点时才能卖掉所有产品,并保持价格的稳定性(抑制供给或需

求的任何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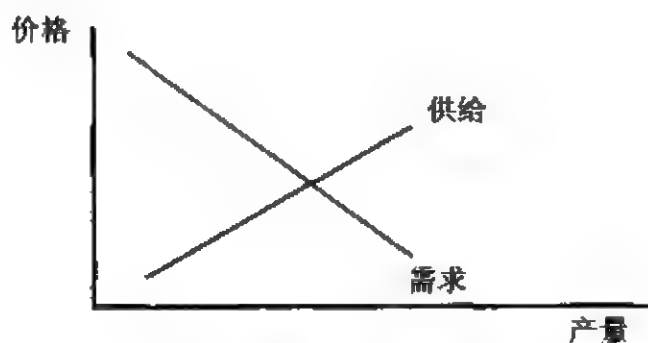


图2 供给、需求及均衡

马歇尔意识到他的“双刃论”涵义复杂,于是他继续更为详尽地分析供给和需求。需求是由人们通过消费某一特定商品获得的效用或满足程度所支配的,消费者永远在寻求从自己购买和消费的商品中获取最大效用。他们将会比较可供选购的不同商品的边际效用。若商品定价过高,将鲜有人问津,因为消费者购买很多其他商品均能获得更多的效用。

马歇尔详述了在同样的价格水平下,人们购买或多或少的某种商品时需求的变化。需求关系的变化和需求曲线的变动源于以下几个原因——财富的变化、人口的变动、消费口味,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或未来预期价格的变化(马歇尔,1920)。如图3所示,财富与人口的增加将使需求增加,价格提高。广告也可能改变消费者口味,刺激需求增长。同样,预期未来价格上涨将拉升需求与价格,因为人们都愿意在涨价之前马上购买。

至于其他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分析起来就更复杂一些。通常,当某种商品如汽油涨价时,人们将购买少量汽油,而把钱支出于其他项目。这样对汽油以外商品的需求将会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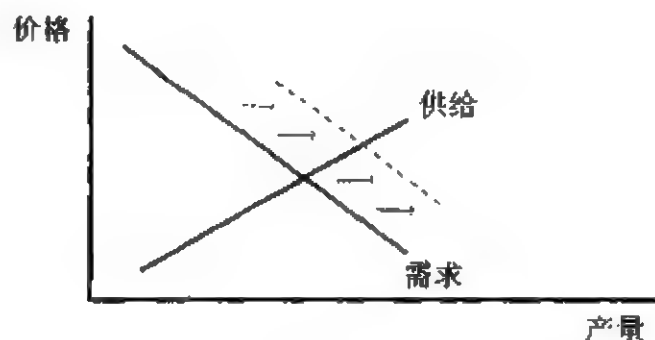


图3 需求变动

但也确实存在一些情况相反的例子 - 互补性商品 (complimentary goods) 就是经常被同时消费的系列商品。若汽油价格上涨, 则与汽油同时消费的商品如汽车 (特别是耗油量大的车型) 将遭遇需求减少的境况。

与需求相反, 供给是由生产成本所决定的。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一样总是追求最大化; 不过他们追求的是生产过程中的利润最大化。由于收益递减规律和零部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只有增加成本才能获得更多产出。因此, 厂商只有在更高价格时才生产更多的产品。所以马歇尔的供给曲线呈正比例方向倾斜。

与需求相同, 供给关系也会变动。供给变动类似于需求变动, 表示在每个价格水平上生产或销售商品的多寡。影响供给变动的主要因素即生产成本的变动。例如, 更高的工资将增加生产成本——不论生产多少商品, 厂商只有将增加的成本以涨价的形式转嫁给消费者才能赚取同样的利润。因此, 工资增加使得供给曲线向左侧移动 (见图 4)。供给变动将导致涨价。相反, 改进技术以减少产品生产所需的必要劳动力数量, 将会降低单位成本, 供给曲线向下移动 (或移至右

侧),价格也将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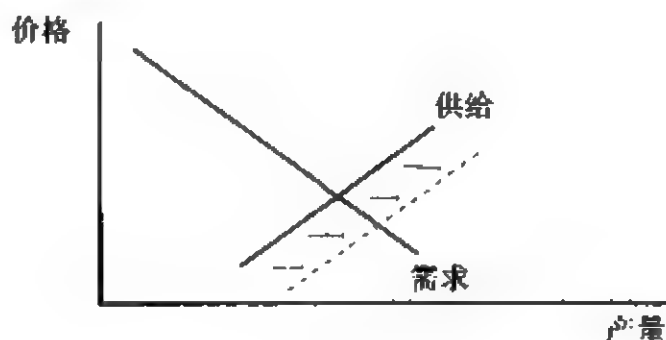


图4 供给变动

对弹性(elasticity)概念的阐述是马歇尔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所有经济关系实际上都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弹性的概念试图弄清既定条件下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效果。若某条件具有显著效果,则称此关系为弹性的;若条件导致的效果甚微,则该关系为非弹性的。马歇尔还摸索出一套精确衡量经济关系的弹性或非弹性程度的数学方法。

价格的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论述的是既定价格变动到何种程度才会改变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马歇尔,1890)。马歇尔确认了对某特定商品的需求可能为弹性或非弹性的几个决定性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得到替代品的容易程度。若商品为必需品,且鲜有替代品,则对该商品的需求可能是价格非弹性;消费者在商品涨价时也不得不继续购买该商品,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如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时,尽管汽油价格涨至原来的四倍,人们仍然需要动力,所以他们接受高昂的价格,而很少削减对汽油的消费。

马歇尔还解释了为何价格自身也是需求弹性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拿一瓶廉价的盐来说,即使价格大幅度变动,

对消费的影响也甚微,原因在于因大幅度涨价而额外支付的金钱实在是微不足道。相反,若贵重项目(如汽车或大学教育)的价格呈高比例增长,消费者必须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能买到的话,人们就不太可能去购买。因此,对贵重商品的需求倾向于弹性,而廉价商品倾向于非弹性。

最后,马歇尔强调指出时间也是决定需求弹性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需求将会变得更有弹性。20世纪70年代汽油价格大幅度提升之后,人们发现很难削减汽油开支。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开始购买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汽车生产厂商开始生产汽油里程更长的汽车,公共运输系统得到改进和扩展,人们学会根据合伙用车协议轮流驾车。所有这些变化最终都有助于减少汽油的购买量。

马歇尔还将价格弹性的观点应用于供给关系。供给的价格弹性衡量在既定价格变动范围内,厂商相应地多生产或多销售商品的数量。在这里,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最短的时期被马歇尔称为“市场时期”。投入市场的每一件产品都必须售出,否则就会变质,生产对价格的变化毫无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供给曲线呈垂直状态,或接近垂直,需求决定价格。

在短期,为了响应价格上涨,厂商将延长现有雇员与设备的工作时间。但设备在短期内无法扩充,新厂商在短期内也无法进入一个行业。因此,供给更多的商品受到了限制。需求的增长将导致产量的一些增长,但更多的是对价格的影响。

长期即允许厂商扩张工厂和设备的时期。此外,在这段时期,厂商可以进出某个行业。因此,产出能够在成本大致稳定的基础上轻易地扩大,使得长期供给曲线相当平缓。马歇

尔据此推断：在短期内，需求是价格的较重要的决定因素；但若给予足够时间，决定价格的就是供给或生产成本了。

既然当初马歇尔出于伦理思考和援助穷人的愿望而迷上了经济学，那么他格外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就不足为奇了。马歇尔到劳动力市场追踪贫困问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类似于任何一个商品市场，唯一的区别在于：公司是需求方，而家庭是供给方。在马歇尔看来，非熟练工的供给取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population principle)——高工资导致人口增加，劳动力供给也同样增加，然而对非熟练工的需求却由于机械化而不断衰减，这两股力量致使非熟练工工资下跌，使他们的收入停留在贫困线上。

马歇尔认为那些缺乏广泛而精深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谈判中不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只能赚取低工资。低工资致使他们身体欠佳和教育水平低，继而又造成了其后代的低生产率和低工资，贫困因此代代相传，因为没有任何事件能打破这种循环(马歇尔，1890)。遗憾的是，马歇尔很少谈及如何提高那些缺乏一技之长的人的工资水平，关于怎样减少贫困就更少触及了。他拒绝提倡最低工资或工会。他唯一的建议是非熟练工要控制家庭规模以及运用累进税制来帮助穷人。从根本上说，他寄望于用教育来解决贫困问题。

尽管马歇尔对微观经济学的贡献最为著名，但他对宏观经济学也作出了一定贡献。他(1923)运用“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观点来诠释两国货币之间汇率的决定因素。该观点背后的思想简单而直接。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商品的销售遍布世界各地，通过比较这些商品在国与国之间的成本，我们就能够很好地衡量两国货币的相对价值。

若麦当劳的汉堡包在美国卖 1 美元,而在日本卖 100 日元,则 1 美元和 100 日元代表等价收入。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若不考虑美元与日元间的实际汇率,既然 1 美元和 100 日元具有等价的购买力或能购买同样的商品,那么 $1 \text{ 美元} = 100 \text{ 日元}$ 就应被用来比较美国与日本的收入水平。同样,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日元与美元间的汇率将趋于这个水平。若日本的商品比较便宜,那么美元持有者将乐于购买日元以便在日本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这将抬升日元的价值(压低美元的价值),直至达到购买力平价。反过来,若美国的商品更便宜,日本人将乐于购买美元,从而抬升美元价值,向购买力平价方向移动。

尽管马歇尔提出了许多新概念,但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也许是制度性的而不是实践性的。马歇尔将经济学创建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科目,在这一点上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马歇尔 1885 年回到剑桥大学时,经济学还只是伦理学与历史学课程的一部分,它只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为了获得学位而不得不学习的一门课程,是马歇尔开始让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立足于自身的研究领域,并使其学科标准具备了与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的高度。然而马歇尔也希望经济学能成为一门实用科学,以帮助和辅助政府官员及商业领导者们作出重要决策。

1903 年马歇尔的努力获得了成功,独立的经济学院与经济学学位在剑桥大学诞生了。在剑桥大学的带动下,其他学术机构纷纷成立,经济学学科开始闻名于世。世界各地的学子们因此能以经济学为专业,探索马歇尔提出的许多观点。所有这些原因使得马歇尔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并成为经济学历史上六个左右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马歇尔的著作：

Elements of Economics of Industry, London, Macmillan, 1879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1890), London, Macmillan, 8th edn., 1920

"National Taxation after the War," in W. H. Dawson (ed.) *After-War Problems*, London, Allen & Unwin, 1917, pp. 313 - 45

Industry and Trade, London, Macmillan, 1919

Money, Credit and Commerce, London, Macmillan, 1923

The Pure Theory of Foreign Trad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30

The Early Writings of Alfred Marshall, 1867—1890, 2 vols., ed. John K. Whitak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涉及马歇尔的著作：

Groenewegen, Peter, *A Soaring Eagle: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Brookfield, Vermont, Edward Elgar, 1995

Keynes, John Maynard,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Economic Journal*, 34 (September 1924), pp. 311 - 72.
Reprinted in *Essays in Biography*, New York, Norton, 1951, pp. 125 - 217

- Pigou, A. C., (ed.),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London, Macmillan, 1925
- Reisman, David, *The Economics of Alfred Marsha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 Reisman, David, *Alfred Marshall's Miss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 Rima, Ingrid, "Marshall's Concern About Poverty: A Hundredth Anniversary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48 (Winter 1990), pp. 415 - 35

弗 朗 西 斯 · 伊 西 德 罗 · 埃 奇 沃 思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1845—1926)

埃奇沃思研究了经济怎样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佳或最优状态。他的主要贡献是将先进的数学技巧运用到回答上述问题的努力中。在此过程中,埃奇沃思创立了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埃奇沃思盒形图(Edgeworth Box)等诸多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

埃奇沃思 1845 年生于爱尔兰埃奇沃思镇的一个殷实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是理查德·洛弗尔·埃奇沃思(Richard Lovell Edgeworth),他的姑妈是小说家玛利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埃奇沃思通过家庭教师接受了极好的古典文学和人文主义方面的教育。17 岁时,他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学习语言。然后,1867 年埃奇沃思来到牛津大学学习人文学科。1877 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出版了第一部关于伦理学的著作(1877),试图将其他道德理论归在功利主义之下。接着埃奇沃思开始研究商法;他还自己阅读并研究数学。

19 世纪 70 年代末埃奇沃思在伦敦的贝德福德大学执教。他的邻居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使埃奇沃思对数学、统计学以及怎样将它们运用于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埃奇沃思很快

发现数学有助于经济学推理,能够检验用普通的英文写就的论点。随后他开始出版文章和著作,将数理技巧应用于经济学原理的论证中。这些出版物最终为他赢得了国王学院的教授位置,接着是一流的教授职位——牛津万灵学院的德拉蒙德讲座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1891年,埃奇沃思成为《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第一任编辑。在此后的35年里,埃奇沃思把该杂志塑造、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学方面的重要刊物。在此期间,他担任编辑或联合编辑(与凯恩斯一起)。

在埃奇沃思所有的研究中,他将微积分看作是开启经济学智慧之门的“万能钥匙”。埃奇沃思的经济学研究始于清晰的定义和精确的数学公理,并经过严格的论证推导出结论,希望藉此将经济学建立在与数学、自然科学相同的基础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处理和解决经济政策问题。埃奇沃思还感到,从美学的角度看,数学比单纯的文字更雅致,比文字更精确,因而在哲学上优于亚当·斯密以及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的口头论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他那简陋的文字和令人费解的数学,即使是在数理经济学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也难以读懂。

埃奇沃思主要对交换和分配问题感兴趣;他特别研究了个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如何分配贸易或交换过程中的利益问题。

埃奇沃思(与帕累托)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关于更多效用的观点,该观点因边沁和穆勒的影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广为流行。早期的功利论者依赖基数效用(cardinal utility)的概念,需要消费者知道自己从商品A中获得的效用比商品B大多

少。埃奇沃思使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从基数效用转移到序数效用(ordinal utility)上来。序数效用是指在每种商品的效用的基础上形成的消费者偏好的等级次序。序数效用没有基数效用那么严密,因为它仅仅需要消费者知道自己偏好商品 A 甚过商品 B(反之亦然),或两种商品之间无差别。

接着埃奇沃思运用序数效用的观点形成了无差异曲线的思想。该曲线呈现为一系列的点,代表能为特定个体提供相同数量效用的两种商品的组合。设想一个只有两种商品的案例——椒盐卷饼和啤酒,就很容易理解上述思想。开始先选取这些商品的某种组合,如三瓶啤酒和三袋椒盐卷饼。若我消费更多的啤酒或椒盐卷饼,则我获得的效用因我拥有更多的东西而增加。为了让我的效用维持在相同的水平,只要我饮用更多的啤酒,那么我就必须减少对椒盐卷饼的摄取(反之亦然)。我们可以考虑连续增加一种商品的数量而减少另一种的数量,以确保消费者的效用维持在相同水平上。所有这一系列点将构成一条啤酒和椒盐卷饼的无差异曲线(见图 5)。

以更多的啤酒和更多的椒盐卷饼为起点,我们可以勾勒出另一条比原有曲线产出更大效用的无差异曲线。这条新曲线将位于图 5 所绘制的无差异曲线的东北方,将包含诸如四瓶啤酒和四袋椒盐卷饼的组合。既然更多的商品产生更大的效用,那么该无差异曲线将代表更多的效用,或更佳的消费者生存状态。类似的,从更少的啤酒和椒盐卷饼开始,将使我们描绘出一条新的、比原有曲线产出效用更小的无差异曲线。该曲线将位于图 5 所绘曲线的西南方。

埃奇沃思设想无差异曲线起初应该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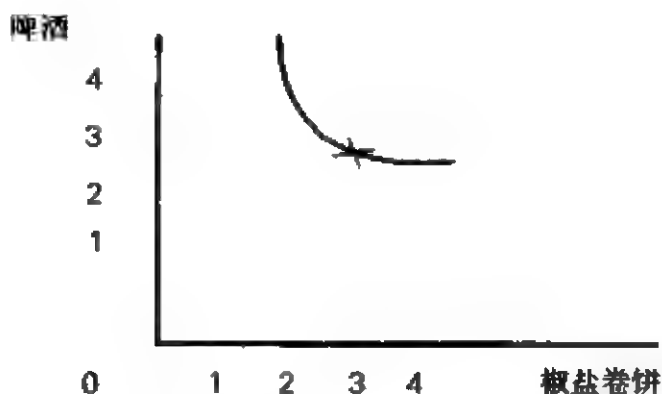


图5 无差异曲线

线(见图5)。这是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当我消费越来越多的啤酒时,我从另一瓶啤酒中获得的额外效用将减少。第一瓶啤酒平息了我的干渴,帮助我在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获得了放松;第二瓶也能帮我放松。但第九瓶提供的额外效用将小于第八瓶,并且当显示为极度醉酒和酒精中毒的情况时,甚至会提供负效用。啤酒是如此,椒盐卷饼也将如此。第一袋椒盐卷饼消除了我的饥饿,第二袋以及以后各袋提供的效用将越来越少,当咽到第十袋时,可能只会让我恶心。

接下来埃奇沃思将无差异曲线这个工具运用于对交换的分析。交换可能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实物交换),也可能表现为两国之间的贸易,前者是埃奇沃思考虑到的,后者则是众多当代经济学家运用埃奇沃思的分析方法时想到的。交换理论构成了埃奇沃思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它用图解的方法演绎了交换怎样使双方同时受益,还表明如此交换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不确定的。

设想两个国家(德国和比利时),每个国家都生产两种商

品(仍是啤酒和椒盐卷饼)。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系列无差异曲线,各国都希望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或达到自己的最高无差异曲线(尽可能两种商品的最佳组合)。比利时运用国内资源,找到了自己的最高无差异曲线,生产出 4 000 万箱啤酒和 1 000 万吨椒盐卷饼。同样,德国也寻求自身的最高无差异曲线,生产出 4 000 万箱啤酒和 6 000 万吨椒盐卷饼。将一个国家的无差异曲线倒置过来,与另一个国家的无差异曲线相连接,就构成了埃奇沃思盒形图。在图 6 中,德国被倒置过来,因此对德国来说,曲线进一步向下或向西南移动就代表无差异曲线越高。图 6 中的点 A 表示两国在任何贸易发生之前的最优状态。它应被看作两国在不发生贸易的情况下能够独立达到的最佳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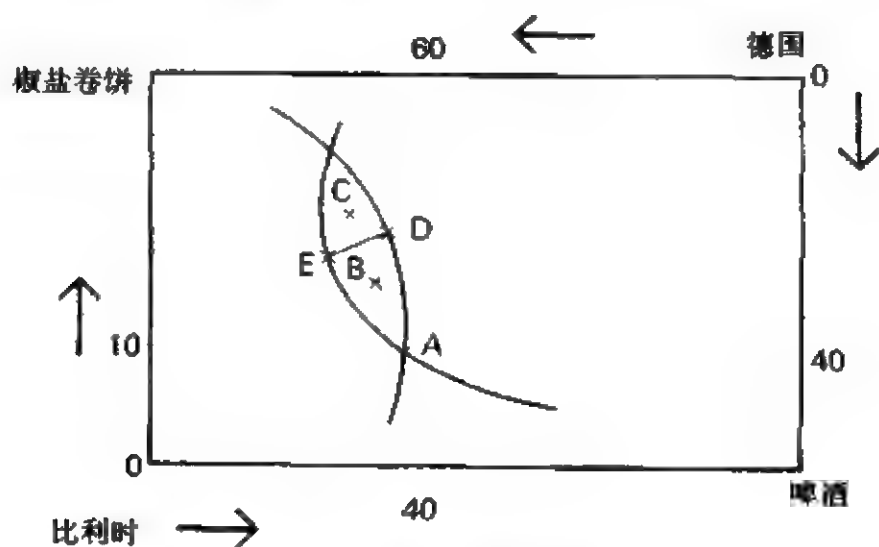


图 6 埃奇沃思盒形图

埃奇沃思注意到,从点 A 移动到椭圆内,或在两国无差异曲线的交叉点所形成的椭圆目镜中的任一点,比利时和德

国都能改善本国的福利。如点 B 和点 C 位于各国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使各国都处于境况较好的状态。这些点只有在比利时和德国进行双边贸易时才能达到。比利时通过将啤酒销往德国换取更多的椒盐卷饼,移动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德国通过放弃椒盐卷饼换取啤酒也移动至更高的无差异曲线上。

与上述情形对照,当我们沿着在 D 点与 E 点之间绘制的线段移动时,设想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利时只有在德国变糟的情况下才能变好,德国也只有在比利时变糟的情况下才能变好。若德国移动至一条更高的无差异曲线,那么比利时必须位于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反之亦然。

埃奇沃思将德国与比利时的无差异曲线能够相切的一系列点(图 6 中 D 与 E 之间的点)的轨迹称为“契约曲线”。这些点代表两国间可能发生的最佳贸易(从点 A 开始)。然而在现实中,这条曲线既是契约曲线,又是冲突曲线。当各国位于契约曲线上时,都比拒绝贸易(停留在 A)时的境况要好得多;然而一旦位于契约曲线之上,两国就将陷入争斗——一国得到的越少,则另一国得到的就越多。在点 E,德国达到了一条高得多的无差异曲线,从贸易中获取了全部利益,而比利时则不好也不坏。相反,在点 D 处,贸易中的全部利益将流向比利时。

接着,埃奇沃思试图弄清在类似的情形下是否只存在唯一的解决办法,或贸易创造的财富将如何在双方之间实际分配。他发现不可能只存在一个贸易平衡点。两国最终位于契约曲线上的点,将取决于德国与比利时之间关于贸易中所获利益的谈判。获利较多的一国或那个能更容易地生产出他国

所无法生产的商品的国家的国家将是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方。

随后,埃奇沃思继续阐明,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程度是各方交易者的数量作用的结果。若许多国家生产椒盐卷饼以供出口,只有少数几个生产啤酒,德国将不可能在与比利时的谈判中占据优势。所有的椒盐卷饼生产国将互相竞争,为从比利时进口每箱啤酒而争相提供大量的椒盐卷饼。同样,若存在众多的啤酒生产国,而没有其他的椒盐卷饼生产国,交易的利益将对德国有利。各国都想要德国的椒盐卷饼,而德国可以到处采购啤酒。埃奇沃思表明,只有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即有很多国家既销售椒盐卷饼又销售啤酒时,才会只存在一个可能的结果。各方都将是价格的接受者,每方都将失去凌驾于对方之上的谈判权。

埃奇沃思除了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还在统计分析方面作出了几个贡献(1996),包括在推导统计推论、创立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方面的工作。可以从0变化到1的相关系数表示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两个变量彼此相关的紧密程度。相关系数为0表示两个变量毫不相关,不会同时发生变化。相关系数为1则表示两个变量同时发生变化,只要一个变量变化,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出另一个变量将如何变化。

极为难得的是,埃奇沃思在数理统计学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实用的一面,他将数理统计学延伸至实践领域并作出了解释。埃奇沃思在两篇文章(1886,1888)中阐明,对以往的提款需求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让银行估算出可能的现金水平,该现金水平应足够满足未来日常的提款需求。这种估算使银行

可以决定能够贷出多少货币,以及应在手头保持多少货币作为意外开支的准备金,以防存款人到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

尽管埃奇沃思的研究具有实用价值,但他最希望建立的是有关经济学原理的定理。这种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对其他经济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埃奇沃思还创立了几个重要的经济学分析工具。鉴于此,埃奇沃思成为 20 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五到六位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埃奇沃思的著作:

New and Old Methods of Ethics: Or 'Physical Ethics' and 'Methods of Ethics', Oxford, Parker, 1877

Mathematical Psychics: 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Moral Sciences, London, Kegan Paul, 1881

"Problems in Probabilities," *Philosophical Magazine*, 22 (1886), pp. 371 - 84

Metretike, or the Method of Measuring Probability and Utility, London, Temple, 1887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Banking,"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51 (1888), pp. 113 - 27

Paper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y, 3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25

Writings in Probability,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3 vols.,

ed. Charles R. McCann, Jr., Hants, Edward Elgar, 1996

涉及埃思沃奇的著作：

Creedy, John, *Edgewort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Oxford, Blackwell, 1986

Creedy, John, "F. Y. Edgeworth, 1845—1926," in *Pioneers of Modern Economics in Britain*, ed. D. P. O'Brien and John R. Presley, Totowa, New Jersey, Barnes & Noble, 1981, pp. 72 - 104

Hicks, John,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in *Economists and the Irish Econom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ed. Antoin E. Murphy,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1984, pp. 157 - 74

Keynes, John Maynard,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1845—1926", in *Essays in Biography* by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Norton, 1951, pp. 218 - 38

Stephen M. Stigler, "Francis Ysidro Edgeworth, Statisticia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41, 3 (1978), pp. 287 - 322

约翰·贝茨·克拉克 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

约翰·贝茨·克拉克是 19 世纪末几个独立发现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克拉克还运用边际生产力的概念创立了收入分配理论。他还利用该理论证明现有的收入分配是公正与公平的。此外,克拉克还研究了美国经济中大型垄断公司和强大的工会组织的影响;他认为当存在这样的经济权力组织时,公平将受到抑制。

克拉克 1847 年生于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他父亲在当地开了一家纺织品商店;但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迁至明尼苏达州,开设了一家小型耕具店。克拉克进入了布朗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在那儿对哲学和伦理学产生了兴趣。毕业后,他分别在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和德国的海德堡大学研修了三年。当时美国没有什么研究课题,必须到欧洲才能从事先进的研究。克拉克返回美国后到卡尔顿学院任教,在那里教授了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此后他又来到史密斯学院、阿默斯特学院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任教。克拉克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安顿下来,自 1895 年起教授经济学,直至 1923 年(除了 1898—1899 学年他接替欧文·费雪到耶鲁大学任教,因为当时费雪正处于肺结核病的康复阶段)。1880 年克拉克帮助创立了美国经济学会,该学会如今已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组织。三年后他成为该学会主席。

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克拉克是和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深信战争的威胁是改善人类经济条件的巨大障碍,遂加入了和平促进联合会,积极拥护国际联盟,并当选为研究世界大战和军国主义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经济学和历史学部的负责人。

毫无疑问,克拉克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创立了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distribution)。该理论构想的目的是解释决定不同个体的收入水平的规律,即影响经济领域内收入分配的规律。

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确切的灵感来源至今仍有扑朔迷离。据克拉克自称,该理论是在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辩论的过程中形成的,目的是证明乔治关于收入分配的观点的错误。乔治主张,地租源于土地所有者的垄断权力,地租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存在固定的土地储备,并且有人愿意为了使用土地而付款。因而地租在伦理上并未被证明为是合理的,也不是人类努力的结果。于是,他建议(像魁奈一样)废除所有现存税种而针对土地价值制定单一税种。

而克拉克的儿子(J. M. Clark, 1952)和约翰·亨利(John Henry)都坚持认为,克拉克是在反驳马克思的过程中形成了边际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声称工人遭到剥削,因为雇主榨取了工人创造的部分价值(剩余价值)。克拉克的著作的大量片段显然支持这种关于克拉克灵感来源的解释。

但更可能的是,克拉克在构思他的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时既想到了乔治又想到了马克思。边际生产力理论反对乔治的观点,认为地租收入是应得的劳动收入;该理论又与

马克思的论点相反,认为工人并未遭受剥削,因为他们获取的收入等于他们赚取的收入。克拉克创立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三个动机也许是更实用的一个。19世纪末的美国是强盗资本家的年代,面对日益增长的商业强权,劳动骑士团(Knight of Labor, 1869年成立的秘密工会)和美国劳动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Labor)等工人组织兴起,对资本主义的联合攻击日益增强。边际生产力理论很可能源于克拉克试图证明商业利润合法性的愿望,从而保护资本主义免受攻击。

不管他的灵感出自何处,克拉克运用边际生产力理论论证说明,现存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只要收入被当作竞争过程的一部分所接受。克拉克在《财富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一书的绪论中阐述了他的理论精要: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表明社会收入分配由自然法则所支配,若该法则的运作没有摩擦,那么分配给每个生产代理者的财富的数额就是该代理者所创造的财富。然而工资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自由谈判来调整,通过谈判而形成的回报率往往等于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工业产品部分……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受到阻碍,(经济体系)将把每个人生产的特定产品分配给个人。”

为了理解边际生产力理论,设想一个特定的厂商,如一个教育机构。只要学校多聘用一名教员,就能提供更多的班级和教学课程,因而学校的入学人数将增加,学校将从每个新生身上获得额外收入。如果新教员享有国内或国际声誉,则学校收入将更多;国内或世界各地的学生将涌入这所大学,以赢得跟随这名新教员学习的机会。新教员的边际生产力就是聘用该教员的学校所增加的收入。

克拉克采取这样的立场：如果每个人都被给付了相当于各自边际生产力的价值，那么他们将没有理由抱怨收入水平。每个人的收入正好就是他们对商品和服务生产的贡献额。这种分配结果将是公平的，每个人都获得了公正的补偿。另一方面，若某人的收入少于他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他就遭到了抢掠和剥削。克拉克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将导致马克思所意识到的潜在的社会问题。

在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土地被看成与劳动是一样的。它对产出价值作出了贡献，因为倘若没有地方设置建筑物与工厂，生产活动将无法进行。类似的，土地包括商品生产与服务中所需要的重要的原材料。鉴于土地对产出价值的贡献，土地所有者必须被偿付地租。这样，亨利·乔治宣称该收入不是劳动所得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土地为生产作出了贡献，土地所有者就应该为自己的贡献收取报酬。

与之类似，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由于资本禀赋或机器设备对商品生产的贡献，利润被证明是合理的。这样利润就不是掠夺性的；利润是对资本的报酬。再者，即使工人们没有获得在工作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只要他们获取了他们的边际产品，那么对他们的报酬就是公平的。

从该理论马上引出的一个问题即所谓的产品耗竭或总额相符问题(adding up problem)。看待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首先，是否能够通过商品销售取得足够的资金向所有的生产要素支付他们的边际产品？我的学校蒙茅斯大学是否能获得足够的收入向所有教员支付他们的边际产品？如果不能，那么有人将遭到剥削，因为他们的报酬小于他们对学校收入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其次，如果每个人都被支付了自己的边际产

品,那么你把所有此类支付累加起来后,是否还剩下一些什么?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因为如果蒙茅斯大学偿付了所有教员和其他所有生产要素之后,还剩下一些,我们就需要采取某种方式去决定谁该获得这笔收入,并决定这笔额外收入的分配是否会影响整体收入分配的公平。

克拉克(1890a, 1891)断言,所有边际生产力的总额等于一个企业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总值,甚至还绘就了试图证明这一结论的一系列图表。他认为通过竞争往往会排除其他任何结论。然而克拉克的论点在数学上并不严密,而且他无法识别该结论所依附的限制性环境。后来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论证了解决总额相符问题的正确方法。威克塞尔阐明只有在“不变的规模收益”(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的情形下,对所有要素的偿付才等于其所生产的商品价值。接着威克塞尔认为竞争将导致不变的收益。然而,克拉克已经抓住了正确解决方法要点;只有当竞争力量强大时,产品耗竭和总额相符才不是关于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克拉克还通过对竞争和垄断的研究为经济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们就被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厂商手中的问题所困扰。垄断厂商运用自己的市场权力能够约束产出,提高价格,因而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少、更贵的商品。

从上文可知,克拉克认为竞争是经济领域的积极力量,因为它趋于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自己公平的份额,或自己对生产的边际贡献价值。在竞争条件下,若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少于他的边际产品,他将转而为其他雇主提供服务。他将能找到现

成的就业机会,其他厂商将会通过雇佣他而获益。厂商将获得额外利润加上工人的边际产品,这将超过雇主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然而在缺乏厂商间竞争的情况下,工人的选择机会有限,必须接受雇主开出的工资水平。

上述分析具有几个重要的政策涵义。扰乱竞争的任何因素都是应该诅咒和反对的。其中包括工会组织罢工示威,以及利用示威来追求高于工人的边际产品价值的工资水平。因此克拉克(1894)在19世纪末领头为劳工就业权(自由雇佣企业)法律而战。然而,抑制竞争的因素也来自于商业企业;因此克拉克开始研究垄断、其他不完全竞争的形式以及抑制竞争的商业实践。

克拉克(1890b,1901,1904)在大量文章中为大型厂商辩护,提出垄断和求过于供的市场情况均是自然现象。克拉克认为由于潜在的竞争,拥有垄断权力的大型厂商从未真正构成问题。若一个厂商赚取了额外的或垄断利润,其他厂商将迅速进入该行业,要求分享如此高额的利润。此外,克拉克还认为,若大型厂商滥用垄断权力,消费者和工会将会竭力利用立法机构和法庭来降低价格和打破垄断。

不过,克拉克(1900)确实意识到在竞争过程中某些厂商可能会将定价低于成本。采取这种行为的意图是要将竞争者逐出市场,从而造就垄断权力,在未来赢得更大的利润。若国内厂商做出这种行为,即称为“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当外国厂商做出这种行为时,即称为“倾销”(dumping)。为解决这个潜在的问题,克拉克强调,必须阻止任何不公平竞争的方式。

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ct)以及1911年

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事件,使得掠夺性定价在美国成为违法行为。不幸的是,在实践中总是很难证明厂商是否在从事掠夺性定价,克拉克也未提供明确的检验方法帮助我们判定厂商是否做出了该种行为。若厂商定价低于成本,可能是由于产品缺乏需求或竞争对手能够在低价格水平上生产和销售产品。在后一种情形下,其他厂商为保持竞争力不得不将价格削减至同样低的水平,并希望通过降低成本得以生存。

近来,美国商界又就这个问题提出意见,谴责日本公司在美国倾销商品,意图占据巨大的市场份额,使美国企业破产。倾销类似于掠夺性定价,被视为商业竞争的一种违法形式,因为它的目标是造就垄断权力。关贸总协定(GATT)有一个所有国家都应遵守的反倾销准则。但是正如掠夺性定价一样,很难在实践中证明倾销。

贯穿约翰·贝茨·克拉克的经济学思想的主题是竞争在商业企业中的重要性。必须通过竞争才能保证每个人获得相当于自身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的偿付,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竞争也是避免大型厂商滥用经济权力的必要手段。

尽管克拉克的成就未能使他与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或欧洲大陆的边际主义者相媲美,但却使克拉克成为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克拉克生活和写作的时代,欧洲是经济学思想的中心,但由克拉克率领的一支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队伍将迅速发展壮大。

参 考 文 献

克拉克的著作：

The Philosophy of Wealth (1886),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7

"The Law of Wages and Interes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 (July 1890a), pp. 43 - 65

"The 'Trust': A New Agent for Doing an Old Work: Or Freedom Doing the Work of Monopoly," *The New Englander and Yale Review*, 16, 3 (March 1890b), pp. 223 - 30

"Distribution as Determined by a Law of R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1891), pp. 289 - 318

"The Modern Appeal to Legal Forces in Economic Life," *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December 1894), pp. 481 - 502,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1899),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5

"Trust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5, 2 (January 1900), pp. 181 - 95

The Control of Trusts, New York, Macmillan, 1901

The Problem of Monopol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4

涉及克拉克的著作：

Clark, J. M., "J. M. Clark on J. B. Clark,"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ed. H. W. Spiegel, New York, Wiley, 1952, pp. 592 - 612

Henry, John, "John Bates Clark and the Marginal Product: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Value-Free Economic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5, 3 (1983), pp. 375 - 89

Henry, John, *John Bates Clark: The Making of a Neoclassical Economis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其他参考文献：

George, Henry, *Progress and Poverty* (1879), New York, Robert Schalkenback Foundation, 1929

Josephson, Matthew, *The Robber Barons: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61—190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1848—1923)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主要是作为数理经济学之父为经济学家们所铭记。然而到了晚年,帕累托舍弃了将经济学形式化的倾向。他开始相信这种方式过于狭隘,不能为揭示经济的实际运行方式提供充分的理解。于是,他试图将政治和社会学变量与他对经济体系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拓展了经济学。

帕累托 1848 年生于巴黎,当时他的父亲——一位土木工程师因反对意大利政府的政策而流亡至此。中产阶级的家庭为帕累托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还教给他辛勤劳作与有节制的生活的价值。1858 年他的家搬回意大利,于是帕累托主要在意大利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后来他进入都灵工学院,1869 年最先在他所在的毕业班中获得工程学学位。

被授予学位后,帕累托在一家国有铁路公司担任土木工程师,之后还担任了其他工程类职位。这些工作要求帕累托不时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旅行,他因此能够观察英国经济。当时英国政府促进自由市场的成功、施行放任政策的良效格外引人瞩目。所以帕累托加入了亚当·斯密学会(Adam Smith Society),成为该学会 19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的一名积极分子。他经常向学会投递时事通讯稿,支持民主、自由贸易与

竞争,以及减少政府对商业和个体活动的约束。

闲暇时,帕累托广泛阅读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书籍,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1882年他从政府工作岗位上退休成为工程顾问后,开始撰写政治和经济学评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帕累托充分利用自己在数学与工程学方面所受过的训练,将经济学理论从口头宣言式的文句转化为数学方程。这项成就使得帕累托于1893年获得了洛桑大学的教职,成为里昂·瓦尔拉的继承人。

作为推动经济学更加数学化的先驱,帕累托在洛桑大学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尽管已经功成名就,帕累托却被数理经济学越来越突出的狭隘性所困扰,并开始改弦易辙。他认为,要想真正地理解经济,就需要理解经济事件发生过程中所蕴涵的文化内容和政治内容。帕累托还努力将社会学因素、政治因素及心理因素融入了他对经济变迁方式的分析。

1898年因叔叔去世,帕累托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他用这笔钱在日内瓦湖畔买了一幢乡村别墅。在那里他得以安静地致力于拓宽经济学分析的课题,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古怪的隐士,和十几只猫共同生活在一幢大宅子里。

除了使经济学更加数学化以外,帕累托还对经济学作出了三个实质性贡献——他发展了至今仍然冠以他的名字的收入分配法则,他促使经济学家们从关注基数效用转向序数效用,他创立了检验经济产出是否得到提高的方法。

在洛桑大学任教时,帕累托对收入分配问题发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各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这些探索使他发现了支配收入分配的简单模型。帕累托发现,如果你想给某国的家庭的收入水平按次序分等级,然后记录家庭收入水平,你会发

现收入并不呈比例或算术级数增长。相反,帕累托发现,当我们沿着等级次序从最穷的家庭移动到最富的家庭时,收入呈几何级数增长。当收入呈比例增长时,若第 30 个百分位的家庭比第 20 个百分位的家庭收入多 20%,那么第 40 个百分位的家庭应比第 30 个百分位的家庭收入多 20%,第 100 个百分位的家庭应比第 90 个百分位的家庭收入多 20%(见图 7)。当收入呈几何级数增长时,收入沿着等级次序移动呈不等份增长。例如,第 30 个百分位的家庭比第 20 个百分位的家庭收入多 10%,第 50 个百分位的家庭比第 40 个百分位的家庭收入多 40%,而处于第 100 个百分位的家庭也许就是第 90 个百分位家庭收入的两倍(多 100%)(见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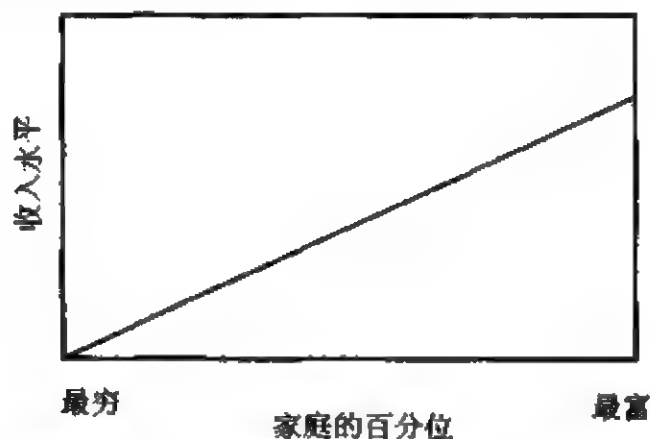


图 7 收入的算术级数增长或按比例增长

帕累托检验了美国 and 众多欧洲国家的收入统计资料,发现每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模型都极其相似。于是他就将该模型称作收入分配“法则”。由于他发现收入分配是刚性的和不变的,因而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帕累托是在为现存的收入不平等模型辩护。但是模型的其他解释却表明,这些极其相似的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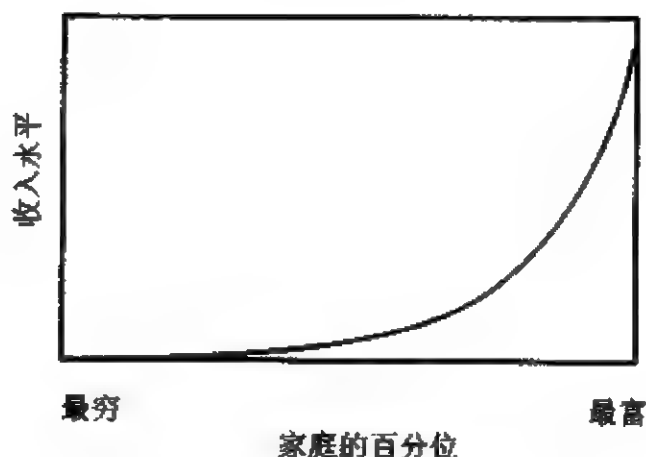


图8 收入的几何级数增长

入分配模型到处都可能存在。例如,帕累托相信富人将竭力保护自己拥有的财物,并且他们通常有权力这样做。收入再分配和减少不平等的计划在富人的政治势力下终将破灭,这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尽管该法则引起了激烈的论战,但帕累托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工作仍标志着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帕累托是首位在世界范围内郑重研究收入分配资料的经济学家,他因而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帕累托还因建议怎样衡量收入不平等而作出了重要贡献。由此看来,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最后他建议,收入分配或许显示了某种类似法则的秩序,他在建议中提出了曾被后来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们所忽略的诱人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帕累托对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主张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应是序数效用而不是基数效用。序数条件下衡量的是,假定个体消费者知道偏好商品 A 甚于商品 B。基数条件下衡量的是,消费者被假定不仅知道偏好 A 甚于 B,还知道偏

好 A 甚于 B 的程度是多少。

把经济学家们对基数效用的关注转移到序数效用上来,他们就不必去深究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仅仅需要知道自己偏好桃子超过李子,这是大多数消费者实际上都知道的,大多数消费者的日常支出也体现了这一点。然而消费者并不可能知道自己想要桃子的程度是李子的两倍或三倍。因此转变列序数效用上来使得经济学描述人类行为的方式更加符合实际。

同时,从基数效用转移到序数效用,就不必再担心怎样衡量效用,或怎样才可能对不同的个体所获的效用进行比较。自从边沁和穆勒时代起,功利主义就为这些问题所困扰。有了序数效用,就不再需要衡量工具了。两个人互相交易的事实表明,他们偏好接受的商品甚于卖出的商品。同样,无须再比较人与人之间的效用。序数效用能保证效用总额增长,任何一桩交易的结果都是这样,因为交易各方的效用都增大了;如果每个人都没有得到更多的满足,他们就不会进行交易。

帕累托的第三个贡献是他提出了经济体系最优状态的命题,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帕累托自己称之为“*ophelimité*”,源自希腊语“*ophelimos*”。他的目的就是要论证特定的经济结果不可能再得到改进了。帕累托最优结果是指要增加一个人的福利就必须减少其他人的福利的状态。因而,所有人都彻底得到改善是不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起初,帕累托注意到市场中的两个个体只有在双方通过交换均受益时才会发生交易。若一方获利而另一方受损,则交易不会产生。若双方不能自主自愿地进行交易,在这些人

之间再分配资源的任何努力都将改善一方的福利而恶化另一方的处境。所以,允许市场存在自由交换的经济将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观点也可被用来评价政策议案的变化。削减富人的税赋将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若低收入人群因经济加速增长而获利,则该税收政策将导致帕累托较优的(Pareto Superior)结果。但是,若削减税收并没有激发充分的收入增长,那么低收入的人将处境恶化(因为总要有有人承担这部分减税)。现行税制在这种情形下就应该是帕累托最优状态。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最优的观点有助于评价经济运行而不必求助于价值判断。他们认为该观点为经济学设立了更科学的基础。因而经济学家们殚精竭虑地试图证明特定状态下帕累托最优状态存在的定理,以判断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稳定的还是可能变化的。该项工作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资本主义竞争既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又实现了稳定。

不过,近来这项工作招致了很多批评。帕累托最优是指在既定的初始收入分配或资源分配条件下的状态。如果我们从其他初始收入分配出发,将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也是帕累托最优,但我们无法在各种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中作出抉择。其次,正如森(Sen,1982)指出的,帕累托最优实际并未诞生纯客观的或科学的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它假定,若一个变化能够改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福利,那么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将得到改善。尽管这一假定也许非常正确,但森指出这只是个人的见解而不是科学的真

理。最后,森(1987)提出,饥荒可能是帕累托最优,而阻止民众饿死的资源再分配却并非帕累托最优,所以其实并不存在令人满意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参见森)。

除了作出许多实质性的重要贡献以外,帕累托还因将数学形式的推理和分析引入经济学而闻名。然而他到了晚年,开始不满于数学形式化和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整体运行的要害问题只能置身于历史和社会政治环境中去理解。于是帕累托试图将这些因素与经济周期理论结合起来。他注意到,社会因素影响储蓄、工作和消费决策,从而影响经济状态。然后,帕累托逐渐形成了关于经济增长与停滞的社会学理论。根据帕累托的观点,经济增长需要努力工作和自愿延迟享乐的满足。努力工作、节俭、职业承诺的社会准则有助于形成这些行为;而经济增长又趋于让人们缓和与松懈下来。人们收入上涨时,会变得更加倾向享乐主义——借款、消费,为迅速赚钱而忙碌于投机活动。帕累托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消费者过度负债将削弱消费者的信心和支出。这将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但是,通过振兴社会准则以及积累更多储蓄以供未来投资,也将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帕累托因对数理经济学的贡献而闻名,后来他却开始批评与否定数理经济学。不过,越来越数学化的经济学将称颂数学的帕累托而忽略社会学的帕累托,这一点不足为奇。虽然如此,由于他在经济学诸多领域中的大量贡献,在使经济学更加数学化、科学化以及历史化与社会化方面的开创性努力,帕累托注定将被尊崇为经济学历史上十二位左右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参 考 文 献

帕累托的著作: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06), New York, A. M. Kelly, 1971

The Mind and Socie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5

Sociological Writings, ed. S.E. Finer New York, Praeger, 1966

涉及帕累托的著作:

Cirillo, Renato, *The Economics of Vilfredo Pareto*, London, Frank Cass, 1979

Powers, Charles H., *Vilfredo Pareto*,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7

Schumpeter, Joseph, "Vilfredo Pareto: 1848—1923,"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3, 2 (May 1949), pp. 147 - 73. Reprinted in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Walr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10 - 42

其他参考文献:

Sen, Amartya,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2

Sen, Amartya,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欧根·冯·庞巴维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

欧根·冯·庞巴维克为经济学作出了几个相互关联的贡献。他发展了资本与利息理论,并解释了实际利率必须是正数的原因。他是首次将时间因素与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经济学家之一,还发展了由时间因素扮演关键角色的经济学。

庞巴维克 1851 年生于莫拉维亚(当时为奥匈帝国领土,现属于捷克共和国)的布尔诺市。其父为政府高级官员。庞巴维克在他的学生时代学习了法律、管理和政治学,并打算跻身于文职部门。可是由于家庭面临经济困难,他决定到维也纳大学主修法律,以图走上一条报酬更为丰厚的生活道路。法律专业要求学生必须选修一些经济学课程,可能正是这些课程激发了庞巴维克对经济学的兴趣,并导致了他职业生涯的另一个转折。

1875 年庞巴维克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律博士学位后,接受政府资助出国留学,准备日后从事经济学教学。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他先后求学于德国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和耶拿大学,并撰写了博士论文。1880 年庞巴维克取得任教资格后,就职于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大学。

四年后他晋升为正教授。1889 年庞巴维克离开讲坛,成为财政部的一名政府经济学家。在那里,他研究怎样令奥地

利回归金本位制,并致力于改革奥地利所得税制,使其成为更好的政府收入来源(当时奥地利严重依赖销售税)。1893年他当上了奥地利的财政部长,并在其后十年间连任几届。

1904年庞巴维克离开政坛重返维也纳大学,在那儿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此后直到他1914年逝世的十年间,他的大部分时光都花在了抵御许多政治学与经济学批评家的自我保卫战中。

庞巴维克的名字流传至今主要是因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他在该领域作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贡献——将生产作为一个迂回过程的分析;对实际利率为何为正数的解释;将时间因素列为影响利率的重要变量的利率均衡理论。

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经济朝向均衡的方向发展,但却忽略了这样的事实:该过程的发生需要一段时间。既然经济在达到静止或均衡状态前会经历相当长时间,那么就可能发生其他许多变化,打破初始的均衡状态,并促使经济发展走向另一条道路。庞巴维克拒绝忽略时间,而且他强调,时间是一个理解经济实际如何运行的重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时间也是厂商决定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主要因素。厂商可以运用效率较高的生产技术;遗憾的是,这些手段提供的产出较少。或者,厂商可以使用迂回的生产技术,经过较长时间的生产过程,最终获得更多的产品。拿庞巴维克最津津乐道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用手、桶或管道从泉眼中汲取饮用水。方法越来越迂回;同时也越来越有效,汲取的水也越来越多。

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ion)是指为向消费者提供最终产品而运用更多的工具与资本,生产更多的中间产品,并

使生产经历不同的阶段。当庞巴维克写作时,大型组装厂开始问世。由于在制造和销售产品之前必须要兴建工厂,因此这些技术先进的大型工厂生产出最终产品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例如轿车)。使用机器人的产出比自动流水线更多;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必须建造机器人和自动化工厂,然后给工厂装配机器人,这是一个更迂回的生产过程,需要经过比流水线更多的时间和更长的等待期才能完成最终产品。但是这种更迂回的生产方式也通过漫长的周期生产出了更多的产品。

该理论的麻烦之一即难以衡量生产过程的迂回性,或很难在两种生产过程之间判定哪一种更迂回。如果将一条自动流水线与某人在车库里制造轿车相比,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你必须比较两种不同的流水线技术或两套不同的家庭用水管道运输系统时,任务就复杂多了。而后两种情况是众多厂商都必须作出的决策。庞巴维克的确试图解决衡量迂回性这个难题,但他的努力毫无建树。

然而,迂回生产的观点包含着一个关键思想——生产涉及两种选择之间的平衡:一是立即拥有产品,但为数不多;二是拥有更多的产品,但是在遥远的将来。人们放弃即时消费,日后就能享有更多的产品;或者人们可以即时消费,但在将来只能得到更少的产品。

庞巴维克依据经济代理者个人对时间的偏好,对上述选择进行了分析。人们决定现在就享用商品,还是愿意放弃眼前,以便将来收获更多;企业主根据自己希望现在就赚钱还是日后赚钱,决定在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采用迂回技术。

个人对时间偏好的思想还奠定了庞巴维克利息理论的基础。首先,庞巴维克通过介绍和批评以前所有的理论为他的

利息理论打下基础。这体现在他的《资本和利息》(*Capital and Interest*)第一卷(1884),该卷阐明,以前对利息的解释建立在资本生产力、节制消费和剥削工人的基础上,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接着,第二卷(1889)继续阐述基于时间因素的利息理论,试图表明为正数的实际利率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理所当然的。

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解释实际利率必须为正数的原因,但均以失败告终。人们可以将双方达成一致的利率看成是名义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从银行借款,期限为1年,利率为10%,那么我所偿还的一沓美元要比原先的借款多10%的利息。实际利率(real interest rate)衡量的是我偿还给银行的钞票的购买力能比我向银行借款的购买力大多少。如果在过去的一年中,商品价格上涨10%,那么我还款的实际价值将减少,因为其购买力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多还10%的一沓钞票以及10%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我的还款的购买力并不比借款的购买力大,实际利率为零。根据定义,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或者,我们可以像庞巴维克那样去理解实际利率——消费者支付的实际利率代表他为了即时消费而不得不放弃的未来利益。

庞巴维克对为正数的实际利率列出了三条解释。首先是一条基于经济增长的论断。通常收入在持续增长,若人们希望未来生活更加富裕,那么为了现在得到一美元,就得愿意在将来放弃不止一美元的价值。

其次,庞巴维克认为人们都具有为正的时间偏好;也就是说,人们喜欢即时消费,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也许到了将来

人们打消了消费的欲望,或没有能力消费(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既然我们现在就需要物品,那么让我们放弃即时消费来换取未来消费就必须贿赂我们。这种贿赂只能体现为未来能享有更多的物品。

最后一点,庞巴维克认为既然迂回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因而借款者能够轻松支付、并且愿意支付为正数的实际利率。

解释了实际利率为何必须为正数之后,庞巴维克接着阐述在实际生活中怎样设置利率。他的分析依赖于标准的供需分析——借款的供给与需求决定了借款的价格或利率。

在这里,庞巴维克的贡献在于他说明了迂回生产与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是如何分别影响货币的供给与需求的。我们已经看到,庞巴维克认为生产是一个产品转换的过程。这个迂回过程需要其他已经加工好的商品,这些商品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偿付。同样,生产中间产品也需要劳动力与原材料;但是在最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之前,必须要支付工人工资和购买原材料。于是迂回生产导致了厂商对货币的需求。必须储存的中间产品的数量以及生产过程的时间决定了厂商对货币的需求。

同样,在庞巴维克看来,货币供给取决于贷款方偏好将来拥有更多还是现在就拥有。若人们作长期打算,愿意牺牲眼前以期将来收获更多,那么他们会更乐意供给货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期望即刻得到满足,那么为开展更迂回的生产而筹集的资金将需要更高的实际利率(或大量未来的产品)。

创建了资本与利息理论之后,庞巴维克(1896)运用该理

论解释了为何工人并未遭受剥削,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反。他假定对所有的工人都按现行的工资率支付工资。工人创造的产出与工资的差额即企业主的利润。工人无法获得他们产出的全部未来价值,因为雇主在生产进行中必须支付利息。利润理所当然地成为对资本家采用更迂回的生产方式和因之而生产更多产品的回报。利润还包括厂商为借款和使用更迂回的生产技术而必须偿付的利息成本。

熊彼特将庞巴维克推崇为历史上五到六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不过,由于熊彼特是庞巴维克的学生,因而这个评价必然被看作是相当偏颇的。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庞巴维克并未达到经济学史上最杰出、最重要人物的业绩水平。然而,他的确为经济学史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他认识到了在理解资本与利息的经济作用中时间因素的重要性,他还认识到了时间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参 考 文 献

庞巴维克的著作:

- Capital and Interest*, 3 vols. (1884 and 1889), trans. G. D. Huncke and H. F. Sennhole, South Holland, Illinois, Libertarian Press, 1959
-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1896), New York, A. M. Kelley, 1949
- Further 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 South Holland, Illinois, Libertarian Press, 1959

Shorter Classics of Böhm-Bawerk, South Holland, Illinois, Libertarian Press, 1962

涉及庞巴维克的著作：

Buechner, M. Northrup, "Roundaboutness and Productivity in Böhm-Bawerk,"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2, 2 (October 1989), pp. 499 - 510

Hennings, Klaus H., *The Austrian Theory of Value and Capital: Studies in the Life and Works of Eugen von Böhm-Bawerk*,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7

Hirshleifer, Jack, "A Note on the Böhm-Bawerk, Wicksell Theory of Interes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4 (1967), pp. 191 - 9

Kucenne, Robert E., *Eugen von Böhm-Bawe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Schumpeter, Joseph, "Eugen von Böhm-Bawerk, 1851—1914," in *Ten Great Economists: From Marx to Walras* by Joseph Schumpet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43 - 90

克努特·威克塞尔 KNUT WICKSELL

(1851—1926)

纵观威克塞尔的一生,他是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他依据自己的原则,拒绝与自己选择共同生活的女子结婚,拒绝抚养家庭。1909年他因发表嘲弄圣母无沾成胎说的言论而在监狱服刑2个月。他拥护妇女权利、生育控制和全民选举,而这些思想很久之后才在瑞典被接受。

威克塞尔的经济学也同样富有争议性。作为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早期鼓吹者,与该理论的其他支持者形成对照的是,威克塞尔从该理论得出了政策结论,即经济生活需要更加有力的政府干预。事实上,威克塞尔与他所有的同代人都不同的是,他认为若不施行适当的经济政策,通货膨胀或失业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威克塞尔1851年生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由于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去世,威克塞尔转由伯父和姑妈抚养。他接受了很好的中学教育,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显示出天赋。1869年他怀着迅速荣膺哲学博士和数学教授的雄心壮志考入了乌普萨拉大学。然而他的学术生涯却显得漫长而多舛。他对诗歌、女权运动和政治发生了兴趣,并于1878年出版了一本25首诗的诗集。接着,19世纪80年代他成了一名激进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遍游瑞典各地,游

说人口过剩的危险以及必须通过独身和生育控制来控制人口增长。这种兴趣多变的后果是,直到 1885 年(在他初次考入乌普萨拉大学的 15 年后)威克塞尔才获得了数学系的学位。

然而他的兴趣仍在继续变化,从研究数学转向研究经济学和社会改革。凭借从去世的父亲那里继承的遗产,威克塞尔前往伦敦,以便在大英博物馆阅读经济学家的名著。他回到瑞典后,希望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写作。然而当时经济学是瑞典大学法律系的教学科目,因此威克塞尔在获得经济学教职之前,必须修习法律和获得法律学位。1899 年,年已 48 岁的威克塞尔通过了法律考试,成为乌普萨拉大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律系的讲师。可以想象,他的学术生涯非常短暂;威克塞尔于 1916 年退休。

威克塞尔在三个截然不同的经济学领域作出了大量贡献——边际生产力理论、货币理论以及公共财政。

威克塞尔和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各自(独立地)解决了总额相符问题或产品耗竭问题(参见克拉克)。这个问题反映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何时能解释一个厂商生产的所有产品的分配问题。威克塞尔是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早期支持者,该理论主张个体的收入取决于他们对厂商收入的(边际)贡献。该理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是否所有边际生产力的总额以及由此形成的所有收入等于该厂商创造的产出的价值。

威克塞尔论证说,这一点是否真实取决于规模收益。这一概念是关于在增加一定投入的条件下产出如何增长。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设想某厂商专门从事谷物种植。若我们将用来种植谷物的土地面积扩大到原来的两倍,刚好收获两倍

的谷物,因而我们获得了不变的规模收益。若我们将耕作的面积扩大至两倍,而产出增长却不到 100%,我们得到的就是规模收益递减(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最后,若我们将种植面积扩大至两倍而谷物的产值是原来的两倍多,那么我们就拥有了规模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威克塞尔表明,如果存在、并且仅仅存在不变的规模收益时,所有边际产品的总额将等于所创造的产值。相反,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边际报酬的数额将超过产出的价值;而在规模收益递减的情况下,边际报酬的数额将小于产出的全部价值。在后一种情形下,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某些价值无法用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在前一种情形下,该理论能够给予充分解释。

威克塞尔接着解释了竞争如何迫使公司在最优规模下运行,并声称这种最优规模将要求不变的规模收益。他起初注意到公司面临“U 形”成本曲线。拿一个典型的厂商来说,当产出上升时,成本下跌,接着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不变,最后又开始上升。关于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形并不难理解。当农场的规模开始发展壮大时,农场主可以利用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获利。种植更多的谷物不需要购置第二台拖拉机;一台可以耕种更多的田地。同样,不需要第二座谷仓。谷物的产出可以翻一番,而种植谷物所需的投入却无须翻一番。然而规模经济将在某一点衰竭,而公司在这一点将达到最优或最高效的规模。此时公司面临着不变的规模收益,以及生产额外谷物的不变成本。超越了这个水平,将需要额外的资本设备,贫瘠的土地也将被用来种植谷物,农场将变得太大,以至于无法高效运行,因而规模收益递减就出现了。

由于竞争,公司被迫以最高效的生产水平运转。这将达到平均成本的最低点,或拥有不变收益的生产水平。生产无法达到这个水平的厂商将被那些以最低成本生产的竞争者逐出商业圈。这样,竞争就迫使厂商以最低的平均成本生产而享有不变的规模收益。威克塞尔认为,支付给所有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品将趋向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价值,而边际生产力理论将能够解释所有收入是如何分配的。

威克塞尔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关于货币理论方面的。在威克塞尔生活的时代,货币理论主要研究货币对价格的影响。而货币或利率对现实经济的任何影响却被忽略——对生产或就业的影响。威克塞尔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影响现实经济,从而改变了货币理论。

威克塞尔设想存在自然利率或资本的自然回报率。他将自然利率视为对最近创造的产品和设备的回报率(或收益)。生产技术的革新或改良将提高自然利率,促使投资产生更大的回报。与之相反,市场利率是银行对借款方的收费。该利率是由银行业体系决定的。

只要自然利率超过了市场利率,厂商将希望投资生产,因为投资收益(自然利率)将超过他们的借款成本(市场利率)。威克塞尔认为投资能够超过储蓄,因为投资并不是由储蓄而是由信用来提供资金的,或是通过在银行发放新贷款时创造的新的银行存款来提供资金。

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经济扩张将是累积的和能使自身永存的。投资需求的增长将促使工人从生产消费品的产业转移到生产投资产品的产业中来。消费品减少,则消费品的价格上涨。这样的话,消费品的生产厂商将赚取更多利润并将希

望扩大生产或增加投资。投资增长和消费品涨价的过程将经久不衰。在威克塞尔看来,在增长与投资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出现减速。

相反,若自然利率跌落到市场利率之下,投资需求将降低。厂商将不愿意借款扩张,因为借款的成本(市场利率)超过了投资收益(自然利率)。结果厂商产量减少,就业水平下降。需求不足将降低价格与支出水平。但是销售额和价格的下降将有损于厂商的利润。而且生产能力过剩的厂商将不愿再投资。经济紧缩将持续至投资增长。但是投资增长除非在自然利率上涨或市场利率下跌情况下才会发生。

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涵义是简单而直接的——货币当局必须避免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的任何背离。只有保持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货币当局才能避免经济持续增长和爆发通货膨胀,或避免持续停滞与失业率上升。该分析的另一个涵义涉及货币与利率之间的不确定联系。与20世纪的众多货币理论大相径庭的是,威克塞尔认为是利率决定了银行贷款与货币供给(而不是货币供给决定利率)。

威克塞尔的第三个主要贡献涉及公共财政。威克塞尔支持由政府发挥巨大作用的混合型经济。他以成本—效益分析为论据,提倡大量发展公有企业。威克塞尔迫切要求将自然垄断企业,如公共事业公司,以及其他显示出垄断倾向的公司或者逐渐形成以限产与提价为目的的卡特尔组织收归国有。威克塞尔坚信,由政府拥有和操纵这些公司会更好。国有制将给予消费者更多的商品与服务,以及较低价格的好处。

既然价格很可能降低至平均生产成本之下,国有企业将出现持续亏损。威克塞尔建议由课征的税收来弥补这些亏

损。因此他认为国有企业没有必要赢利。恰恰相反,与垄断状态相比,国家控制公司所有权是为了改善国有经济资源的配置。

威克塞尔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第二个方面论及减轻瑞典19世纪90年代对累退税的严重依赖。在这一点上,他提倡降低主要由低收入人群负担的消费税和关税,而发展对个人收入、公司收入以及财产或遗产课征的累进税。威克塞尔还提倡修改瑞典的财产税体系,以便更好地对土地价值中非劳动所得的增值部分征税。他强调对劳动所得的征税率应低于非劳动所得。

至于财政平衡的另一方,威克塞尔提倡政府加大在社会服务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支出,以补偿因在边际生产力基础上分配收入而引起的收入不平衡。但是威克塞尔也强调了广泛分配政府支出的重要性,这样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感到从自己上缴的税收中受益。

这些关于公共支出和税收的诸多建议使威克塞尔成为瑞典混合经济的创立者——高税赋、累进税率、政府给予工人巨大利益以及政府拥有大量的国有生产设施的所有权。

在本书的五十位经济学家中,威克塞尔是最被低估的一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威克塞尔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内作出了贡献。另一个原因是威克塞尔没有形成任何关键性的经济观点,也没有对经济分析的数学化作出贡献。最后,威克塞尔自身也应承担部分责任。他太富有争议性,过于轻率地对其他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理论表露不敬,无论是对于他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经济学家均是如此。

参 考 文 献

威克塞尔的著作：

Value, Capital and Rent (1893), London, Allen & Unwin, 1954

Interest and Prices (1898), London, Macmillan, 1936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1901, 1906), 2 vol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4 - 5

Selected Papers o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涉及威克塞尔的著作：

Firsch, Ragnar, "Frisch on Wicksell,"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 Great Economists in Perspective*, ed. H. W. Spiegel, New York, Wiley, 1952, pp. 652 - 99

Garlund, Torsten, *The Life of Knut Wicksell*, Stockholm, Almqvist & Wicksell, 1958

"Symposium on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Knut Wicksell,"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0, 2 (1978), pp. 127 - 249

Uhr, Carl G., "Knut Wicksell - A Centennial Eval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1, 5 (1951), pp. 829 - 60

Uhr, Carl G., *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nut Wickse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0

Uhr, Carl G. , "Knut Wicksell, Neoclassicist and Iconoclast,"
in *The History of Swedish Economic Thought*, ed. Bo
Sandel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76 - 120

托尔斯坦·凡勃伦 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

凡勃伦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最尖锐、最诙谐的批判者之一。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及其本人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都强调了社会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此外,凡勃伦将个体行为看成是习惯、嫉妒以及其他心理特性所激发的结果,而不是受理性与利己主义的驱动。凡勃伦运用这些行为特性来诠释经济所经历的规律性变化。

凡勃伦 1857 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的小农场。他生长在威斯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的乡村。他的父母重视教育,鞭策孩子们出人头地和不断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卡尔顿学院,凡勃伦跟随约翰·贝茨·克拉克学习经济学,克拉克最先阐明了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参见克拉克)。接着凡勃伦又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师从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学习哲学,皮尔斯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美国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期间,他还师从美国经济学会的创立者、杰出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Richard Ely)研修政治经济学。尽管拥有如此显赫的老师,凡勃伦还是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非常不满,因而转学至耶鲁大学。在那儿他跟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研究哲学,

并于 1884 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糟糕的哲学家就业市场,凡勃伦无法找到一个哲学方面的教职。以后的七年,他独自在埋头苦读中度过,终于他决定改行;因此他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后,凡勃伦和他在康奈尔的导师 J·劳伦斯·劳克林(J. Laurence Laughlin)一起来到芝加哥大学。在此他执教 14 年,尽管他写了两部非常成功、赢得评论界赞誉的著作(凡勃伦,1899,1904),发表了无数的文章,并编辑了享有盛名的《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从未晋升至助理教授之上。

离开芝加哥之后,凡勃伦经常在大学行政管理层的“激励”下,不停地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找工作。他的部分问题是他与年轻的女学生及教员们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另一个问题是他的刻薄的批评——尤其是对学术界及其他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他难以与同事们接近。更麻烦的是他从不关心诸如全系会议、参加班级活动、上班时间以及打分等这些学院仪式。他通常在不考虑学生学习质量的情况下给他所有的学生都打个“C”。最后凡勃伦老师出了问题。据多夫曼(Dorfman,1934)所述,凡勃伦在课上“喃喃自语,神思恍惚,经常跑题。结果他的班级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班最后只剩下一个人……”。

凡勃伦的离奇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出名。多夫曼(1934)报道说,凡勃伦用盒子布置他的住所,并将这些盒子当作桌椅使用。他强烈反对整理床铺之类的世俗的家务琐事,认为是浪费时间。脏盘子被堆在盆里,直到没有干净的碟子为止,然后再用水管冲洗。据迪金斯(Diggins,1978)讲述,凡勃伦 20 世

纪初在密苏里大学任教时,住在一个朋友家的地下室里,并通过地下室的窗户进进出出。

凡勃伦的经济学和他的生活方式一样离奇。当其他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象牙塔内研究人类行为时,凡勃伦则根据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人类行为。对于凡勃伦来说,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很多,他将这些其他力量导入经济学分析中。同样,他通过从其他学科获得的见识努力拓宽和丰富经济学。

利用从其他社会科学中获得的见识,凡勃伦拒绝如下的经济假设,即大多数人类行为都是理性的,人们仅寻求自身的快乐。相反,他发现人们的行为举止是非理性的,人们遵循习俗与习惯,而不是力求效用最大化。事实上,凡勃伦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完全颠倒过来,认为是人类制度及经验帮助人们决定该相信哪些行为是愉快的,哪些是痛苦的。

凡勃伦的第一部著作使他一举成名。《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凡勃伦,1899)反对将消费视作实现人类幸福的一种手段的传统观点,同时他也驳斥了认为个体通过内省来决定他们消费不同商品所获取的幸福的观点。凡勃伦发展了消费的文化理论,取代了这些观点。习惯、风俗以及迷信的非理性都将决定人类的消费。

凡勃伦认为,消费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给他人留下印象。凡勃伦称之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然后他继续为这种现象提供历史性说明。他论证了非生产性消费在早期掠夺性文化的情形下是人类威力与尊严的标志。在较为现代的文化中,炫耀性消费包括各种炫耀——将贵重礼物送人、驾驶豪华赛车、举办奢侈的宴会等。这些行为证明了一个人的财富及重要性。即使在较低经济阶层的家庭中,也

存在其中一个配偶呆在家里而不到市场上打工赚钱的现象,通过这一点也能证明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学说破坏了传统的经济人的观点。货币支出并不是因为它给个体消费者提供了效用,相反,炫耀性消费学说认为,消费者花钱是为了让他们的朋友及邻居嫉妒,以及跟上其朋友及邻居的消费水平。

这种分析形成了几个重要结论。如果我买了豪华轿车是为了让我的邻居嫉妒,我的邻居为了赶上我也买了类似的轿车,我们谁也不比谁更富有。我们双方都有更豪华的轿车,但我们都未能在对方面前炫耀自己。

情况会比这更糟糕。假如我的邻居为了让我嫉妒,买了一辆比我更豪华的轿车。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我付出更高的代价购买了更加豪华的车型。这个过程将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即我和我的邻居不断地购买更为豪华的轿车。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我们双方的处境都将极度恶化——我们因为买了我们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产生了大量的债务,我们卷入这场竞赛中,谁也未能取胜,这对我们双方的破坏性极强。由于人类对于效仿及驾驭别人之上的欲望,人类的决策事实上也许会减少个人的福利。

炫耀性消费也破坏了消费者的理性与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一旦认识到消费方式源于风俗习惯,那么消费就不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一旦意识到消费方式要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文化能够影响消费决策,那么消费者就不再是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后再购买什么的自主个体。再者,人都有缺陷,他们通常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因而他们在试图作出消费决定时要注意广告、文化,以及

其他人的做法。凡勃伦认为他们并不是那种被动的代理者,只会把从从事不同的事情或消费不同的商品中获取的乐趣累加起来。

凡勃伦(1904)除了研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同时也研究了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由机器及强盗资本家主宰的工业经济的崛起、道德体系对控制现代商业力量的无能、严峻的经济周期,以及近似于垄断的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和标准石油公司的兴起。与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都在集中精力研究经济如何朝着稳定的均衡方向发展,而他却与众不同,试图理解、解释他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变化。

朝着这个研究方向,凡勃伦将商业活动与机器加工区分开来,并类似地将资本家与工程师区分开。在凡勃伦看来,商业企业是由那些仅对谋取利润感兴趣的资本家经营管理的。资本家是对赚钱,而不是对商品感兴趣的剥削者。商品可以品质低劣,毫无使用价值,只要它们能够赚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相反,机器加工是生产产品时使用的技术程序。这些加工是由工程师设计和运作的。和资本家、商人不同,工程师关心生产力、实用性及效率。与商业活动不同,机器加工重视技艺。它的产品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用商品,能够满足人们关于饮食、建设性工作的需求以及人们的好奇心。

商业活动是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凡勃伦,1904)。商人借款是建立在预期未来利润的基础之上的。借款扩大了经济活动并提高了商品价格,从而导致了更高的利润。在他们的预期得到确认时,商人对未来的利润更为乐观。随着事态的

顺利进展,商人能够贷更多的款,赚更多的钱。然而,在某些时候,出现了对持续利润的忧虑,一些商人发现赚钱机会逐渐减少。贷款被收回,一些小企业开始破产,随之而来的便是萧条。停滞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商人们看到能谋取更多利润的充分机会,并乐意贷款并扩大业务。

与 20 世纪早期其他著述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凡勃伦没有看到经济制度走向均衡的趋势,他看到的是毫无止境的动荡与不稳定。因而凡勃伦认为,任何关于经济是如何达到均衡的分析都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分析要想科学化,就必须随时关注制度的变革,而不是关注经济移向静态均衡点的方式。

那么凡勃伦认为这个过程将往何处发展?凡勃伦有点天真地认为,机器加工和工程师可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很多经济问题。机器加工将允许生产和分配更具有计划性。它将允许我们废除价格体系。同时,一方面它将结束失业的浪费,另一方面将消除炫耀性消费的浪费。

凡勃伦是美国 20 世纪初期最著名的两三个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结果,凡勃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

参 考 文 献

凡勃伦的著作：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899), New York, Macmillan, 1908

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 (1904),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78

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New York, Macmillan, 1914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 Men,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8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1919),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0

The Vested Interests and the State of the Industrial Arts,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9

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1921),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3

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s, New York, B. W. Huebsch, 1923

A Veblen Treasury: From Leisure Class to War, Peace and Capitalism, ed. Rick Tilma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涉及凡勃伦的著作：

- Diggins, Jack, *The Bard of Savagery*, New York, Seaburg Press, 1978
- Dorfman, Joseph, *Thorstein Veblen and His America* (1934),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2
- Mitchell, Wesley C., "Thorstein Veblen" in *The Backward Art of Spending Mone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1950, pp. 279 - 312
- Riesman, David, *Thorstein Veblen: A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
- Rosenberg, Bernard, *The Values of Veblen*,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56
- Tilman, Rick, *Thorstein Veblen and His Critics, 1891—1963: Conservative, Liberal and Radical Critic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欧文·费雪 IRVING FISHER

(1867—1947)

欧文·费雪在其生涯中研究了关于货币和经济的问题——货币如何影响利率,货币如何影响通货膨胀,以及货币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影响。由于他的贡献,他被誉为货币经济学之父。

费雪 1867 年出生于纽约州的索杰蒂斯。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因此,他是在一个宗教氛围很浓的环境下长大的。很可能,这种环境造就的使命感给他的个人生活及职业生涯打上了烙印。

费雪在公立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擅长数学。当他决定去耶鲁大学时,他的家庭随他一同迁往纽黑文。由于费雪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他留校攻读数学和经济学。他开始师从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研究经济学,威廉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论的倡导者,该学说主张在社会生活中总是优胜劣汰,人类进步需要竞争。在萨姆纳的影响下,费雪学习了耶鲁大学开设的每一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课程。然而哲学似乎对费雪没有什么影响。他在耶鲁大学进行的绝大部分经济学研究以及撰写的博士论文的内容,与其说将哲学或社会问题导入经济学领域,不如说是使经济学计量化。

当费雪 1892 年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已被奉为那个时代

的数理经济学家中的领袖人物,耶鲁大学立即聘他为经济学教授。很快,众多赞誉与奖项纷至沓来。1918年,费雪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30年,他帮助创立了经济计量学学会(Econometrics Society),并成为第一任主席。

20世纪20年代,费雪将其经济学及金融市场方面的知识运用于华尔街。他做了大量的股票投机买卖,很快便成为千万富翁。但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他损失了一半的净财富。他相信危机过后股票行情仍然看好,于是大量借款买进更多的股票。当市场继续下跌时,他全部的财富都亏损殆尽。在他的余生中,他负债累累,并在债务的重压下过着简朴的生活。

费雪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很多事业,并写下了许多提倡这些事业的深受人们喜爱的书。他是健康生活及保健生活方式的改革者。他提倡改善饮食,并进行充分的锻炼。他于1913年创立了生命延长学院。他反对抽烟,吃荤食及饮酒。他将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支持禁酒令及促使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等事业上。

费雪也是一位经济政策的改革者。然而,他在该领域的成功,与他在华尔街的成功及促使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相比,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建议(1935),银行应将所有的存款控制在手中,而不应将它们贷出去;他主张(1942)应根据个人消费征税,而不是根据个人收入来计征;他呼吁(1920)应通过投放种类丰富的商品来支持美元汇率,从而控制通货膨胀。然而,他的上述建议都未能得到认真采纳。

迥异于他的政策建议,费雪的理论研究为他赢得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声誉。他的兴趣主要在于货币理论——货币、利

率、价格,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主要贡献是诠释了货币概念以及货币怎样影响经济。

费雪首次对收入、资本和财富的概念作出了精确定义。要理解这些术语就必须知道储备与流动之间的区别。费雪声称他在一次瑞士阿尔卑斯山的登山旅行中突发灵感,悟出了这个区别的。当时他看见水流像瀑布一样从山上飞泄而下,落进一个水潭。山谷中的水潭形成了储备;从山上流泻下来的水增加了储备,扩大了储备的体积。

费雪(1906)用这个区别澄清了几个概念。他将资本定义为财富在某个时点的储备,类似于水流在山谷里的水潭中汇聚成的储备。从当前的收入中拿出来形成的储蓄流量,就仿佛瀑布从瑞士山顶飞落而下,增加了我们的财富储备。而过度支出(或支出超过了你的收入)将导致现有财富的流失,从而减少了财富储备。

费雪(1896)还将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区分开来(参见庞巴维克),他发明了“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这个术语,是指无法将一个美元与它的购买力(或这个美元在通胀后的购买力)区别开来。银行存款利率就为货币幻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当存折上的利率下跌时,人们通常要抱怨所获得的低回报。然而这些人在遭逢较高的名义利率和高通胀时处境会更糟糕。在工人们涨工资时,货币幻觉也会经常发生。既然工资是厂商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那么高工资通常会导致产品涨价。正在产生货币幻觉的工人们开开心心地接过数额增加的工资单,可是这笔数额更大的钱却只能买更少的东西。

费雪(1923,1925)认为货币幻觉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他

还认为货币幻觉是形成经济周期的原因。相信实际利率在高通胀和高名义利率时期上升的厂商,将停止贷款与投资,这将延缓经济活动。接着,当缓慢发展的经济降低了名义利率时,厂商误以为实际利率削减,于是增加贷款与投资。当经济扩张时,货币幻觉终将使扩张陷于停顿。当经济扩张产生通胀压力时,银行将提高名义利率以维持他们贷款的实际利率。厂商再一次误以为实际利率提高,投资因此下降。费雪认为,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循环,就是上述过程的产物。

费雪还解决了怎样衡量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的难题。通货膨胀仅仅是一个典型家庭所面临的价格变化问题。由于每个家庭购买种类不同的商品,并且购买的商品有规则地变化,推算一个独立的代表价格平均变化的数字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衡量通胀问题的一个简单办法是,衡量典型家庭在某时点购买的系列商品价格的变化。这种方法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当某种商品的价格变动时,人们购买这种商品的数量会减少。该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油价暴涨而能源消费减少时格外突出。我们是使用这儿的初始数量还是选用价格变动后的购买数量?20世纪末,所有的国家在测算通胀时均采用价格变动前人们购买的系列商品。国家之所以采纳此法是出于实际的原因而不是其他。这种方法既要花费钱财,又要花费时间调查消费者的购买情况,因此调查每隔几年才进行一次。然而这个决策对我们衡量通胀水平给出了重要结论;它隐含的假设是,当价格变动时消费者不会改变支出模式。

费雪(1922)意识到采用初始购买水平测算将高估实际通胀率,因为它假定人们在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时仍大量买进。

他也意识到若采用相反的方法,即采纳价格变动后家庭购买的数量,将低估家庭在某商品价格大幅上扬时所遭受的购买力的损失。费雪建议,理想的指标数字或对通胀的衡量,应采用价格变动之前和变动之后的平均值。

尽管费雪将大量精力倾注在阐明经济学概念方面,但他的贡献比仅仅帮助定义概念要多得多。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还包括分析了利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引起通胀的因素。

费雪的利率理论至今仍被教授给大多数经济学学生,并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为对特定经济领域中利率的决定因素的正确分析。费雪(1930)提出,利息应被看作是在生产中使用了某种要素而产生的收入流量。具体地说,利息是某人允许将自己的财富储备运用于产品生产而获取的收入流量。当财富投入生产过程时,是因为有人把资金贷给厂商而不是把它用来消费。因而利息就是对当前不消费的一种回报,费雪的理论就是通常所述的利息时间偏好理论(time-preference theory of interest)。因为大多数人希望即时消费,让他们等到来年或后年消费商品就必须给予他们补偿。

费雪认为有两股力量决定了利率。从供给方来看,个体对当前和未来收益的偏好很重要。人们当前不消费商品,而把节省的储蓄贷给他人,由此收取的利息赋予了人们能够在未来消费的额外数量的商品。因此利息就是对贷款方放弃当前消费而在以后某个时候消费(更多的)商品的一种补偿。

从需求方来看,利率依赖可获得的投资机会与资本的生产力(包括人力资本)。更高的生产力促使贷款需求增加。生产力提高了,利润随之增长,厂商将希望扩张生产力。为此,厂商需要贷款或更多的资金。

均衡利率即借方需要的借款数量等于贷方愿意放弃的资金数量时的利率水平。费雪清楚地指出,影响供给与需求的因素是不稳定的。此外,除了经济因素,资金供需还受到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如习俗、智力程度、自控能力、借贷双方的远见等等。

最后,费雪(1911)创立了当今著名的交易方程(equation of exchange),他用这个方程来鉴别价格通货膨胀的原因。方程 $MV = PQ$ 表述的是货币供给量(M)乘以它的周转率(V , 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一个单位的货币在一年中的使用次数)必须等于商品和服务的产出(P 乘以 Q)。定义各种条件之后,该等式一定是可靠的。若经济领域存在 1 万亿法郎,假设每个法郎在购买商品时每年可使用 7 次,那么每年将能够购买价值 7 万亿法郎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是法国经济的国民产出或国内生产总值。该产出可依次被进一步分解为价格(P)与数量(Q)两部分。数量代表产品的实际生产数量,而价格部分则衡量每件商品的平均成本(费雪的价格指数)。

运用这个方程,费雪能够解释通货膨胀的三个潜在原因。首先,若 V 与 Q 均保持不变,价格将随着货币供给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领域内货币过多造成的。第二,若 M 与 Q 不变,价格将随着周转率的变化而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通货膨胀源于人们试图消费的速度过快,或想购买的商品超过了经济体系的生产水平。最后,若 M 和 V 不变,商品数量下降则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短缺将引起通货膨胀。

为了使自己的分析更深一步,费雪(1910)分析了影响 M 、 V 和 Q 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解释了个体消费习惯和

人们获得补偿的方式如何影响货币周转率。为使问题简化,假设所有工人均在每个月初取得报酬。当月他们通常使用该月的全部工资购买商品和服务。到了月末,所有资金都集中在雇主手中,能够用来支付下个月的工资。在这种情形下,每个法郎一年之内可以被用来购买 12 次商品(每个月 1 次)。货币周转率将是 12 次。另一方面,若一个月内将工资分两次支付给法国工人,此后工资支付的过程相同,随之而来的是每年产生消费开支 24 次,货币周转率将不是 12 次而是 24 次。因为工人获得报酬的频率相对稳定,因此货币周转率也相对固定,这样影响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就剩下货币供给量(M)的变动了。费雪认为 M 的变化将影响价格或实际产出。当代货币经济学家继承了费雪的观点,坚持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从长期看只会影响价格。

尽管在公众眼中费雪也许不像托尔斯坦·凡勃伦那样出名,但费雪仍被誉为 20 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虽然缺少凡勃伦那样的广度与洞察力,但费雪以他对货币理论的大量贡献弥补了这一切——他定义了重要概念,阐明了货币怎样影响经济,并解释了利率的决定因素。

参 考 文 献

费雪的著作:

Appreciation of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1892

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 New York, Macmillan,
1906

The Rate of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1907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New York, Macmillan, 1910. Revised edn. 1922

Stabilizing the Dollar,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The Making of Index Number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22

"The Business Cycle Largely a 'Dance of the Dolla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8 (December 1923), pp. 1,024 - 8

"Our Unstable Dollar and the So-Called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 (June 1925), pp. 179 - 202

The Money Illusion, New York, Adelphi, 1928

The Theory of Interest,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100% Money: Designed to Keep Checking Banks 100% Liquid; to Prevent Inflation and Deflation; Largely to Cure or Prevent Depressions; and to Wipe Out Much of the National Debt, New York, Adelphi, 1935

Constructive Income Taxation, New York, Harper, 1942

涉及费雪的著作：

Allen, Robert Loring, *Irving Fisher. A Biograph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3

Fisher, Irving Norton, *My Father, Irving Fisher*, New York, Comet Press, 1956

Patinkin, Don, "Irving Fisher and His Compensated Dollar

Plan," *Economic Quarterl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79, 3 (Summer 1993), pp. 1 - 33

Schumpeter, Joseph, "Irving Fisher's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a*, Vol. 16, 3 (July 1948). Reprinted in *Ten Great Econom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22 - 38

其他参考文献:

Hofstadter, Richard,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4

亚瑟·塞西尔·庇古 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

亚瑟·塞西尔·庇古是著名的现代福利经济学之父,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是怎样促使经济更有效地运行以及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平衡。庇古也是现代公共财政的创立者,他形成了关于税收怎样影响经济的分析方法,并证明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

庇古 1877 年生于怀特岛上的赖德。父亲是一名英国军官,母亲出身于爱尔兰政府官员的家庭。庇古先是就读于一所优秀的英国私立学校——哈罗公学,然后是剑桥的国王学院。在剑桥他起初主修历史;但第三年时在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与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的影响和说服下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与马歇尔一样,庇古为经济学的实用价值所吸引。他试图教育学生“研究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能够看穿政客们虚假的经济言辞。”

自马歇尔 1908 年从剑桥退休后,由庇古继任政治经济学系的主任。此后一直到他 1943 年退休,庇古始终是剑桥马歇尔经济学派的主要诠释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庇古的人生经历。他继续在剑桥教书,同时假期时在一个靠近前线的野战卫生队服役。约翰逊(Johnson, 1960)报道说“正是这段经历将爱德华七世时代

的一个生气勃勃、爱开玩笑、友善而热情洋溢的年轻学者变成了一个古怪的孤独者。”除了是一名孤独者，庇古还因极端节俭而闻名，特别是在穿着上。他常常穿着破烂不堪、污渍斑斑的衣服，“50年代的某一天在马歇尔图书馆他很显眼地、骄傲地套着一副一战前买来的行头。”（约翰逊，1960）

庇古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显著成果。首先，他关于外部性的分析为现代公共财政、环境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其次，庇古是第一个反对由凯恩斯发起的宏观经济学革命的主要学者。

庇古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是关于劳资关系和进口关税的。这些研究促使他对政府政策如何增进国民福利发生了兴趣。1912年庇古提出了这个基本问题，然后投入了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试图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此过程中，他创造出大量关于现代公共财政，特别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论断和基本原理。

某些产品全部的生产成本由厂商产生，但经由产品价格而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庇古（1920）揭示出一个厂商的（私人）生产成本也许并不能反映产品所有的社会成本。当厂商生产产品时，他们考虑的仅仅是私人成本——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必须购买的资产。但生产不可避免地要污染环境，而这些代价却是由那些既未生产又未消费的第三者来补偿。在这里，生产的社会成本超过了私人成本；其他人代替厂商和消费者承担了产品的部分生产成本。在这种情形下，市场的产出并不能实现最佳结果。我们拥有了过多污染环境的产品；既然污染成本被强加于第三者的身上而与厂商无关，厂商当然乐于采用会产生更多污染的技术。这一切的后果是，市场体

系造就了太多被污染的空气和水源,以及城市过度的噪音和拥塞。

另一方面,生产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会超过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所获得的利益。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于 1883 年提出的“灯塔”就是经济学家们用来诠释上述观点的经典案例。此类其他案例包括警察、消防、国防以及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个人之所以购买态度冰冷的医疗补助金是因为接受治疗后他们会觉得好一些。但若治疗导致他人受感染的可能性不大的话,社会利益将比私人利益要大得多。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这种背离被称为“外部性”、“外溢效果”或“第三者效应”。庇古强调,当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相背离时,市场体系是低效的,两者间存在的背离证明政府干预市场领域是合理的。

只要存在大量实际的外部性,人们无论是否付出都能受益。获得某种商品或服务的利益而无需付出代价的可能性造成了如今所谓的“免费乘车的问题”(free rider problem)。每个人均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他们意识到即使自己不为国防投入钱财,国防体系无论如何也是会建成的;而且还能获得国防支出增加的好处。如国家遭遇外敌侵犯,那么无论我是否曾为国防出钱,房子都能受到保护。并且,即使我对国防未作出任何贡献,国防体系也照样会建成。那么我的一毛不拔对已建成的国防体系的类型或国防体系的质量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由于对国防没有作出任何贡献,我省下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但也未遭受任何损失。

这里的问题是,若每个人都如此推理,政府将募不到一分钱用于国防建设,每个人的处境都将变得恶劣。解决的办法

是由政府改进基于市场的结果。政府必须构建国防体系,必须对所有受益人(国家公民)课税以弥补国防建设的支出。

很多情况下政府能够通过税收和补贴来修正因外部性而产生的问题,但有时通过修订法律即可充分解决问题。例如,在《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中,庇古主张铁路应补偿那些因火车的火花及烟雾危害而遭受损失的农民和其他财产所有者。在此案例中,需要修改英国的责任法律中的相关政策。庇古认为,若铁路不得不为火车造成的危害而赔偿他人时,他们将更加小心并减少火车的运营数量。这样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将不再矛盾,外部性将被内部化,或变成经由铁路运输的商品成本的一部分。

最后,在某些情形下通过政府干预修正因外部性引起的问题并不合理。当强加于第三者的成本低而修正成本高时,根据成本—效益分析便可得出应允许外部性继续存在的结论。试来分析一下火车发出的噪音。如果这仅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小小的不便,那么迫使铁路改线和开发静音火车的成本则远远超过人们每隔几个小时就听到火车在家门口呼啸而过的成本。

庇古(1920)声称经济学家的工作之一即鉴别外部性,并通过阐明政府行为怎样以及何时改进市场结果来消除外部性。他甚至认为鉴别外部性是经济学家的道德责任。然而庇古的兴趣不仅仅在于消除外部性,他所关心的主要是怎样提高国家的经济福利。他注意到,这依赖于经济蛋糕的尺寸大小及其分配方式。

更多的产出将提高整体福利,因为人们渴望拥有财物,拥有的越多(总体水平)就越富裕。同样,收入再分配的经济政

策也增进了整体福利。这个结论出自于庇古的信条：源于金钱的满足感将随着一个人钱财的增多而衰退。几百美元对巨富比尔·盖茨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某个失业者来说，这笔额外的钱财也许就关系到生死存亡。所以，对富人征税而损失的福利必定小于因施财于穷人而获得的福利。因而援助穷人的累进税制及转移支付计划被证明是可以改善国家的整体福利的。

庇古认识到累进税和转移支付计划也许会缩小经济蛋糕的尺寸，在增长与公平之间应该有一个平衡。当平衡不存在时，两者泾渭分明。提高国家的产出但不会恶化穷人处境的事情将增进国家的福利，提高国家产出中穷人享有的份额但不减少产出总体水平的事情，也将促使福利的增长。

然而当两条标准相抵触时（因转移给穷人而减少了产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需要对放弃多少产出才能改善穷人的状况作出判断。亚瑟·奥肯（Arthur Okun, 1975）以特别的字眼把这种平衡生动地描绘为“漏筛”。从富人转移到穷人总要通过一个漏筛，在收入再分配时将失去一些收入。漏掉的水代表因转移支付而导致的无效和国家产出的减少。极力推崇公平的亚瑟·奥肯认为当漏水达到 60% 时就应停止转移支付。庇古（1920）没做到这么精确，但他的确声称，只要能获得进一步的公平，牺牲一点点产出是值得的。

除了在福利经济学和公共财政领域的诸多贡献，庇古也许还作为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反对者而声名卓著。凯恩斯主义革命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剑桥。凯恩斯在《通论》中将庇古作为出气筒。由于种种原因，庇古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他是一个孤独的人，鲜有同一战壕的追随者；他穿得破破烂

烂,是剑桥的滑稽人物;他是凯恩斯所反叛的旧体制的一部分。

凯恩斯把庇古归类于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供给总能自发创造需求的观点就是古典经济学派形成的。在凯恩斯看来,古典经济学家们都认为这一观点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是正确的;他们坚信不可能出现失业,因为当人们为雇主提供服务时,市场必定存在对其服务的需求。否则,工资水平将下降,直到有人愿意雇佣这些工人。

对庇古的这番刻画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庇古(1914)出版了一部畅销书《失业》(*Unemployment*),在书中他论证是刚性和高工资最终导致了失业。多年以后,庇古(1927)认为因厂商减少对工人的需求将造成更多的失业,但如果工人愿意降低实际工资水平,问题尚可以补救。庇古1933年写就的《失业理论》(*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主张,若工资水平高于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则厂商将不会雇佣任何人,因为这样做的成本超过了因雇佣他们而获得的利益。尽管庇古从未提倡削减工资,但在所有的案例中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似乎都是降低工资,这就是凯恩斯批判庇古的原因之所在。

庇古被《通论》深深地触怒了,因为遭到攻击的不仅是他本人,而且还有剑桥的马歇尔传统。在评价《通论》时,庇古诘责凯恩斯曲解了他的观点,并断言此书毫无价值。他声称自己在以前的著作中就已意识到扩张政策将造成价格上涨,短期内将因此降低实际工资和增加失业。

后来庇古形成了自己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判(1943)。他阐述了“实际余额效应”(real balance effect)或“庇古效应”(Pigou effect),描述高失业率问题将趋于自动调节且

不需要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庇古指出,在高失业率时期工厂无法把商品销售出去,因而价格总是下跌。结果实际财富和前期储蓄的购买力在萧条期将会增加。人们富裕了一点,就会花更多的钱。接着这些额外的支出将刺激生产,厂商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失业就这样自动终止,不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

庇古在剑桥两位天才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凯恩斯的阴影下度过了大半生。因此比较而言,他的贡献似乎不大。尽管没有达到马歇尔或凯恩斯的高度,庇古的影响依旧深远。后来的经济学家分析和论证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方式都是从庇古这里学来的,因此庇古成为现代公共财政和现代福利理论之父。也正因如此,环境经济学——这门相对新兴的学科也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参 考 文 献

庇古的著作:

Protective and Preferential Import Duties, London, Frank Cass, 1906

Wealth and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1912 *Unemployment*, New York, Holt, 1914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1920), 4th edn., London, Macmillan, 1932

Industrial Fluctu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27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 (1928), 3rd edn., London,

Macmillan, 1951

The Theory of Unemployment, London, Macmillan, 1933

The Economics of Stationary States, London, Macmillan, 1935

"Mr. J.M.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Economica*, 3, 10 (May 1936), pp. 115 - 32

"The Classical Stationary State," *Economic Journal*, 53 (1943), pp. 343 - 51

涉及庇古的著作：

Aslanbeigui, Nahid, A. C. *Pigou*, London, Macmillan, forthcoming

Champernowne, D. G., "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22, pt II (1959), pp. 263 - 5

Collard, David, "A. C. Pigou, 1877—1959," in *Pioneers of Modern Economics in Britain*, ed. D. P. O'Brien and John R. Presley, London, Macmillan, 1981, pp. 105 - 39

Johnson, Harry, "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6, 1 (February 1960), pp. 150 - 5

Saltmarsh, John and Wilkinson, Patrick, *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其他参考文献：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4

Okun, Arthur M. ,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5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与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一道并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三位泰斗。在三个人当中,斯密可以被看成是乐天派,他认为经济进步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成果;而马克思被视为悲观主义者,他坚信诸多严重问题将导致资本主义走向自我毁灭;凯恩斯则被推崇为求真务实的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凯恩斯既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优点又看到了它的缺陷,凯恩斯寄望于用经济政策的手段来缓和资本主义的病症。他认为政府采取明智的政策能够挽救资本主义,让我们享有它的好处而避开它阴暗的一面。

凯恩斯 1883 年生于英国剑桥。他可谓口含银匙出生,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是剑桥大学的注册主任和该校知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他的母亲曾任剑桥市市长。

凯恩斯在英国最优秀的学校——伊顿公学和剑桥国王学院接受教育。他师从 G. E. 穆尔(G. E. Moore)学习哲学名著,向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学习数学,跟随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学习经济学。凯恩斯还是剑桥知识分子高级俱乐部的成员,后来该俱乐部演变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圈内人士包括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如吴尔夫

(Virginia Woolf)^①、福斯特(E. M. Forster)^②、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③等等。

毕业后,凯恩斯参加了政府文职机关考试,在所有考生中成绩名列第二名,这使得凯恩斯轮到第二个在文职机关的所有公开岗位中挑选。尽管他渴求得到财政部的工作,但这个职位被考试得分最高、可最先挑选岗位的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抢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凯恩斯的逻辑学、心理学、政治学和写作都得了最高分;但总分屈居第二是因为经济学考分较低。后来,凯恩斯自我解嘲道,他“比其他应试者更懂得经济学”。

凯恩斯勉强接受了印度事务办公室的职位后,负责组织与协调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他工作后的第一件持续了几个月的重大公务就是,订购10头艾尔郡(位于苏格兰西南部)的乳牛,并安排船运至孟买”。之后的工作也同样乏味,可想而知,凯恩斯厌倦了这份工作。两年后,凯恩斯于1908年返回剑桥大学教授经济学。三年后他出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该刊物是当时全球威望最高的经济学杂志。

凯恩斯接下来出版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1919)首次赢得了公众赞誉,该书描述了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和约。在一战

① 吴尔夫(1882—1991),英国女小说家、评论家,主张淡化情节,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写作,著有长篇小说《海浪》、《黛洛维夫人》、《到灯塔去》等,及评论集。

② 福斯特(1879—1970),英国小说家和散文家,主要作品有《霍华德别业》、《印度之行》等,其作品反映了20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

③ 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评论家,以所著《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四名人传》和《维多利亚女王传》而闻名。

期间,凯恩斯就职于英国财政部,主要负责为英国战备争取外界经费支持。战争行将结束时,凯恩斯被选为在凡尔赛与德国进行战争赔偿谈判的英方代表之一。凯恩斯不仅言辞锋利地批评了参加和谈的大人物们(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以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还愤怒地抨击了和约本身。根据他的分析,德国不可能实现英法提出的赔偿要求。和约的经济后果是导致德国贫困,加深德国人对法国和英国的仇恨。凯恩斯同样担心会出现的政治后果是,未来将崛起一个仇恨与好战的德国。

当时已成为全国知名人士的凯恩斯将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学理论与政策问题。他的《货币改革论》(*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1923)对通货膨胀引发的危险发出了警告。该理论提出凭借由央行控制货币供给的手段来稳定价格水平和有效抑制通货膨胀。此书还包括一条凯恩斯的遭致误解的著名格言:“在遥远的将来我们终归于死亡。”许多人把这段话理解成凯恩斯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甘愿牺牲长远的经济运作。然而这根本不是凯恩斯的用意所在。凯恩斯的真正意图是,批评其他人坚信通货膨胀问题最终能自动修正,而不需要任何积极的政府干预的观点。相反,凯恩斯觉得最好立即采取经济政策来改善通货膨胀问题,而不是坐等将来问题自动纠正。他的观点是,我们没有理由去等待不可捉摸的未来收益,而通过采取明智的经济政策解决经济问题会取得更迅速的改善。

20世纪20年代,通货膨胀问题趋于缓和,英国发现自己日益蒙受经济波动和高失业率周期延长的痛楚。因此凯恩斯转而研究这些新问题。《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 1930)详细检验了货币、价格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凯恩斯将储蓄一

投资关系列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当人们努力节约的储蓄超过厂商计划的投资时,厂商将很快发现自己生产能力过剩,产品鲜有人问津。另一方面,当投资超过储蓄时,经济生活中将发生大量支出行为。消费者宁愿花钱而不愿储蓄,厂商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制造产品和新建工厂与设备。所有这些支出将拉升工资及其他生产成本,还提高了所有消费品的价格。这一切的后果是——通货膨胀。

凯恩斯强调,问题的症结在于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的主体分别为不同的个人群体,因此无法保证两者一致。接着,凯恩斯主张,保持两个变量一致的责任在于央行,应由央行负责抑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若储蓄超过投资,央行需要降低利率,这样既减少了储蓄又刺激了贷款。另一方面,若投资超过了储蓄,央行则需要提高利率,这样就能增加储蓄和减少用于投资的贷款。

不过,凯恩斯最有名的经典著作是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经济学的一个完整的分支——宏观经济学因此得到了发展,该书成为 20 世纪最具参考性和争议性的经济学著作。著作本身既是对凯恩斯的经济学前辈们的一次冲击,又是关于什么决定一国生产与就业水平的理论。尽管此书很少论及经济政策,但却为政府采取政策行为解决 20 世纪 30 年代实际困扰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的《通论》从攻击主张“供给能自发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Say's Law)开始。根据该定律,失业不可能存在,因为不论现存劳动力供给的多寡(或经济领域现存商品供给的

多寡),总会产生对这些劳动力的需求(或对商品的需求)。接着凯恩斯将萨伊定律颠倒过来,宣称总的或全部的需求决定产出的供给和就业水平。凡是需求旺盛的时候,经济就呈现繁荣,厂商将扩张和雇佣更多的工人,失业将不再成为问题。而当需求低迷时,厂商将无法卖出商品,被迫削减产量和裁员。若情况变得很糟,将会出现大量裁员、高失业率和经济不景气。

显而易见,下一步凯恩斯转而研究总需求和总需求变化的原因。凯恩斯分析了需求的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形成了现代消费者支出理论和商业投资理论。

凯恩斯识别出决定消费者支出的两个显著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影响消费的主观因素或心理因素,包括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遗留财产的愿望、享受独立与权力的愿望的考虑等等。对未来经济更多的担心、把钱留给后代的更强烈的愿望、对独立的更深切的渴望,将导致更多的储蓄和更少的消费。相反,对经济未来无忧无虑、没有子嗣以及不关心自身的经济独立将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影响消费的客观因素是指经济的影响,如利率、税收、收入及财富的分配、预期未来收入,其中当前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因素。当利率上涨时,消费者不愿借钱去赊账购置房产、新车和其他商品。相反,当利率下降时,消费者将随意借贷消费。类似的,当财富、现有收入与预期的未来收入增加时,人们将消费更多而储蓄较少;而当财富、现有收入与预期的未来收入降低时,人们将消费更少和储蓄更多。

在凯恩斯看来,与影响消费的诸多因素相反,厂商投资仅仅取决于两个因素——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和利率。前者形成

了投资于新厂和设备的收益,后者形成了购置工厂和设备的筹资成本。若预期投资回报率超过了利率,厂商将扩建新的厂房设备。然而,若利率超过了投资回报率,则不会发生投资行为。

预期回报率的变化和利率的变化将导致厂商投资的变化。当企业家对经济持乐观态度时(相信自己能够在将来销售大量商品,并能以高价卖给消费者),他们将期望赢得较高的资金回报率,并用这笔资金建造新的工厂和设备。然而当悲观主义降临时,商业决策者们期望的销售额较低,认为只有低价供应商品才能吸引消费者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新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菲薄,不可能新建几座工厂。

接着凯恩斯解释了利率的决定因素。据凯恩斯所述,货币市场决定利率,在这个市场上,个人和厂商产生对货币的需求,而货币的供给由央行来控制。货币需求源于个人和厂商的投资组合决策——他们可以以股票、债券及其他资产的形式持有货币或财富。

现存于经济领域的货币供给必须被某人所持有。当央行增加货币供给时,会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只是承诺在将来的某个时点支付给债券持有者固定数额的货币。为了使问题简单化,设想一张承诺从现在起一年后支付持有者\$1 000的债券。如果我打算以\$800购买债券,那么我贷给债券发行方的利率或资金回报率将为25%(支付\$800,获利\$200)。若债券价格为\$909而不是\$800,我只能赚回资金的10%左右(在以\$909购买债券的基础上获利\$91)。若我以\$990买下债券,只能赚取资金的1%(投资\$990,增值\$10)。因而债券的价格与利率呈负相关——当一方上扬时,另一方就下降,反之亦然。

当央行购买债券时,将抬升债券价格和降低该资产的回报率。另一方面,当央行企图减少货币供给时将必须卖出债券。央行必须低价卖出才能使人们接受债券。购买债券的人将因此获得丰厚的资金回报率,换言之,利率将上升。

令人惊讶的是,凯恩斯在批评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介绍了商品和服务总需求的决定性因素之后,接下来凯恩斯却没有论及怎样减少失业和结束经济衰退。既然凯恩斯起初感兴趣和最感兴趣的是经济政策,这就更令人费解了。

他既支持货币发行(货币政策),又赞成政府支出和减税(财政政策)。在一段被广泛援用的文字中,凯恩斯写到了对房屋、旅馆、学校和马路的需求膨胀。但他注意到可能有许多人反对如此“浪费”的政府支出,因此另一个手段(货币发行)就显得非常必要。

“如果财政部打算将钞票塞进一些旧瓶子,埋在废弃煤矿的地下适当的深处,然后在煤矿表层填满城市垃圾……私营企业[将会]挖出钞票,失业也就不复存在。”

在一段倍受诋毁的文字中,凯恩斯提倡“较为广泛的投资社会化”。虽然很多人以为凯恩斯提倡政府对所有厂商的投资决策进行控制,实际上凯恩斯真正提倡的是通过政府支出政策来稳定国民经济的总体投资水平。凯恩斯相信消费者支出相对稳定,每年变化不大。而厂商投资则受变化无常的“活力”所驱使。对未来经济的商业信心和预期发生变化,就会改变投资水平,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可以自发实现的预言可能会起作用。当工商企业对经济充满信心时,投资将膨胀,经济将扩张。经济繁荣增强了对利润的预期,导致更加乐观的预期和更多的投资。另一方面,对经济将不景气的预期

将会减少投资,延缓经济运行,加深对未来利润的悲观估计。这一切的后果是,若持乐观态度,经济将繁荣,但若持悲观态度,投资将急剧降低,出现大量失业。

凯恩斯的解决方案是让政府来稳定投资水平。当私人投资低迷时,政府就借款(也就是实行财政赤字)致力于公共投资,如新建道路、桥梁,在学校与改善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这将扩张经济,并增强人们的预期。相反,若厂商因过于乐观而投资膨胀时,政府应停止借款,并削减公共投资。

20 世纪 40 年代,人们发现凯恩斯再一次效力于英国政府。他再次回到围绕战备制定政策的问题上来。他协助英国谈判,从美国贷款以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提出建议帮助英国筹募战争经费,既不是提高税收(这会减少英国人的收入),也不是对募集战争经费袖手旁观(会由于商品短缺和需求旺盛而导致通货膨胀),凯恩斯提出了义务储蓄和延迟支付的计划。他的想法是,所有收入超过最低限的英国公民应从定期工资中取出一部分转换为特殊的银行存款,用来资助战争。这些存款在战争期间将会产生利息,但是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存款不得收回。于是这笔储金可以贷给政府用来资助战备。战后,这类存款可以自由提取以满足消费需求。该计划附带的一个好处是,额外的消费支出将有助于阻止战后的另一轮经济衰退。

二战结束时,凯恩斯投身于由战胜国政府发起的国际货币管理工作。他认为 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经济萧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每个国家都试图将失业出口至它的贸易伙伴国。各国通过实行贸易顺差产出更多商品,创造出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它的贸易伙伴国将进口产品而不是在本国境内生产

该产品。因而国外对工人的需求减少,失业增加。

大多数国家企图通过货币贬值产生贸易顺差。一国政府很清楚,促使外国货币和外国商品升值,本国公民将很少购买外国商品而购买更多的国产商品。同样,若促使本国货币与商品在其他国家价格更便宜的话,将增加出口。问题是只要一国竭力贬值本国货币以图为本国国民创造出口与就业机会,那么其他国家将纷纷效仿。结果会导致一连串的货币贬值,对哪个国家都没有好处。

为了阻止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凯恩斯提出了相对固定的汇率体系。战胜国同盟 1944 年在汉普郡的布雷顿森林通过了该体系,遂成为众所周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要求各国将本国货币盯住一盎司黄金并维持不变。由于各国货币均与黄金绑在了一起,各国货币的价值就与其他货币绑在了一起。若美国政府宣称 1 美元值 0.1 盎司的黄金,而英国政府规定 1 英镑值 0.2 盎司的黄金,那么 2 美元就相当于 1 英镑,因为两者都等于 0.2 盎司的黄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了大约 25 年。在此期间内,世界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创 20 世纪最低水平。

然而表象下面矛盾重重。在达成一致的固定汇率体系下,黄金迅速从美国流失,美国担心黄金很快就要被耗尽,必须采取行动结束这一切。1971 年 8 月,尼克松总统终止了美元可兑换为黄金,随后宣布让美元相对于 1 盎司黄金浮动,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现行弹性的和可变动的汇率体系诞生了。

第二种抑制各国因追求贸易顺差而引发贬值冲突的方法

是,建立一个国际机制消除贸易失衡。凯恩斯希望建立这样一种体系,贷款给出现贸易逆差的国家,惩罚持续实行贸易顺差的国家。正如《通论》中涉及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样,该体系鼓励各国购买外国商品,从而对抗任何另一方经济衰退的倾向。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曾建立了这种凯恩斯所期望的消除贸易失衡的机制和贷款能力;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但是美国自己想要实行贸易顺差,因为它的生产能力并未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所以它拒绝任何惩罚持续顺差国的体系。凯恩斯竭力推行该政策建议,但是美国掌握全部的谈判筹码,因为它已贷款给英国,决不肯让步。正当谈判最后折衷方案的细节时,凯恩斯因一连串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在剑桥的家中逝世。

毋庸置疑,20 世纪没有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能超过凯恩斯。凯恩斯在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宏观经济学分析,如今在各高校讲授的宏观经济学仍依赖凯恩斯创立的观点与分析方法。即使是当代反对凯恩斯思想的宏观经济学家(参见弗里德曼和卢卡斯)也发现自己必须从凯恩斯的观点出发,然后再阐述他理论上的局限与问题。在政策层面上,央行与中央政府为控制经济周期而采用的许多工具,以及现存的协调贸易失衡的国际机制,都主要源自于凯恩斯。

参 考 文 献

凯恩斯的著作：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ed. D. Moggridge, 30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71 - 89. Paperback editions of *Essays in Biography* and *Essays in Persuasion* are published by Norton. Harcourt, Brace & World publishes a paperback edi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涉及凯恩斯的著作：

- Dillard, Dudley, *The Economics of J. M. Keynes*,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48
- Hansen, Alvin, *A Guide to Keyne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53
- Harrod, Roy, *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New York, Norton, 1951
- Lekachman, Robert, *The Age of Keyn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 Moggridge, Donald,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Pressman, Steven, "The Policy Relevance of *The General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4 (1987), pp. 13 - 23

Skidelsky, Robert, *John Maynard Keynes*, 2 vols., New York, Viking, 1983 and 1992

其他参考文献:

Block, Fred L., *Origin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

对于约瑟夫·熊彼特来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变化。他既研究了短期经济波动,又研究了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他通过这些研究确定了经济周期的阶段与成因,还检验了资本主义兴衰的成因。

熊彼特 1883 年生于摩拉维亚(当时隶属奥匈帝国,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拥有一家纺织厂,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辞世了。他母亲不久即改嫁到维也纳,熊彼特在那儿进入一所贵族学校。他在人文学科方面接受了优秀的教育,但在数学与科学方面的背景却显不足。作为维也纳大学法律专业的一名学生,熊彼特也学习了经济学的一些课程。是庞巴维克教授的研讨会点燃了他对研究资本主义长远未来的兴趣。

1906 年获得法律博士头衔后,熊彼特前往开罗从事法律实践工作,并管理一位埃及公主的财政。1909 年他接受了查尔诺威兹大学的教职,两年后被任命为克拉兹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接着熊彼特又对政治产生了兴趣。1918 年他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主张将德国的工业社会化,以提高工业的效率。1919 年他当选奥地利财政部长。然而他的政治生

涯是短暂而失败的。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他建议对资本征收一种不受欢迎的税赋。他在发生剧烈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对奥地利元发表轻率的言辞,被视为漠不关心奥地利民众的疾苦。他对奥地利企业实行国有化的计划也遭到了许多批评。

由于无法应付政治生活中的压力,熊彼特当权仅七个月就辞职了。随后,他成为一家小型私人银行的董事长。同时他投资于高度投机的活动,致使他债台高筑,花了许多年才偿清债务。

1925年熊彼特接受了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职务。七年后又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职位,直到1950年去世。1949年熊彼特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因而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美国人。

熊彼特认为,所有资本主义经济都有两个显著特征——不稳定,并经历高速增长。熊彼特寻求分析和理解这些资本主义特征。

熊彼特(1939)是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之一。经济周期是经济经历的规律性波动。他界定了三个同时发生的不同周期。首先是3~4年的短期波动,因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最先发现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基钦周期”。该周期是由于商业存货的变化而造成的。厂商为使存货的增长超前于销售的增长,将扩张存货1~2年。但是当销售增长缓慢时,存货将在仓库中囤积。因而,厂商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削减产量以减少存货积压。当存货最终恢复到更适当的水平时,销售额回升,厂商将再次寻求扩张存货。

第二个周期则关系到厂商投资于新厂房和设备的变化。该周期持续8~11年,克莱门特·朱格拉(Clément Juglar)首先发现了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朱格拉周期”。人们通常所述的“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的就是这种经济波动。熊彼特认为,由于厂

商希望扩张自己的固定资产并使其现代化,扩张将持续4~5年。但是当厂商已经扩张和实现装备现代化后,将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因此接下来的4~5年中,在厂房与设备方面的支出将减少。经过这段时期,固定资产将损耗、过时,因此又转移到另一个4~5年的投资繁荣阶段。

最后是持续45~60年的长期周期,亦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cycle),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最初注意到该周期,但不能解释其成因。熊彼特将发明与创新看成是长期周期背后的驱动力。在经济增长缓慢时,厂商不可能引进新的技术创新。因此,新的发明与创新将被积压几十年。当经济迅猛增长最终开始启动时,贮存了几十年的创新将被运用于生产过程,经济迅速增长。熊彼特将引进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发明的工业革命视为一轮长期经济扩张的开始。19世纪中叶的铁路建设开始了第二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20世纪初,电力、汽车和化学激起了第三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在熊彼特(1911)的早期研究中,他认为发明是由非经济力量决定的,无法通过研究经济学来理解。在后来的研究中,熊彼特(1942)认为创新是由大企业内部的经济力量所形成的。但是,在熊彼特的一生中,他拒绝承认创新是一种理性的活动;相反,他认为这是无法解释的创造性活动,也不能当作理性思考过程的结果去理解。创新与发明的代理者是企业家。

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仅仅是为了在最低成本上生产商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而雇佣资源。相反,他赞同坎蒂隆的观点,认为企业家是愿意冒险的个体。正是这样的企业家成为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当存在许多企业家时,资本主义将兴旺发达;另一方面,若企业家精神被

破坏或遭受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将平静地转变到社会主义。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塑造和形成消费者口味。与其他认为厂商应响应消费者口味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熊彼特(1939)认为,“消费者选择消费品的大多数变化是由厂商强制造成的,这些消费者往往抵制这种改变,却又被广告精心策划的心理技术学所诱导和培养”。消费者偏好并没有导致生产与创新;而是由创新造就新的商品与服务,消费者或者拒绝,或者培养对新事物的口味。

依据熊彼特(1911)的观点,企业家的发明与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由银行信用支持的发明导致了创新与日益的繁荣。效仿者很快被吸引过来,于是最初的创新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是效仿者的效率总是比创新者的效率低,而且有很多效仿者在这个扩张期中姗姗来迟。错误的估算和紧缩的信用将一些企业推向破产的境地,并导致萧条与不景气。但破产也将低效的企业清除出去,从而纠正了以往扩张中的错误。发明在经济紧缩期间积聚,此时企业家无法募得资金将发明转换为能够刺激增长的创新,因而常备不懈,等待启动新一轮增长周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熊彼特(1942)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不是检验资本主义经济所经历过的周期变化,而是考察资本主义的未来。他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给出的答案是:“不,我认为它无法生存下去。”在根本上,他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失败毁灭,而是将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资本主义不仅包括成功的创新,也包括打破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然而问题出现了,因为较小的企业经常被较大的企业所替代。在此过程中,是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创新的企业家。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结果,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与变化的精神。

熊彼特(1942)还看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植根于资本主义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作出合理选择这样一个事实中的。这将促使人们在思想中形成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在收入增长方面如此成功,它能够支撑大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知识分子,将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竭力推行增强政府官僚的经济作用的措施。对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收入不平等的怨恨也将在知识分子中间愈演愈烈,他们将竭力采取保持收入平等的措施。这些活动将减少冒险与创新的动力。

最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求,而家庭需要升华个人的欲望和妥协。可是,家庭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家庭是储蓄的主要来源。家庭储蓄是一种在赖以养家的主要劳动力发生意外时,其他家庭成员能被供养的措施。资本主义通过破坏储蓄动机,从而摧毁了自己的基础——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长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亚当·斯密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视为获得迅速增长的最佳途径。然而到了19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的问

题,而对增长问题失去了兴趣。熊彼特的主要贡献即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调整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他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健康、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

参 考 文 献

熊彼特的著作:

-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1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 An Historical Sketch (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4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2 vol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39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2
Ten Great Econom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涉及熊彼特的著作:

- Allen, Robert Loring, *Opening Doors: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 2 vol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Heertje, Arnold(ed.), *Schumpeter's Vision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fter 40 Years*, New York, Praeger, 1981

- Heilbroner, Robert, "Was Schumpeter Right?", *Social Research*, 48, 3 (Autumn 1981), pp. 456 - 71
- Oakley, Allen, *Schumpeter's Theory of Capitalist Motion: A Critical Exposition and Reassessment*, Hants, Edward Elgar, 1990
- Rosenberg, Nathan, "Joseph Schumpeter: Radical Economist," in *Exploring the Black Box Technology, Economics, an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47 - 61
- Shionoya, Yuichi, *Schumpeter and the Ide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tolper, Wolfgang F.,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Public Life of a Private Ma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皮耶罗·斯拉法 PIERO SRAFFA

(1898—1983)

皮耶罗·斯拉法对经济学作出了两大贡献。首先,他指出价值边际主义理论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其次,他试图在李嘉图的研究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古典概念——“盈余”的基础上,创建一种适当的价值理论。

斯拉法 1898 年生于意大利都灵的一个富庶、显赫的犹太人家庭。他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一边从事自己的职业,一边在意大利的多所大学中教授法律。由于父亲从一所大学换到另一所大学,斯拉法也随之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学校。从中等学校毕业后,斯拉法考入都灵大学法律系。在都灵他师从著名的公共财政专家、后来的意大利共和国总统路易吉·艾诺弟(Luigi Einaudi)学习政治经济学。在意大利军队短暂服役之后,1914—1920 年斯拉法在艾诺弟的指导下在意大利撰写了关于货币通胀的博士论文,并于 1920 年获得了学位。

毕业后,斯拉法在一家意大利银行工作,但 1921 年春他为了花时间到英国研究英国的货币问题而辞去了工作。通过父亲的一个朋友,他结识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22 年,应凯恩斯之邀,斯拉法撰写了两篇关于意大利银行制度的论文。一篇关于一家意大利银行破产的论文(斯

拉法,1922a)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该杂志是由凯恩斯编辑的一本学术刊物。第二篇(斯拉法,1922b)刊登在《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上,批评了意大利银行的报告程序以及政府对银行报告程序的监督。该文迅速被译成四种语言,其中包括意大利语。结果引起了墨索里尼的注意,墨索里尼勃然大怒,斥之为“一场真正的对意大利财政的阴谋破坏活动”。墨索里尼与斯拉法的父亲联系,坚持要求斯拉法完全彻底地撤回言论。斯拉法拒绝了,但被迫逃离意大利,直到墨索里尼倒台。

尽管与墨索里尼之间的关系不稳定,20世纪20年代斯拉法仍坚持在意大利开展了大量工作。他在米兰建立了一个政府部门以收集劳动统计资料,但是当法西斯政权迅速上台后该部门解散了。随后他来到佩鲁吉亚大学讲授公共财政和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在撒丁岛的卡格利阿里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当法西斯政府的压迫日甚时,斯拉法只得到意大利境外求职,凯恩斯帮助他在剑桥大学安排了讲师的职务。然而斯拉法发现自己难以开口讲演。他不喜欢当众传播思想,在不得不用英语讲课时尤其觉得别扭。凯恩斯再一次伸出援手,让斯拉法当上了马歇尔经济学图书馆的负责人。凯恩斯还安排斯拉法为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编辑大卫·李嘉图的著作。这项课题促使斯拉法的兴趣从货币和经济政策转移到价值理论这个抽象的理论问题上来。斯拉法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以及50年代初花费大量时间编辑了李嘉图的十卷版《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信全集》(*Works and Correspondence*)。他因这项学术努力荣获诸多奖项(包括瑞

典皇家科学学会的 Söderström 金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身),斯拉法主要因为在价值理论领域的理论性研究而声誉鹊起。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供需分析开始在欧洲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斯拉法不满于这种思维方式。他对价值理论的贡献是双重性的——一个是破坏性的,另一个则是建设性的。首先,他指出了马歇尔的供给分析中的逻辑错误。其次,他在古典概念“盈余”的基础上创立了更适当的供给理论。

1925 年斯拉法在波科尼大学的《经济学年报》(*Annali Di Economia*)上发表论文抨击了传统的马歇尔经济学的基础。埃奇沃思在意大利读到这篇论文,并告诉了凯恩斯。他还请凯恩斯让斯拉法为《经济学杂志》写一篇短一点的英文译文(斯拉法,1926)。两篇论文都指出了马歇尔的供给曲线分析中的逻辑毛病。

根据马歇尔的观点,单个厂商的供给曲线与同行业的所有其他厂商的供给曲线是相互独立的。整个行业的供给曲线得自该行业中每个厂商供给曲线的简单累加。如果行业中有 100 家厂商,其中 50 家希望生产 1 000 个咖啡杯,而另 50 家希望生产 2 000 个咖啡杯,那么若市场定价均为 \$1,则该行业的总产量将为 150 000 个咖啡杯。对于不同销售价格的计算与之类似。把不同价格水平上的数量相加,我们就得到了该行业咖啡杯的总供给量。

斯拉法认为,任意一个厂商的生产条件,即供给曲线将影响其所有竞争对手的生产条件。例如,当一个厂商扩大咖啡杯生产量时,将会增加对生产咖啡杯所需的原料(如粘土)的

需求,因此这些原料的价格将上涨。但是若咖啡杯的生产成本因原料成本上涨而提高时,所有的厂商从咖啡杯生产中得到的利润都将减少。结果其他厂商将希望在每个价格水平上减少咖啡杯产量。斯拉法主张,由于上述相互依赖关系的存在,推导出任何行业的马歇尔供给曲线都是不合逻辑的。

斯拉法的第二个批判是对生产过程中收益递减假设的挑战。他认为大多数生产特别是消费品的生产是在收益递增的条件下发生的。他还阐明,既然一个特定行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将影响所有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后者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前者的产品,那么收益递减就不能孤立地运用于这个特定行业或商品。鉴于此,斯拉法提议放弃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型,代之以承认厂商相互依赖以及存在垄断与寡头卖方垄断的模型。该批评促使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及其他经济学家后来提出了垄断竞争模型。

斯拉法还对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作出了其他批判。罗宾逊接受斯拉法的建议发起了“剑桥论战”(Cambridge Controversy),论战内容包含对价值是循环的传统理论的辩论。因此需要其他研究价值理论的手段。斯拉法回溯到李嘉图的经济学以及盈余这个古典概念,探索新的研究手段。

根据斯拉法的观点,在逻辑上一致的价值和分配理论必须回归到生产的循环本质这个古典概念上来——商品用于生产商品,最终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多于最初投入的商品就创造出盈余。接着斯拉法继续论证该模型的适用性。他揭示了如何运用这个模型解释价值或相对价格,以及在工资与利润之间决定收入分配的原理。

从一项给定的工艺技术开始,其细节是生产商品所必需

的,再给定一个实际工资(由工人的生存需要决定)或利润率(假定竞争将在整个经济领域内产生均衡利润率),斯拉法论证了相对价格的决定因素。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收入分配将由模型外的其他一些力量所决定。该分析的要点是,现行技术或生产成本决定了相对价格。

让我们举一个不产生盈余的简单案例来演示斯拉法的主要观点。假定经济只生产两种类型的商品——制成品(M)和农产品(A)。生产两种商品的技术要求如下:

$$2A + 2M = 6A$$

$$4A + 1M = 3M$$

生产6个单位的农产品需要2个单位的农产品和2个单位的制成品,而生产3个单位的制成品需要4个单位的农产品和1个单位的制成品。从6个单位的农产品和3个单位的制成品开始,将其投入制成品和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我们最终得到了6个单位的农产品和3个单位的制成品。我们的经济逐年复制自身,但在一年当中并未创造盈余或有所增长。

如果依据这个模型或系列方程来考虑价格,我们将意识到投入品的成本必须等于各部门产出的价值。于是我们可以将 A 看成是农产品的价格,将 M 看成是制成品的价格。为了找出这两种商品的价格,我们需要将上面两个方程中的 A 和 M 求解出来。不幸的是,这里没有唯一的数学解法;但我们的确明白,生产技术中的数学要求 M 等于 $2A$,或制成品的价格必须是农产品价格的两倍。因此生产技术决定价值或相对价格,尽管它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每种商品的价格是多少。

斯拉法能够将这个模型扩展到许多商品领域,并再度揭

示生产技术仍旧决定相对价格。他也能将模型延伸至产生盈余的情况,情况在这里变得更复杂了,斯拉法不得不作出几个简单化的假定。首先,他假定资本的流动性将导致均衡的利润率。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假设,因为资本将流向那些能产生更多收益的行业或部门,而离开那些低收益的行业或部门。这将减少前一类行业的利润率,而增加后一类行业的利润率。其次,斯拉法假设利润率依赖于利率。有了这两个假设,斯拉法得以再次论证是技术或生产成本决定了相对价格。自此,解释价值或相对价格无须求助于边际主义分析的循环性。同样,我们也不再需要依赖边际生产力概念的收入分配的循环理论。相反,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收入分配是由货币政策、竞争以及其他影响利率的力量所决定的。

很难给斯拉法在经济学史中准确定位。他对经济学权威理论提出了几个卓有成效的批判,始创了一套崭新的、不同的价值理论。然而很少有经济学家去沿袭斯拉法所开创的道路,甚至是多数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经济学家也没有追随他的足迹。

参 考 文 献

斯拉法的著作:

"The Bank Crisis in Italy," *Economic Journal*, 32 (June 1922a), pp. 178 - 97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talian Banks" *Manchester Guardian Commercial: The Reconstruction in Europe*,

- Supplement No. XI, (7 December 1922b), pp. 675 - 6
- "The Laws of Return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
Economic Journal, 36, (December 1926), pp. 535 - 50
- "General Preface" and "Introduction," in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10, vols., ed. Piero Sraff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 5
-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涉及斯拉法的著作：

- Kaldor, Nicholas, "Piero Sraffa 1898—1983,"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71 (1985), pp. 615 - 40
- Mongiovi, Gary, "Piero Sraffa," in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Dissenting Economists*, ed. Philip Arestis and Malcolm Sawyer, Hants, Edward Elgar, 1992, pp. 536 - 45
- Potier, Jean-Pierre, *Piero Sraffa: Unorthodox Economist (1898—198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Roncaglia, Alessandro, *Sraffa and the Theory of Prices*, Wiley, 1978
- Roncaglia, Alessandro, "Piero Sraffa's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in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ed. J. R. Shakleton and G. Locksley, New York, Wiley, 1981, pp. 240 - 56
- Rocaglia, Alessandro, "Towards a Post-Sraffian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Income Distribution* , 3, 1
(Summer 1993), pp. 3 - 27

其他参考文献:

Harcourt, G. C. , "On the Influence of Piero Sraffa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Joan Robinson to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Journal , 95 (1986), pp. 96 - 108

贡纳尔·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 (1898—1987)

贡纳尔·缪尔达尔的经济学有两个显著特征——关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试图将其他学科的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缪尔达尔的大半生都在研究种族关系、失业和贫困问题。他还试图理解经济怎样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变化,他认为心理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学因素以及文化因素是产生这些经济变化的原因。

缪尔达尔 1898 年生于瑞典中部的一个乡村农业区——梭瓦波村。他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地主,有条件为缪尔达尔提供良好的教育。缪尔达尔在皇家高级中学读书,接着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之所以选择这项课程是因为他希望理解社会的运行方式。尽管 1923 年缪尔达尔获得了法律学位,但这段令人精疲力竭的过程扼杀了他对法律的兴趣。这时他的妻子阿尔瓦说服他转而研究经济学,该学科能够将科学、数学与他探索社会运行方式的努力结合起来。在老师克努特·威克塞尔的指导下,缪尔达尔于 1927 年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校任教。

1932 年缪尔达尔被社会民主党政府任命为新成立的住房与人口委员会委员,他因此能够主宰瑞典的住房政策。他曾两度供职于瑞典议会,第一次是从 1934—1936 年,第二次

是从1942—1946年。20世纪30年代末他效力于瑞典国家银行委员会。20世纪40年代中期缪尔达尔当选为瑞典战后计划委员会主席以及贸易与商业部长。

由于缪尔达尔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政治地位的影响,他成为瑞典这个福利国家的主要构建者之一。此外,缪尔达尔还强烈鼓吹在瑞典施行凯恩斯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 1987)认为,在说服财政部长厄恩斯特·威格特斯(Ernst Wigters)将支出用于公共设施,实行财政赤字,从而减少失业上,缪尔达尔功不可没。1974年缪尔达尔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兴趣广泛而多样,他对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分析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理论水平上,他引进了事前与事后(ex ante - ex post)的区别,从而澄清了宏观经济学分析,他还创立了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思想作为均衡分析可供选择的方法。在政策层面上,他诠释了在发展中国家与美国黑人中普遍存在的持续贫困现象,并提出大量政策建议以解决贫困问题。

20世纪20年代预期与实际的产出之间混淆不清造成了经济学上的诸多困惑。例如,厂商为赚取利润而投资;但有时他们会亏本。厂商甚至在没有额外储蓄的时候投资;但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储蓄必须等于投资。缪尔达尔(1939)将预期产出与最终产出或事前与事后经济变量区别开来,从而澄清了这些问题。预期或事前经济变量在经济过程的初始阶段衡量,而最终或事后变量在经济过程结束时衡量。

有了这个区分,缪尔达尔得以解释投资增长超过事前储蓄将如何导致储蓄增加(通过利润及其他收入的增长),因此

在事后,储蓄将等于投资。同样,事前储蓄较高将导致经济不景气,造成裁员和厂商利润降低。厂商无法将已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出去,将缩减投资规模。因此在衡量事后时储蓄又将等于投资。

尽管事前与事后的区别有助于解释经济将如何向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状态移动,但总的来说,缪尔达尔反对均衡分析,建议采取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解经济运行方式的手段。累积的因果关系阐述了一个包括两个或更多变量的正负反馈机制。既然任意一个变量的变化将导致其他变量发生同样的变化,那么整个系统将向一个方向移动。累积的因果关系法则最初由威克塞尔应用于经济学分析,检验当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相背离时产生的现象。但是首次描述该法则并意识到其重要性的经济学家是缪尔达尔。

我们可以将累积经济过程与单向性因果关系的计划——A引起B的变化,而B却没有进一步影响A——作一番对比。在单向性因果关系的情况下,A的变化引起了B的变化,事情到此为止;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变量A和变量B价值更高(或更低)的稳定均衡。

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变量A与变量B相互影响。A的变化将影响B,B将进一步影响A,A将再次影响B等等。系统不存在均衡或静止点。当A与B共同增长时,我们将得到一个良性循环或正的反馈回路;当A与B同时衰退时,我们将拥有恶性循环或负的反馈回路。缪尔达尔采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思想来解释诸如贫困和种族关系等经济问题。

1938年,当缪尔达尔在哈佛大学执教时,卡内基基金会

邀请他研究美国的种族问题。他应邀花费了五年的时间著述了开创性的《进退维谷的美国》(*An American Dilemma*, 1944)一书。该书认为在美国存在道德冲突。一方面,美国人信仰公平与机会平等的理想,认为黑人的才干并不比白人差。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黑人与白人并没有受到平等对待,美国没有实践其高尚的理想。《进退维谷的美国》大部分篇章深入研究了美国存在的歧视黑人的问题。该书以文献佐证了黑人与白人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汇集了大量证据表明黑人受到了与白人不同的对待。

缪尔达尔以他那典型的风格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学的知识融入自己的分析中。他阐明了因种族隔离与歧视而招致的破坏。他还认为,因为拒绝为黑人提供正规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在就业与住房方面歧视黑人,整个美国社会将因此蒙受损失。缪尔达尔还提出理由证明美国给予黑人的待遇与对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的需求不一致。因而歧视的后果是——美国糟糕的经济运行状态。

缪尔达尔还运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观点来帮助解释美国黑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对黑人的成见导致黑人的生活水平降低。白人看到黑人的生活水平确实相对低下,对黑人的成见愈发加深。这将导致黑人的生活水准相对于白人进一步降低。正如缪尔达尔精辟的论述:“歧视繁殖了歧视。”

缪尔达尔继续论证了黑人由于歧视的累积过程而被压制的许多方式。例如,教育上的歧视意味着黑人成为医生的可能性比白人要少,并且说明黑人健康与卫生方面的知识要比白人少。此外,黑人的医疗保健经费比白人少。由于上述所有原因,黑人接受的医疗服务不充分,健康状况比白人差。结

果黑人发现自己与白人相比,更难获得和一直从事一项职业;因为收入水平较低,黑人的教育也将成为问题。

缪尔达尔还注意到种族隔离致使白人对黑人产生成见,促使白人关注黑人与自己的区别。这反过来又影响了白人对黑人的看法。当白人为黑人考虑得越少时,他们与黑人交往或联系的可能性就越小,黑人也不太可能与漠视自己的白人共同工作和生活。于是种族隔离和种族成见日益加深。

认为美国黑人的处境源自负反馈过程的观点具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涵义——可在众多方法中任意选用一个来修正这种状况。任一领域的改善都将通过累积过程而在其他领域获益。但从何处着手呢?

缪尔达尔寄望于美国的公共机构打破歧视黑人的恶性循环。教堂、学校、工会和政府之类的组织是美国储存公平、平等信条的宝库,而且很多机构能迅速改善黑人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消除对黑人的偏见,启动正的或良性的循环。于是缪尔达尔建议扩大联邦政府在教育、住房和收入保障领域内的职责,更便于黑人投票选举的法律就是打破歧视与偏见的循环的另一条捷径。缪尔达尔还提倡黑人从南部乡村移民到工业化的北部与西部,那儿歧视黑人的风气不浓,也能找到更多报酬丰厚的工作。将黑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将对美国劳工和美国黑人都有利。最后,缪尔达尔提倡施行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以使移民到北部与西部城市的黑人能够就业,并融入战后的工业化经济。

缪尔达尔(1957)后来将累积的因果关系的法则运用于经济发展研究,并用它来解释南亚的持续贫困(缪尔达尔,1968)。他对比了创造正累积循环的“传播效应”与产生负累

积循环的“逆流效应”。一旦某地区开始发展经济,它将从其他地区吸引资本与劳力。这些新资源将有助于经济发展过程。另一方面,持续贫困通常导致高人口出生率、营养缺乏以及低劳动生产率,所有这一切将促使贫困加剧。

缪尔达尔(1970)沿着减少美国黑人贫困现象的政策建议的思路,强调了终止贫困的恶性循环和启动增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的必要性。首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教育方面投入更多资金。其次,必须集中力量改善卫生状况,提供净水和发展其他公共福利设施。第三,收入支援方案必须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公民收入不足的问题。

大多数经济学家断言,在公平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参见库兹涅茨和庇古),而缪尔达尔则断定不存在这样的平衡,越公平则增长越快。缪尔达尔(1970)认为由于贫困造成的生理与心理后果和穷人无法施展自己的才智,不平等将致使增长放慢。因为消费增长可以促使生产力增长,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消费增长实际上就是投资增长。同样,实行收入再分配的福利国家将刺激需求水平上升和增长速度加快。

纵览缪尔达尔的一生,他对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怀有高度的批判精神。我们已经看到他是怎样抛却均衡分析而推崇累积的因果关系分析法。缪尔达尔(1969)还批评了一般的社会科学家和专业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无法写出和说出普通人能够理解的东西。相反,专家们只在圈内写作和互相交谈,这就削弱了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缪尔达尔(1929)还批评了经济学家们试图在科学的客观事实的表象背后隐藏自己标准化的假设或价值假设。他并不反对经济学家作出价值

判断;他只是反对他们拒绝承认这些价值判断。甚至在荣膺诺贝尔奖之后,他还声称对于像经济学这样不科学的领域,授予诺贝尔奖是不恰当的。他常常托说自己接受诺贝尔奖的唯一原因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在他没有完全睡醒之前、早晨还很早的时候就打电话给他。

缪尔达尔是一位难得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累积的因果关系理论为传统的均衡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选择。由该理论推导出的关于减少贫困与失业的建议,为传统的放任政策“药方”提供了可替代的选择。

参 考 文 献

缪尔达尔的著作:

-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192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Monetary Equilibrium*, London, Hodge, 1939
-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4
- Rich Lands and Poor. The Road to World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7
-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8
- Objectivity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The Challenge of World Poverty: A World AntiPoverty Program in Outlin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Against the Stream: Critical Essays on Economic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涉及缪尔达尔的著作:

Angresano, Jam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unnar Myrdal*,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7

Dostaler, Gilles, Ethier, Diane and Lepage, Laurent, (eds.) *Gunnar Myrdal and his Work*, Montreal, Harvest House, 1992

Jackson, Walter A., *Gunnar Myrdal and America's Conscience: Social Engineering and Radical Liberalism*,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Kindleberger, C. F., "Gunnar Myrdal 1898—1987,"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9 (1987), pp. 393 - 403

Lundberg, E., "Gunnar Myrdal'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eory,"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6 (1974), pp. 472 - 8

Pressman, Steven, "An American Dilemma: Fifty Years Later,"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8, 2 (June 1994), pp. 577 - 85

Reynolds, Lloyd G., "Gunnar Myrdal'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Theory, 1940—1970,"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6 (1974), pp. 479 - 97

Streeten, Paul, "Gunnar Myrdal," *World Development*, 18,
7 (1990), pp. 1,031 - 7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1899—1992)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因支持自由市场,以及反对政府干预个体通过市场从事自由贸易的权利而享誉全球。他提出充分理由证明,与其说是政府决策,不如说是个体选择创造了经济收益(更高的效率)与非经济收益(更多的自由)。

哈耶克 1899 年出生于维也纳。他的祖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的朋友;他的父亲接受了医师训练,后来成为维也纳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耶克服役于意大利前线的奥地利军队。离开战场回国后,他考入维也纳大学,并获得了两项博士头衔——一个是法律博士(1921),另一个是政治学博士(1923)。

随后,奥地利经济研究所的负责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聘用了哈耶克。1927 年他举荐哈耶克为研究所主任。四年后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邀请哈耶克就任伦敦经济学院图克讲座的经济学与统计学教授,负责将欧洲大陆的经济学思想介绍到英国。

随着《通往奴役之路》(*Road of Serfdom*)一书的出版,1944 年哈耶克成为举世闻名的社会理论家。1950 年他在接到的众多教学邀请中,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的聘请。1962 年他退休回到欧洲,接受了弗赖堡大学的教职。1974 年哈耶克与

贡纳尔·缪尔达尔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在获奖宣布内容时特别提到了哈耶克提倡其政治思想的独创方式。

在哈耶克的早期职业生涯中(20世纪30年代),他的贡献在于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后来他开始关注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到了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开始猛烈抨击社会主义、政府计划以及所有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他谴责政府造成了经济问题,又通过干涉市场经济恶化了这些经济问题。

哈耶克(1933)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检验了经济扩张与紧缩时期货币所扮演的角色。该书试图发展和诠释威克塞尔的力作《利息与价格》(1898)。哈耶克认为货币因素是经济周期的必要条件,但货币供给的变化并不足以造成产出的波动。相对价格的变化也是解释经济周期的必要因素。

继庞巴维克之后,哈耶克相信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更加迂回的方式生产商品。商品被投放市场的时段将不断延长,因为在商品与服务生产过程中使用机器与工具之前,必须完善机器与工具。

当银行发行货币而未发生额外储蓄时,将立刻出现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这将推动消费品相对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厂商为努力满足需求,采用迂回程度较低的生产方式。价格开始上涨后不久,银行必须提高利率才不至于发生重大亏损,因为他们过去放出的贷款所收回的资金的购买力比原来贷出的资金要少得多。利率升高反过来将延缓消费者支出。生产消费品的产业将闲置和解雇工人。至此,以前的过度需求开始自食其果。生产更多投资商品的失败,意味着投资商品的生产厂商将无法吸纳那些被消费品生产所抛弃的劳动力。

哈耶克对失业成因的分析与凯恩斯的分析迥然不同。他认为并不是因为需求缺乏导致了失业；相反，失业源自需求的构成，或错误地选择了商品类型（需求的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商品）。这种状况只能通过减少对消费品的需求来纠正，这样厂商就能够获得额外储蓄进行额外投资，他们就能施行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的生产过程。

因此，哈耶克反对凯恩斯在大萧条期为解决失业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行为。他反对刺激消费者需求，扩张公共工程项目或扶持价格。他认为凯恩斯的政策会将原来也许是轻微的不景气转化为一场被暂时延缓的大萧条。此外，由于凯恩斯的政策而爆发的通货膨胀最终将损害经济。

哈耶克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几个恶果。首先，哈耶克（1945）认为市场体系最重要的特征是提供信息。价格告知消费者生产哪些商品需要的精力和资源较少；价格还告诉厂商哪些投入和生产方式是最低廉的。通货膨胀扭曲了价格的这种信号功能。当所有价格均持续上涨时，很难知晓哪些商品生产成本较低、哪种商品生产方式最经济。结果，通货膨胀使资源转移到不该被使用的地方（无效和不需要的活动），从而扭曲了经济。这将降低经济效率，进而降低国民生活标准。其次，通过推动支出增加而迫使价格上扬，将生产出更多消费品，厂商将更少实行迂回的生产方式，这也延缓了未来经济的增长。

哈耶克反对通货膨胀，但更反对将收入政策（income policy）作为抵制通货膨胀的工具。他认为这将走上极权主义国家的道路，而且收入政策与通货膨胀一样破坏了价格的信息功能。最后，哈耶克认为收入政策忽视了通货膨胀的真实

原因——货币过量。既然通货膨胀源于货币过量,那么就必須放慢货币发行速度以根除通货膨胀。哈耶克论证,过度的货币发行是政府垄断钞票的印刷与流通的结果。根据哈耶克的观点,由政府垄断货币发行而导致通货膨胀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政府总是被诱使印刷更多的货币来用于支出。其次,政府为了能够用购买力降低了的贬值货币来偿还借款,被诱使印刷货币和制造通货膨胀。

为防止政府故意制造通货膨胀,哈耶克(1976a)建议允许私营厂商发行自己的货币。这样大型厂商,或者大型银行将很可能印刷自己的货币。个人与厂商将有选择地持有那些有望最容易被他人接受以及最不可能贬值的通货。哈耶克觉得私人发行的货币将抑制通货膨胀,因为它将抑制政府的通货膨胀倾向。同时,货币私人发行者必须关注自己的声誉以及自己所发行的货币的价值。因此哈耶克认为他们不可能倾向于发行过多的货币。

因政府干涉而引发经济问题的观点,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成为哈耶克经济学的主题。在证明自己有理由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事务时,哈耶克日益依赖哲学与心理学的洞察力。他强调,任意一个个体或机构能获得的知识量都是有限的,人类理性也是如此。人们能够理解一般的经济关系,却无法理解任一时刻运行的确切关系。哈耶克(1955)还强调社会科学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人们并不像物质遵循物理学规律那样遵循心理规律或经济规律,因此采取像科学控制环境那样的方式来控制社会的一切企图都是错误的。这两则信条具有经济学意义,每条均支持了哈耶克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事务的观点。

20 世纪 30 年代与 40 年代制定经济计划的一个论据是,中央计划者能够估算出经济生活中所有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并能相应地操纵价格。再深入一些,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如此复杂,计划者运用完美的数学模型定价比市场定价要好得多。其他人(参见加尔布雷斯)则主张当厂商规模增大、垄断加强时,就必须由政府计划来抵消这种力量。

哈耶克将上述观点全部推翻。他认为,经济的复杂性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理解整个经济的运作。因此计划者将无从知道供应与需求方程,计划也只能导致无效。同样,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对国民经济进行微调)也存在着缺陷,因为政策制定者无法懂得市场体系的所有复杂与精妙。政府政策非但没有改善经济运行,只会使改善我们生活水平的经济体系窒息。

哈耶克还推翻了必须用政府权力来抵消垄断权力的论点。他认为垄断权力通常是政府行为的结果。例如,国内生产者游说政府排斥进口,并通过要求许可证来限制行业或专业的准入。哈耶克还认为即使大公司力量强大起来,也会因潜在竞争的激励而高效运作,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来生产消费者所需的产品。

但哈耶克走得比这更远。他指出,由于政府政策限制了个人自由,我们将被迫迈向奴役之路。不论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只要对未来施行计划或试图减少失业都会出现上述情形。与之类似,企图以经济公平的名义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政府政策也是如此。哈耶克(1976b)声称,将市场过程的产出描述为公平或不公平是不合逻辑的。收入分配是世界存在的客观现象,是客观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公平的

概念在此并不适用。而且,政府方面竭力对收入进行再分配将弊多利少。由于再分配削弱了经济动力进而缩减了经济蛋糕,穷人的利益将因此受损。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每个人的收入都会因之而减少。穷人还遭到了另一方面的损害,因为富人履行着重要的经济职能,如冒险、支持艺术与教育,以及检验新的、昂贵的、能成功地以较低价格大量生产的产品。

哈耶克(1944)还进一步批判了政府为获得平等的结果而试图为所有个体提供平等的经济机会的做法。他声称机会平等的观念是一种错觉。若政府试图给所有的孩子一个平等的起点,将意味着对孩子父母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于是没有一个孩子从开始就领先于其他孩子。同时,机会平等还意味着保持所有父母的收入平等,以至于某些孩子得不到任何利益。于是政府在追求提供平等机会的过程中,又一次必须变得更加极权主义。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哈耶克确实拥护平等。他认为在法律面前对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应予以平等对待。平等的法律和规则适用于所有公民,将维护自由而反对政府的强制权力(哈耶克,1976b)。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他关于自由市场的优点以及价格提供信息的观点。这些观点得出以下结论:应反对改变或控制市场的企图,因为那样将不可避免地束缚个体的自由、降低经济效率和生活水平。在哈耶克看来,市场具有促进繁荣的自我调节机制。政府政策或其他阻碍市场运作的企图,都将会恶化我们的经济条件并削弱个体的自由。

参 考 文 献

哈耶克的著作：

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1934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33), Fairfield, New Jersey, Augustus M. Kelly, 1975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1

The Road to Serfdom (194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4 (September, 1945), pp. 519 - 30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 (1955), Chicago, Liberty Press, 1979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Money,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6a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b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 A. Hayek, 10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94

涉及哈耶克的著作：

- Barry, Norman P., *Hayek's Social and Economic Philosophy*, London, Macmillan, 1979
Barry, Norman P., "Restating the Liberal Order: Hayek's Philosophical Economics," in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ed. J. R. Shakleton and G. Locksley, New York, Wiley, 1981, pp. 87 - 107
Butler, Eamon, *Hayek: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of Our Time*,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83
Machlup, Fritz, "Hayek'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in *Essays on Hayek*, ed. Fritz Machlup, Hillsdale, Michigan, Hillsdale College Press, 1976, pp. 13 - 59
Nishiyama, Chiaki, and Leybe, Kurt R., *The Essence of Hayek*,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其他参考文献：

- Wicksell, Knut, *Interest and Prices* (1898), London, Macmillan, 1936

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

(1901—1985)

西蒙·库兹涅茨因创立了所有国家在衡量经济活动时都采用的国民收入核算(national income account)体系而声名卓著。他还衡量了收入分配,并检验了 20 世纪美国的收入分配的演变方式。但是库兹涅茨的研究超越了经济核算的范畴,他还对确定经济增长的动因以及改变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了探索,研究了经济历经的增长周期,并试图理解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库兹涅茨 1901 年生于平斯克。他父亲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毛皮衣制作工,父亲把家搬到了哈尔科夫,该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以其浓郁的文化氛围而闻名。从当地的公立学校毕业后,库兹涅茨跨入哈尔科夫大学,在那里他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开始接触约瑟夫·熊彼特的创新与经济周期理论。俄国革命使大学关闭并引发了内战,库兹涅茨全家逃离俄国,先来到土耳其,最后定居在美国。

库兹涅茨自学了一个暑假的英语,随后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师从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米切尔使他接受了经验主义经济学研究方式的训练,并激发了他对经济周期的兴趣。1923 年与 1926 年,他分别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与博士学位。

他的论文(关于批发与零售贸易的波动)不仅包括经济核算,还涉及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量(库兹涅茨,1926)。

库兹涅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了约三年。接着,他于1931年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职位。1960年他离开这所大学转而加盟约翰斯·霍普金斯学院,一直在那里呆到1971年退休。无论在哪儿任教,他始终与NBER保持着联系。

在库兹涅茨的学术生涯中,他赢得了众多专业方面的荣誉。1949年他当选为美国统计学会主席(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53年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7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诺贝尔委员会看中的是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领域和变革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但他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却在于创立了国民收入核算体系。

宏观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为了检验关于宏观经济关系的假说或发现宏观经济良性运行的动因,必须具备衡量整体经济活动的手段。17世纪的威廉·配第形成了关于英国经济核算的一些雏形,继配第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英国又开展了几次国民收入估算。然而没有人以一个年度为基础进行国民收入的估算,估算本身也不审慎,不具备系统性。20世纪20年代时,英国在汇编国民收入数据时仍然远远领先于美国。扭转这一局面主要归功于库兹涅茨,他使美国从落后地位跃升为国民收入统计领域的先锋。

库兹涅茨就职于NBER时负责对1929—1932年间的美国国民收入进行首次估算。接着他开展了1919—1938年间的国民收入统计,并提供追溯至1869年的美国经济活动估算

(库兹涅茨 1941, 1946a, 1946b, 1952a)。

库兹涅茨(1933)既认真地阐述了他在从事经济活动估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论,又详尽地描述了他在估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就这样,他设立了经济核算的标准,并形成了至今仍在沿用的程序。

例如,库兹涅茨意识到对国民收入的估算排除了那些未在市场上交易或买卖的商品和服务。当家庭为自己煮饭、修剪草坪以及打扫房间时,他们也在生产商品与服务;但这些商品与服务并未被列入经济活动的政府统计数字之内。同样,即使可能,非法活动如卖淫、毒品交易等也很难衡量,因此不能包括在整体经济活动的估算范围内。

库兹涅茨还小心地将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区分开来,并借助这种区分避免重复计算的问题。作为最终产品销售给消费者的一辆汽车,是由轮胎、玻璃、引擎和刹车之类的中间产品而装配成的。计算了销售给汽车生产厂商的轮胎的价值,又计算了整辆汽车的价值,那么生产出来的轮胎就被计算了两次,为了获得对经济活动的更精确的核算,必须从卖给消费者的汽车的最终价格中减去所有零部件的价值。这个差额或汽车生产厂商的增值部分为国民收入核算奠定了基础。国民收入只不过是经济领域内每个厂商在特定时期内的增值总和。它可以来源于厂商关于销售收入、零部件支出以及季度利润的定期报告。

库兹涅茨明白,运用国民收入核算作为国民福利的指示器存在严格的限制。因为国民收入增长并不代表国家必然富裕,收入分配可能更不平等;因此尽管整体收入上涨,绝大多数的家庭可能会更加窘迫。库兹涅茨还注意到,增长过程本

身也许会带来麻烦的后果,如城市化、交通拥塞以及污染。最后一点,国民收入核算未考虑政府分得多少产出,通过强制征税获得多少偿付。

库兹涅茨在经济活动核算领域的研究自然促使他研究经济周期或经济活动周期性的扩张或紧缩。在库兹涅茨的研究之前,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1925)发现了持续45~60年之久的长期经济周期的存在。康德拉季耶夫检验了美国、法国以及德国几百年的价格数据(包括了全世界的铁、煤及其他产品的产量数据),发现其规律性地呈现20~30年的价格上涨时期,接着是20~30年的价格下跌时期。从此,这种长期的经济变化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而较短的、10年左右的周期则与厂商投资的变化相联系(参见熊彼特)。

库兹涅茨(1930)在研究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发现了持续约20年的增长与衰退的中间周期。为了表达对发现者的敬意,该周期被命名为“库兹涅茨周期”(Kuznets cycles)。库兹涅茨认为人口统计学的变化可以解释这种20年的经济周期。人口增长可能来自移民的浪潮,或因景气的经济形势提高了人口出生率。无论何种原因,人口增长促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膨胀,特别是对面积更大、数量更多的住房的需求。额外需求刺激了额外的厂商投资。这一切再加上对规模经济效益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产力增长速度。结果当人口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准也随之提升。然而新公民将很快成为越来越庞大的劳动力队伍中的成员,这将对工资产生向下的压力。当工资下跌时,消费与投资也开始下降,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降临了。

库兹涅茨还将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扩展到源于经济增长与

衰退的结构性经济变化方面。他研究了经济周期如何影响储蓄与消费率、生产力、收入分配及其他因素(如资本、商品和人口的国际流动)。

库兹涅茨(1953,1955)还检验了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开创了收入分配核算的先河。他利用美国国税局的所得税资料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资料,检验了每10个收入群体从1913—1948年每年实际获得的全部收入(分为收入最高的10%人群,收入次之的第二个10%人群、第三个10%等等)。库兹涅茨(1953)发现,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年份,收入最高的1%的美国人口赢得了整个国民收入的15%,收入最高的5%的美国人口赢得了所有收入的25%~30%。他还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战后,美国存在的收入不平等有所缓和,1%的人口仅仅获得了所有收入的8.5%,5%的人瓜分了所有收入的18%。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周期可以解释这些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战后出现的低失业促使国民收入流向低收入人群的份额增加。同时,较低的利率与较高的所得税削减了流向最富裕人群的收入份额。从更长的时期范围和许多不同的国家来观察这些数据,库兹涅茨(1955)发现收入不平等遵循一个“U形”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收入不平等加剧,收入曲线下降使穷人的处境相对恶化,但在发展的后期阶段,收入不平等趋于缓和,收入上升使收入较低的人群受益。

库兹涅茨的另一个经验主义的重要发现是关于美国的储蓄率,或它的对立面——国民收入的消费率。库兹涅茨(1946b,1952b)发现美国的储蓄率非常稳定,并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变化。而凯恩斯的简化的消费函数预测为 $C = a +$

δY (C 代表消费, Y 代表当前收入), 两者产生了矛盾。如凯恩斯的假说成立, 那么当收入上升时消费率将下降, 消费率下降意味着储蓄率上升。从本质上看, 凯恩斯的观点是当人们的收入增长时, 储蓄额将随之增加。而库兹涅茨发现了储蓄率保持不变的事实, 在他的启发下, 米尔顿·弗里德曼创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弗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形成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 并以此来解释储蓄率保持不变的原因。

最后, 库兹涅茨将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倾注在对生产力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这是他关注经济增长的自然延伸, 因为经济增长是由于生产力提高和人口增长共同影响的结果。在这两个因素中, 生产力增长当然更为重要, 正如亚当·斯密指出, 导致生活水平改善的动因是生产力的增长。研究生产力增长使库兹涅茨得以将自己在人口变化、作出精确的经验主义的估算以及提高生活水准方面的各种兴趣结合起来。

库兹涅茨极其强调将科技变革和创新作为促进生产力增长的手段。他估计(1946), 在 50 年的时间内, 美国生产力的 $3/5$ 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的, $2/5$ 的生产力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如农业)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如制造业)的再配置引起的。从历史的角度看, 既然科技是更重要的因素, 而劳动力的再配置随着从事农业的美国人越来越少而显得越来越次要, 于是库兹涅茨认为提高生产力的努力必须集中于科技突破与科技进步。

20 世纪末, 大多数经济学研究日趋高度抽象和理论化。经济学家们甚至轻视经验主义研究, 瞧不起这种追求衡量经

济变量并检验这些变量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研究方法。库兹涅茨坚持继承了由配第的政治算术所开创的经济学经验主义传统。库兹涅茨的贡献使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主要知识体系得以成形,并留下了大量可供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数据资料。政府也因此能够在有规则的基础上汇编和报道宏观经济数据资料。如果将经济学视为对现实经济生活运行的研究,那么库兹涅茨必须被看成是六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库兹涅茨的著作:

- Cyclical Fluctuations: Retail and Wholesale Trade, United States, 1919—1925*, New York, Adelphi, 1926
- Secular Movement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1930
- "National Income,"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1,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pp. 205 - 24
- 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 - 1938*, 2 vol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1
- National Income: A Summary of Finding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s Research, 1946a
- National Product Since 1869*,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6b
- Income and Wealth of the U. S.: Trends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Bowes & Bowes, 1952a, with Raymond Goldsmith

"Proportion of Capital Formation to National Produ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 2 (1952b), pp. 507 - 26

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3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March 1955), pp. 1 - 28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Norton, 1965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opulation, Capital, and Growth, New York: Norton, 1973

Growth, Popul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Norton, 1979

涉及库兹涅茨的著作:

Abramovitz, Moses,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Kuznets Cyc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 (April 1961), pp. 349 - 67

Hinck, Harriet, "Simon Kuznets 1971," in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ed. Bernard S. Katz, New York, Garland, 1989, pp. 143 - 59

Kapuria-Foreman, Vibha and Perlman, Mark, "An Economic Historian's Economics: Remembering Simon Kuznets,"

Economic Journal, 105 (November 1995), pp. 1524 - 47

Lundberg, Erik, "Simon Kuznet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3 (December 1971), pp. 444 - 61

Ben-Porath, Yoram, "Simon Kuznets in Person and Wri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6, 3 (April 1988), pp. 435 - 47

其他参考文献:

Kondratieff, Nikolai, *The Long Wave Cycle* (1925), New York, Richardson and Synder, 1984

约翰·冯·诺伊曼 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

约翰·冯·诺伊曼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数学家,他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天才之一。然而,他对经济学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可想而知,这些贡献是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决策。但是冯·诺伊曼并不是像其他将数学技巧应用到经济学中去的重要人物一样用微积分去解释经济关系,而是将博弈的策略引入了经济学。正是通过引入博弈的策略,他为研究构成了经济生活基础的人类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冯·诺伊曼 1903 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父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富有的犹太籍银行家。冯·诺伊曼童年时数学天赋就很引人注目,6 岁时,他能够心算两个 8 位数间的除法,8 岁时就掌握了微积分。学校同意他免修常规的数学课程而去接受大学数学教授们的家教。在他高中最后一年时,他已被看作是专业的数学家,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

冯·诺伊曼是在布达佩斯大学注册登记的,但他并未在那儿上课,他在柏林大学上课,而回到布达佩斯大学仅仅是参加考试。两年后,冯·诺伊曼转到了瑞士工业学院读书,在那儿他得到了他那个时代杰出的数学家的指导。1923 年他获得瑞士工业学院的化学工程学位,1926 年获得布达佩斯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1926—1930 年间,冯·诺伊曼先是在柏林大学任教,接着又去了汉堡大学,其间发表了有关集合理论、代数学和量子物理学等方面的文章。因为不想居住在德国,1930 年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33 年以后他一直受聘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那儿度过了他的余生。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冯·诺伊曼参加了重要的战争委员会和咨询顾问团的工作,为美军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同期,应 J·罗伯特·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的要求,他也参加了导致第一代核武器诞生的“曼哈顿计划”。战后,冯·诺伊曼强烈支持美国的核试验,提倡进行氢弹的研究和开发。1954 年,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要求,冯·诺伊曼加入了原子能委员会,然而就在冯·诺伊曼抵达华盛顿后不久,他就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健康状况急剧下降。由于冯·诺伊曼是坐着轮椅参加原子能委员会会议的,再加上他的“前核”地位,于是,许多人都认为冯·诺伊曼是 1963 年名为“斯坦利·克鲁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影片中的“核战争狂”博士的原型。

20 年代后期,当匈牙利的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在布达佩斯度假时,与同时在那里度假的冯·诺伊曼相识了,冯·诺伊曼表现出了他对数理经济学的兴趣,卡尔多就建议他看一些瓦尔拉的著作。根据瓦尔拉的理论,如果一组代表着供给和需求的方程组的数量等于未知数的个数(买卖的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一般均衡就可以被证明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求解每一种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参见瓦尔拉)。冯·诺伊曼指出,这种计算方程和未知数的程序并不能排除负价格的存在,这种负价格是无意义的同时也不

可能存在于现实中。也就是说,这种方法不能证明所有的市场能同时得到均衡。

冯·诺伊曼还指出了瓦尔拉的供求方程忽略了市场间重要的相互依存性,比如轿车价格降低必然会导致能源的危机。1928年,冯·诺伊曼提出了用博弈论(game theory)来解释这种相互依存性。他同时也认为博弈论是对常规经济分析的一种挑战,常规经济分析吸取了经典力学和从采纳微分法中得到的最大化假设的精髓。冯·诺伊曼认为社会现象需要不同的模型和分析方法,而博弈论恰好可以满足这一点。

博弈论是研究相互竞争的个体之间的冲突状态的理论。这些个体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或竞争者在做什么,但所有的个体都知道各方决策的不同将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因此,博弈论涉及的是双方或多方的相互作用。

多数经济分析都避而不谈经济活动的各方面的相互作用,然而在这一层面上博弈论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许多经济决策并不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例如某人到超市,他购买葡萄干的价格与他购买葡萄干的盒数并无关系。但有很多例子说明其他人的反应对经济决策者有重要的作用或影响。例如在垄断行业中,经济代理者或决策者的数量很少,这种作用或影响就极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下一家厂商所作的决策将可能影响其他厂商的决策,而且这些相互作用将会最终影响到各个厂商的经济结果。

1939年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来到了普林斯顿,他和冯·诺伊曼很快地成了好朋友,莫根斯特恩看了冯·诺伊曼1928年有关客厅游戏的策略的论文,意识到冯·诺伊曼提出的构想可以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中的许多地方。他

们成了研究博弈论和运用博弈论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合作者。

冯·诺伊曼与莫根斯特恩从描述博弈的特征开始研究博弈。每一个博弈都有三个特征：(1) 若干博弈的参加者；(2) 可供博弈各方选择的一组策略；(3) 各博弈方在每一组策略组合下得到的结果所形成的一个得益矩阵或一张表。

如果一个博弈具备了以上特征，则博弈各方都能计算出他们每走一步或在博弈中选择每一个策略时的所得和所失，冯·诺伊曼与莫根斯特恩认为可以假定每一个博弈方都设法使结果最优化，即博弈各方都会选择可能使他们得到最大收益的策略。

图9是有两个博弈方的得益矩阵，每一方都有两种可选策略。这就可能有四种不同的结果，博弈双方就有四种不同的得益。在每一个结果中，第一个数字代表1#博弈方的得益，第二个数字代表2#博弈方的得益，这样，如果1#博弈方选择 a 策略，而2#博弈方选择 b 策略，则1#博弈方将得+1，而2#博弈方将得-1，这也可以想象成货币上的所得和所失(如\$1000)。但严格地说，图中的数字应该代表着博弈各方最终所得的效用。

1928年冯·诺伊曼证明了在一个博弈中博弈双方总有一个合理的行为过程，这种合理的行为过程可以是使用纯策略(指总是作同样的选择)，也可以使用混合策略(以某一概率选择任何一个可供选择的策略)。用纯策略，因为作出的是最好的决策，于是博弈方将会始终选择同一个选择对象。用混合策略，博弈方能够做的最好是以某一固定的概率选择每一可选对象。

图9是应用混合策略的博弈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最简单

		博弈方	
		<i>a.</i>	<i>b.</i>
博弈方	<i>a.</i>	+1, -1	-1, +1
	<i>b.</i>	-1, +1	+1, -1

图9 博弈论得益矩阵

的博弈就是猜硬币的游戏，如果博弈双方都选择正面或都选择反面，则1#博弈方就赢，否则就是2#博弈方赢。如果1#博弈方倾向于选择*a*策略，则2#博弈方会很快发觉并选择*b*策略，这样他就赢了。反过来说，如果1#博弈方倾向于选择*b*策略，则2#博弈方只要更频繁地选择*a*策略，他也会赢。因此1#博弈方要取胜的唯一办法是以同样的概率选择*a*策略和选择*b*策略。

这种简单的构想可以扩展和应用于许多地方。冯·诺伊曼与莫根斯特恩1944年研究了在何种条件下部分博弈方将结成联盟获胜，而以不结成联盟的其他博弈方为代价。这与研究在现实生活中，何种条件下处于垄断行业的两家公司有必要合并，通过减少行业中竞争者的数目来形成更大的垄断相类似。与之类似的还有，研究在何种条件下经营性公司串通起来提高价格会有利；何种条件下工人会联合起来形成工会，或一群人组成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并游说政府制定出能赋予集团成员经济利益的法规。

博弈论的最经典的例子是“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囚徒的困境”显示的是追求各自最优策略的两个人是怎样最终无法达到最优状态的。典型的“囚徒的困境”博弈见图 10。

		博弈方	
		<i>a.</i>	<i>b.</i>
博弈方	<i>a.</i>	0, 0	-5, +3
	<i>b.</i>	+3, -5	-3, -3

图 10 囚徒的困境

“囚徒的困境”得益矩阵描述如下：警察抓住两名罪犯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如果他们都拒不认罪（如两人都选 *a*），则他们都会被无罪释放。如果两人都坦白认罪（如两人都选 *b*），则他们都会被判 3 年徒刑。但如果两人中一人坦白认罪，则坦白者将会获得奖赏（被释放获得新生），而另一人将被重判 5 年徒刑。

从 1# 博弈方的角度看，无论 2# 博弈方怎样做，他最好都选择坦白（选 *b*）。因为如果 2# 博弈方不坦白（选 *a*），1# 博弈方应选择坦白而不是拒不认罪，他会被无罪释放而不是被判 3 年徒刑。再如果 2# 博弈方坦白的话（选 *b*），1# 博弈方也应选择坦白，因为选择坦白会被判 3 年而不坦白会被判 5 年。从 2# 博弈方的角度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无论 1# 博弈方怎么选择，2# 博弈方最好都是坦白。这里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两人坦白认罪后会各被判处 3 年徒刑，这种博弈

的结果要比两人拒不认罪这种“非理性策略”差(都不坦白会都被无罪释放)。

类似“囚徒的困境”的情况在日常生活和经济领域中屡见不鲜。它们是有关“免费乘车问题”的核心。就像坦白的囚徒一样,这些免费乘车者并不付钱支持每一位公民都渴望的社会服务的费用。免费乘车的结果是导致重要的社会服务的缺乏。这类问题也将使罗伯特·欧文提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方案失败。

“囚徒的困境”可以用于研究很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仅仅是肤浅地涉及到经济学。“囚徒的困境”被用于解释军备竞赛(策略 *b*),即如果美国与前苏联不建立武器库的话,他们将无法抵御对手的攻击;“囚徒的困境”也可以用于解释商品供给,垄断者愿意通过共谋提高价格,而不是通过竞争或获得很少的利润;它还被用于解释即使两个国家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他们也将采用保护性措施(策略 *b*)。谢林(Schelling)在1978年使用“囚徒的困境”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邻居间存在着种族隔离,以及为什么即使所有的运动员都得到头盔的保护而曲棍球运动员却不愿意戴头盔。

博弈论的一个潜在的缺点是它并不总能提供确定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在“囚徒的困境”的博弈中,我们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到每一个囚徒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它仅仅能针对每一个囚徒去分析决策。然而,现实社会本身并不总是有确定的结果的,再者,实际的结果又总是依赖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的,于是博弈论就成为分析这些现实情况,捕捉不同的因素,然后作出决策,帮助人们选择特殊情况下最佳策略的很有用的工具。正如伦纳德(Leonard,1995)指出的,博弈论是“科学根本

转变的一部分,它涉及到……抛弃了决定论、连续性、微积分和力学,而考虑到非决定论、概率和状态的非连续性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冯·诺伊曼对部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和思路上的转变作出了贡献。

参 考 文 献

冯·诺伊曼的著作:

-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sspiele” (“Theory of Parlor Games”), *Mathematische Annalen*, 100 (1928), pp. 295 - 320.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in Tucker and Luce (eds.)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Games*, Vol 4,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1 - 27
-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with Oskar Morgenstern
- “A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3 (1945 - 6), pp. 1 - 9

涉及冯·诺伊曼的著作:

- Halmos, Paul, “The Legend of John von Neumann,”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80, 4 (April 1973), pp. 382 - 94
- Leonard, Robert J., “From Parlor Games to Social Science: von Neumann, Morgenstern, and the Creation of Game Theory 1928 - 1944,”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

2 (June 1995), pp. 130 - 61

Macrae, Norman, *John von Neuman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2

Morgenstern, Oskar,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Oskar Morgenstern and John von Neumann on the Theory of Gam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3 (September 1976), pp. 805 - 16

Poundstone, William, *Prisoner's Dilemma*,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其他参考文献:

Russell, Bertrand, *Common Sense and Nuclear Warfa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59

Schelling, Thomas,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Schelling, Thomas,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Norton, 1978

琼·罗宾逊 JOAN ROBINSON

(1903—1983)

琼·罗宾逊在经济学的两个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使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介于完全竞争和垄断之间的各种市场形态;后期,她致力于捍卫和发展凯恩斯的理论,从而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

琼·罗宾逊 1903 年出生于英国的萨里郡。她的家庭属于中上阶层,很重视教育和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她父亲是一位将军,也是一名作家,后来又成为伦敦大学某一学院的院长。她母亲是一位剑桥大学教授的女儿。罗宾逊在伦敦的重点女子学校——圣保罗女子学校学习历史,然后进入剑桥的格顿学院学习经济学。因为想要了解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着贫困和失业,她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认为经济学能解决这些问题。

自 1925 年毕业后,罗宾逊除了与她丈夫一起在印度住了几年外,她一直在剑桥教学。然而,由于她的性别,直到 1948 年,她才成为剑桥大学的全职人员。

20 世纪 30 年代,罗宾逊是“剑桥圈”(帮助凯恩斯发展他的《通论》的经济学家的小团体)的积极参与者,她保护凯恩斯免受反对者的抨击,并将他的理论向好几个方向进行了延伸。1974 年,罗宾逊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成为第一位女主

席,也是少数几个非美国籍主席中的一个。罗宾逊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有被提名者中的第一位女经济学家。

大学时代,罗宾逊学习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当时的标准课本。她发现她特别难以认同的是该著作的结论——即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共同最大化他们的福利。这个结论似乎与当时 20 年代英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不一致的,当时英国处于高失业、工业运转低负荷状态。罗宾逊也不赞成马歇尔和其他经济学家仅仅关注两个极端类型——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她认为,在有趣的现实世界里,很多情况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1933 年,罗宾逊撰写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一书,分析了现实社会中处于两种极端(即许多小企业高度竞争的行业与仅仅由一个企业垄断的行业)之间的行业:

为了解释厂商决策,罗宾逊使用了“边际收益”的概念(参见古诺),当一个工厂生产并卖出更多的产品时,它将会获得额外的收益。对于完全竞争状态下的厂商,他们卖出更多商品但并不降价出售,于是边际收益恒等于市场价格。但在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为了卖得更多,他们往往采用削价出售的策略。但是当厂商减价出售时,有些顾客可以支付他们本应支付的更少的钱。这样,厂商收入就少了。将较低的价格和扩大的销售量两个因素都考虑在内,我们会发现厂商有可能将价格降到即使卖出很多商品也无法获得更多的收益的地步(如,他们卖出更多商品后的边际收益为零或负数)。相反,如果厂商提高价格,即使生产和出售得少一些,他们也能获得更多的收益。

通过说明“提高价格和生产较少的产品如何为大厂商带来更多的收益”,罗宾逊阐明了为什么不完全竞争是以不充足的产品和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为特征的。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能够解释英国 20 世纪 20 年代盛行的高失业率和 30 年代的经济大衰退(而完全竞争的理论却解释不了)。

1933 年罗宾逊著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同样也阐明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工人得到的工资将低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结果是只要不完全竞争存在,就不可能获得边际生产力。在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劳动力会被大厂商盘剥。为了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罗宾逊引入了“买方垄断”(monopsony)的概念,即在一个特定地区仅仅有一个雇主或者是只有一个雇主雇佣有某一特定技能的工人。当仅仅存在一个潜在的雇主,却有很多人在寻找工作时,人们就会处于一种竞争的逆势中,他们会被迫接受那唯一的雇主提供的工资水平。罗宾逊意识到现实社会既不是由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也不是由垄断的产品市场组成。然而买方垄断概念的引入,促使人们注意到工资的决定需要一个谈判的过程,以及工人被盘剥是由于他们缺乏与少数大厂商进行谈判的能力。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的分析。经济学家知道大的、垄断性的厂商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工资,但是罗宾逊是第一位解释它的运作原理和结果的经济学家。1933 年罗宾逊还指出了价格歧视仅仅在垄断或不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才会存在。通过价格歧视,垄断性的厂商能够增加他们的收入和利润。

为施行价格歧视,厂商需要将他们的产品市场分为二个部分——愿意支付并能够支付高价格的消费者和那些对价格

敏感的消费者。这样,厂商就需要一些手段去向第一部分人群索要较高的价格。第一种方法是在一天中的不同的时段索要不同的价格。如电信公司在晚上和周末提供较低的费率。通常,对价格不太敏感的公司客户支付较高的白天的费率,个人支付减低了、非高峰时的电话价格。折扣赠券同样也可以分割市场,容许价格歧视的存在。那些对成本敏感的顾客会扣除赠券价值而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商品,而那些不敏感的顾客将会付全价。同样,通过讨价还价来定价——就像在汽车代理商那儿一样——也会导致价格歧视。这些争吵不休的顾客,不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买车,于是支付的金额少于那些不愿意花许多时间在价格上谈判的顾客。

以不完全竞争为特点的经济社会也导出了一种价格歧视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是由罗宾逊首先间接提及,后来由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都是价格的制定者,他们必须使价格能为市场所承受,并与其他厂商制定的价格相同。然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价格是由生产者在初始成本(主要是工资)的基础上加成后制定的。行业中的竞争越小,成本加成会越大;工厂因扩张所需的内部资金越多,成本加成也会越大。

尽管《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有很多先进之处,但罗宾逊几乎在完成著作的同时就对自己的作品提出了质疑。她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自己的著作,发现了许多问题。在理论的层面上,罗宾逊逐渐意识到供给和需求分析的逻辑问题;在实践中,经济大萧条和凯恩斯的著作使罗宾逊对厂商的定价和产量的决策不再感兴趣。

罗宾逊认为供给和需求分析中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忽略了

时间和预期,而用一个无时间限制的称为“均衡”的概念代替。因为经济学是处理不断增长与变化的经济问题的,所以,罗宾逊认为在均衡分析中的内部稳定性的概念与经济学这样的学科不相符。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相反,消费者与厂商并不对当前的价格作出移向均衡价格的反应,他们是在预期未来价格的基础上对当前的价格作出反应的。再者,价格的变动会改变预期。较低的价格会导致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更低,使得消费者尽管价格急剧下跌也不愿购买一些商品。在没有均衡或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的情况下价格只是一种可能。供给和需求分析并不能说明现实社会中的情况。为了理解现实社会就需要一种新的理论的引导,这种理论应关注价格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而不是价格是如何移向目前的均衡价位的。

罗宾逊认为供给和需求分析中的第二个问题是资本的性质。罗宾逊以她的关于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评论文章开始了所谓的剑桥论战。根据这一理论(参见克拉克),利润率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罗宾逊(1953—1954)提出的问题是:为了获得边际产品,如何测算资本。这个相对简单、无关痛痒的问题(在不知道利润率的情况下测算资金的可能性)在英国的剑桥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罗宾逊指出,在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为了测算边际生产力,我们需要知道资本的需求量。构造这样的需求曲线涉及到计量利润率和资本的数量。问题是资本与工人是不一样的,它不容易计数和加总。资本包括大工厂和小车间、自动装配线、锤子、旋凿、计算机、计算机软件等。这些商品与我们

能够计量的资本没有共同之处,因此,我们必须使用其他的方法。

计量资本的传统的方式是测算它的价值或未来的获利能力。这种方式在实践上和会计方面运行良好,但作为理论的一部分,它却无法完美地解释是什么决定了利润率。正如罗宾逊指出的,如果经济学理论必须解释利润率,就不能为了测算资本量而假设自己已知资本的获利能力,这是个循环的过程。因此,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必须被抛弃。

罗宾逊对微观经济学的评论支持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方法。如果我们反对边际生产力作为分配的原理,那么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就无法决定工资和就业。我们将不再有理由相信若预期工资下调,失业将会消失。同样,如果均衡的观点对于研究现实经济毫无用处的话,我们也无法设想劳动力市场会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罗宾逊也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延伸至国际领域起了作用。根据传统的观点,经济学家认为改变汇率或货币流量能纠正任何的贸易失衡。贸易顺差的国家会经历货币的流入或本国货币的升值。这将会使他们的商品相对其他国家的国民来说较为昂贵,从而减少了出口。贸易逆差的国家将会经历相反的一系列变化——他们的商品在国外将不那么昂贵,因而能出口更多的商品。根据通常的经济学理论,价格的改变就这样使贸易达到了平衡。

罗宾逊的观点与这种传统的观点相反,她认为存在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机制。贸易问题是通过收入的改变得到校正,而不是通过相对的价格变化。贸易逆差的国家是因为没有出售足够的商品给国外,结果产量下降,失业率上升。相应地,

该国国民会从国外购买更少的商品和服务,于是该国的贸易逆差就移向了平衡的状态。但是这影响了贸易顺差的国家,这些国家当时正经历着别人对它们所生产商品的需求的减少,它们的贸易顺差会减少,它们的失业率也会同时上升。

接着罗宾逊在动态的情况下检验了国际贸易,并描述了贸易平衡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从而拓展了凯恩斯主义。罗宾逊(1980)将对外贸易看作一个国家增长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其当作在不同国家之间划分任务以生产不同商品的最佳方法。贸易顺差,特别是对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将会提高国内的利润率,引起更大的投资和技术提高,这相应地就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收入。贸易顺差就这样使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得到了长期的提高。通过竭力创造贸易顺差,贸易政策就成为政府刺激经济增长常用的工具之一。

琼·罗宾逊的经济学着眼于现实社会,她对已经被接受的不切实际的或不合理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批判。她对不完全竞争的分析全面地考虑了大厂商在现实中是如何作出关于价格、产量和雇佣的决策的。她对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对帮助经济学家理解现实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界是男性为主导的领域。多少有点令人惊奇的是,经济学原理中的数学本质并不是个中缘由。在经济学领域,女大学生和女博士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占的比例小。琼·罗宾逊作为一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在这个男性的堡垒中显得尤其突出。

参 考 文 献

罗宾逊的著作：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33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London, Macmillan, 1937a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London, Macmillan, 1937b

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42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1, 2 (1953 - 4). Reprinted in Robinson (1980), Vol. 2, pp. 114 - 31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Macmillan, 1956

Economic Heresies: Some Old - Fashioned Questions in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3, with John Eatwell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5 vol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0

涉及罗宾逊的著作：

Gram, Harvey, and Walsh, Vivian, "Joan Robinson's Economics in Retrospec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1, 2 (June 1983), pp. 518 - 50

Rima, Ingrid (ed.) *The Joan Robinson Legacy*,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1

Shaw, G. K., "Joan Robinson 1903 - 83," *Pioneers of Modern Economics in Britain*, Vol. 2, ed. David Greenaway and John R. Presle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p. 144 - 69

Skouras, Thanos, "The Economics of Joan Robinson," in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ed. J. R. Shackleton and G. Locksley, New York, Wiley, 1981, pp. 199 - 218

Turner, Marjorie,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 Armonk, NY, M.E. Sharpe, 1989

其他参考文献:

Eichner, Alfred S., *The Megacorp and Oligopoly: Micro Foundations of Macro Dynam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Harcourt, Geoff, *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Kahn, Shulamit, "Women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4 (Fall 1995), pp. 193 - 205

扬·廷贝亨 JAN TINBERGEN

(1903—)

扬·廷贝亨是经济计量学和经济模型领域的先驱。他建立了第一套统计的经济学模型,并用这些模型去研究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但廷贝亨不是一个玩数字游戏的人,正如鲍姆(Baum)1989年指出的,所有廷贝亨的统计学著作都源于“对人类福利的深刻的忧虑和确信科学的、数学的分析能与广泛的人文主义方法相结合”。

廷贝亨 1903 年出生于位于荷兰北海岸的海牙。他父亲是一位语言学教师,强调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意思。廷贝亨并没有受他父亲的影响,在高中时就对科学和数学而不是语言学课程发生了兴趣。

高中毕业后,廷贝亨考入了莱顿大学学习物理,在这段时期(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爱因斯坦每年都到莱顿演讲并与廷贝亨的老师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相聚在一起。在好几个场合,廷贝亨甚至还拜见了爱因斯坦。然而,廷贝亨对物理还是失去了兴趣,转换了学习的课程,起先是数学、统计学,后来是经济学。这种改变的一个原因是 20 年代莱顿的经济是荷兰最差的,很贫困,失业率很高,实际上没有官方援助。廷贝亨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荷兰人提高生活水平,并认为经济学是有助于达到目标的合理途径。廷贝亨也研究了个

人关心的和平、公正以及人类的福利。他成为荷兰社会民主工人党的积极分子和尽责的反对者。廷贝亨没有去军队服役,而成为鹿特丹监狱的一名管理人员。

1929年,廷贝亨完成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最小化问题的论文后,进入了荷兰中央统计局。在随后的16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廷贝亨除了为国际联盟做少量定额的工作外,都在统计局研究经济周期问题。从1945—1955年,廷贝亨担任荷兰政府中央计划局局长,在这段时间,他集中精力研究经济计划。廷贝亨在哈佛任教一年后,又成为荷兰经济学院的教授。鉴于廷贝亨与拉格纳·弗里施(Ragnar Frisch)对经济计量学发展的贡献,他们在1969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廷贝亨对经济学作出了几项重要贡献。其中的大多数从本质上讲是统计学方面的。他创立了第一个关于经济整体的经济学模型,并用这个模型研究、解释了荷兰经济的波动。他对创建和发展经济计量学也发挥了作用。经济计量学是一套数学技巧,经济学家们用它在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估算定量关系。例如,通研究利率和储蓄之间的历史关系,经济学家们能够估算当利率提高时,人们可能储蓄多少。将X轴设定为利率,Y轴设定为储蓄率,我们可以构造两个变量间关系的二维图形(见图11)。

图中的每一个点代表着特定的一年中的储蓄率(家庭的储蓄额/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利率。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一种统计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经济学家能发现描绘利率和储蓄率之间关系的最佳直线。这里,“最佳”意味着每一个点和直线之间的距离最短,即这组点都和直线都尽可能的接近。经济学家通过回归分析精确地找出了用 $Y = 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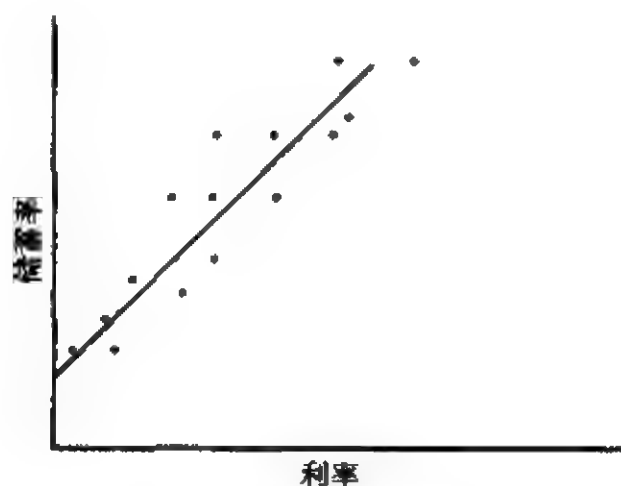


图 11 利率与储蓄

bX 方程的形式表达的直线。这里, a 是 Y 轴的截距, b 是直线的斜率或称回归系数。回归系数 b 计算的是当 X 变化一个单位时 Y 将变化多少,或是当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时,一个家庭的储蓄将增加多少。

宏观经济学模型就是一大组回归方程。每一个方程都是关于经济的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

1936 年,廷贝亨开发了包含 24 个方程的荷兰经济的宏观经济计量学模型。这些方程描述了荷兰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什么决定了消费者的开支、厂商投资、出口等等。在很多情况下都发生了滞后,因此当收入提高时消费(包括其他的宏观经济变量)并不是立即发生变化;而是随着收入的变化慢慢地变化,在几年后适应更高的收入水平。这可以精确地表达为消费依赖于当前和过去收入的加权平均数(而不仅仅是目前的收入)。

就在建立了荷兰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后不久,廷贝亨

在 1939 年又开发了 1919—1932 年间的包含 48 个方程的美国经济的模型。在二战期间他又为英国经济建立了一个小模型(廷贝亨,1951)。

这项统计工作导致廷贝亨和凯恩斯之间就经济计量学的本质和有用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39 年,凯恩斯对廷贝亨的一本书作了批评性的评论,指出经济计量学仅仅是对已经在性质上知道是正确的经济关系给出一个定量的精确分析。1940 年廷贝亨提出,回归分析可以帮助验证理论并能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廷贝亨开始用他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去研究经济波动,发展有关经济周期的理论。

20 世纪 30 年代,宏观经济学家们研究了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并对不同的阶段作了解释。此外,他们主要关注经济是如何移向均衡的(静态分析),但是他们却并不关注经济如何随着时间而上下波动。廷贝亨对经济周期提供了一个独立的、一致的解释。他阐述了经济是如何、为什么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廷贝亨的这些灵感来自于他 1930 年发现的蛛网定理(cobweb theorem)。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假定价格和市场以一种直线的方式移向均衡或静止点。如果价格太高,市场上将会有过剩的商品。过剩的商品又会使价格下降进而引起商品的供给减少。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商品短缺就会引起价格升高从而增加商品的供给。然而在许多农产品市场上我们可以看到价格和数量是移向相反方向的——价格下降却有更多的商品被生产出来销售,这没有什么不寻常的。

廷贝亨对这种现象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在农产品市场上

产出相对于价格来说有一个滞后。农民需要时间对市场上的变化作出反应。有几种类型的产品,例如猪的养殖,就需要可观的时间。如果太多的猪肉进入市场,这将会降低猪肉的价格。但是因为价格降低,第二年,农民将饲养较少的猪。同时,由于消费者开始习惯吃猪肉、咸肉以及其他的猪肉制品,较低的肉价将会导致人们对猪肉的较大的需求。这种低供给和高需求的结合引起猪肉短缺并提高了猪肉的价格。相应的,在第二年农民又会饲养过多的猪,这将导致另外一种过剩。

蛛网定理为廷贝亨的周期分析提供了基础。廷贝亨建立了 22 个统计方程,每一个方程都表达了供给和需求是如何随着时间变为短缺和过剩的。每一个方程也模拟了发生在不同经济阶段的变化。通过这些方程,廷贝亨阐明了经济是如何随时间波动的,正如猪的饲养一样。

在开发了经济运行中的宏观经济计量学模型后,廷贝亨转而对政策问题产生了兴趣,他阐述了政策制定者怎样使用宏观经济计量学模型衡量任何建议性政策的影响。接着,廷贝亨又说明了面对矛盾和冲突的经济目标时,他的统计模型是怎样帮助政治家们作出政策决策的。在廷贝亨之前,经济学家们都是孤立地研究不同的经济决策,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处理多重经济目标。廷贝亨认为多重的经济目标需要多重政策。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失业率低一些,本国货币坚挺一些,就需要有两个不同的政策来达到不同的目标。通常如果政策制定者有一定数量的目标,他们就必须有可以任意使用的至少是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

廷贝亨也解释了如何使用经济学分析帮助国民政府开发提高经济产出的计划。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国民关于经

济目标的集体偏好。为了最有效地满足国民的集体偏好,他们需要操纵政策工具。这种集体偏好导致政策目标可能是固定不变的也可能是富于弹性的。达到这种结果的方式可以是深入改革经济运行方式(例如社会保险法规的采用,就业保障,或者是收入政策),或者通过定性的变化影响经济结构(例如控制垄断和竞争的法律的变化以及新的税制形式),或者运用定量的变化诸如货币供给、汇率、改变政府支出金额这些政策工具。

20 世纪 70 年代,廷贝亨不再关注经济计划转而注意收入分配。这种改变可能有几种因素。第一,对经济计划的兴趣正在世界范围内衰减,第二,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正在加大。这与廷贝亨的提高社会平等和经济福利的期望相违背。

就像廷贝亨的其他工作一样,他用动态的观点研究收入分配。廷贝亨试图找出收入分配随着时间变化的根源,而不仅仅是寻找当前收入分配的原因。他将这些定位于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上。根据廷贝亨的理论,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和技术进步。他的分析也依赖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假说(dual labor market hypothesis)。该假说假定在发达国家有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在运作,而不是一个大的劳动力市场。根据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应该存在一个高技能的熟练工市场和一个缺乏技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熟练工市场。工人从一个市场跳到另一个市场很不容易,而雇主却可以在任意一个劳动市场中挑选工人。

从这种观点看,加强教育,使一个国家国民的能力倾向于

一致,可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另外,教育也将使这两个市场中的工人的工资趋向于一致。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大量供给会减少他们较高的工资。同时,更广泛的教育可以减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供给量,这就意味着剩余的低技能的工人会得到更高的工资。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会拉大收入差距。技术需要有技能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这样就会增加对有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并提高他们的收入。技术也会淘汰那些适应不了更高要求的工人,减少对无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并降低他们的收入。

廷贝亨(1975)发现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教育和技术进步竞争的结果,如果教育比技术发展得快,收入差距将会缩小;如果技术超前,收入差距将会加大。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出三个政策涵义。第一,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应该增加,以使教育比技术发展得更快。第二,政策应当指导技术创新,以使其需要更多的低技能的劳动力。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会提高处于分配底层的这些劳动力的工资,也能缓和被技术进步拉大的收入差距。最后,廷贝亨建议用税收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他提倡对财产、资本收益和遗产征收较高的税。

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个发达国家都构建了包括将近1000个方程的大型的宏观经济计量学模型,这些模型被用来研究经济活动和预测未来的经济过程,它们也被政府和中央银行用来制定经济政策。这些宏观经济计量学模型的存在归功于廷贝亨的开拓性研究,这些研究也使廷贝亨成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廷贝亨的著作：

“Annual Survey of Significant Developments in General Economic Theory,” *Econometrica*, 2, 1 (January 1934), pp. 26 - 8

An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Business Cycle Problems, Paris, Hermann, 1937

Statistical Testing of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2 vols.,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39

“On a Method of Statistical Business Cycle Research: A Reply,” *Economic Journal*, 50 (1940), pp. 141 - 54

Business Cycl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70—1914,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51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52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Economic Polic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54

Economic Policy: Principles and Design,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56

Selected Paper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59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 Suggestions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2

Lessons from the Past,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3

Income Distribution: Analysis and Polici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5

涉及廷贝亨的著作:

Baum, Sandra R., "Jan Tinbergen 1969" in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 ed. Bernard S. Katz,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89, pp. 304 - 17

Bos, Henk C., "Jan Tinbergen: A Profile,"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6, 2 (1984), pp. 151 - 8

Hansen, Bent, "Jan Tinbergen: An Appraisal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1, 4 (1969), pp. 25 - 26
Keynes, John Maynard, "Professor Tinbergen's Method," *Economic Journal*, 39 (September 1939). Reprinted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XIV, London, Macmillan, 1973, pp. 306 - 20

Kol, J. and Wolff, P. de, "Tinbergen's Work Change and Continuity," *De Economist*, 141, 1 (1993), pp. 1 - 28

Van Der Linden, J. T. J. M.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Netherlands: The Contribution of Professor Jan Tinbergen,"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146, 3 (December 1988), pp.

270 - 82

其他参考文献:

Piore, Michael and Doeringer, Peter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 C. Heath, 1971

约翰·希克斯 JOHN HICKS

(1904—1989)

约翰·希克斯最显著的是开发了若干用于论证经济学原理和分析技巧的图表。这些图表成为当代经济学的基础,特别是成为大学生的必修内容。

希克斯 1904 年生于英国沃里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父亲是一名记者兼编辑。希克斯在英国的私立中学受到较好的教育,后来获得了牛津巴利奥尔学院的奖学金。希克斯起先在牛津大学学习数学,但很快就转而关注起经济学。1926 年,他获得了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位。

毕业后,希克斯曾任教于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在南非也有过短暂的教书经历。他不喜欢剑桥大学,既不喜欢那儿的自然气候,也不喜欢那儿的学术氛围(太容易发生争执)。相反,他却认为伦敦经济学院适于工作。伦敦经济学院的休·道尔顿(Hugh Dalton)让希克斯阅读帕累托的手册,这对他的—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他读到了附录的数学部分时,希克斯意识到帕累托并没有完成他已经着手在做的事情——通过用数学表达使经济学分析更为清楚和精确。从那一刻起,希克斯决定要用一生去完成帕累托未竟的事业。

1938 年,希克斯被任命为曼彻斯特大学的斯坦利·杰文斯讲座教授。八年后,他又回到牛津大学任教,1965 年退休。

1964年,希克斯被赐予爵位——约翰·希克斯爵士。1972年,他与肯尼恩·阿罗(Kenneth Arrow)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希克斯对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在20世纪,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分成两个独立的领域,所有的学科都盛行专业化。希克斯的成就在当时是罕见的。作为一名宏观经济学家,希克斯最著名的成就是完善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在一直以来被引用得最频繁的一篇经济学论文中,希克斯1937年将凯恩斯的《通论》浓缩成两条曲线(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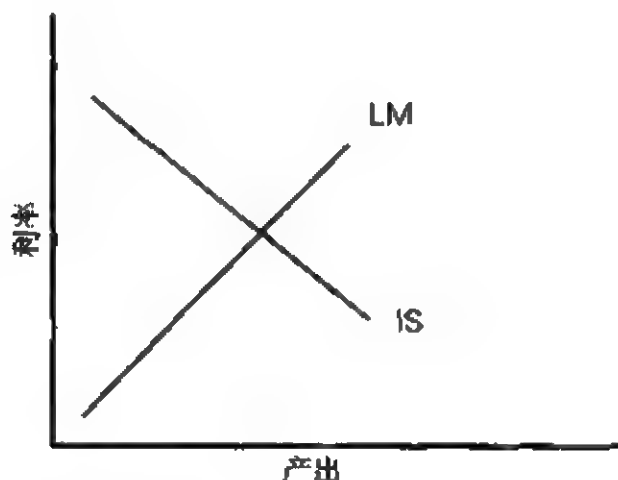


图12 IS-LM图

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从来不把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截然分开。在商品市场中,厂商生产商品,并将商品销售给消费者、政府、其他的厂商和其他国家。商品市场的均衡需要投入市场的供给等于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在货币市场,人们和工商企业需要一个固定的由国家中央银行设定的货币储备。货

币市场的均衡要求货币的供给等于货币的需求。

然而,这两个市场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彼此独立的。如果货币的供给增加,将会使货币市场的利率降低,但是随着利率的降低,投资将会膨胀,于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增加。当然,随着更多的商品和服务被生产出来,人们会需要更多的货币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但是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又会使利率升高,于是投资和商品将会减少,因此又会相应地降低对资金的需求。

可以想像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相互作用永远是互动的,没有最终的和稳定的结果。IS - LM 模型 (IS - LM model) 演证了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将会同步得到均衡。这个图表现已成为对大多数大学生进行宏观经济学教育的基础,而且在他们的头脑中,IS - LM 模型与凯恩斯主义是同一个意思。

图 12 中 IS 曲线代表经济领域中的商品市场的均衡位置,它代表了商品市场中投资(I)等于储蓄(S)的事实,IS 曲线向下倾斜可以看作下降的利率,必须扩张经济的产出才能保持商品市场的均衡。这是因为较低的利率会使厂商增加投资,但是它也会减少储蓄。为了使储蓄增加,保证储蓄与投资相等,经济必须要产出更多的商品、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收入。

LM 曲线显示了货币市场中可能的均衡位置。LM 曲线代表了在货币市场中货币需求(L)必须等于货币供给(M)的事实。图 12 表明了当利率升高时,如果想要使货币市场保持均衡就必须让经济膨胀。这是因为,由于货币的持有者会损失因持有一些生息的资产而可能赚取的利息,所以较高的利

率使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减少。然而,如果经济增长,人们将会想要更多的货币以购买更多的商品,随着更多的商品的产生,货币的需求将会增加直至等同于货币的供给。

在 IS 与 LM 曲线的交叉处,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了均衡。由于商品市场移向 IS 曲线上的点,货币市场移向 LM 曲线上的点,那么整个经济就必定移向了两条曲线唯一的交叉点。

希克斯接着阐明了对两条曲线的不同的假设是如何导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差别的。如果 LM 曲线是平坦的而不是陡峭的斜线,就会需要用财政政策(或 IS 曲线的变换)来扩大就业,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描述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 IS 曲线是较平坦的,就会需要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或者是 LM 曲线的变换)来加大产出和就业,这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描述的状况。

希克斯对宏观经济学的第二个贡献涉及到利率的期限结构(term structure)。经济学家们频繁地谈及“利率”,好像“利率”仅仅是存在于经济中的利息的比率。但是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上都有不同的利率。信用卡上的利率要比住宅抵押贷款上的利率高,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又要比可变利率的抵押贷款的利率高。利率理论尝试着解释这些利率间的关系。

经济学家们曾经用两种方式理解这些利率。一种方式是集中关注贷款的风险,另一种方式是集中关注贷款期限的长度。对贷款方来说,风险越大,利率会要求得越高,贷款方要求的更高的利息是为了补偿若不还贷可能造成的损失。

收益曲线(yield curve)是观察不同时限贷款的利率的图

解说明。这些贷款采取了个人和厂商购买政府(公司)债券的形式。收益曲线表明为美国政府提供3个月的贷款,将会赚取4.4%的利息,2年的贷款将获取5.5%的利息,10年的将获得7%的利息,30年的将获得8%的利息(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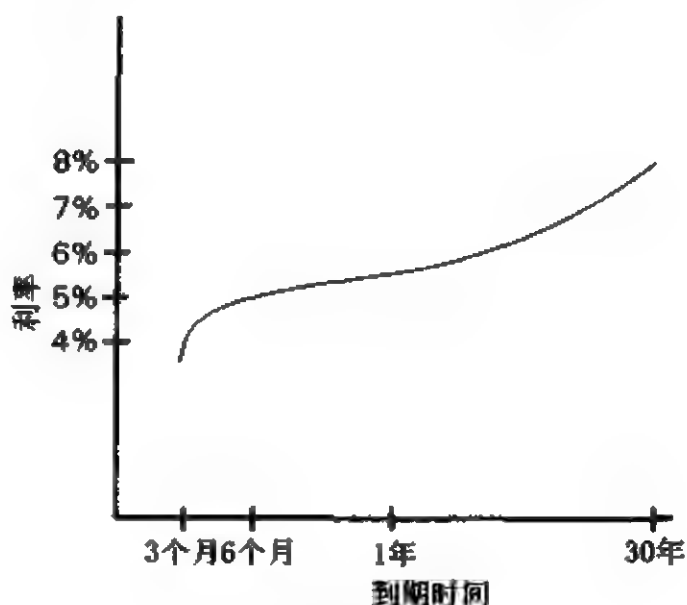


图13 收益曲线

收益曲线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同到期日资产的利率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如6个月和1年到期的债券,希克斯1939年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并建立了预期假设来阐述不同到期日的资产间的关系。

希克斯推理,如果现在6个月到期债券的利率是5%,1年期债券的利率是5.5%,那么投资者一定希望6个月后的6个月到期债券利率会是6%,这样投资者无论选择多长期限的债券,都是得到5.5%的利率。他们可以购1年期债券以在整年里获得5.5%的利率,或者,他们也可以在前6个月赚

取5%的利息,在后6个月赚取6%的利息。预期假设认为,较长到期日的资产的收益通常都等于短期资产当前收益的平均数或者是短期资产未来的预期收益。

希克斯接着继续解释为什么预期假设是正确的,这种假设本质上依赖于套利的过程。如果1年期债券利率是5.5%,而当时6个月到期债券的利率是5%,6个月后6个月到期债券的利息是5.5%,那么决不会有人想要拥有6个月到期债券并去购买它们。在1年时间里,购买前6个月和后6个月的债券平均下来仅仅能赚得5.25%的利息。人们会偏好5.5%的1年期债券,所以人们将会卖掉6个月到期债券而购买1年期债券。这将会促使6个月到期债券的价格下降,而1年期债券价格上升。由于债券的价格与相应的利率是相反的,于是6个月到期债券的利率会上升,1年期债券的利率会下降。这种过程会一直持续到最终得到预期假设所认同的均衡状态——1年期债券的利率等同于现在的6个月到期债券的利率与从现在起半年后的6个月到期债券的利率的平均数。

希克斯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家作了许多贡献,然而他第一次获得荣誉却是作为一名微观经济学家获得的。尽管是埃奇沃思首先绘制了无差异曲线,但却是希克斯(1934)将无差异曲线融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他阐明了无差异曲线是如何被用来为任何商品构造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接着,他又用无差异曲线去区分价格变化中的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和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

这种分析的关键是引入了预算线(budget line),这条线描述了在消费者当前的收入和商品当前的价格给定的情况下,

消费者能购买多少数量的该种商品。例如用 10 美元购买成本均为 1 美元的椒盐卷饼和啤酒,一个消费者可以买合计 10 美元的椒盐卷饼和啤酒的任何组合,这就是图 14 中斜率为负数的直线。在直线的一端,可以购买 10 袋椒盐卷饼。在另一端,可以买 10 份啤酒。在这两个端点之间,任何一种组合都是可能的,预算线显示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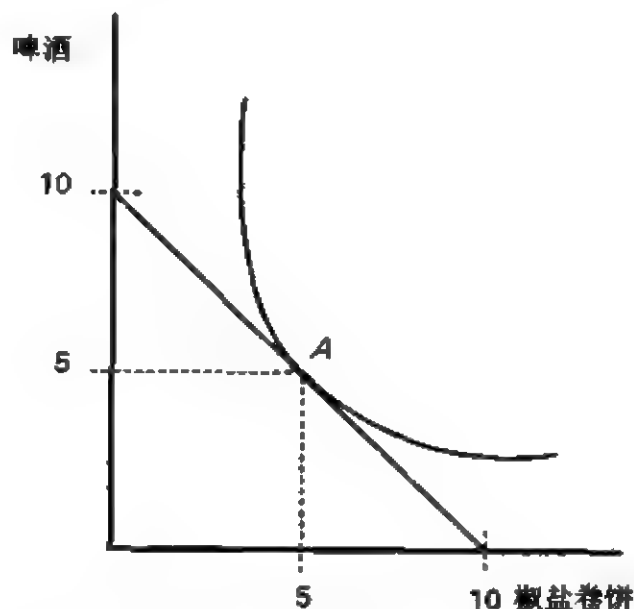


图 14 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约束

为了解释消费者的行为,希克斯将无差异曲线加入了这张图表。消费者将会选择能产生最大效用的椒盐卷饼和啤酒的组合,即图上的 A 点。

希克斯接着分析了价格变化的作用。先假设啤酒的价格提高到 2 美元,随着啤酒价格相对提高,人们会希望多买一些椒盐卷饼而少买一些啤酒,这就是替代效应。当一种商品价格提高时,对该种商品的需求会减少,而对另外一些商品的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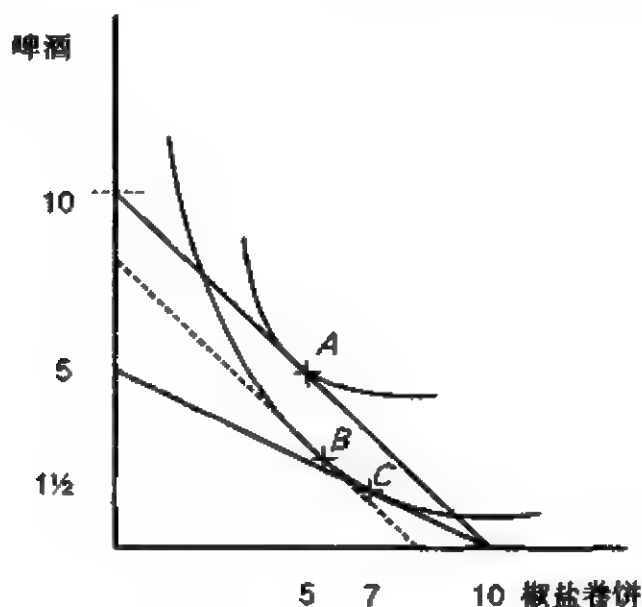


图 15 收入与替代效应

求会增加(并不是所有商品都是互补商品)。然而,还存在一种收入效应。当啤酒涨价时,消费者的收入能购买的东西将减少,由于收入效应,在椒盐卷饼和啤酒上的开支都会下降。这两种效应加在一起,就会使人们从 5 份啤酒和 5 袋椒盐卷饼的组合改变为 1.5 份啤酒和 7 袋椒盐卷饼。预算线的旋转体现了这些效应。现在,由于预算线的旋转,消费者在 C 点得到最大的效用。

希克斯又提出一种独创性的方法去区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预算线的斜率代表着二种商品相对的价格。如果只存在替代效应而没有收入效应,我们就在最初的无差异曲线上,仅仅是在啤酒新的 2 美元的价格上或新的预算线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的椒盐卷饼和啤酒的组合。想要显示出收入效应,希克斯建议用原先的那条预算线在图 15 中移动,直到它正好与

新的无差异曲线相切。正如图 15 的虚线所示,在 B 点啤酒和椒盐卷饼的相对价格是相同的。这表明消费者支出习惯的改变只能归因于收入效应。

因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各自都减少了啤酒的消费,当啤酒涨价时,人们会少买些啤酒。啤酒的需求曲线一定会向下倾斜——当啤酒的价格上升时,啤酒的消费量会减少;相反,当啤酒的价格下降时,啤酒消费的数量会增加。

最后,希克斯于 1932 年引入了替代弹性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的概念,这是对马歇尔的弹性概念的自然延伸。马歇尔将弹性的概念应用到消费者的需求和生产商的供给上,研究在价格给定的变化上消费者会买多少,生产商将卖多少。希克斯将这种弹性概念应用到厂商对商品的产量所作的决定上来。

从一个厂商的角度上来看,可以用若干种不同的方式来生产商品,每一种方式都使用不同的劳动力和资金的组合。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会雇佣较多的劳动力,使用较少的资金,而资金密集型的生产过程会使用较多的资金,雇佣较少的劳动力。通常,厂商会在生产上面临一个平衡——雇佣的工人多了,需要的机器就会相对少些;而生产中使用的机器多了,需要的工人就相对少些。替代弹性计算的就是如果在生产商品时多增加一个工人可以省下多少机器,或者是多购买和使用一台机器时可以省下多少工人。

希克斯指出,工人其实不必去反对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改进,因为它最终会导致工人的工资增加。如果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变大,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是很容易的。有了较多的资本,工人们将会生产更多的商品,于是工资将会更

高。

希克斯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是专门写给经济学界同仁看的,他开发的大量的工具和图表使得经济学家能够更为清晰和简明地描绘经济学分析的原理。希克斯阐述了如何将商品市场的分析与货币市场的分析结合起来,如何理解不同到期日的利率间的关系,如何将效用理论与需求理论结合起来。鉴于他在许多方面的领先和在许多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希克斯理应被视为 20 世纪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希克斯的著作:

The Theory of Wages, London, Macmillan, 1932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 *Economica*, 1 (February and May 1934), pp. 52 - 76, 196 - 219, with R.D.G. Allen

“A Suggestion for Simplifying the Theory of Money,” *Economica*, 2 (February 1935), pp. 1 - 19. Reprinted in Hicks (1967)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5 (April 1937), pp. 147 - 59. Reprinted in Hicks (1967)

Value and Capital: An Inquiry into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Capital and Grow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Critical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Collected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 3 vol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 3

涉及希克斯的著作：

Baumol, William, "John R. Hick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4 (1972), pp. 503 - 72

Hagemann, Harold and Hamouda, Omar F., *The Legacy of Hicks: Hi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Hamouda, Omar F., *John R. Hicks: The Economist's Economist*, Oxford, Blackwell, 1993

Klamer, Arjo, "An Accountant Among Economists: Conversations with Sir John R. Hick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4 (Fall 1989), pp. 167 - 80

Morgan, Brian, "Sir John Hick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eory," in J. R. Shackleton and G. Locksley (eds.)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London, Macmillan, 1981, pp. 108 - 40

奥斯卡·兰格 OSKAR LANGE

(1904—1965)

奥斯卡·兰格最著名的是他在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方面的成果。这项成果解释了在由官僚机构而不是市场设定价格的事实情况下,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它也解释了欠发达国家如何使用经济计划的工具去发展得更快、更有效。兰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成果是鲜为人知的,他在这方面的成果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经济会经历有规律的经济周期,为什么通常的政策不足以解释高失业率。

兰格 1904 年生于波兰西部的卢布林地区的托马斯佐·马佐维茨基小镇。他父亲是一个德国的纺织品生产商,将生产的商品销售到欧洲东部。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兰格家处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他父亲的生意破产后,家庭的经济状况变得困难起来。

兰格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对生物、数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兴趣。到了该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兰格在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间很难作出抉择。经历了许多心灵上的痛苦后,兰格选择了后者,并在克拉科夫大学注册学习数学、统计学、法学和经济学。1928 年他因研究波兰的经济周期而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在大学里获得了统计学讲师的职位。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早期,兰格以洛克菲勒基

金会成员的身份访问了英国和美国。在这期间,他和哈佛的约瑟夫·熊彼特先生共同从事研究工作;接着他在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获得了教学职位。在二战后期,兰格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波兰政府。二次大战后,他在波兰政府担任过驻美国大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波兰代表、国会议员和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8年,兰格又回到了学术界,在华沙的计划和统计中心学院教书,接着又去华沙大学任教。

兰格的经济研究成果首先涉及到计划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他研究的问题包括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像市场经济一样有效地运作,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管理者提供足够的激励,如何在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等等。在兰格所有的工作中,他都试图将数学和统计学的分析应用到计划问题中去。

社会主义经济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项功能是由市场去执行的。那些消费者需求量比较大的商品价格较高,这样就向这些商品的生产商发出信号——他们需要扩大生产。相反,消费者不想要的商品会堆积在货架上和仓库里,厂商会停止生产这些东西转而生产需求量较大的商品。兰格阐明了社会主义并不会仅仅因为没有市场经济就导致商品的无效分配——生产太多的消费者不想要的东西,而消费者很想要的东西却不充足。

1908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埃里科·巴罗尼(Enrico Barone)试图阐明市场对于经济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巴罗尼,1935)。他从建立一组数学方程开始,每一个方程都代表某一特定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巴罗尼使用这组方程说明社会主义经济能

够正确地设定价格、有效地分配商品。所有的经济计划者要做的就是求解这些方程和发现每种商品的市场出清价格,或者是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时的价格。通过设定每种商品的价格等于它的市场出清价格,计划者将确保经济生产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

20 世纪 30 年代,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莱昂内尔·罗宾斯,两位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的经济学家,对这个体系提出了明显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巴罗尼设想的程序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践中行不通。在作任何决定之前,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或主管经济计划的部长将不得不收集无穷多的信息,推出几十万甚至是数百万个方程。为了得出一组市场交换价格,他们必须求解所有这些方程。而且,正如罗宾斯指出的,当用数学方法将这组方程求解出来的时候,经济状况可能已经又变化了,由经济计划部门设定的价格将又会过时了。

1938 年,兰格(1964)对这些异议作出了反应,并论证了一个有效分配的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他说明经济计划者不必了解数以百万计的数学方程,也不必为了得到正确的价格去求解这些方程。兰格主张,对计划者来说,必须要做的是遵循一种简单的尝试和纠错的方法。无论何时,经济中存在短缺,经济计划者就应当提高价格;当存在过剩时,经济计划者就应降低价格。通过利用这些原则,社会主义计划者会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市场一样起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将能有效地分配资源。为了使他们的工作更加容易,计划者不必一开始就进行尝试和纠错的过程,他们可以从一组由市场决定了的有效价格开始。

兰格还提出,这种程序会形成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经

济体系,经济会很迅速地达到均衡价格,因为经济计划部门对整个经济状况会比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任何个人企业家有更多的了解。许多年后,兰格意识到有了计算机的帮助,求解几千个方程是完全可能的,为所有的商品找出市场出清价格仅仅是几秒钟的事情——比市场本身需要的时间更少。经济周期可以通过迅速地变动均衡价格而变得更短、更缓和;于是社会主义经济会比资本主义经济的失业率更低。

根据兰格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还有其他的优势。它比资本主义经济优越是因为在收入分配上社会主义经济更为平等。另外,社会主义经济不会为垄断权力的问题所困扰,在社会主义的厂商不可能通过约束产量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他们就不可能掌握很大的政治权力。

虽然兰格为阐明社会主义如何像资本主义一样高效而穷尽了心血,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乌托邦的最后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真正的危险在于经济生活中的官僚机构。”他担心经济计划者可能会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出发去作出决定。但是兰格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在垄断的资本主义下也会发生——公司的管理者成为官僚,不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反应。兰格认为分散的决策和受过良好教育的计划者对缓和这些问题应该有帮助。

兰格对经济学的第二个贡献是他对资本主义中的经济问题的分析。根据兰格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垄断已经破坏了市场和自由竞争,市场并没有承担经济学理论所赋予它的角色。这些垄断者可以控制价格,剔除竞争者,既能影响消费者又能影响政治家。于是,兰格将社会主义作为恢复市场价格和竞争效率的方式,就像作为使经济决策更加民主

的方式一样。经济管理是由在民主监控之下的公务员去承担,而不是由根本不受控制的有权势的大型企业的领导层去承担。

兰格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高失业率的困扰。这项研究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研究是平行的。兰格注意到在经济衰退期间有两种结果是可能的,其中只有一种能够导致就业的增长。首先,经济衰退可能引起价格下跌,但是对流通领域中的货币的数量却几乎不起作用。随着价格的下降,现存的货币供给使消费者能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厂商可以购买更多的厂房和设备。浮动的价格就这样帮助经济转向了充分就业。这就是经济如何对高失业作出反应的传统分析。

但是兰格提出货币供给的下降幅度也可能比价格下跌的幅度大。为了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可能发生,首先需要了解在成熟的经济社会,当银行贷款时,货币能被创造出来。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当银行借出钱时,他们会害怕得不到还款。如果银行要求还清贷款,拒绝再贷款出去,这将会减少货币供给,提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投资会下降,失业将增多。

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个在实践中都是可能的。货币经济并不拥有自动的机制,不像浮动价格那样保证经济移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兰格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增强的垄断因素使浮动价格不那么可能出现,而更可能出现上述的第二种情况。

考虑得更深一步,兰格怀疑凯恩斯提倡的宏观经济学政策是否能解决失业问题。因为存在着太多的垄断,垄断更可

能通过提高价格来对需求的增加作出反应,而不是通过扩大生产和雇佣更多的工人。这样,很显然限制了商品需求增加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能力。消除失业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约束垄断权力——让国家接管这些垄断者。为了经济运行的利益,国家必须主张对经济的民主控制。这样在兰格看来,垄断资本主义就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否定了资本主义,而是它的延伸。他认为垄断和寡头的增长已经破坏了市场和自由竞争。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经济是恢复经济和维护民主的一种方法。

兰格不仅批评了资本主义经济;他更批评了苏联经济。兰格不认为苏联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把它看作是“政治目标指导下的独裁主义者经济”。它的政治目标是想成为世界卓越的工业国家之一,并为国防提供足够的产品。因此,苏联并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市场,而是政府将资源转向国防支出和对制造业的大规模投资。政府是通过减少其他部门所需的商品的数量来做到这些的。消费者渴望得到商品,必须要排好几个小时的队去购买它们。为了发展制造业,农业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材料供应总是短缺。同样,苏联的经济计划者对数量的强调(而不是市场出清价格)也损害了质量。为了实现计划者提出的数量目标,工厂可能将制造最廉质的商品,因为商品始终处于短缺状态,于是无论商品是怎样的冒牌货,都会被别人买走。

兰格的研究应当被视为将社会主义最好的方面(经济决策中的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好的方面(效率)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他提倡政府拥有大型垄断企业的所有权,他也提

倡运用价格机制确保经济体系能生产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他尝试将中央计划与分散管理结合起来,试图通过更好的教育和提供现代的分析 and 预测工具以使计划者更加富有效率。如果中欧和东欧的国家想要在适者生存的资本主义与政府对所有经济活动实行全盘控制的形式之间寻找中间地带的话,毫无疑问,兰格的经济学思想将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兰格的著作:

"Say's Law: A Restatement and Criticism," in *Studies in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in Memory of Henry Schult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p. 49 - 68

"The Theory of the Multiplier," *Econometrica*, 11 (July-October 1943), pp. 227 - 45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Principia Press, 1944a

Working Principles of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Research Bureau for Postwar Economics, 1944b

"Economic Controls After the Wa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60 (1945), pp. 1 - 13

Some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Polish Road to Socialism, Warsaw, Polonia Publishing House, 1957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3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4, with Fred M. Taylor

Economic Theory and Market Socialism: Selected Essays of Oskar Lange, ed. Tadeusz Kowalik, Hants, Edward Elgar, 1994

涉及兰格的著作:

Feiwel, George 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Some Reflection on Lange's Contributions," *Kyklos* 25, 3 (1972), pp. 601 - 18

Fisher, Walter D., "Oskar Ryszard Lange, 1904—1965," *Econometrica* 34, 4 (October 1966), pp. 733 - 8

Rider, Christine, "Oskar Lange's Dissent from Market Capitalism and State Socialism," in *Economics and its Discontents*, ed. Richard P. F. Holt and Steven Pressman, Cheltenham, UK &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1998, pp. 165 - 82

Kowalik, Tadeusz, "Oskar Lange's Market Socialism," *Dissent*, 38, 1 (Winter 1991), pp. 86 - 95

其他参考文献:

Barone, Enrico, "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 F.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1935, pp. 245 - 90

Robbins, Lionel, *The Great Depression*, London: Macmillan,

1934

Hayek, Friedrich A., "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in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ed. F. A. Hayek, London, Routledge, 1935, pp. 1 - 40

瓦西里·里昂惕夫 WASSILY LEONTIEF

(1906—)

瓦西里·里昂惕夫以其开发了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而闻名于世。投入—产出分析,是描述不同经济部门或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技巧,它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并为人们了解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广阔的视野。投入—产出分析使人们能理解当经济扩张时,生产瓶颈是如何出现的,以及通货膨胀过程是如何波及和扩散到整个经济中的。投入—产出分析在二战后也被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用于编制五年经济计划。

里昂惕夫 1906 年生于俄国圣彼得堡的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在圣彼得堡的一所大学里教授劳动经济学,他母亲是一位人文历史学家。里昂惕夫自小就有点天赋,15 岁就上了大学,学习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因为批评新共产主义政府,里昂惕夫频繁地惹上麻烦,在大学时就进了好几次监狱。

1925 年,里昂惕夫 18 岁的时候,获得了社会科学的硕士学位,并赢得了“优秀经济学家”的称号。里昂惕夫一家由于与共产主义政府意见分歧而离开了俄国,定居德国。里昂惕夫在柏林大学注册,继续他的经济学学业,并于 1928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与来自中国的访问者在柏林咖啡馆的一次偶然

相遇使里昂惕夫成为中国铁道部部长的顾问和咨询员。以这样的身份,里昂惕夫花了一年的时间走遍了中国,并收集了有助于规划中国铁路网络的数据。这项工作为他提供了洞察经济相关性和用现实社会的数据详细规划这些关系的机会。

1931年,里昂惕夫来到了美国,他先是以一个研究助理的身份在纽约的国家经济研究所工作,接着又在哈佛大学工作了许多年。20世纪30年代在哈佛,里昂惕夫开始为美国经济开发投入—产出模型。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他进一步地细化和扩展了这个模型,同时发现了使用这个模型研究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许多方法。1975年,里昂惕夫离开哈佛到了纽约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工作。

里昂惕夫在这几十年中得到了许多赞扬和奖励。1970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197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选择里昂惕夫获此殊荣的过程中,诺贝尔委员会引证了他在投入—产出分析中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成果毫无疑问地构成了里昂惕夫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虽然经济是由一系列相关联的部分组成,即一个部门从其他部门购买商品,货币从一处流向另一处,最后又流回来的观点最初是由坎蒂隆和魁奈提出的,但是里昂惕夫用数学术语表达了这种关系,并收集了必要的数据去构建现实社会的投入—产出表。也正是里昂惕夫推导出他自己开发的关于经济的数学表述所隐含的政策涵义。这一工具使分析家们能计算出任何一个经济部门或产业的变化将怎样影响其他部门和产业。此外,投入—产出分析也考虑到了里昂惕夫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会出现的全面的政府计划。

投入—产出分析所隐含的主要见解是,如果经济要生产

更多的某一商品,比方说汽车,那么一定需要制造这辆汽车所必需的所有投入或零部件。于是需要更多的轮胎、轮毂罩、轮轴、窗玻璃以及更多的发动机等等。依次,生产每一个部件又会需要其他的零部件。生产轮胎会需要更多的橡胶、机器等等。使事情更为错综复杂的是,生产更多的发动机、轮毂罩和轮轴就会需要生产更多的汽车,因为必须要用它们来运送零部件和原材料。要生产更多的汽车,当然会需要更多的汽车生产所必需的所有投入。

在这个框架里,劳动力投入是很容易掌握的。如果组装汽车的工人被看作一种投入的话,他们将需要其他的投入。工人们会需要食物、衣服、房子,当然还有接送他们工作往返的汽车。这些组装工人所需要的投入与经济中的其他工人所需要的投入是一样的。

通过对为数众多的美国工业的生产和技术需求的广泛研究,里昂惕夫(1941)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主要产业的技术生产关系。这种类似会计决算的框架详尽描述了生产任何特定商品时需要的所有其他的商品。里昂惕夫列出了一系列数学方程,每一个都代表经济生产中的一个商品。通过计算机的帮助,里昂惕夫解出了这组方程。他的解表明了为了多生产一辆汽车,必须要多生产多少其他商品。如果这些商品没有按需要生产出来,生产瓶颈就会出现;就会出现发动机或轮胎、窗玻璃的短缺,额外的汽车就不会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所有的投入都按照需要的数量生产出来了,那么就会有正好足够的零部件和材料来生产另一辆汽车。

投入—产出模型并不仅仅是技术的关系,政策制定者也可以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定改变经济政策的结果。例如,

国防支出的缩减必然损害军备工业、它们的供应商以及它们供应商的供应商。相反,增加在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和铁路等方面的投资将帮助建筑业、它们的供应商以及它们供应商的供应商。将这两组变化综合起来考虑,政府就能预测军事的改变对国家不同地区的影响以及对经济的不同产业、不同部门的总体影响。

当里昂惕夫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时,他演证了投入—产出技巧是如何被用来验证经济学理论的。他很惊奇地发现美国的出口商品比进口商品在生产中使用更少的资本和更多的劳动力。这与传统的贸易理论是相矛盾的。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个资本富裕的国家(如美国)应当出口资本密集型的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这样的结果就是“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里昂惕夫的发现使人们非常努力地修订贸易理论以解释现实社会的发现。

里昂惕夫为美国开发的另一个实用的投入—产出分析系统始于1973年,这项工作试图开发一个世界性的投入—产出模型,这个模型将环境也作为一个“经济部门”。众所周知,经济部门不仅生产出通常的产品,如汽车,还产生出许多污染物质。同样,人们可以想到污染治理部门的投入就是其他部门所产生的污染物质。该部门清理污染物质,使环境恢复到初始的状态或质量。里昂惕夫使用这个模型来研究生产扩张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限制环境污染所付出的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污染治理部门所需的投入)。

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全世界都热衷于投入—产出分析,计算机的发展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能开发日益复杂的、现实的投入—产出模型。在二战期间,政府用投入—产出

分析决策哪个经济部门可能出现短缺,然后制定政策去扩大该部门的生产。不仅如此,二战后,国家开始对掌管本国的经济未来感兴趣,而不再任由反复无常的市场的力量去支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计划机构和官僚机构,投入—产出模型为这种努力提供了简单、实用的工具。

然而,到了70年代,人们对投入—产出分析的兴趣开始减退。首先,当时的氛围从计划又回到任由市场决定发展的步伐和方向中来。第二,投入—产出分析中的有些缺陷变得明显了。它为大型的、复杂的经济估算实际的投入—产出关系既困难又昂贵,一国政府也很少修订国家的投入—产出模型。结果,运用投入—产出工具进行政策分析所依赖的数据相当过时(马歇尔,1989)。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现实社会中,增长和发展与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相关联。技术进步意味着生产可能只需要更少的投入(特别是对劳动力的需求)。那就意味着投入—产出的关系总是在不停地变化,然而,投入—产出分析却将这些关系固定住了。

除了投入—产出分析,里昂惕夫也关注着经济学方法论和当代经济学家们的日常实践。这时的里昂惕夫已经从一个模型的构建者、对建立经验主义的关系感兴趣的专家转变为一个尖锐的职业批评家。他的第一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评论抨击了凯恩斯和他的跟随者们所构建的抽象的、理论性的模型,该模型的前提假设已包含了该模型的结论。里昂惕夫认为,没有对经济实际运作方式的很好的经验性评估,建立的模型就不可能阐明现实经济中的任何问题。这个评论本质上是指经济学已经不再是一门经验主义的科学而是变得过于理

论化了。

里昂惕夫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中继续批评他的同行是如何研究经济学的。这次,他抱怨数学的形式主义支配了经济学专业。他指出,经济学家只是对构建形式化的模型,然后逻辑地推断该模型的特征和特性感兴趣,而根本就不去问及这些模型的假设是否真实。里昂惕夫认为,这些数学推断的结论互不相关,因为他们的前提假设就是不真实的。

里昂惕夫也批判他的同行经济学家是在不可靠的数据的基础上完成让人迷惑的统计分析的。他积极建议经济学家们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去收集数据,少花些时间开发复杂的测验技巧。最后,里昂惕夫提出,与自然科学关系不一样,经济关系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因为经济关系所依赖的个体的行为也会改变。他认为假设经济关系总是一成不变的经济计量学的测验因此被误信,并掩饰了数据收集方面的缺陷以及经济关系确实随着时间的变化的事实。这一观点在建立宏观经济学模型方面领先于“卢卡斯评论(Lucas Critique)”。

里昂惕夫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鼓励经济学家应用一种“系统地寻求事实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已被自然科学、历史科学的同行们所利用与接受”(1983)。他还号召经济学家们拓宽知识面——与社会学家、工程师和管理学家共同研究和工作。在这些领域中,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更有价值,这些从业人员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方面具备很高的技能。因此这些其他学科可以教会经济学家许多有关数据收集和理论检验的用途和重要性方面的知识。

当时其他人对经济学家的日常实践也提出了类似的批

评,但是没有一个人有里昂惕夫这样的声望和多年的经验主义经济学的广泛经历。不幸的是,这些评论在经济学界无人理会。更糟的是,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来自这样一位有威望的人物的一系列批评。

贯穿里昂惕夫所有研究的一个统一主题是,经济学应该是一个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科学,应致力于通过运用分析性工具分析实际数据来收集数据和解决问题。投入—产出分析就是阐明经济运行的实际方式,并以此来改善经济运行。里昂惕夫对方法论的抱怨就是经济学家们如今再也不这样做了

参 考 文 献

里昂惕夫的著作:

“Implicit Theorizing: A Methodological Criticism of the Neo-Cambridge Schoo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1, 1 (1937), pp. 337 - 51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919 - 1929: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Equilibrium Analy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Wages, Profits, and Pric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1, 1 (1946), pp. 26 - 39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Disarmament,” *Scientific*

- American*, 204, 4 (1961), pp. 47 - 55 with M. Hoffenberg
- "The Economic Impact-Industrial and Regional—of an Arms Cut,"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7, 3 (1965), pp. 217 - 41, with others
-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Nonobservable F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March 1971), pp. 1 - 7
-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Foreword" in *Why Economics Is Not Yet A Science*, ed. Alfred Eichner, Armonk, M.E. Sharpe, 1983, pp. vi - xi
- Input-Output Economics* (1966), 2nd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涉及里昂惕夫的著作：

- Cave, Martin, "Wassily Leontief: Input-Output and Economic Planning" in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ed. J. R. Shakleton and G. Locksley, New York, Wiley 1981, pp. 160 - 82
- Dorfman, Robert, "Wassily Leontief'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1977), pp. 430 - 49
- Marshall, James N., "Wassily Leontief 1973," in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ed. Bernard S. Katz,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89, pp. 160 - 73

其他参考文献：

Mayer, Thomas, *Truth versus Precision in Economics*,
Hants, Edward Elgar, 1993

尼古拉斯·卡尔多 NICHOLAS KALDOR

(1908—1986)

在尼古拉斯·卡尔多的生涯中,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设计政策以改善经济运行情况上。他主张对消费征税而不是对收入征税。税收会有利于并刺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卡尔多反对用反向的紧缩政策的方式来抑制通货膨胀,他主张控制工资—物价螺旋形上涨的政策,以避免这种上涨引发通胀压力。

卡尔多 1908 年生于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他的父亲是一位刑事律师和法律顾问。他的母亲来自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卡尔多就是在这么一个相当富裕的环境中成长的,并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他上的高中是布达佩斯以苏格拉底教学方式而闻名的模范中学。

尽管卡尔多的父亲希望他学习法律,他还是开始着迷于经济学。这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对政治的兴趣,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脉休假期间亲眼目睹的德国 1923 年的高通货膨胀深深地吸引了他。

1925 年,卡尔多考入柏林大学。两年后,他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师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30 年,卡尔多毕业后就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但于 1947 年离开了学校担任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研究与计划部的主任。1949 年,卡尔多又回到了学

术界,在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任职,成为凯恩斯的追随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卡尔多一直担任英国和外国政府的顾问。他还是1964—1968年以及1974—1976年两个阶段的英国财政大臣的特别顾问。

当卡尔多开始在剑桥大学授课的时候,他改变了他早期的观点,从关注经济学理论转为关注经济政策。他摒弃了他早期的观点,不再认为政府放任经济才能实现最佳经济运行,而采纳了更加激进主义的政策取向。特别是他又设计了几个税收政策以改善整体经济运行。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尔多提倡积极的政府干预来控制通货膨胀。

1951年,卡尔多任职于关于收益与所得税的皇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检查英国的税收体系并提出改进建议。在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卡尔多站在反对派的一边,他反对委员会的主要建议,并写了一份冗长的代表少数派的报告。这份报告后来被拓展成为一本书(卡尔多,1955)。该书提出了一个基本方案,即对消费征税而不对收入征税。在整个50年代,卡尔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推广征收消费支出税(对印度、斯里兰卡、圭亚那、土耳其、伊朗、委内瑞拉和加纳等国政府提出了建议)。

卡尔多反对所得税有几个理由。第一,收入无法充分衡量一个人的纳税能力。引证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如只有当财产变卖后,获得的资本收益才会被征税,未变现的收益却没有被征所得税。结果,财产所得就逃了税,而且征所得税对于富人来说是太温和了。并且,越富裕的人继承的财产越多,不需要去赚取额外的收入,对收入征税实际上就是允许这些人逃税。

第二,卡尔多提到了征收所得税的严重经济缺陷。因为利息与利润要纳税,对收入征税就抑制了储蓄和投资,而获取收入却需要储蓄和投资;另外,由于成功的冒险所获得的收益却被课以相当高的税率,因此所得税制抑制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为了矫正这些问题,卡尔多将所得税改为消费支出税。人们应该将消费支出税看成是在应纳税收入中扣除全部新增储蓄后的所得税。新增储蓄可以很容易用证券投资组合和银行存款余额来计算。如果一个家庭不储蓄,或是用它的财产来支付当前的消费,那么这个家庭当年就要用他的负储蓄去缴税(用来消费)。这种“新增储蓄”的税收扣除就允许了每年的储蓄可以免税,而只有支出才要纳税。当然,储蓄的税收扣除会引起税收的减少(除非税率提高)。而且,为了维持所得税的累进税性质,尽管富裕的家庭获得了高额储蓄的扣除,仍将因高消费而被课以高税率。卡尔多(1955)建议消费支出税的最高税率可设置在100%以上,可能高达300%。

从所得税转为消费支出税最大的益处在于鼓励了储蓄。人们可能会扩大储蓄,因为储蓄不用纳税而消费却要缴纳很高的税。储蓄的增长会带来技术的改进、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更多的收入,甚至是更多的储蓄和投资。

虽然卡尔多曾任两届英国工党政府和几个发展中国家的顾问,却没有什么国家采用他的税收政策。英国从未采用过消费支出税,发展中国家也不拥护这个提议。卡尔多曾说服了印度和斯里兰卡两个国家采用他的税收政策,终因两国发生了暴动来反对消费支出税,执行了不久又都放弃了。

在这些失败以后,卡尔多又提出了新的税收政策。他

建议,构建的税收政策应该帮助特定的产业和特定的经济部门。

卡尔多提倡发展英国的生产性经济部门,这一观点要回溯到魁奈时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经济部门的划分,卡尔多(1981)非常强调将规模收益递增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贡献因素。收益递增就意味着当工厂生产出更多的某种商品时,每个工人的生产率也更高。提高了的生产率既刺激了国内经济的扩张,又加剧了全球经济的竞争。

卡尔多(1967)确信规模收益递增支配着制造业。他的观点源于他研究不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时所观察到的三条经验性的规律。第一,卡尔多发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 12 个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制造业产出增长之间有着很高的关联度。他认为总增长率是依赖于制造业的增长率的(反之亦然),而且这可以用工业活动中的规模收益递增来解释。

第二,卡尔多发现了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与制造业产出的增长之间有较高的关联度。他认为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依赖于制造业产出的增长。当人们需要更多的制成品时,制造这些产品的工厂就要扩大生产。由于规模经济的影响,随着对制成品需求的增加,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会加速,而成本则会随之下降。

第三;卡尔多还认为一个国家制造业产出的增长与该国内其他经济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是相关的。他提出,制造业增长的同时,它很容易吸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结果,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就相应地提高了。另外,“工业化加速的不仅仅是某一个部门的技术变革,而是整个经济

的技术变革”。因此,所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都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也都提高了。

根据以上因素,卡尔多推论出经济的增长首先依赖于制造业部门的增长。制造业的健康与繁荣意味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卡尔多从该分析中得出的政策结论就是政府必须支持国内的制造业。政府可以通过直接购买制造业的产品、给制造业以税收优惠、放松管制以及其他的激励和援助措施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

从这些分析中得出的一个独特的政策建议即选择性的就业税(employment tax)。卡尔多提议,服务行业的厂商应当按他们雇佣工人的数目来征税。这样将鼓励规模收益递增的制造业的就业,并抑制制造业以外的就业。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卡尔多改变了他关注的焦点和在政策上的努力,但是他必须先与日益盛行的货币主义论战。

现代货币主义(monetarism)(参见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是造成高价格的原因,要控制通货膨胀的方式就是要保证货币供给的速度每年以一个稳定的、较慢的速率——3%~5%的比例增长,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产出也是年复一年地以这一比率增长的。

卡尔多 1982 年提出了反对货币主义的几个观点。首先,他指出根据交易方程 $MV = PQ$ (参见费雪),当货币流通的速率(V)恒定时,货币越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越严重。卡尔多认为货币流通的速率不可能是不变的,并提出了相当经验主义的证据来阐述货币流通速率是如何随着时间变化的,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货币流通速率是如何不同的。

其次,卡尔多认为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的方向与货币主义者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的。卡尔多认为是经济活动的增加或者价格的上涨引起了货币供给的增加。在现代经济中,当银行贷款出去时,货币就产生了。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张,厂商和个人都希望借款。正是这种借款行为引起了货币供给的增加。相反,当经济活动速度放慢时,借款的需求就变小。当银行不再贷出新的款项时,货币的供给就不会再增加。

最后,卡尔多认为货币增长的放慢会造成过多的失业。他反对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喋喋不休地讨论通货膨胀,他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定义为价格水平的普遍上涨,即使对货币主义者自身而言,通货膨胀的代价相对来说也几乎不存在。当所有的价格与所有的收入都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时,经济所付出的代价是不重要的,这个代价实质上是时间代价和必须涨价的代价(这些成本有时被称为“菜单变化成本”menu change costs)。另一方面,失业的产生使那些没有工作的人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像货币主义者这样,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中微不足道的代价就主张失业,很显然是一种拙劣的政策措施。

卡尔多在抛弃了用紧缩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观点后,于1982年提出了用收入政策来替代当前的工资谈判体系。卡尔多指出,通货膨胀不是由于货币太多造成的,而是成本与价格无休止地螺旋形互相推动的结果。工人们会要求涨工资以应付目前的高价格,但是工资越高意味着厂商的成本越高,这种升高的成本又以价格上涨的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于是又开始了另一轮循环。

要停止这种螺旋形的通货膨胀,卡尔多建议政府介入工资谈判过程。可以通过冻结所有的工资和价格,也可以让劳资双方坐在一起,共同努力控制通货膨胀。例如,如果劳方同意自己的工资增长率与生产率的提高相一致(这样就不会增加成本),则厂商应当承诺不再涨价。

卡尔多通过采用经济激励形成了改善市场体系的政策建议,这为他自己树立了声望。如果储蓄对经济有益而消费支出对经济不利,那么就对消费支出罚征更高的税收。同样,如果制造业的生产促进经济的高增长,而大量的服务行业只会延缓经济增长,那么政府就应当对后者征税而对前者实行税收优惠。这种注重发展经济政策以改善经济产出的思想使得卡尔多(与琼·罗宾逊一道)成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学派的奠基人之一。

参 考 文 献

卡尔多的著作:

An Expenditure Tax, London, Allen & Unwin, 1955

Causes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Reprinted in Kaldor 1960 - 80, Vol. 5, pp. 100 - 38

Strategic Facto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thaca, New York State School of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1967

“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82 (December 1972), pp. 1,237 - 55

“The Role of Increasing Returns, Technical Progress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e Appliquée*, 34, 4 (1981), pp. 593 - 617

The Scourge of Monetar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conomics without Equilibrium,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5

“The Economics of the Selective Employment Tax,” in *Collected Economic Essays*, Vol. 7, pp. 200 - 29

Collected Economic Essays, 8 vol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60 - 80

涉及卡尔多的著作：

Blaug, Mark, “Nicholas Kaldor 1908 - 86,” in *Pioneers of Modern Economics in Britain*, Vol. 2, ed. David Greenway and John R. Presle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pp. 68 - 95

Pressman, Steven, “The Feasibility of An Expenditure Tax,”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2, 8 (1995), pp. 3 - 15

Thirlwall, Anthony P., “A Plain Man's Guide to Kaldor's Growth Law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5, 3 (Spring 1983), pp. 345 - 58

Thirlwall, Anthony P. , *Nicholas Kaldor*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987

Turner, Marjorie S. *Nicholas Kaldor and the Real World* ,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理论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加尔布雷斯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太过吹毛求疵,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他批判经济学理论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并认为传统的理论忽视了大公司所积聚的经济权力。他还批评了政治家们屈服于大公司的权力而不为公众争取利益。此外,他还批评与他共事的经济学家们只是白痴专家,他们只会进行数理分析却根本不去理解现实的经济社会。积极的一面在于加尔布雷斯强调了如果我们要理解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必须将权力间的关系引入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

加尔布雷斯 1908 年出生于伊利湖北岸的一个名叫艾奥那的小镇,成长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加尔布雷斯很遗憾他的学习常因为农场的工作而中断,学习成绩并不突出。

1926 年,加尔布雷斯考入安大略农业学院学习农业经济学,接着在伯克利念完了农业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加利福尼亚各县的支出,“论文毫无特色,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学位”。

加尔布雷斯获得学位后,在哈佛大学接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虽然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追求他在政治上的兴趣,

但他余下的学术生涯却一直是在哈佛度过的。1941年,他成为价格管理办公室的副主管。直到1943年,加尔布雷斯一直控制着大多数美国商品的价格。在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加尔布雷斯在政坛上特别活跃。他是阿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竞选活动中的顾问和演讲稿的撰写人。1961—1963年,加尔布雷斯被任命为驻印度的大使。1968年,他为安格尼·麦卡锡(Engene McCarthy)参议员的总统竞选工作。1972年他又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参议员的总统竞选工作。

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著作主要关注的就是经济权力。加尔布雷斯描述了厂商获得经济权力的趋势,获得经济权力后的结果,以及通过政府干预来反对商业利益的权力和强调公众利益的必要性。

加尔布雷斯(1967)提出道,美国经济的工业部门根本不像经济学课本上所描绘的那样。我们并没有容纳数量众多的、受公众意愿支配的厂商的完全竞争市场,相反,我们有的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和控制着市场的大厂商。这些大型的垄断厂商并不试图使他们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是想方设法地使市场更可靠,更可预测。

大厂商制定计划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进行规划,因为市场和竞争的压力对它们来说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投资于新技术是很昂贵的,因此厂商承担不起投入昂贵的投资费用后生产出来的商品无人需要的风险。因此为了兴旺发达,厂商们必须随时随地的消除市场的压力,他们必须设法控制市场而不是被市场所控制。

大公司可以用好几种方法规避市场的压力。通过纵向联

合收购供应商与销售渠道；通过开发许多不同的产品，公司能够吸纳消费者口味的剧烈变化或消费者对特殊商品的嫌恶；或通过花钱做广告来左右消费者的口味。最后，还可以在生产商与供应商之间签定长期合同以消除短期市场波动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假定厂商是由所有者经营的。加尔布雷斯认为这种观念太陈旧了。他认为生产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以供我们购买的厂商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这些经理人是公司决策的制定者，加尔布雷斯称他们为“技术结构”。这就是公司权力所在。由于现代大厂商的重要决策需要许多人的科技知识，这些职业经理人就从所有者那儿篡夺了决策权。一个人不可能熟悉工程、采购、质量控制、劳资关系、营销等经商所必需的所有方面的问题。在集体决策和技术专家变得更为重要时，权力就从单个的所有者那儿移向了经营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团体。

与那些已在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获取既得利益的所有者不同，职业经理人从最大化的利润中几乎得不到什么。相反，这些技术结构成员所渴望的是生存、增长及技艺精湛。生存意味着决策制定者获得能够维持独立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增长避免了将解雇技术结构成员作为节约成本的措施，增长还满足了技术结构的心理需要——在知名的大公司就职的声誉。最后，技艺精湛意味着技术结构有更多的工作和晋升机会。

加尔布雷斯在 1958 年还检验了大公司拥有的权力对消费者的影响。他抨击了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的学说，该学说认为消费者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厂商生产商品是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加尔布雷斯辩驳说,这与现实社会中一直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常识相违背。需求并非源于消费者,而是厂商通过广告为消费者策划出来的。大厂商就是这样对消费者的支出施加了权力影响。

如果由消费者自己决定他们需要什么特定的商品,这将会指明厂商应首先生产什么。但是由于需求是被策划的,于是就无所谓厂商首先必须生产什么。公共商品可能同样重要。而且厂商生产的许多商品可能是微不足道或根本不重要的。甚至是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法则也指出,当我们消费越来越多的私人部门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时,我们从每一个额外的商品中得到的满足会越来越少。

多年来偏重私人产品的生产而忽略公共商品的供给,已造成了一个个人富裕而社会贫穷的情形,下面这段被广泛援引的文字描述了这种反差(加尔布雷斯,1958):

“一家人驾驶着装备了空调、动力转向、动力刹车的淡紫色小汽车出外旅游。汽车驶过路面很差的城市,大家都对城市里乱糟糟的被毁坏的建筑物、告示牌以及很久以前就该被埋入地下的电线接线桩感到讨厌极了……他们在一条被污染了的小溪旁从一个轻便的冷冻盒中拿出包装精美的野餐食物;晚上他们是在一个对公众健康和道德品质有威胁的公园度过的。在尼龙帐篷的下方是臭气熏天的腐烂的垃圾,在他们躺在气垫上睡觉前,迷迷糊糊地祈祷着这奇怪的不平坦消失。”

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商品,当然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有更高的税收。资金必须从购买不太

需要的商品的私人手中流向可以造福于公众的公共金库。

加尔布雷斯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说上批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权力关系。经济学研究通过否认权力的存在以及假设市场会缓和公司权力,对权力避而不谈。然而,现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战争、不平等以及环境败坏——都源于渴望增长和利润的公司与关注经济保障、环境和军备竞赛的公众之间的权力斗争。加尔布雷斯认为,由于忽视了这些权力斗争,经济学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当两个互相竞争的权力之间产生了重大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冲突时,国家就获得了一个额外的功能。国家为了反对大公司的权力必须站在公共目标的一边。这个论题后来在《经济学与公共目标》(*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该书中,加尔布雷斯试图证明:美国经济已经分成了两部分。大厂商——加尔布雷斯称之为“计划体系”的那部分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权力。他们有权控制价格,他们有塑造舆论的财力。大公司做广告可以与私人经济部分生产商品的满足感相提并论。广告还能劝说公众相信环境危害是虚构的,甚至是良性的或者正在被消除。最后,大公司甚至能影响政治进程以对自己有利。

相反,小厂商受制于市场的指令,他们没有经济权力,也无力左右舆论或政治的进程。相对于计划体系,他们处于一个竞争的劣势。结果是不平等的经济发展——计划体系产生太多的商品而市场体系生产的商品却不充足。

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观点,计划体系与市场体系之间的权力必须更加平等,收入应该从计划体系重新分配至市场体系。价格控制、最低工资法、最低收入保障、保护性关税以及扶持

小公司都是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

长期以来,加尔布雷斯(1952b)都支持要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控制工资与价格水平的观点。控制是必要的,因为通货膨胀根本上是由于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价格产生的压力以及较高的价格水平对收入的压力所引发的。只有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阻止工会的市场权力和大公司的市场权力产生通货膨胀。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最有效的分配商品和服务的方式是由市场自由地去设定价格和工资。从这种观点看,政府管理的价格和干预劳动力市场会错误地配置资源。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认为,控制仅仅是产生了一个无用的官僚机构去监督遵守情况,这将会需要商品定量配给。相反,“价格控制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认为垄断性的厂商不会接受市场设定的价格。垄断经济部门的厂商是价格的制定者而不是价格的接受者,“确定已经固定的价格相对要容易些。”(加尔布雷斯,1952)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存在着一条强大的惯例要素,价格通常是由生产成本加成定价法(mark-up pricing)设定的。而且,成本加成自身也是约定俗成的,政府控制价格试图改变惯例,于是就得到了更加令人满意的结果——较低的通货膨胀,监督价格控制也就更容易了。根据加尔布雷斯的观点,需要控制价格的仅仅存在于垄断经济部门,因为只有这些部门才具备市场权力。结果,就只有一千家左右的厂商需要被监督。大的垄断性厂商全都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这一事实有助于价格控制的实行。

在加尔布雷斯的著作中明确了几个主题:第一,大厂商

拥有相当大的经济权力,他们以此来支配现代经济;第二,这种权力刺激了技术进步,并对经济福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于是,最好是抵消大厂商的权力而不是拆散大厂商去消除权力。政府必须通过扶持工会和有竞争力的小厂商,在私有经济部门发展抵消性的权力。最后,政府本身应通过提供充足的公共商品、保护环境、反对军备竞赛、保障就业、给所有的工人以象样的收入以及控制价格等方式来抵消大公司的权力。

加尔布雷斯并不是经济学家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加尔布雷斯根本算不上经济学家,但是他的著作对于让人们关注到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到政府政策在控制这种权力上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参 考 文 献

加尔布雷斯的著作:

American Capitalism,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1952a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b

The Great Crash 1929,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1954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1958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7

Ambassador's Journal,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9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3

A Life in Our Tim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1

涉及加尔布雷斯的著作：

Hession, Charles,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His Critic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2

Reisman, David, *Galbraith and Market Capit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Sharpe, M. E., *John Kenneth Galbraith and the Lower Economics*, White Plains,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3

Stanfield, James 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1912—)

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有两个主题,即货币是重要的,自由也是重要的。说货币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只有货币供给的变化才能影响经济活动,还因为在经济领域中的货币过量会导致通货膨胀。自由是重要的是因为当政府不试图控制物价、汇率、行业进入壁垒时经济会运转得更好,而且自由本身作为目标也是重要的。

弗里德曼 1912 年出生于纽约市布鲁克林一个贫穷的犹太移民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奥匈帝国的移民。他出生后不久,他的父母移居到新泽西州的罗韦,弗里德曼在那儿长大。在罗韦中学,弗里德曼喜爱上了数学并打算将来成为保险精算师。但当他上了罗格斯大学(当时是一所小型私立学校,现在是新泽西州一所大型州立大学)后,他又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决定选经济学与数学两个科目作为主攻专业。

1933 年拿到学士学位后,弗里德曼去了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然而,第二年,他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份慷慨的奖学金,就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弗里德曼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之后,又回到了芝加哥大学,给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当研究助手。之后他到华盛顿工作,先是为罗斯福的新政政府做消费统计工作,然后为国家经

济研究所工作。在国家经济研究所时,弗里德曼与西蒙·库兹涅茨一道研究了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生、会计师的市场。这项研究最后成了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并写成了一本书。这项研究有一个发现,即医生的薪水高是因为医生这个行业的进入条件很高,因而减少了当医生的人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争议性,该书的出版也因之被延缓。

在明尼苏达州短期教学后,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46年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他与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一道,发展了芝加哥经济学派。1966—1984年的《新闻周刊》(Newsweek)的固定专栏文章(其中一部分收录在弗里德曼1975年出版的书里)、一本畅销的经济学著作(1962)和一部十集的电视系列片(1980)使米尔顿·弗里德曼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逾30年不衰。

1967年弗里德曼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并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委员会特别提到弗里德曼的研究中突出的三个方面:对消费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的研究;对施行稳定政策遇到的困难与问题的辩论以及对货币理论与历史的贡献。弗里德曼1977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退休后成为加利福尼亚州胡佛学院的高级学者。

在经济学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以他对凯恩斯主义革命的讨伐而著名。这包括反对运用稳定政策去控制通货膨胀或失业。米尔顿·弗里德曼出于众多原因坚持认为财政政策不会起作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将会恶化经济周期,并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关于消费函数、经济领域中货币的作用和自然失业率的研究都对反驳凯恩斯及其追随者主张政府

干预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些研究也支持了他自己的经济观点,即没有外部经济政策制订者的影响,消费函数会最佳。

凯恩斯勾画的消费理论很简单,认为消费者支出主要受当前收入的影响。而弗里德曼提出了另一理论——永久性收入假说,他认为消费者根据长期的预期收入来指导自己的消费支出。弗里德曼 1957 年以大量的实际经验来支持这一假说。这一假说本身使得弗里德曼解决了大量源于简单的凯恩斯主义消费函数理论的难题。简单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一个涵义就是当收入增加时,收入的消费部分会下降而储蓄部分会上升。库兹涅茨为美国开展的关于收入、消费和储蓄的研究证明这点并不正确。尽管过去几十年美国收入有了大幅增长,但储蓄仍停留在同一水平上。

意识到消费支出依赖于未来的预期收入有助于解释上述现象。人们收入一旦增长,就可能期望未来会有更高的收入增长。结果,人们就不必为未来的消费储蓄更多的钱。

永久性收入假说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团体,比如小业主有时会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又会降低储蓄。如果储蓄依赖于当前收入这一点就不会发生,但当实际支出依赖于多年的平均收入时,这点倒是很有可能会发生。

更进一步,永久性收入假说具备的政策涵义与凯恩斯的政策良剂相矛盾,凯恩斯提倡在经济萧条时期用财政政策扩大支出、增加就业。但是,如果政府增加了工资却并未带来人们支出的增加(因为人们认为收入的增长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那么财政政策就没起到什么经济作用。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偏重财政政策相反,弗里德曼(1962,1963)认为货币及货币政策在决定经济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他关于货币重要性的论证源于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MV = PQ$), M 指经济中货币的数量, V 指一年中每一美元用于购物的次数, M 乘以 V 必须等于售出的经济产出(PQ)。

与古典货币理论家认为货币周转率由公共机构决定的观点(参见费雪)相对照,弗里德曼承认货币周转率依赖于经济因素,比如利率及预期通货膨胀。而且,弗里德曼意识到人们想持有货币而不用于购物是有理由的,那就是,为了安全或者他们认为证券价格及其他资产的价格可能降低。然而,弗里德曼1963年开展的经验性研究发现,这些经济因素对周转率只有很小的影响,而且它们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弱。如果货币周转率保持相对稳定,那么货币的数量就对经济活动的水平起着主要的影响作用。

再进一步讲,弗里德曼认为尽管货币可能在短期内影响经济活动,从长远看货币必须适中,而且对经济没有影响。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措施将滞后6~9个月才会影响产出水平。但在此之后的6~9个月,货币只能影响价格。这样的话,货币供给增长12~18个月后,价格才上升,通货膨胀才将成为一个问题。经济学家们虽然历来将成本推进通货膨胀及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区分开来,但弗里德曼认为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源于对商品的过量需求,而且货币发行量越大需求也越大。

因为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仅仅是个货币现象,所以通货膨胀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必须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弗里德曼建议中央银行每年增加3~5个

百分点的货币供给量,这是美国经济的正常增长率。这足够提供购买增加的商品所需的货币,但货币量又不至于多到引起通货膨胀的地步。

弗里德曼(1963,1992)指出,是货币发行机构错误安排了货币供给量导致了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其他不希望有的结果。他指责联邦储备银行造成了经济大萧条,指出他们是怎样因为害怕证券市场投机先是紧缩货币供给,之后在1930~1931年间当储户都奔向银行提钱时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最后,当英国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时又提高了利率。所有这些行为导致美国货币供给急剧下降,支出减少,大萧条由此产生。因为中央银行不能让人相信会实施正确的政策,弗里德曼认为中央银行应被强制遵循货币规则而不是允许对货币供给继续作出错误的安排。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经常失灵是因为在现行经济问题和任何货币供给变化切实影响经济之间存在着一个较长的和可变的时滞。弗里德曼(1953)指出三种这样的时滞问题:中央银行认识到经济问题的存在需要时间;切实改变货币供给需要时间;货币供给改变对经济产生效果也需要时间。由于这些时间上的滞后,货币政策就不太可能发挥很大作用,也不可能是一种正确的政策,因为任何政策开始影响经济的时候,原先存在的问题可能已不复存在了。

弗里德曼(1962)指出货币机构会受到财政机构和国家财政部的过度影响。中央银行的主管都由政府首脑任命并由立法机构通过。一旦政府官员想扩大货币供给、拉动经济增长,中央银行肯定要受到政治压力,这样,解决办法就是束缚中央银行家的手脚,强迫他们让货币供给每年增长3~5个百

分点。

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是弗里德曼1968年在美国经济学会的就职演说中介绍的思想。他认为经济领域中存在均衡失业率,一个人并不总是有工作。总有一些人的工作处于不断变换之中,而新的劳动力大军并不是立刻就会找到工作。弗里德曼提出均衡或自然失业率应取决于让某些人没有工作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劳动力的不同结构特征。比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及制定其他能允许人们花费较长时间找到工作的社会计划。如果配偶有工作,可以允许人们有较长的时间去找工作。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任何企图将失业率降低至自然失业率或均衡失业率以下的做法都会很快加剧通货膨胀。但随着物价上涨,人们的支出额会减少。当支出下降时,生产和就业也会下降。这样最终会导致经济紧缩而回到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率的假定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提出了挑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一个平衡,或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参见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认为从长远看不存在这样的平衡。试图降低失业率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而失业率总归会回到自然失业率的,因此从长期看,在自然失业率下菲利普斯曲线是根直线。政策制定者想要一直降低失业的话几乎是束手无策;不仅不能降低失业率,而且还会加剧通货膨胀。

更进一步,弗里德曼(1977)坚信更高的通货膨胀会导致通货膨胀率更大的不稳定性,从而导致更大的经济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样会导致更高的自然失业率。因此,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仅不存在平衡,而且两者有可能朝一个方向移动,

既达不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降低失业率的目的,又加剧了通货膨胀,甚至与他们意愿相反会增加失业。弗里德曼因此强烈指责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stagflation),并指出这一滞胀源于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经济政策的一些错误观点。

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弗里德曼都以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正统学说为己任。凯恩斯热衷于固定汇率体系甚过浮动利率体系,在他的帮助下,固定利率体系得以在二战后建成。而弗里德曼相反,他(1953,1967)坚持浮动汇率在有些场合下优于固定汇率。首先,由于汇率固定,国家必须运用货币政策以使货币保持在固定汇率上。中央银行将被迫创造过量的货币,用于购买外币保持固定汇率。相反,浮动汇率使得货币当局可以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政策而不必担心本币的币值。

其次,弗里德曼坚持浮动汇率可以促进国际贸易。若汇率固定,国家通常会采取贸易限制来解决贸易中的问题;而在实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一旦贸易出现赤字,汇率会自动调整。

最后,浮动汇率可以避免将通货膨胀出口到其他国家。在固定汇率体系下,正遭受通货膨胀的国家会购买更多的外国制造的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更便宜,这样会增加其他国家的商品消费支出从而引起其他国家更大的通货膨胀。而在浮动汇率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遭受通货膨胀的国家会感到本国货币贬值,以及外国商品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国内商品便宜。

弗里德曼不仅对宏观经济学做出了许多贡献,他对经济学还有其他的重要贡献。他参与了经济学史上方法论的或者

说哲学的两次主要争论中的一次(关于另一次方法论争论的详细资料见门格尔)。对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常见批评是他们在研究经济时总是做些不切实际的假定。关于经济学家有个有趣的笑话,讲有几个专家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们有很多听装食物,可就是打不开。当所有其他被困的人都无法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打开这些罐子时,经济学家勇敢地站出来解围,宣称:“假设我们有个开瓶器。”

在一篇有争论的文章中,弗里德曼(1953)捍卫了这种方法论,他坚信假设的现实性在科学分析中并不重要。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所有的理论都陷于抽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理论的所有假设都是不现实的。唯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的内涵是否正确,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是否起作用,是否能做出好的预测。如果理论有数据支持,那么理论的假设是否完全精确就不重要了。另一方面,如果数据不能支持理论,那么即使理论用了现实的假设也要被抛弃。尽管许多经济学家都反对这一见解,博兰(Boland, 1979)还是劝说人们相信弗里德曼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理论应该是工具,只要经济假设能发挥作用并有助于预测经济运行情况,那么这种假设也可以是不现实的。

如前所述,弗里德曼的著作不仅仅针对他的同行们,而且他还为广大读者写下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坚决支持了经济中的个体自由,反对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弗里德曼(1963, 1979)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可以推进政治自由,因为市场可以抵消政治势力。

弗里德曼较流行的作品都有一个清晰的政策观点。他反对所有的对个体决策有强迫意味的政府计划。弗里德曼

(1975)反对工资及价格控制,反对最低工资法,反对社会保障(因为这将使家庭的纽带崩溃而且事实上将财富从不太富有的人转移到富有的人身上,而富人可能活得更长因此获益更多),反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因为这些钱首先使富有的人受益)。另一方面,他支持完全志愿的军队(1975),他提倡所有的父母都有权选择将来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哪所学校(1979)。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试图跨越两个不同领域的少有的经济学家。一方面,他在经济学领域被视为巨匠,是 20 世纪少数几个最常被提到的,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强调货币的重要性和市场在改善经济福利方面的重要性。同时,弗里德曼还为公众写了多篇著作,强调个体决策及自由的重要性,这也使弗里德曼成为 20 世纪后期少数几个最知名的及最被承认的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弗里德曼的著作:

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6, with Simon Kuznets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a

"Should There Be an Independent Monetary Authority," in *In Search of A Monetary Constitution*, ed. Leland B. Yeag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b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with Anna J. Schwartz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Free Versus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67, with Robert V. Roosa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968), pp. 4 - 17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1975. Reprinted and updated as *Bright Promises, Dismal Performance: An Economist's Protest*, San Diego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Nobel Lecture: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1977), pp. 451 - 72

Free to Choose, New York, Avon, 1980, with Rose Friedman
Tyranny of the Status, New York, San Diego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4, with Rose Friedman

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 New York,

San Diego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涉及弗里德曼的著作：

Burton, John, "Positively Milton Friedman," in J. R. Shackleton and G. Locksley (eds.)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London, Macmillan, 1981, pp. 53 - 69

Butler, Eamonn, *Milton Friedman: A Guide to His Economic Thought*,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85

Hirsch, Abraham and de Marchi, Neil, *Milton Friedman: Econom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Walters, Alan, "Milton Friedman,"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ed.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New York, Stockton Press, 1987, pp. 422 - 7

其他参考文献：

Boland, Lawrence A., "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7 (June 1979), pp. 503 - 22

Reder, Melvin W., "Chicago Economics: Performance and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s Literature*, 20, 1 (March 1982), pp. 1 - 38

保罗·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1915—)

保罗·萨缪尔森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在 20 世纪后期,对经济学的数理性研究方面无人能与萨缪尔森匹敌。通过编著一本非常成功的普及性经济学教科书(1947),萨缪尔森为自己赢得了名声,也赚了很多钱。再者,萨缪尔森实际上对经济的每一个领域都作了著述。对于一个精确度如此之高的人来说,这样的广度在经济学界是非常突出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萨缪尔森 1915 年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不久,他家就搬到了芝加哥,萨缪尔森是在芝加哥公立学校接受的教育,后来考入了芝加哥大学。他本来打算主修数学专业,但他听了一门经济学课程后,立即就意识到数学可以革新经济学。

萨缪尔森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奖学金,因而解决了接受研究生教育所需的学费,可他还得付出一个代价:根据奖学金的发放规则,他不能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于是萨缪尔森选择了去哈佛继续学业,1941 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被大多数经济学家看作是为现代经济学奠定了数学基础。

萨缪尔森喜欢哈佛,希望学校能给他一份全职的教师工作,但未能如愿。为了留在坎布里奇,萨缪尔森接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工作,并在那儿度过了他全部的职业生涯,32

岁时就被聘为全职教授。1947年,萨缪尔森荣获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第一枚贝茨·克拉克奖章,该奖项是每年奖给40岁以下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1951年,萨缪尔森担任了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1961年,他任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1970年,萨缪尔森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萨缪尔森所有的专业研究中,他都试图去为经济学思想提供数学支撑,并坚信没有数学形式的经济学理论是不系统的,也是不明晰的。萨缪尔森和马歇尔不一样,马歇尔认为将平铺直叙的文章转化成数学方程是浪费时间,而萨缪尔森却认为将数学方程转换成平铺直叙的文章才是浪费时间。对萨缪尔森来说,数学形式能使模型的本质及论证更加明确,并能证实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由于萨缪尔森的影响,对研究生的经济学指导逐渐使用线性代数和微分、积分这些工具和技巧,经济学家们之间的沟通也逐渐数学化了。

然而,萨缪尔森并不支持“为了严密而严密”或“为了形式而形式”。他把数学看成是工具,用数学方法阐述论点和证明那些能够被经验所证实的经济学理论。

战后几年,在萨缪尔森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之间发生了关于经济学理论的相关性和可验证性的方法论的争论。弗里德曼(1953)认为经济学假设的真实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这些假设所得到的预测是否正确。萨缪尔森(1963)反驳道,实际上不准确的假设在科学上是不可能有价值的。他还表明,在假设和预测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晰;什么当作假设,什么当作是某一假设的结果是非常随意的。弗里德曼所提出的不现实的假设可以被看作是从一组不同的假设中推导出的不现实的或是错误的预测。最后,萨缪尔森指出,根据逻辑的原

理,正确的前提只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错误的前提却能得到两种结论——正确的或错误的结论。而经济学想要的却是正确的结论。

虽然这场方法论的争论看起来有点抽象,但他们也争论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弗里德曼多年来都是使用完全竞争经济学模型论证没有政府干预会产生最佳的经济结果。而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追随者,他提倡通过更多的政府干预改善经济结果。因此,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之争不仅涉及如何研究经济学,而且还涉及了运用政府政策改善经济运行情况的合理性。为了捍卫完全竞争假设,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干预;而为了论证经济假设必须是现实的,萨缪尔森接纳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政策。

萨缪尔森五卷本的《科学论文集》(*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包括50年间撰写的388篇论文,实际上涵盖了经济学的每一个主题。这些论文包括了许多经济学上的重大进步。在萨缪尔森的丰硕成果中,有三个领域的成就最为突出——消费者选择、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关于消费者选择的研究试图使微观经济学的假设经验化和可验证,这遵循了他自己的方法论。萨缪尔森从需求理论中剥离出心理内省的范畴,并去除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这种不可验证的假设。他还发现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传统理论是同义重复的。消费者的定义是购买自己最想要的商品的人,因此,无论消费者买什么都将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

因此消费者行为可以根据偏好来解释,而偏好反过来只能由消费者行为来定义,结果很容易陷入循环,而且毫无疑问,在许多描述中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通常结论中除了“人

们像他们的行为那样行为”就再也说不出任何东西了。一个没有经验性涵义的定理,由于它不包括任何假说,且与所有可能想象到的行为相一致,就不会有人去反驳。

为了摆脱这种循环,萨缪尔森 1938 年提出,观察到的消费者支出可用于解释消费者对从不同商品中获得的效用的偏好。这些数据可以用来验证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不同假设。例如,经济学理论表明,消费者的偏好应符合一致性和传递性。试想有一个消费者可以用同样的价格购买三种商品,如果该消费者宁愿买 A 商品而不愿买 B 商品,同时又宁愿买 B 商品而不愿买 C 商品,那么该消费者会宁愿买 A 商品而不买 C 商品。这是可以从经验中去验证的,而且也确实已经证实了。多数验证已经发现消费者的偏好具有一致性和传递性,于是证实了经济学家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假设。

萨缪尔森对经济学作出重要贡献的第二个领域是国际贸易理论。这项工作检验了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贸易的不同的经济结果。萨缪尔森(1948, 1949)指出,即使人们很难移民,即使资金很难周游世界以寻找最高的回报率,自由贸易都会使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的回报更加平等。例如几乎完全是手工制作的薯片,如果美国工人的工资比法国工人的高,法国工人就能在较低的成本下制作薯片,当美国与法国之间存在着自由贸易时,法国的薯片会被出口到美国去,这种增加的需求会提高法国薯片的价格,根据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会提高法国薯片制作工人的工资。相反,美国薯片生产商,面对着国外更激烈的竞争,会被迫降低薯片的价格,减少工人的工资。这样由于自由贸易,法国和美国工人的工资会更加趋于相等。

这就是人们所知道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对于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有着相当重要的政策涵义。这个定理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墨西哥和美国的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相同。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将会提高墨西哥工人的工资,同时降低美国工人的工资。

萨缪尔森—斯托尔珀定理(Samuelson-Stolper theorem)检验了对某些进口货物征收关税的影响。萨缪尔森和斯托尔珀(1941)阐述了关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与被课征关税的外国商品相竞争的本国产业的投入的收益,然而,关税也会减少其他所有人的收益。例如,对进口轿车征收关税会提高进口轿车的价格,这反过来也会提高国产轿车的价格,因为进口价格的提高将刺激对国内轿车需求的增加。在美国,关税的最大的受益者将是那些大量用于轿车制造的生产投入要素。如果轿车的生产是资本密集型的(如相对使用大量机器),业主就会赚钱,而其他所有人因为不得不支付更高的轿车价格而蒙受损失。另一方面,如果轿车的生产要使用大量的熟练工人,那么熟练工人会是关税的受益者,而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

萨缪尔森还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引入了美国,这项工作部分是通过他的普及性经济学教科书完成的,书中向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学生们介绍了凯恩斯的诸如消费函数、乘数(multiplier)和财政政策等概念。萨缪尔森还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向经济学家以外的人们介绍凯恩斯的理论。他还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向他们解释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降低失业的重要性。

当时,在宏观经济学的圈子内有许多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到底哪一个更有效的争论。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经济学家们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才能够影响经济运行状况,他们只是将财政政策看成是让银行创造出更多货币的一种间接的方法。而另一派,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这些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将货币政策描述成一根绳子,无论我们如何用力地拉这根绳子,我们都无法产生更多的工作岗位。萨缪尔森采取了中间立场,他信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能有效地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认为两种政策都可以使经济更稳定。他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采取的形式也采取了中间立场。当加尔布雷斯建议肯尼迪总统增加政府支出,而保守的凯恩斯主义学派坚决要求削减税收时,萨缪尔森则提出既要实行政府的扩张计划,又要进行适当的税收削减。

萨缪尔森也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他自己的贡献。凯恩斯阐述了额外的支出对整体经济会有一个乘数的影响,投资是取决于厂商对未来前景的预期。但是凯恩斯并没有分析在乘数和商业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萨缪尔森发展了“加速器”(accelerator)的概念,以阐明当经济扩张时,商业决策将变得更加乐观,加速或增加投资支出。

萨缪尔森(1939a, 1939b)系统地描述了加速器的概念,并用数学方法推导了乘数和加速器的过程结合起来对经济的影响——乘数扩张了产出,膨胀了的产出又会引起对预期的看好,于是又有更多的投资,接着又进入了新一轮的乘数过程。他还论证了在何种情形下乘数—加速器的影响会引起经济的不稳定(要么是增长太快,要么是由于支出减少,使得企业不愿投资,最终导致经济活动的巨大滑坡)。最后,他从加速器

这一过程得出了一个政策涵义,即由于加速器的影响导致经济更加不稳定,那么为了稳定经济,将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

萨缪尔森和他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一起发展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另一重大贡献。A·W·菲利普斯 1958 年对英国的工资增加和失业作了广泛的研究,发现货币工资的少量增长是与高失业率相关的。反之亦然。萨缪尔森和索洛对这种现象作出了阐述,认为既然工资是成本的主要成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占 60%~70%),成本上升会体现为价格上涨,那么通货膨胀也应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即通货膨胀率越高,失业率越低;通货膨胀率越低,失业率越高。从美国 1933—1958 年的数据来看,萨缪尔森和索洛确实发现了这么一种平衡交替关系,并且出于对菲利普斯的尊敬,将它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

萨缪尔森将菲利普斯曲线看作是鉴别政府官员作出的政策选择的工具。如果关心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会扩张经济;但这将会使经济沿着菲利普斯曲线移动,最终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如果政策制定者关心通货膨胀,他们就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必须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因此,制定一项好的政策就意味着在菲利普斯曲线上选择一个最好的位置,或者说是找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平衡的最佳位置。

正如林贝克(Linbeck, 1970)所述,萨缪尔森在 20 世纪后半叶为专业性的经济学论著“设立了风格”。但是萨缪尔森也作出了许多实质性的技术性贡献,这些贡献实际上遍布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宏观经济学和国际

贸易两个领域。他解释国内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在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时国内经济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样运用经济政策来改善经济运行状况。有很多理由使得萨缪尔森成为 20 世纪后半叶少数几个最著名的和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萨缪尔森的著作:

- “A Note on the Pure Theory of Consumer's Behavior,”
Economica, 5 (February 1938), pp. 61 - 71
-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ultiplier Analysis and the Principle of Acceler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1 (May 1939a), pp. 75 - 8
- “A Synthesis of the Principle of Acceleration and the Multipli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7 (December 1939b), pp. 786 - 97
-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 (November 1941), pp. 58 - 73, with Wolfgang Stolper
- Economics*, 1st edn.,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7a; 15th edn. with William D. Nordhaus and Michael J. Mandel, New York, McGraw Hill, 1995
-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b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qualisation of Factor Prices,”

- Economic Journal*, 58 (June 1948), pp. 163 - 84
-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1958), with Robert Dorfman and Robert Solow
- "Analytical Aspects of Anti-Inflation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0 (May 1960), pp. 177 - 94 with Robert Solow
- "Problems of Methodology-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 (May 1963), pp. 231 - 6
-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5 vol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 - 77

涉及萨缪尔森的著作：

- Breit, William and Ransom, Roger L., "Paul A. Samuelson-Economic Wunderkind as Policy Maker," in *The Academic Scribblers* by W. Breit and R. L. Ranso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p. 111 - 38
- Brown, E. Cary and Solow, Robert M., eds. *Paul Samuelson and Modern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3
- Feiwel, George (ed.) *Samuelson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Boston, Massachusetts, KluwerNijhoff, 1982
- Kendry, Andrian, "Paul Samuelson and the Scientific Awakening of Economics," in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ed. J. R. Shackleton and Gareth Locksley, New York, Wiley, 1981, pp. 219 - 39
- Lindbeck, Assar, "Paul Anthony Samuelson'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2, 4
(December 1970), pp. 342 - 54

其他参考文献:

Caldwell, Bruce, *Beyond Positivism: Economic Method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llen & Unwin, 1982

Friedman, 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p. 3 - 43

Phillips, A. W.,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in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1958), pp. 283 -
300

弗 朗 哥 · 莫 迪 利 亚 尼 FRANCO MODIGLIANI (1918—)

弗朗哥·莫迪利亚尼以他在宏观经济学上的两项创新最为著名。为了解释总的消费者支出,莫迪利亚尼创立了家庭储蓄和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为了解释商业投资,莫迪利亚尼又帮助创建了著名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s)。这些定理阐述了为什么筹集投资资金的公司决策以及偿还投资者的公司决策不会影响到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

莫迪利亚尼 1918 年生于意大利罗马,父母是犹太人。他父亲是一名医生,莫迪利亚尼本来也想继承父业,到罗马大学学习医学,后来意识到自己无法忍受看见鲜血,便决定改学法律。

莫迪利亚尼感到法律课程相当容易,他就通过将德文的经济学文章翻译成意大利文赚些外快。一次他对有关价格控制的全国性论文竞赛产生了兴趣,因为他以前曾经翻译过好几篇这个专题的文章。莫迪利亚尼参加了比赛,他的论文不仅得了第一名,评委还深深地被他的文章所吸引并宣称他将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

1939 年,莫迪利亚尼拿到了他的法学学位后,决定离开意大利。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信仰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存

在冲突。在法国短暂地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他去了美国的新社会研究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攻读社会科学博士课程。这个学院是知识分子逃避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早期的欧洲独裁统治的避难所,后来被称为是“流放大学”。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期间,莫迪利亚尼受到了雅各布·马沙克(Jacob Marschak)的影响,雅各布·马沙克教授了他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以及明确地表述可验证的经济学假设的重要性。1944 年莫迪利亚尼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在新社会研究学院教了好几年书。

1949 年,莫迪利亚尼接受了伊利诺伊大学的一项工作,1952 年他又转到了卡内基理工学院。50 年代后期他在几个大学做了客座教授之后,1962 年最终定居在麻省理工学院直到退休。1976 年,莫迪利亚尼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1985 年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委员会引证了生命周期假说和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作为莫迪利亚尼最重大的贡献。

回到伊利诺伊州参加明尼苏达大学一个有关储蓄的会议时,莫迪利亚尼和理查德·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系统地陈述了生命周期假说。布伦伯格是莫迪利亚尼的研究生,在他们著名的论文发表后不久死于脑瘤。这以后,莫迪利亚尼不得不独自发展和验证生命周期假说。

生命周期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理性的个体会试图使他们的消费水平年复一年地相当稳定。当然个人的收入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年代,人们能挣较多的钱,经济状况差时或退休后人们挣的钱将少得多。即使收入年复一年地变化,人们还希望能够保持一贯的生活方式。这就需要人们使他们的消费与他们预期的一生的收入(或者说

是预期的一生的平均收入)相称。他们会在自己挣钱相对较多的时期储蓄起收入的一部分;而在收入相对较低的年份不再储蓄。

生命周期假说支持凯恩斯主义理论。该假说能解释为什么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提高会刺激个人消费,而对未来收入较差的预期,如担忧可能会被解雇会减少消费支出。在前一个例子中,人们目前支出较多的钱,因为相信他们将来能挣足够多的钱还清任何借款。同样,在繁荣时期,人们的支出会更多——相信他们不必储蓄以防不测——因为未来看起来如此美好。相反,当人们预期到将来会有经济问题时,他们就会少支出而多储蓄,这样如果他们被解雇,他们还有存款。

生命周期假说的一个重要涵义是经济增长是国家储蓄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当经济增长迅速时,人们会感到至少不必为未来储蓄,因为将来的收入会更好。这样储蓄率会骤然下降。相反,当收入和经济产出缓慢增加时,人们就不得不从收入中挤出钱来储蓄,那么储蓄率会很高。

生命周期假说的第二个涵义是当想要解释和预期消费者支出时,财产应当被考虑在内。对任何人而言,财产的价值仅仅是未来会从财产中获得的预期回报。财产可以算作未来预期收益的一部分,也将会既影响家庭的支出行为又影响家庭的储蓄行为。财产总额发生较大变化(例如,证券价格或是不动产价值的陡然增加)将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财产且可以减少为退休而准备的储蓄。

生命周期假说同样能解释为什么暂时的政策变化既不能影响支出也不能影响整个经济活动,税收暂时的变化可能对当前的收入有很大的影响,但它对一生的收入却没什么影响。

因此,暂时的税收变化不太会影响消费者的支出。1968 年美国赋税加重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与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的期望相反,这种税赋的增加并没有减少多少支出,也没能减少通货膨胀。按照生命周期的观点,这种税赋的增加实际上并不会影响支出,正是由于它是暂时的政策,因此它对一生的收入不会有影响。

生命周期假说对宏观经济学分析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性工具。因为它使经济学家们在试图解释和预期家庭所作的消费决策时将财产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考虑在内,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经济学家们从生命周期理论开始理解总的消费和储蓄行为。

莫迪利亚尼的第二个主要创新是建立了现代财务理论。财务理论研究的是厂商借债去投资的决策以及偿还投资者的决策。通常,一个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必须决定是借钱进行投资还是印制股权证明或同意投资者拥有公司的部分股权(股权融资)。财务官还必须决定是以股息的形式将全部利润支付给股东,还是保留一部分利润作应急之用或是用在将来扩张生产。

莫迪利亚尼和米勒 1958 年阐明(忽略税收和金融市场的完全不完美),一个厂商的资本成本并不依赖它的资本结构以及厂商如何获得资金。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厂商一定存在能够承受的债务融资的最佳比例。少量的债务无法提供足够的杠杆作用,而大量的债务就会使偿还债务变得很困难。高水平的债务增加了过失的风险,导致了贷款人要求更大的回报以补偿他们较大的风险,但是由于利率更高,厂商就不太容易还债。

莫迪利亚尼和米勒阐述了一个厂商用债务融资还是股权融资,是没有差别的,而且一个厂商不存在债务融资的最佳百分比。所有的投资者都持有风险程度各异的资产投资组合,因此,投资者不会关心是否他们的投资组合中的某一部分因某厂商严重依赖债务融资而存在更大的风险。即使投资者变得开始关心贷款给一家高债务比率厂商的额外风险,他们总能通过在全部的投资中增加低风险的投资如银行存款、政府债券来补偿这些额外的风险。

在后来的一篇论文(1961)中,莫迪利亚尼和米勒证明了公司的股息政策(dividend policy)不会影响到公司股票的价值,因而一个公司的价值与它是保留利润还是向股东支付股息无关。两个厂商除了从利润中划拨出来作股息的比例不同,其他所有的方面都完全相同,那么它们就应当有相同的市场价值。这与20世纪50年代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同,这些经济学家将公司的股息政策看作是未来预期利润的预兆,是与公司的股票价格相关的。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反驳道,当不存在差别税收待遇时,是将利润以股息的形式支付,还是以资本收益和未来股息支付的形式对公司再投资和支付给投资者,是无关紧要的。

莫迪利亚尼在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具有一个重要涵义,即管理者不应该关注他们公司的财务结构,而应当为现有的股东关注市场价值最大化。

除了以上两个关键性贡献——消费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以外,莫迪利亚尼还对经济学作出了其他几个贡献。20世纪60年代,莫迪利亚尼和其他的经济学家开始为美国经济构建大型的经济计量学模型。这些模型是用数学方程来表达整个

经济许多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们可以让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测定任何政策变化或者经济冲击所带来的精确结果,它们还支持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去协调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可以让经济学家计算出为了减少失业,税收必须降到什么数值;或者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必要的投资和就业,利率该降到多少。

针对当时对上述模型提出的尖锐批判,莫迪利亚尼为模型进行了辩护。尤其是,莫迪利亚尼特别反驳那些反对宏观经济学模型和预测的人,因为个体会对任何预测作出反应,并将很快使之失效。就这样,莫迪利亚尼对众所周知的“卢卡斯评论”作出了回答。他认为预测者们必须考虑任何预测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当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这一切都纳入了宏观经济学模型中时,好的预测是完全可能的。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涵义是,如果经济预测效果差,那么是预测者的责任而不应错怪人们的行为。

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延伸和发展,可能没有人比莫迪利亚尼的贡献更大。他发展了当代消费理论和商业投资的理论;发展了有助于施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实际上,他的洞察力和他的研究改进了当代宏观经济学分析的每一领域。

参 考 文 献

莫迪利亚尼的著作: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the Theory of Interest and Money,”

Econometrica, 12, 1 (January 1944), pp. 45 - 88

-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 in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ed. K. K. Kurihara,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a, pp. 388 - 436, with Richard Brumberg
- "The Predictability of Economic Even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2 (1958b), pp. 465 - 78 with Emile Grunberg
-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3 (June 1958), pp. 261 - 97, with Merton Miller
- "Dividend Policy, Growth, and the Valuation of Shares," *Journal of Business*, 34, 4 (October 1961), pp. 411 - 33, with Merton Miller
- "Corporate Income Taxes and the Cost of Capital: A Corre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 (1963), pp. 433 - 43
- "The '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ggregate Implications and Te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 1 (March 1963), pp. 55 - 84, with Albert Ando
- "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 or, Should We Forsake Stabilization Polic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1 (March 1977), pp. 1 - 19
- The Debate Over Stabilization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Ruminations on My Professional Life," in *Lives of the*

Laureates: Thirteen Nobel Economists, 3rd edn., ed. William Breit and Roger W. Spenc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pp. 139 - 64

涉及莫迪利亚尼的著作:

Bhattacharya, Sudipto,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Legacy of Miller and Modigliani,"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 4 (Fall 1988), pp. 135 - 47

Samuelson, Paul, A., "The 1985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in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Essays in Honor of Franco Modigliani*, ed. Rudiger Dornbusch, Stanley Fischer, and John Bosson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1987, pp. 29 - 35

Seyedian, Mojtaba, "Franco Modigliani 1985," in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 Science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ed. Bernard S. Katz,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9, pp. 203 - 17

其他参考文献:

Rutkoff, Peter M., *New School: A History of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Springer, W. L., "Did the 1968 Surcharge Really Wor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4 (September 1975), pp. 644 - 59

詹 姆 斯 · M · 布 坎 南 JAMES M. BUCHANAN (1919—)

詹姆斯·M·布坎南由于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领域的贡献而成为经济学界至关重要的人物。公共选择检验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联系。布坎南运用经济学分析去研究政治家和政治决策。同时,他还强调理解政治过程对于经济学研究是相当重要的。

布坎南 1919 年生于田纳西州戈姆镇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在 1891 年由于获得了农场主联盟的绝对多数选票而当选为田纳西州的州长。布坎南很信赖他的母亲。他母亲酷爱读书,通过家庭教育和辅导布坎南做家庭作业培养了布坎南的学术能力。

布坎南本想到范德比尔特大学读书,以期成为一名律师,但是经济大萧条使他的梦想破灭了。他能读得起的唯一的一所学校就是默夫里斯伯勒附近的田纳西州中等师范学院。布坎南主修了数学、英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接着又在位于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攻读经济学的研究生。在海军短暂服役后,布坎南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要不是他有在纽约的官员培训学校的经历,布坎南很可能是去了哥伦比亚而不是芝加哥,他感觉“美国东部的当权派”歧视外地人(特别是贫穷的南方人),正是这点使他拒绝了哥伦比亚而选择了

芝加哥。

1948年,布坎南取得了博士学位,并在田纳西大学获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从那以后,他先后在好几个美国和欧洲的学院担任职务,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但布坎南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弗吉尼亚的三所学校里度过的。从1958—1969年,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书,并在那里建立了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中心。从1969—1983年,布坎南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并创立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随后,布坎南将这一中心迁到了乔治·梅森大学,直到现在它一直保留着。1986年,布坎南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成就在于改变了经济学家研究政府和政治家的方法。

布坎南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创立公共选择这一研究领域(研究政治领域内的交换)所起的作用。公共选择是从公共财政发展而来的。公共财政研究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正如经济学家假设经济人是理性的,寻求效用最大化一样,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应当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政治家和政府的官僚机构。政治的交换正如经济交换一样是受利益预期驱使的。

如果我们从布坎南入手的地方——凯恩斯主义理论去理解他对经济学贡献的重大意义可能是最容易的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会频繁地出现问题,应该用经济政策工具去补救。布坎南并没有反驳市场经济会出故障这一事实,实际上他所经历的大萧条也支持了这一分析。布坎南反驳的是凯恩斯提出的政策措施。他否认政府官员能改善市场结果。他的论据包括两部分——哲学方面的和经济学方

面的。

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布坎南是从“激进的主观主义”(radical subjectivism)这一立场开始反驳的。所谓激进的主观主义,是认为只有个人能够了解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是有益的。这种看法否定了任何外在的政党或团体能够客观地决定什么对于大众来说是好的。特别是政府和政府的官僚机构无法区分什么对于社会来说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它们也不能通过制定经济政策给公众带来益处。

激进的主观主义否定了现代福利经济学(参见庇古)——通过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来提高国民经济福利。更重要的是,激进的主观主义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布坎南(1977,1978)极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认为社会利益最大化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官僚们是无法为社会的任何最大化作出选择。相反,由于政府想方设法地提高公众利益,实际上是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反而减少了公民的福利。

反对政府干预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方面的原因。通过解释经济力量是如何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布坎南阐述了良好的愿望是如何失败的,甚至导致了更坏的结果。这就是反驳凯恩斯主义和反对传统的经济政策决策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实质。

布坎南(1977)主张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建立在“政策制定者从公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的假定的基础上。但是由于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是人,他们会有与其他人一样的想法和做法,他们会想方设法使他们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不会做出利他主义的行为或者执行

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法律或政策。

另外,布坎南指出不可能从那些主张政府作用降至最小的人中选拔出政治家,因为这些人不可能被吸引去为政府效力。而且,政治家会关心社会工程和提高社会福利,这需要很高的预算。而且,政治家需要参加周期性的再选举。控制着庞大预算的权力使政治家能够四处行贿以提高他们再次当选的机会。同样,未当选的公务员也会推荐和建议更高的预算,因为这样可以为他们创造工作机会,也可以让他们管理更多的人并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根据布坎南的观点,这种体系导致了庞大的预算和臃肿的政府。最终,由于它的大规模和范围,政府会面临困难而又复杂的决策。于是需要雇用专业的经济学家,他们能够找出市场失败的特殊原因,还能使政府起到更大的作用。

更深一步,布坎南鉴别了另外一种源于政府臃肿和政府政策决策的浪费。当政府主宰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时,他们所作的任何决策都会对工商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厂商必须特别密切地关注政府的决策,并设法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影响。厂商在设法影响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会牺牲大量的、本应投入到商品生产中的资源去游说政府官员。

布坎南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不是改善经济运行的机制,而是“一种长此以往将毁灭民主的弊病”。它导致了长期的政府赤字和国债,还以“我们欠的是我们自己的钱,所以是可以的”这样的格言来使其合理化。根据布坎南(1977)的观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一种弊病,因为它使政治家在实施财政政策时不再有道德约束。特别是它导致政治家偏离了预算平衡的轨道。

布坎南(1958, 1977)强烈反对财政赤字和国债,他认为国债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它们减少了国家的资本。当政府为其债务融资出售债券时,会与私人的债券销售者相竞争,从而拉升借款的成本(利率)。结果,造成私人投资下降。长此以往,问题愈演愈烈。加重了的债务和加重了的利息负担增加了政府拖欠的可能性。另外,布坎南(1986)认为后代会被赤字所连累,因为他们必须承担较高的税赋,而债券持有者的利息回报尚不能补偿他们的负担。

如早些时候提到的,布坎南并未否认经济结果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状态。然而,与凯恩斯相反,他认为次最优状态的经济结果是因为个体无法从贸易中获益。因此进一步限制个体行为的政府政策并不是解决的办法。相反,解决办法必须为互惠互利的贸易创造机会。可通过制度的、组织的或宪法的变化来改变经济游戏的规则,从而促使此类贸易的繁荣发展。布坎南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应当能识别规则的变化并能使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可能从中获得的益处。

布坎南对政府臃肿的解决办法是再评价和改变政府作用的“宪法改革”(1969)。如果没有宪法的限制,民主政府会过度膨胀和变得过于扰民,必须对政府施加宪法的限制以保证人权不被践踏,同时引导个人利益趋向集体利益。必须建立框架、制度或者规则以约束政治家提高其个人私利而不是公众利益的行为能力。

布坎南长期以来提倡的一项制度变革即为实现预算平衡而推行宪法修正。他相信只有通过宪法框架的变革才能恢复财政的职责和健康的经济。“就像一个酗酒者可能会欣然接受嗜酒者互诫协会一样,一个沉湎于财政赤字与政府臃肿的

国家会采纳预算平衡。”(1977)

宪法的规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避免了一个国家的多数派将成本强加在其他的人身上。例如,单一多数派通过对他人征收高额税收,以大多数少数派的利益为代价而使他们自己获益。为了防止这种多数派的独裁统治就要改变规则或国家的宪法,要求所有税收的提高必须得到大部分多数派的支持(也就是说,要投票代表的2/3通过)。

虽然其他的经济学家对布坎南的评价并不高(他不具备常青藤名牌大学的教育背景,也没有用数理方法分析经济学),但布坎南的政策影响超过了20世纪后叶的除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外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日渐加剧的对政府的不满,公众支持削减税收、减少政府支出、修正平衡预算都可看作是布坎南在政策领域影响的例证。不过,布坎南的最突出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其公共选择的观点,他使得经济学家以更为复杂和现实的眼光去看待政府的代理者和政策的制定者。

参 考 文 献

布坎南的著作:

Public Principles of Public Debt,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1958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with G. Tullock

“Pragmatic Reform and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Ethics*, 17

- (1969), pp. 95 - 104, with A. de Pierro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the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Democracy in Deficit: The Political Legacy of Lord Keyn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with R.E. Wagner
The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78, with J. Burton & R.E. Wagner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Better than Pleading and Other Personal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涉及布坎南的著作：

- Atkinson, Anthony, "James M. Buchanan'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89, 1
(1987), pp. 5 - 15
Locksley, Gareth, "Individuals, Contracts and Constitutio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mes M. Buchanan," in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ed. J. R. Shakleton and G.
Locksley, New York, Wiley, 1981, pp. 33 - 52
Reisman, Davi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mes Buchanan*,
London, Macmillan, 1990
Romer, Thomas, "On James Buchanan's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 4
(Fall 1988), pp. 165 - 79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 DOUGLASS CECIL NORTH (1920—)

道格拉斯·诺斯对经济学的三个领域作出了贡献。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史；检验和诠释了制度在调节个人行为时的作用；他还试图去搞清使得经济繁荣或贫困的历史的力量。这三条研究思路并不像它们最初的看上去那样各不相关。诺斯从采纳正确制度的方面解释了经济的增长。他也使用统计学的方法验证了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制度理论。

诺斯 1920 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他父亲是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因此在诺斯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全家不得不经常搬迁。结果，诺斯在康涅狄格州、渥太华、洛桑、纽约和长岛等地都上过学。由于他父亲后来调到了旧金山工作，诺斯不想离家太远，就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

在伯克利，诺斯主修三门科目——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他非常希望毕业后到法学院读书，但是二战的爆发使他无法实现这个计划。诺斯宣称无法容忍自己杀人而参加了商船队。三年的海上生活使诺斯有很多时间读书、思考，这时他决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而不是一名律师。

战争结束后，诺斯回到了伯克利。1952 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美国人寿保险的历史的。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1983 年，诺斯一直在华盛顿大学执教，后来在圣·路易

斯的华盛顿大学当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1993年,诺斯和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共同获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诺斯和福格尔获奖时引证了他们在发展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方面的先驱性工作。历史计量学,涉及到将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应用到经济学史的研究中去。直到20世纪后期,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史的研究还是主要以叙述为主,而没有应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结果,60年代当诺斯和福格尔将数学的方法应用到这个领域时,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但是诺斯和福格尔仍不停地推进他们的课题,最终成功地改革了经济学史的研究方法。诺斯和福格尔要求经济学史中所有的工作均产生可验证的或可证明的预测,而且这些预测实际上可通过反驳一个可替代的、某些因素并不重要的、无效的假说来验证。验证可以通过收集相关的历史性数据,并使用任何其他经济学家都使用的统计工具分析这些数据来完成。

诺斯和福格尔最早从事的历史计量学的工作是研究经济增长的动因。诺斯(1961)调查了南部、北部和西部之间的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他指出交通的不同(西部和北部之间通过运河相连;海运联结着北部和南部;南部和西部是通过汽船联系的)产生了美国三个不同却相关的经济区域。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专业分工——南部生产棉花,北方是金融和工业中心,西部主要生产动物毛皮和食品,而且,每一区域要依赖其他两个区域供给的商品。

诺斯接着进行一种受控实验。他验证了“区域的专业化分工可以导致经济的更快增长”这样的假说,反对另一个假说——“区域分工不是增长的动因”,他发现三个不同区域确

实倾向于同时扩张、同时紧缩。并且,他还发现这主要是因为一个区域经济增长导致了对其他两个区域商品的需求增大。

诺斯(1977)后来意识到历史计量学能检验关于历史变迁的解释,但它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任何新的解释。因此,需要另一种方法去解释经济增长,诺斯就开始去研究制度和社会规则。1990年,诺斯将制度定义为是由人设定的约束,并将其强加于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中。这些约束包括习惯、风俗和法律之类的正式的约束。接着,诺斯试图解释这些制度对个人行为和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以及某一制度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存在的原因。这种探询的思路使诺斯成为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鼻祖。

多数经济学家都采用给定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例如,他们假定市场是存在的,但却不提及市场是怎样发展和进化来的。然而,制度既影响经济运行状况又影响市场,因为制度是人的制度,包括很多因素——人与人之间是如何互相影响的,他们如何构筑自己的世界。这些制度影响着生产商品的成本、销售商品的能力,所以也影响着经济增长率。

诺斯认为,制度的重要性在于三个关键方面。首先,它们建立了产权和经济激励。没有关于谁拥有财产的协议,人们将不会去生产也不会设法在经济上改善自身。随着产权的界定,激励了人们获取新技术并使用更加有效的生产工具。例如,在没有专利法的情况下,个人或厂商就不太会花钱去进行研究和开发。那些在研究和开发上根本没有投资的人将能够复制或廉价地再生产任何发明。那些摹仿者将从新的发明中赢利,而他们并没有为这些发明付出本应付出的研究和开发费用。结果,摹仿者并没有付款给从事研究活动的厂商而仅

仅是复制他人的成果就成了竞争者；每一个厂商都会等着让其他人去花钱搞研究。但在这样的经济规则下，由于实际上没有人花钱从事研究和开发，新发明就会很少，于是每一个人都蒙受损失。

其次，诺斯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必须强制执行经济游戏的规则。这里，国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面对关键交易的经济主体。

一方面，国家不能允许人们欺诈并得逞。在最低程度上，国家必须保护公民和工商企业免受抢劫和勒索，因为如果他们的赢利可能被其他人偷走，那么没有人会工作或生产。在更复杂一点的程度上说，国家必须确保规则不被破坏，不致损害经济运行。国家要确保公民不偷税、漏税，厂商不会共谋抬价和降低商品质量，厂商也不会从事欺骗或危险的勾当。某一个人欺诈的得逞会鼓励其他人也去欺诈，这样会减少勤奋工作的经济动机，而勤奋工作又是经济成功、繁荣必不可少的要素。

另一方面，当国家试图防止越来越多的欺诈时，监督和强制执行的成本就会上升，这需要更高的税收，并引起对政府干涉私人事务的更大的不满。我们来看一下确保每一个人都遵循税法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人接受稽核，许多人都将作假；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接受稽核，政府的成本会变得非常高，公众对税法会非常不满。国家必须在允许有些人在税收上欺诈与通过严密监督和提高税赋消除几乎所有的欺诈之间找到一条最佳路线，严密监督和提高税赋本身也妨碍和减慢了经济增长速度。这需要创造一个制度的框架或一系列规则以使厂商和个人诚实地缴纳他们欠政府的税。用更通俗的语

言说,政府必须营造一个每个人都依照经济规则行事的氛围,但这些规则不会对经济主体产生压力。

第三,诺斯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意识形态或经济社会的心理构成和社会构成紧密相关。制度有助于决定人们如何看待公正和正确的行为。这些因素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如何针对不同的情形作出反应。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体总是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理性地采取行动,诺斯的观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相反,他认为个人拿不准自己该做什么,也不清楚什么才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于是他们要依靠流言、意识形态、通行的信仰和习惯。例如,如果工人觉得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会努力工作,工作效率也高;如果公民相信政治民主,他们就会投票;如果人们相信政府能保证商品的质量,他们会买更多的商品。诺斯不赞成加里·贝克尔(Gray Becker)的观点,加里·贝克尔相信对个人的奖惩比制度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而诺斯则认为如果人们相信经济体系是公正的,他们作假的可能性将变小;如果人们信赖政府,他们将不太会在税收上作假,并很可能参与投票选举。事实上,诺斯认为如果人们认为体系不公正,并且惩罚远远超过了犯罪的严重程度,那么过度的惩罚也许反而会增加人们所不希望见到的行为。

如上所言,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使经济增长的潜力受阻。当制度为从事非生产性活动提供动机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如果人们将制度的奖赏看作是武断的或不公正的,人们将不再努力工作,这将阻碍经济增长。如果厂商为了特殊利益游说政府官员,而不是去创造商品和服务,经济增长也会受挫。

相反,公正的制度能使经济得到更快的增长,每个人都将从中获益。诺斯 1981 年阐述了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可能减少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行为如偷窃(通过在偷窃者身上施加法律管辖以外的惩罚)。于是个人将不太可能从事损害经济体系根基的行为。

诺斯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无效”的规则或制度仍然存在。1981 年诺斯曾提出政治市场是无效的。特殊利益团体在某种动机的驱使下会组织起来,促使政府通过对他们有利的立法;由于对别人的损害不大,因此别人就没有动机组织起来去反对这些特殊利益团体。投票者几乎没有任何被告知的动机,因为单单一个人的投票想要决定任何选举的结果实在是不可可能的。而且,问题越来越复杂,致使投票人忽略了这些问题。于是,意识形态占了上风——人们投票赞成简单却错误的意见,为有个人魅力却无真才实学的候选人投票,为原来的状况投票。这种分析能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投票者对他们不得不投票的候选人和政治竞选运动的水平如此不满。

诺斯的新制度主义横跨了传统的经济学和传统的制度经济学,但是,相对而言,新制度主义处于一个相对尴尬的境地。诺斯运用的行为假设完全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作出的假设。诺斯认为,个人根据规则使其行为社会化,这些制度的约束对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观点使传统的经济学家对他的研究不以为然。另一方面,诺斯的研究极其数量化和形式化,这使得传统的制度主义者对他的研究持怀疑态度。

虽然诺斯在许多方面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但他无疑是一名具有开创性的经济学家。他是 20 世纪少数几个敢问并试图回答“是什么使经济增长或衰退”这种大问题的经济学家之

一,也是意识到在社会制度和个人的利己主义之间存在不协调关系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诺思的著作: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 - 1860,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61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with Lance
E. Davi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with Robert
Paul Thomas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fter Twenty Year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1 (December 1977), pp. 187 - 200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47, 1 (1994), pp. 3 - 31, with Arthur T. Denzau

"Douglass C. North," in *Lives of the Laureates: Thirteen
Nobel Economists*, 3rd edn., ed. William Breit and Roger

W. Spencer,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pp. 251 - 67

涉及诺思的著作：

Goldin, Claudia, "Cliometrics and the Nobel,"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2 (Spring 1995), pp. 191 - 208

Libecap, Gary D., "Douglass C. North," in *New Horizons in Economic Thought: Appraisals of Leading Economists*, ed. Warren J. Samuels, Hants, Edward Elgar, 1992, pp. 227 - 48

Johan Myhrman and Barry R. Weingast, "Douglass C. North'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and Economic Histor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6, 2 (1994), pp. 185 - 93

Richard Sutch, "Douglass North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n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d.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M. Walt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pp. 13 - 38

肯尼思·J·阿罗 KENNETH J. ARROW

(1921—)

肯尼思·J·阿罗作为一名理论经济学家,以其兴趣极为广泛多样而闻名于世。他的许多重要贡献已经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到数理规划、社会和政治哲学以及保健。然而,阿罗最著名的是两个技术性的贡献:不可能性定理(在经济学领域里设立了社会性的选择)和证明一般均衡状态的存在。

阿罗 1921 年出生于纽约一个有着罗马尼亚和犹太人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童年时期,阿罗酷爱读书,他宁愿待在家里看书也不愿出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当阿罗犯错误时,他母亲真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他。

“起先,她把阿罗关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但很快就发觉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阿罗的了。他会手捧着一大卷百科全书独享其乐。于是,她改变了策略,以把将阿罗赶出去玩作为对他的惩罚。”(费威尔,1987)

通过阅读伯特兰·拉塞尔(Bertand Russell)的著作,阿罗在高中时期对数学及数理逻辑发生了兴趣。阿罗的父亲在 20 世纪 20 年代生意非常成功,然而在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破产了,家道败落使阿罗不得不进入免费的纽约市立大学就读。阿罗在纽约市立大学学习数学、逻辑和统计学。他毕

业于 1940 年,并获得了金派尔奖,这是毕业生班学生可以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奖项。

毕业后,阿罗本想当一名中学教师,但未能如愿。于是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学习数理统计学。霍特林教授的数理经济学课程使阿罗第一次接触到经济学。1941 年阿罗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同年离开了学校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阿罗又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从事数学与统计学的研究。霍特林怂恿阿罗去申请经济学的博士项目。阿罗开始对社会决策的逻辑产生了兴趣。1951 年他完成了他的论文《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获得了博士学位后,阿罗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职位,四年后他成为那儿的一名全职教授。1968 年他转到哈佛任职,但 1979 年他又回到了斯坦福大学。1972 年阿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罗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他博士论文中的对不可能性定理的证明。这一贡献使得人们反复思考一个概念,即群体比如一个家庭的成员或一个厂商的所有者们如何决策,或如何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作选择。当分析个体的选择时,经济家们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是理性的而且对他们可能得到的方案都能排列出次序(参见埃奇沃思)。特别是,理性的选择需要个体对于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偏好具有一致性和传递性。所谓一致性,就是一个人选择 $A > B$,那么他就不能同时选择 $B > A$ 。所谓传递性,是指一个人偏好 A 超过 B ,同时他偏好 B 超过 C ,那么他一定偏好 A 超过 C 。

阿罗证明了社会选择或者社会决策是非理性的。尤其是

他证明了群体作出的决策不一定遵循传递性原理。想一想这个例子,设想一个家庭必须作出选择。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我们设想只有三种选择(A、B、C),我们把它具体地想成一个家庭要租借的三部电影——阿拉丁、巴尼和灰姑娘。三个孩子不得不在这些可选方案中选择。他们不能同时看三部电影,但每个孩子都希望他或她的效用最大化。如果所有的孩子都愿意看同一部电影,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许多时候这种情况不太会发生,孩子们在三部电影中有不同的偏好。

特别地假定 1# 孩子偏好阿拉丁胜过巴尼,同时偏好巴尼胜过灰姑娘;2# 孩子偏好巴尼胜过灰姑娘,同时偏好灰姑娘胜过阿拉丁;3# 孩子偏好灰姑娘超过阿拉丁,同时偏好阿拉丁胜过巴尼。每一个孩子都遵循上面所定义的一致性和传递性原则,但是当把所有的孩子放在一起决定看哪一部电影时问题就出现了。当孩子们在一起时,由于 1# 和 3# 孩子都偏好阿拉丁超过巴尼,他们会宁愿看阿拉丁而不是巴尼;而 1# 和 2# 孩子偏好巴尼超过灰姑娘,他们会宁愿看巴尼而不是灰姑娘。传递性原则要求宁愿看阿拉丁而不是灰姑娘。可是 2# 和 3# 孩子是宁愿看灰姑娘而不是阿拉丁,这样就违背了传递性原则。阿罗从这样的分析中就暗示了社会选择是非理性的,因为违背了传递性原则。换言之,从个人偏好去推导社会或群体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性原理),也就是说,“对于集体的理性观点不可能有完全的一致性。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一种纯权力关系”(阿罗,1974)。所有这些表明了尽管经济学可以解释个体的选择,但它却不能解释群体的决策。

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在 1970 年为政治哲学引出不可能性定理的内涵。在上面给出的例子中,如果把

A、B、C 归为立法部门的不同的诉状或者是选举办公室的不同的候选人(而不是不同的电影),那么 A、B、C 被提出的顺序将会决定最终的结果。如果第一次选择了 A 与 B 相对,1# 和 3# 立法者投 A 的票而不投 B 的票,那么 A 会赢;再让 A 与 C 相对,因为 1# 与 2# 立法者偏好 C 而不是 A, C 将会赢。但是假设我们第一次选择了 A 与 C 相对, C 会赢,因为 2# 和 3# 立法者将投票给 C 超过 A。但是 B 将会赢 C, 因为 1# 和 2# 立法者为 B 投票。最后假设我们第一次选择让 B 与 C 相对, 1# 和 2# 立法者偏好 B 超过 C, 于是他们都为 B 投票。但是再让 B 与 A 相对时, 基于 1# 和 3# 立法者的投票, A 将会赢。这样, 诉讼(或候选人)被提出的顺序最终就决定了谁是赢家。在政治竞技场中, 赢家就这样被任意地决定了。沃尔夫论证了阿罗通过在民主的决策中援引哲学背景不经意地为政治无政府主义在哲学上提供了合理性。

阿罗的第二个贡献在于用数理方法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回溯到瓦尔拉和帕累托时期, 甚至可能回溯到魁奈时期, 经济学家们就意识到描述一个完备的经济体系的均衡的可能性。在这个体系中, 每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的均衡价格上都会出清, 这种观点缺少一个证明, 即证明实际上存在一套均衡价格使所有的市场同时出清。阿罗用数学术语阐明的正是这一证明。这一证明需要四个假设: (1) 家庭提供劳动服务, 消费商品; (2) 家庭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知道他们从不同的选择中将会得到的效用, 并能对消费和劳动作出理性的选择; (3) 厂商用可能获得的最好的技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 (4) 家庭从生产中得到利润。

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同时也需要两种行为假设和规定两

个条件。行为假设是指厂商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阿罗规定的两个条件是：(1) 价格不能小于零；(2) 任何额外供给的商品的价格都为零(参见诺伊曼)。符合了这些条件，阿罗就能够用数理方法证明竞争的均衡状态的存在，也就是说，他阐明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有一套价格，在这一套价格水平上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这样就阐明了完备的经济体系是存在于均衡状态中的。

对于非经济学家来说，这种证明看起来可能像是抽象的、毫无意义的，然而它的重要性在于帮助经济学家相信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一般均衡并不仅仅是某种理论上的想法，而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经济可以被看作正在移向一般均衡。经济学家们于是更远离了马歇尔的局部均衡模式，开始去研究经济中所有经济的变化对所有市场的影响。这种证明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它使许多经济学家坚信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源并带来非常理想的结果。如果市场被允许毫无障碍地运作，所有市场都能出清，消费者能实现最大化的效用(如果他们有给定的资源)。

一般均衡的证明中，一个重要的假设包含在上述的假设(2)中。因为家庭要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他们必须知道是今天买各种商品还是等着将来买这些商品。这个决定需要期货市场的存在。今天我们付款是为了在将来获得某种商品或是有将来还款的承诺，这样，期货市场就产生了。许多人所熟悉的最简单的期货市场就是银行提供的存款单。银行今天拿了你的钱并保证将来交付给你更多的钱。可是对于许多商品来说是不存在期货市场的。外币有仅仅存续几个月的期货市场，多数商品根本就没有期货市场。当然，很难发现有人愿意

从现在起以某一约定的价格购买十年的食物和燃油。期货市场的缺乏妨碍了阿罗的工作,他的许多后续性工作(1971)已经试图表明:没有完整的市场,一般均衡结果仍然存在。

完整市场的缺乏也成为阿罗的关于保健的经济学著作的主题。阿罗首先提出健康经济学必须从不确定的立场去研究。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经济领域中的医疗保健部门也有不太完美的结局(阿罗,1983)。

第一个问题是个人并不了解他们将从医生那得到保健的质量,特别是当涉及到专家时。找到一个好医生是重要的,因为一个不胜任的医生可能要你以生命做代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找到好的医生是费时的和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阿罗看出进入壁垒是减少不确定性的唯一方式。发放许可证的目的是对消费者保证医生有某种医术上的训练并拥有医疗事务方面的能力。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却相反,他把发放许可证作为政府委任的垄断权力(这就减少了供给和提高了价格),他还相信市场压力将驱除出不胜任的医生。阿罗将一个无秩序的医疗市场看作一个不利于社会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

在保健市场上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学家们所指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这个概念背后的观点是指保险改变了个人的行为。火灾保险使人们对家里少了一点关心,因为他们有保险可以补偿任何火灾,这种态度将引起更多的火灾。同样的,有健康保险的人由于他们的医疗费用将会由别人去支付,更可能去做一些会增加他们生病或伤残的危险的事情。道德风险的结果是健康服务的要求将提高,保健的支出将高涨。阿罗 1971 年阐明了解决道德问题的办法是共同保险,即

个人支付他们自身医疗账单的一大部分。当人们被迫要付出他们医疗账单的大部分费用时,他们将会减少冒险,健康将少出问题,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也会得到控制。

保健市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自然地,个人比任何保险公司都更知道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保险公司只能以高价格获得额外的信息。而且,有着很大的健康危险的人要付给保险公司更多钱,他们在强烈的经济因素的刺激下会对保险公司隐瞒他们的健康问题(因为这需要承担更多的保险费)。这种不同个体的健康危险的不确定性为保险公司带来了问题。如果保险公司根据平均危险规定一个保险费比率,高危险人群将买很多保险而低危险人群将买很少的保险或不买保险。因此保险公司将会亏损并不得不提高保险费比率,但是这将会赶走更多的低危险人群。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再保险时,保险费将不断提高。阿罗阐明这些问题将随着一个独立付款体系的建立而消失。如果每一个人包含在健康保险之内,就没有人能试图提供仅仅令低危险人群感兴趣的计划,保险公司也不用再担忧低危险人群脱离这一体系和大幅度地提高保险人的平均费用。

阿罗的著作主要是写给其他经济学家们的,而不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也不是为政治家提供建议。他研究了群体决策的逻辑、一般均衡分析的逻辑以及医疗保健市场被不确定性所困扰的逻辑。阿罗广泛的兴趣以及具有穿透性的洞察力体现在他所研究的任何一个特定问题中,他毫无疑问成为 20 世纪末最重要的十几个经济学家之一。

参 考 文 献

阿罗的著作：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51

“Existence of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
Econometrica, 23 (July 1954), pp. 265 - 90, with G. Debreu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 (1963), pp. 941 - 69.
Reprinted in Arrow (1983 - 5) Vol. 6, pp. 15 - 50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Bearing, Amsterdam and
London, North-Holland; Chicago, Markham, 1971.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1971, with F. H. Hahn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74.

Collected Papers, 6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5

涉及阿罗的著作：

Breit, William and Spencer, Roger W. (eds.), *Lives of the
Laureates: Seven Nobel Economists*,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Feiwel, George R. (ed.), *Arro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87

Heller, Walter P., Starr, Ross M. and Starrett, David A.
(eds.), *Social Choice and Public Decision Making: Essays
in Honor of Kenneth J. Arrow*,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von Weizsäcker, Carl Christian, "Kenneth Arrow'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s,"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74 (1972), pp. 488 - 502

其他参考文献:

Wolff, Robert Paul, *In Defense of Anarch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巴巴拉·R·伯格曼 BARBARA R. BERGMANN (1927—)

巴巴拉·伯格曼花费了整个职业生涯研究劳动力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些研究涉及到失业与贫困的原因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法,还研究了为什么妇女的工资如此之低。巴巴拉指出由于将妇女排除在某些工作以外,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这也是妇女和儿童的低薪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她提出了强有力的赞助性行动计划。

巴巴拉 1927 年生于纽约,在布鲁克斯长大。在巴巴拉幼年时她父亲就离开了家。在巴巴拉的观念中逐渐被灌输了这么一种想法,即妇女“必须有她们自己的钱”。可是,1948 年巴巴拉从康奈尔大学拿到数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后没能找到工作。在她母亲的提议下,巴巴拉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一年后,她接受了劳动统计局的一份工作。在统计局的经济学家的鼓励下,巴巴拉报考了研究生,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都愿意接受她,巴巴拉选择了哈佛,并于 1959 年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伯格曼在经济顾问理事会担任了两年的高级经济师的工作,接下来的三年是在布鲁金斯研究会——华盛顿声誉卓著的智囊团工作。从 1965—1988 年,她在马里兰大学教书,后来从华盛顿的美国大学退休。在 70 年

代早期,她协助成立了东方经济协会(Eastern Economic Association),并于1974年担任了第一任主席。

伯格曼对经济学作出了两项主要贡献。第一,她说明了歧视是劳动力市场的普遍特征;第二,她驳斥了传统经济学从一系列不现实的假设中得出结论的方法论。伯格曼认为经济学家必须走入真实社会中去研究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

众所周知,女性劳动力平均要比男性劳动力的收入低得多。自从19世纪末第一次收集收入数据以来,数字就表明美国的全职女雇员收入大约只有全职男雇员的60%。虽然这些事实没有引起争论,但为什么妇女的收入比男子低这么多的确是一场大辩论的素材。男女平等主义者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将这种工资的差异作为妇女的次等经济地位的证据,同时还试图搞清妇女的次等经济地位的原因。伯格曼是男女平等主义者经济学的先驱,她还指明了排斥或者说职业分离(occupational segregation)是妇女低薪的主要原因。而且,她还指责她的同行——劳动经济学家们的方法论无视这个事实。

职业分离意味着某些工作主要对妇女开放而另一些工作却将妇女排斥在外。通常,妇女无法得到高薪的工作而集中在低薪的工作中。例如,医生中很多是男性,而妇女更可能是当护士。男人很可能是银行经理,而妇女更可能是银行的出纳员。伯格曼同时指出职业分离往往发生在职业内部。比如说餐饮服务业,“男性服务生通常是在小费较高的昂贵的餐厅工作,并且这种餐厅不雇佣妇女;而妇女则往往是在廉价的、没有男同事的餐馆工作。”(伯格曼,1966)

虽然职业拥挤或分离现象最初是由埃奇沃思观察到的,

然而却是伯格曼(1971,1974)第一个解释了这种歧视盛行的原因。根据传统经济学理论,歧视应该被市场排除,因为对厂商来说进行歧视是无益的。无歧视的厂商支付较低的工资,获得较高的利润,最终会将有歧视的工厂逐出商业圈。

伯格曼举出了确凿证据证明真实的社会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社会。一些起诉大公司的案例都证明了对妇女存在着歧视。然而,这些公司的利润并未下降,它们也未被那些无歧视的公司逐出本行业(伯格曼,1986)。另外,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关注工资歧视或者为何有着同样的技能和才干的两个人工资却不同,但对将妇女排斥在工资较高的职业之外的性别歧视只字未提。

伯格曼还解释了为什么厂商对妇女和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待遇以及为什么倾向于以高薪雇佣白人。这种解释集中在雇员身上而非雇主身上。例如,如果男性白人与妇女或少数民族同事,会觉得不太舒服。男性白人不会培训他们,也不会帮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或者,士气问题(必须与妇女共事的结果)可能会降低男性白人的生产率。为了避免这些可能的“成本”,雇主可能会决定既不雇佣妇女也不雇佣少数民族成员。

伯格曼(1971)更进一步解释了由于职业分离,优势群体是如何以劣势群体为代价而获利的。如果妇女仅仅能做秘书(或其他少量职位),而不可能得到经理的位置,那么会有许多应征者申请秘书类职位,并且超过职位本身的数目,这就使秘书的工资水平下降了。而且,即使让妇女获得的是非秘书类的工作,她们的工资也会很少,因为雇主知道她们很可能主要选择低薪的秘书类的工作。相反,经理职位的工资会较高,这

是因为通过将妇女排斥在外,应征者很少,于是必须以较大的刺激来吸引员工。

为了弥补职业的性别歧视问题,伯格曼(1996a)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赞助性行动计划,她指出赞助性行动并不意味着补救过去的过失,它意味着处理当前的实际问题。歧视在今天的工作场所仍然存在着,即使在控制了诸如教育及经历水平这些因素后,妇女仍比男人得到的报酬少。职业的性别分离也表明了劳动力市场上妇女普遍地被歧视。性别歧视在当今仍然存在的最后一个证据来自一个受控实验。在这个实验里有一群旗鼓相当的人申请实际的工作。这些研究发现,在受雇过程中妇女和少数民族不太可能像男性白人那样获得个人的发展。

伯格曼(1996a)证明了赞助性行动的益处要超过向厂商施加这项政策的成本。一个重要的益处是赞助性行动使得更多的有资格的人被雇佣,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赞助性行动的另一个益处是工作场所的更加多样性。此外,伯格曼声称有许多方式衡量品质或品德,对于品质的判断有着固有的主观性,同时也受诸如候选人的性别、人种、年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会有不止一个候选人最适合这个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赞助性行动提出厂商应该雇佣妇女和少数民族成员。

伯格曼强调,确定赞助性行动的数值目标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目标,厂商会承诺做得很好,但实际上并不雇佣更多的妇女或少数民族成员,只有赞助性行动能够消除歧视,而防止歧视的立法行动是既冗长又昂贵的。另外,如果个人在雇佣过程中被歧视,他们会不知情或无法证实这一点。例

如,应征者不太可能了解所有的女性候选人,无论她们具备什么样的资历,都不可能得到一个特殊职位的面试机会。

伯格曼提倡将可选择的研究方法论应用于经济学,这充实了她的男女平等主义者经济学。伯格曼在就任东方经济协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1974)批评了那些呆在象牙塔里与真实的世界几乎没有联系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或者是通过内省或者是通过用政府汇编的数据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统计性验证来研究经济。伯格曼指出这些与现实社会相脱节的研究方法是不够的,因此是无助于理解现实社会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研究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卢卡斯认为失业是人们对闲暇还是工作做出选择的结果。当目前的工资太低时,人们会选择闲暇而不是工作。伯格曼在1989年指出,卢卡斯为了得出这个结论,在失业者的理性和劳动力市场运作的方式上做出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假设;而且,他也并没有验证任何一个假设。

伯格曼反对从不现实的或错误的假设中去推导结果。她倡议(1973,1990)经济学家走进现实社会中去收集信息。一种方法是做实际的社会调查,另一种方法是开展受控实验,如做那些能够表明在受雇过程中妇女和少数民族成员不像男性白人那样获得发展的实验。最后,经济学家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劳动力市场,这种方法的基本观点是用计算机去模拟个人、厂商和政府的行为面对不同变化时的反应。但是,为了做到这些,我们需要知道工人对削减工资是怎样反应的,以及当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时厂商会怎样反应。只有那时才可能知道工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

例如,访问那些刚刚失业的工人会有助于经济学家理解这些人是怎样作出他们的选择的;有助于经济学家理解为什么失业工人不会立即在当地的快餐店应聘现金出纳的空缺。调查也会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即使存在着寻找工作的人群,开办快餐店的经理也无法在预定的工资水平上找到雇员,以及为什么这些经理不涨工资以吸引更多的应征者。访问也可能使经济学家知道快餐店的经理是如何观察出谁是最近才失去高薪工作的应聘者的。只有在进行了这些采访和模拟了人们对环境变化作出的反应后,经济学家才能搞清楚失业是因为工作岗位太少,还是因为人们宁愿空闲而不愿去工作,还是有其他什么更复杂的原因。这种更为科学和更加恰当的方法也能使经济学家解释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并理解失业的原因。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伯格曼尚未获得最高的赞赏和奖励。她没有当选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也没有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她是一名妇女”,另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女权主义的定位使她的男同事们相当不安。但是,伯格曼仍然将男女平等主义者经济学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引起了传统劳动经济学家对她的研究的关注。

参 考 文 献

伯格曼的著作:

“The Effect of White Incomes on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9 (March /

April 1971), pp. 294 - 313

"Combining Microsimulation and Regression," *Econometrica*, 41, 5 (September 1973), pp. 955 - 63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Wages and Profits When Employees Discriminate by Race or Sex,"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1 (April - July 1974), pp. 103 - 10

The Economic Emergence of Wo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A Microsimulated Transactions Model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with Robert L. Bennett

"Women's Roles in The Economy: Teaching The Issues,"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18, 4(Fall 1987), pp. 393 - 407

"Why Do Most Economists Know So Little About the Economy?," in *Unconventional Wisdom: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ed. Samuel Bowles, Richard Edwards & William G. Shepherd, Boston, Massachusett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pp. 29 - 37

"Micro-to-Macro Simulation: A Primer with a Labor Market Exampl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 1 (Winter 1990), pp. 99 - 116

"Curing Child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2 (May 1994), pp. 76 - 80

A Defense of Affirmative Ac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6a

Saving Our Children from Poverty: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Learn from Fr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1996b

涉及伯格曼的著作：

King, Mary, "An Interview with Barbara Bergman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thcoming)

Paulin, Elizabeth "The Seditious Dissent of Barbara Bergmann"
in Richard P. F. Holt and Steven Pressman (eds),
Economics and Its Discontents,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8,
pp. 1 - 19

Polkington, Betty and Thomson, Dorothy Lampen, *Adam
Smith's Daughters: Eight Prominent Women Economists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1998, pp. 104 - 17.

其他参考文献：

(EEA Symposium) " Symposium: Race, Gender and
Discrimination,"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1, 3
(Summer 1995), pp. 339 - 98

Edgeworth, Francis Y. , "Equal Pay to Men and Women,"
Economic Journal (December 1922), pp. 431 - 57

Ferber, Marianne A. and Nelson, Julie A. (eds.), *Beyond
Economic Man: Feminist Theory and Economics*,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Goldin, Claudia,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Smith, James P. and Ward, Michael P. , *Women's Wages and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1984

Turner, Margery Austin; Fix, Michael and Struyk, Raymond J. , *Opportunities Denied, Opportunities Diminish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iring*, Washington, D. C. , Urban Institute Press, 1991

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1930—)

加里·贝克尔是 20 世纪末最具有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独一无二的方法包括采用理性的经济假设并将它应用于一般经济学家们不作研究的社会问题中。这种方法在经济学中开拓了许多新的专业领域——犯罪和惩罚经济学、癖好(addiction)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和歧视经济学。

贝克尔 1930 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波茨维尔,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长大。他父亲是个小生意人。贝克尔高中毕业后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并在那儿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贝克尔对自己在普林斯顿所受的经济学教育不太满意,因为“似乎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接着,贝克尔进入芝加哥大学跟随米尔顿·弗里德曼攻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1953 年,他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1955 年获得博士学位。贝克尔在弗里德曼指导下撰写的关于歧视经济学的博士论文被诺贝尔委员会推崇为对经济学具有特别重要的贡献。

贝克尔 1954—1957 年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后来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职位,1969 年又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当时他已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从 1985 年开始,贝克尔就在《商业周刊》上撰写经济学方面的专栏文章,向普通公众解释

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思想。1992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对经济学作出了两项重大贡献,第一,他接受了经济学家关于“人类理性”的假设,并将其应用到所有行为方式中,包括不涉及个体之间的市场交易的非经济事件或主题。从“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和“人类总是试图使其效用最大化”这些假设出发,贝克尔分析了关于生育、结婚和离婚(1973, 1974, 1977)、犯罪和惩罚(1968)、癖好(1988, 1991, 1992)等的决策。第二,贝克尔在解释劳动力市场运作的方式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帮助发展了人力资本的思想(1964),并帮助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问题(1957)。

贝克尔以一种类似于传统厂商理论的方式分析了婚姻决策和家庭关系。个人花时间寻找能为自己提供最大效用的配偶,就如同厂商寻求最适合的雇员一样。寻找的时间越长,获得的关于任何可能的配偶是否最合意的信息就越完善。结果,这一理论就预测了那些早婚者更可能离婚,这一预测从婚姻稳定性的数据中得到了证实。而且,这一理论还预测原有的期望演变成失望以及期望变化时都将会导致离婚。如同一个工厂希望利润最大化一样,一个家庭也会通过各司其职来使其效用最大化。这样,丈夫通常会专司市场生产,而妻子通常会专司家庭生产。这种各司其职的结果就是妇女的市场工资会比较低。根据贝克尔的观点,这并不归因于歧视,而是家庭内部对家庭中每一成员不同分工的决策的结果。

家庭对是否生孩子的决定也可以用经济学分析的逻辑去解释。与马尔萨斯认为人类不能控制他们繁衍的冲动相反,贝克尔将生育的决定与消费者购买如汽车和休假等商品的决

定相似。养育孩子涉及到许多费用,父母必须花钱买食品、衣服和玩具,必须提供住所、让孩子接受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必须花时间去养育他们。这势必会减少本来可用于赚取收入和消费商品的时间。父母的这些损失必须从孩子给予他们的更大的效用或欢愉中得到补偿,否则他们不会要孩子。这种补偿可以来自于拥有和养育子女的快乐、对子孙的希望或者是希望有人能照顾你的晚年生活。但是,在贝克尔看来,无论额外效用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孩子都必须与汽车、休假(它们也带来欢愉)一起竞争家庭收入的每一个美元。根据这种观点,系统地描述关于出生率的许多可验证假设便成为可能。养育孩子费用过高将会减少生育,家庭收入的增多则将允许家庭购买更多的东西,包括养育孩子。妇女的收入较高将会增加养育孩子的成本,因为花在家里陪孩子的时间使她无法挣得收入,因此会减少生育。最后一点,政府对老人的收入保障也会降低出生率,因为生孩子的好处之一在于他可能会照料你的晚年生活。

犯罪和惩罚经济学是贝克尔将理性假设应用于新领域、拓宽经济学的又一范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犯罪行为源自于精神上的疾病或社会压力。相反,贝克尔认为潜在的罪犯行为是理性的,受到预期回报和犯罪行为成本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在法律强制执行方面投入更多的财力会增加罪犯被抓获的可能,也就增加了犯罪行为的成本,犯罪会因之而减少。同样,如果惩罚加重,犯罪行为的预期成本会增加,犯罪率也会下降。同样地,如果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报酬也提高了,那么就业与犯罪活动相比要相对好些。随着犯罪活动的相对收益下降,犯罪就会越来越少。

这种分析方法可以推导出,厂商服从政府的管理和个人遵从税法是如何依赖于惩罚的力度和被发现的可能性的。经济学家和犯罪学家的经验性研究为贝克尔关于犯罪行为的决定因素的理论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贝克尔从理性假设推出了更进一步的结论,即沉溺于毒瘾和酗酒都是理性的行为。贝克尔从习惯可以是好习惯也可以是坏习惯开始阐述。他认为如果这些习惯能够增进未来的福利,它们就是好习惯,比如有规律的锻炼、饮食合理、系安全带等都可划入这一类。另一方面,减少未来福利的习惯如吸烟、吸毒都是有害的。但是,贝克尔认为,这些染上坏习惯的人并不是没有理性的。他们仅仅是偏爱目前的快乐甚过未来的幸福。根据贝克尔的观点,沉溺于癖好不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也是对目前和将来的欢愉进行理性的平衡和比较后的结果。这种分析得出了“为了允许每一个人都使他(她)们自己的幸福最大化,应当使毒品的使用合法化”的结论。然而,贝克尔对这个结论进行了一些修正。他指出,有些习惯,比如服用毒品,会减少我们对未来结果的关心,引起更加厉害的吸毒。而且,使毒品合法化会导致毒品吸食者急剧增多,这是因为随着合法化,毒品的价格会下降,吸食毒品的负面效应看上去就不那么严重了。而且同龄人的压力可能会随着合法化而上升,引起麻醉品更广泛的使用和对吸毒更大程度的迷恋。

贝克尔对劳动经济学领域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贝克尔(1962)是发展人力资本概念并用它帮助经济学家理解劳动力市场是如何运作的先驱者之一。人力资本投资类似于机器、飞机这样的实物资本,人们可以通过教育、培训或培养新的技

能对自身进行投资。事实上,人力资本的概念甚至比这更广泛,包括了购买医疗保健、花时间寻找更好的工作、移民去其他地区寻找更好的职业。和新飞机和机器一样,这些人力投资也将产生未来的收入流。

但是和实物资本投资一样,人力投资也涉及到成本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花时间获得人力资本而失去的收入。另外,获取新技能和知识的困难也应算作个人的成本。根据贝克尔的观点,只要未来的收益超过现在的成本,人们就会投资在自己身上。多数人力资本理论的经验性研究都是重点比较成本和学习所获得的回报,特别是大学教育的回报。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经验性验证发现,人力资本投资确实随着将来回报的增大而加大,随着成本的提高而减少。

伴随着人力资本而来的是有关经济不平等和歧视的几个争论要点。第一,贝克尔(1971)指出在两个群体间的不平等(男人和女人,或黑人和白人)并不表明低收入的那一群体就是被歧视的。收入的差别依赖于教育、技能和经历(或每一群体的所有人力资本的总和)等因素的差别。只有将影响收入的那些有关人力资本的差异因素排除了以后,我们才能将收入差异归因于歧视。

第二,贝克尔认为,歧视的心理是雇主的一种口味或偏好,就像每天早上想要葡萄核仁做早餐是一种口味或偏好一样。而且,贝克尔(1993)还提出,歧视更多地是由于消费者和雇员的口味或态度而不是雇主的态度。消费者可能不想和少数民族的销售人员打交道,或目前的雇员可能不想和妇女或黑人共事,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倾向于不雇佣合格的妇女或黑人,因为这种雇佣将降低销售量或工人的生产率,这对厂商来

说就太昂贵了。

第三,贝克尔指出歧视花费的是雇主的钱。如果一个雇主可以雇一名妇女或黑人,但因为歧视他们,将不得不花代价雇佣白人满足自己的口味,代价是雇佣男性白人和雇佣妇女或少数民族成员之间的工资差异。这意味着在竞争市场中,歧视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原因是存在歧视的厂商比不存在歧视的厂商成本高,无歧视的厂商最终将迫使有歧视的厂商无法存续下去。这些关于歧视的假设成为许多批评和争论的主题。

贝克尔将所有个体选择看成是有理性的决策,从而拓展了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开创了关于歧视、犯罪、教育及婚姻的研究。贝克尔在传统经济学的外围进行的每一次探索,都得到了独特的、有意义的结果,而且这一结果有着明确的可验证的预测。更重要的是,他的方法展示了观察非市场性人类活动的新的研究手段和崭新的视角。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贝克尔成为 20 世纪末最有创造力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影响力可以从他的著作被大量引用这一点得到印证。根据在《社会科学引用索引》中被引用的总次数,迈德夫(Medoff, 1989)将贝克尔评为 65 岁以下的经济学家中的第一名。

参 考 文 献

贝克尔的著作: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1957),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nd edn., 1971

-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 5 (October 1962), pp. 9 - 49
- Human Capit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2 (March / April 1968), pp. 167 - 217
-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4 (July / August 1973), pp. 813 - 46
-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2 (March / April 1974), Part 2, S11 - S26
-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ital Instab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 6 (December 1977), pp. 1, 153 - 89, with E. M. Landes and R. T. Michael
-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Human Capital, Effort,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 1 (January 1985), pp. 533 - 58
- "A Theory of Rational Addi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 4 (August 1988), pp. 675 - 700 (with Kevin M. Murphy)
- "Rational Addiction and the Effect of Price on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2 (May 1991), pp. 237 - 41 (with Michael Grossman and Kevin M. Murphy)

“Habits, Addictions, and Traditions,” *Kyklos*, 45, 3 (1992), pp. 327 - 45

“Nobel Lecture: The Economic Way of Looking a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3 (June 1993), pp. 385 - 409

涉及贝克尔的著作:

Becker, Gary S., *Current Biography Yearbook 1993*, New York, H. W. Wilson, 1993, pp. 40 - 4

Fuchs, Victor R., “Gary S. Becker: Ideas About F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2 (Spring 1994), pp. 183 - 92

Posner, Richard A., “Gary Becker’s Contributions to Law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3 (June 1993), pp. 211 - 15

Rosen, Sherwin, “Risks and Rewards: Gary Becker’s Contributions to Law and Economic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5, 1 (1993), pp. 25 - 36

Shackleton, J. R., “Gary S. Becker: the Economist as Empire-builder,” in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ed. J. R. Shackleton and G. Locksley, New York, Wiley, 1981 pp. 12 - 32

其他参考文献:

Heineke, J. M. (ed.), *Economic Models of Criminal Behavio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8

Medoff, Marshall H. , "The Rankings of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 20, 4 (Fall 1989), pp. 405 - 15

Mincer, Jacob,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1933—)

20 世纪最后 15 年,阿马蒂亚·森一直都是福利经济学与经济发展领域的领袖人物。他拓宽了经济学家们关于人类“福利”的概念——不仅包含额外消费而且包含开发人类潜能。森还研究了不发达状态如何对妇女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他还提出经济学家们进行经济发展研究时应更多地关注为人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森 1933 年出生于印度的桑蒂尼克坦村。他的父亲是达卡大学(现在在孟加拉国)的化学教授。在孩童时期,森捱过了 1943 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这次饥荒对他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并且激发了他对研究经济发展的兴趣。

当森在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读本科时,除了学习经济学外,还学习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1953 年他在总统学院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然后又取得了剑桥三一学院的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剑桥,他跟随皮耶罗·斯法拉、琼·罗宾逊研究经济学。罗宾逊指导了他的博士论文(森,1960),并试图将他的研究从“道德的垃圾”转向抽象的理论。

1959 年森从剑桥毕业后,执教于贾多珀大学、剑桥大学和德里大学。1971 年森回到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77 年他转到牛津的纳菲尔德学院。三年后他成为全职的

德拉蒙德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奇沃思与希克斯都曾在他之前任职)。1987年森来到美国,成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与哲学教授。森于1998年又回到英国,成为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94年,他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森的著作的主题是开发人类潜能的重要性。对森而言,经济学应该是开发人们的内在潜能,增加人们的选择机会,而不应该仅仅是设法生产更多的商品或谋划怎样才能获取最大化的效用。因此,他对传统的福利经济学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传统的观点认为自由交换可以使理性个体的福利最大化(参见埃奇沃思)。森反对人类理性的假设,反对将帕累托最优状态作为经济福利的标准。

理性假设的核心是认为个体是使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的人。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个体的行为是高度理性和符合逻辑的,他们看到人们总试图计算不同的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及他们的每一个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可能的效用。他们相信人们会采取使自己得到最大(预期)效用的行为,允许人们以这种方式行动就会带来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森(1976—1977)以众多论据批判了这种观点。

他指出效用最大化理论对人们的实际行为方式提供了一种糟糕的描述。仅举一个例子:个体不能希望从政治选举的投票中获取什么。我的选票决定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事实上,我在排队等候投票时被闪电击中的可能性要比我的选票能决定这次选举的可能性大许多。然而,我还是照常投票,许许多多其他人也是这样。

森也指出,如果人们确实按理性假设行动,那他们都将变

成“理性的傻瓜”，因为自私行为将导致一些相当荒谬可笑的后果。“火车站在哪里？”一个人问我。“在那儿。”我边说边指着邮局。“能否麻烦你顺路帮我将这封信寄掉？”“可以。”他答，接着决定拆开信封检查是否内含贵重物品（森，1976—1977）。这种人际交往一点也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不考虑一个人要成为哪一种人、要成为什么样社会的一部分。

森(1985, 1987)还进一步指出用帕累托最优理论作为福利标准而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指出，结果可以符合帕累托最优理论，但却可能是灾难性的。比如，既然只有减少富人的收入及其效用才能改善某种状态，那么少数人非常富有而多数人挨饿的情形也应是帕累托最优状态了。然而，许多人在挨饿的事实显然根本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

森(1970)还指出最大效用理论与自由主义相矛盾，或者说与人们只要不影响他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想法相矛盾。如果许多人想取缔色情文学，效用最大化理论将要求取缔色情文学。类似地，如果许多人希望每个人都看色情小说，效用最大化理论也将要求人们必须被迫接受色情文学。然而自由将允许每一个体作出自己的决定。

由于个体福利的效用分析是不够的，因此就需要提供另外一种视角。森提议了一种以能力为核心的方法。根据这种视角，福利依据人们能做的事以及能做好的事情而定。如果人们能阅读、吃饭、投票，人类的福利就是最大化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因为它所产出的效用，而是因为当一个人阅读时可以决定他能成为哪种人。吃饭的价值并不是人们热爱食物，只因食物是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人们投票选举，并不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效用，而是因为他们重视特定的政治体系

(民主)及政治活动的特定类型。

人们可以选择的数目以及自由地作出选择是人类福利另一重要部分。这就是说当消费者购物没有选择时,可以通过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来提高消费者的福利,即使消费者最后并没得到更多商品。

森进一步指出,传统经济学关于偏好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已经落伍了——偏好并不决定人们的行为。人们不重视文盲,于是决定不去学习怎样阅读,这些不识字的人已适应了他们的偏好而贬低读写能力。根据传统的功利主义学说,因为将个体的偏好看得比其他东西重要,那么不鼓励文盲学习也可以实现福利最大化。但依照森的观点,较高的文化可以提高人类的福利,因为较高的文化可以增加人们的有效机会,提高人们的能力。

森将他的能力方法运用到经济发展领域。这项工作是从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区分开来开始的。增长意味着不管人们在生产、消费商品时发生什么事情都生产更多的物品;发展则包含着“拓展人们的能力”(森,1984)。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均收入与产出。经济发展则包括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文化、健康及教育水平。这意味着使人们成为他们所在社区的组成部分,并且因为被看作是有价值的个体而毫无愧色地出现在公众场合。

增长与发展经常是一起发生的。但一些国家如中国、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的经验表明,尽管经济增长率较低,正确的公众政策仍可以拓展人们的能力与机会。当发展中国家必须确定是集中精力于经济增长还是能力的培养时,森认为他们应致力于真正的目标,即人类潜能的开发。还有,发展中国

家经济的成功应由其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预期寿命来评判,而不是由生产或收入水平的增长来评判。

森还证实了性别问题是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对下列假设提出质疑: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对男人与女人的影响是平等的,而且发展政策应大致平等地关注男人和女人。

森(1990)阐述了发展中国家的父母对儿子的偏爱导致了对妇女的歧视。所有的家庭都必须经常地对如何分配他们有限的收入做出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即怎样在所有的家庭成员之间分配收入。对一些更富裕的家庭而言,这样的决定通常无关紧要,但对穷人来说,它可能会决定生死。得不到足够食物的家庭成员会死去,同样,生病的家庭成员若得不到充分的医疗也会死去。

森(1993)指出女人与男人得到的医疗保健及有营养的食物并不一样。女人较男人更少可能被送往医院,当女人要被送往医院时往往已经病得很重了。女人也不太可能得到充足的食物供应(森,1984)。

森(1990,1993)以率直的、精确的术语证明了这种不公平待遇带来的后果。在发达国家男女比例大约是100:105。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却为100:94。如果在发展中国家男女被平等对待,那么这些国家的男女比例应在100:100~105。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女人的家庭对待她们像对待男人一样,那么在发展中国家现在应该还有另外的1亿名妇女活着。

出于伦理学及效率的原因,森建议发展方面的努力应关注妇女。在印度,比如说,直接喂养计划比通常的家庭食品支出更成功地改善了女孩们的营养水平。鼓励妇女外出工作的

计划也将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并且使她们理直气壮地要求更多的家庭经济资源。而且,森认为如果妇女的经济贡献更大,得到更多的承认,女孩子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多的家庭资源。

最后,森对饥荒与饥饿的研究也帮助经济学家们了解了现实世界中这些重要问题的成因。它也改变了许多世界机构阻止饥荒及救济的方式。森在《贫穷与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中指出民主政治不会发生饥荒。大饥荒与政府的民主形式所导致的较高的产出关系不大,而与民主政府必须对来自选民们的政治压力作出反应有着更大的关系。在森的研究工作之前,发展经济学家们假定饥荒是食物生产不足的结果。森指出分配问题应与食物供应问题区分开来,食物分配问题比食物供应更重要。饥荒会因贫穷或者不平等的分配机制产生;也可因一国的某些地区食物需求过大及其他地区食物供应不足而产生。

森的研究试图拓宽经济学分析的视野。他迫使经济学家们对人类的经济动因采取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了—个强有力的事实,即人们都有内在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他还指出经济运行良好的目标不仅仅是提供更多的商品与服务,还包括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森的著作的一贯主题是致力于人类潜力与能力的开发及怎样在社会及家庭中产生更大的福利。他将开发人类潜能看作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以及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真正动因。

参 考 文 献

森的著作：

- Choice of Techniques: An Aspect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0
- “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8, 1 (January - February 1970), pp. 152 - 7
- On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 (1976 - 7), pp. 317 - 44
- Poverty and Famines: 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 “The Moral Standing of the Market,” in *Ethics and Economics*, ed. Ellen Frankel Paul, Fred D. Miller, Jr. and Jeffrey Pau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pp. 1 - 19
-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with Jean Dréze
- “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s” in Irene Tinker (ed.)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3 - 4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Famine Preven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Inequality Reexamin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a

"More Th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7 (December 20, 1990b), pp. 61 - 6

"The Economics of Life and Death," *Scientific American*,
268,5 (May 1993), pp. 40 - 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unger: Selected Essay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with Jean Dréze and Arthur Hussain

Ind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Opportu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th Jean Dréze

涉及森的著作:

Klamer, Arjo, "A Conversation with Amartya Se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 1 (Winter 1989), pp. 135 - 50

McPherson, Michael, "Amartya Sen," in *New Horizons in
Economic Thought: Appraisals of Leading Economists*, ed.
Warren J. Samuels, Hants, England, Edward Elgar, 1992,
pp. 294 - 309

Putterman, Louis, "Amartya Sen (born 1933),"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Dissenting Economists, ed.
Arestis and Sawyer, Hants, England, Edward Elgar, 1992,
pp. 498 - 505

小 罗 伯 特 · E · 卢 卡 斯 ROBERT E. LUCAS, JR. (1937—)

小罗伯特·卢卡斯最为著名的成就是发展了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或理性预期的方法。这种方法试图为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它假定宏观经济学的主体和微观经济学的主体一样,是在决策时能使用所有可利用的信息并试图预期未来的理性人。当将宏观经济学的主体看作是理性人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就可以被摒弃——失业可以自行修正;经济政策既不必需,也不令人满意。

卢卡斯 1937 年出生于华盛顿州亚基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出生后不久,他们家的餐馆就破产了——大萧条的牺牲品之一。由于家庭遭受的苦难,卢卡斯的父母(都是共和党成员的子孙)抛弃了共和党的软弱,成为新政的狂热支持者。

卢卡斯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1959 获得了学士学位后,在伯克利开始了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学习。当卢卡斯意识到经济因素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时,他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学史中来。为了跟随米尔顿·弗里德曼学习经济学,他很快回到芝加哥大学。卢卡斯 1964 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厂商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轻易地替换资本和劳动力的经济计量学研究。

从 1963—1974 年,卢卡斯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执教,之

后在芝加哥大学接受了一个职位。1980年他成为芝加哥大学约翰·杜威优异服务勋章教授。1995年,卢卡斯主要因为对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凯恩斯开始,宏观经济学家意识到预期影响经济,但他们对预期是如何形成的仅仅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预期是静态的、固定的。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将预期看作是对过去变化的适应。根据这种观点,如果通货膨胀率过去上升了3个百分点,人们会预期继续有3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几年后,如果有4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人们将会改变他们的看法,预期未来的通货膨胀率是将4%。

卢卡斯坚信人们在形成预期时要比这更聪明、更有理性。人们会以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去展望未来、回顾过去。预期的通货膨胀不仅仅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而且依赖于当前的情况或当前的经济政策可能使情况发生怎样的改变。仅仅因为通货膨胀率在过去几年平均是3%并不意味着以后也是3%。比如说失业的减少和货币的快速增加都有可能使人们预期价格会在未来更加迅速地提高。

虽然是穆特(Muth)于1961年第一次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卢卡斯曾是他最热衷的拥护者),并将这一方法推广开来,但是强调应将理性预期融入宏观经济学分析的是卢卡斯,推导出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假设的结果的也是卢卡斯。理性预期的两个主要结论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之间在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平衡,经济政策工具是无效和无法提高经济产出的。这项研究起始于所谓的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学派”(new classical school),被称为“新古典学派”是因为这些结论使宏观经济学又回复到凯恩斯主义学派之前得到的结论。

了解这种方法的一个途径是看一看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之间的冲突。凯恩斯试图解释为什么经济遭受较长时期的高失业。劳动经济学认为失业是工资太高的结果,如果工人同意减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家们普遍都站在凯恩斯这边,认为失业主要是非自愿的。而卢卡斯改变了所有的看法。

新古典经济学回过头来用古典的方法研究宏观经济学。它假设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总能在一点上达到供求均衡。因此,失业将会是一个预期而不是基准,当劳动力市场调整时失业会趋于消失。失业被看作是可以自行修复的一种暂时的、不均衡的现象。新古典经济学也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定位于坚实的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它假设经济学的主体是理性的,并想方设法使他们的幸福最大化。

卢卡斯(1969b)将劳动力供给决策看作是每一个工人在劳动与闲暇之间所作的选择。工人对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实际工资会有个预期,他们会通过比较从工资和闲暇中获得的收益去决定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预期实际工资比正常的高,他们会工作得多一些。相反,如果预期实际工资比正常的低,工人会选择闲暇直到工资提高。在这种构想下,失业被解释为工人所做出的自愿的选择,他们等待着实际工资上升到正常水平。

厂商必须做出同样的决策(卢卡斯,1972,1973)。当生产的商品价格上涨时,厂商必须判断价格上涨是因为对他们所生产的商品需求增加(这需要额外的生产),还是因为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扬(这不需要额外的生产)。像工人一样,厂

商们面对的是劳动与闲暇之间的平衡;也像工人一样,当厂商能从生产中获得更多回报时,他们才会生产得更多。

因为人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并不可能掌握全部信息,因此在劳动和生产的决策中会出现错误。例如,工人会假设给定的工资的提高代表着实际工资的提高,厂商也可能会认为他们生产的商品价格提高是他们商品的相对价格的提高而不是整体价格的上涨。

根据卢卡斯的观点,失业就是工人和厂商这种错误假设的结果。工人可能会因为对“实际工资”的判断错误而辞去工作或拒绝工资太低的工作。厂商也会因为对需求的判断错误而生产太少和雇佣很少的工人。但是因为人是理性的,他们会展望预期的形成,会很快地修正错误,失业也就会消失。

卢卡斯的对失业原因的分析与其第二个贡献相吻合,即人们都知道的“卢卡斯评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一个通常的实践是应用宏观经济学的模型去研究变化中的财政政策和/或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整个经济的。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模型被认为能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引导经济向充分就业和低通货膨胀的方向发展。70年代,滞胀(stagflation)的出现似乎表明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解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相对无效,经济学家们需要解释为什么政策会失效,卢卡斯提供了答案。

卢卡斯(1976,1978)批判了用大型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去评价不同经济政策的结果(参见廷贝亨)。他指出,这些模型都假设经济关系面临着政策的任何变化时都保持不变,但这是不真实的。卢卡斯(1978)认为,因为“政策的变化必然会改变某些结构参数……以一种高度复杂的形式……”,在不知道哪一种经济关系保持不变、哪一种变化了以及它们如何变化

的情况下,用经济学模型去评价可选择的政策就毫无价值可言。更进一步说,卢卡斯(1978)认为经济学预测模型蹩脚的跟踪记录(如它们无法解释 70 年代的滞胀)就表明了宏观经济关系确实在不停地变化着。

实际上,卢卡斯评论意味着经济行为会随着一项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试图使他们自己的幸福最大化的理性人在面临经济政策的变化时当然会改变他们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变化反过来会改变宏观经济关系,并会使宏观经济政策无效。

其中一个例子是政府债券的影响。根据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削减税收可能会导致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增加,但是政府削减税收也会引起政府的赤字。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理性的公民会意识到将来必须弥补这些亏损,政府必须提高税收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人们会将削减了的税收中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以便支付将来更高的税赋。税收削减政策并不会增加消费者的支出和就业,相反,却刺激了储蓄。

卢卡斯评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另一个重要的例证是菲利普斯曲线(参见萨缪尔森)。卢卡斯(1972)阐明,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传统理论是假设宏观经济的主体是非理性的。接着,他继续解释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从长期看很可能是垂直的。如果政策制定者试图扩张经济、减少失业,那么理性的经济个体会产生高通货膨胀的预期。如果工资较低,工人将不愿意工作,这样就业率就不会上升,失业率也不会下降。刺激需求政策唯一的影响就是价格的上升。长期下去,经济政策就仅仅能改变价格或通货膨胀率,它对失业没有任何作用。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通货膨胀率与失业之间不存在平衡,只存在自然失业率。这个比率是由工人和厂商的决策决定的,任何

经济政策都不可能修正它。

卢卡斯指出有活力的财政政策只能通过愚弄工人来增加就业,使工人相信厂家加薪确实提高了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卢卡斯指出,工人可以被欺骗一次、两次,但仅此而已。政府若再次试图通过额外的政府支出来刺激就业,工人就会预期出现高通货膨胀而不是实际工资的提高。结果,人们将不会去寻找工作,这些政策也就无法再刺激就业了。货币政策也是如此。中央银行不可能总是愚弄大众,扩张经济。由于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用于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卢卡斯(1972)提出了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不变的和可预测的规则。对财政政策,他建议平衡预算;对货币政策,他建议公布货币增长规则。

1995年瑞典的皇家科学委员会将诺贝尔奖颁发给卢卡斯时指出,自1970年来没有人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能够超过卢卡斯。卢卡斯解释了经济主体是如何形成预期的以及这些预期如何反过来影响经济产出和经济运行。卢卡斯挑战了凯恩斯主义正统学派所认为的经济政策必须被用来补救失业的观点。由于他的研究,新古典预期或理性预期的方法主宰了20世纪后期的宏观经济学。

参 考 文 献

卢卡斯的著作:

"Price Expectations and The Phillips Cur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3 (June 1969a), pp. 342-50, with

Leonard A. Rapping

"Real Wages,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7, 5 (September / October 1969b), pp. 721 - 54, with Leonard A. Rapping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April 1972), pp. 103 - 24

"Som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Output - Inflation Tradeoff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3 (June 1973), pp. 326 - 34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the Business Cycl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 6 (December 1975), pp. 1,113 - 44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in K. Brunner and A. Meltzer, eds.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76, pp. 19 - 46

"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 in *After the Phillips Curve: Persistence of High Inflation and High Unemployment*, Boston, Massachusett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Boston, 1978, pp. 49 - 72, with Thomas J. Sargent

"Rules, Discre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Economic Advisor," in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conomic Policy*, ed. Stanley Fischer,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199 - 210

Studie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81

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Nobel Lecture: Money Neutra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4 (August 1996), pp. 661 - 82

涉及卢卡斯的著作:

Chari, V. V., "Nobel Laureate Robert E. Lucas, Jr.: Architect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2, 1 (Winter 1998), pp. 171 - 86

Fisher, Stanley, "Robert Lucas's Nobel Memorial Priz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1 (March 1996), pp. 11 - 31

Klamer, Arjo, *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 New Classical Economics and Opponents Speak Out on The Current Controversy in Macroeconomics*, Totowa, New Jersey, Rowman & Allenheld, 1984

其他参考文献:

Barro, Robert, "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or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 (1974), pp. 1,095 - 117

Muth, John 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Theory of Price Movements," *Econometrica*, 29, 3 (1961), pp. 315 - 35

术 语

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

如果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效率较高,将导致该产品的出口的理论(参见比较优势)。

加速器理论(accelerator):

认为经济扩张时期投资必然增长的投资理论。

总额相符问题(adding up problem):

关于厂商所使用的所有投入的边际生产力总额是否等于产出的价值,销售收益是否因此能够补偿生产要素的问题。

逆选择(adverse selection):

保险业中的问题。指某些购买保险的人会比一般人更可能会去申请索赔。

套利(arbitrage):

指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同时买进或卖出某种资产以从价格差额中获利。

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

双方在贸易或交易中所掌握的信息差异。

剑桥论战(Cambridge Controversy):

20 世纪中叶英国剑桥学派与马萨诸塞剑桥学派之间关于怎样衡量资本问题的争论。

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

货币对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

是谁拥有这些货币。

基数效用(cardinal utility):

该学说认为消费者能够区别自己偏好一些商品甚于另一些商品的程度高低(参见序数效用)。

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

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

新经济历史学,运用先进的统计技术来检验关于经济史史的假说。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即相对效率(或相对无效)决定一国出口何种商品的理论(参见绝对优势)。

互补性商品(complimentary goods):

配套消费的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如汽油和汽车。

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消费支出是为了给别人留下印象而不是改善自身福利。

不变的规模收益(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当投入增加时产出成比例递增。

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

认为每个消费者是对自身福利的最佳评判员,且被允许在购买商品时拥有完全的自由的说。

消费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

消费者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契约曲线(contract curve):

由埃奇沃思盒形图中两个个体或两个国家的无差异曲线的各个切点而连成的曲线。

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用来衡量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或两者共同变动的程度。

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通过将项目产生的所有收益与项目的全部成本进行比较以评估投资项目和政府支出安排的一种工具。

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创新和技术突破逐渐破坏过时的产品与工艺流程的过程。

累积的因果关系(cumulative causation):

涉及两个或更多变量的正反馈或负反馈机制,由此一个变量的增长会导致另一个变量的增长,而后者又反过来促进前者的增长。

级差地租理论(differential theory of rent):

认为任一块土地的地租由这块土地的生产率与最贫瘠土地的生产率之间的差异所决定。

边际效用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消费商品所获得的满足将随着每追加一个单位的消费商品而递减。

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

增加工人(或其他生产要素)时的产出小于以前雇佣工人(或要素)时的产出。

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

指生产过程专业化,任务因此被细分为具体操作,每个劳动者只分配做一项工作。

二元劳动力市场假说(dual labor market hypothesis):

认为在发达国家存在两个不同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一个是熟练工市场,另一个是非熟练工市场。

倾销(dumping):

指出口商品的销售价格低于厂商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价格的行为。

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运用统计技术度量经济关系。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产品生产数量的扩大引起产品生产成本的降低。

埃奇沃思盒形图(Edgeworth Box):

两个个体或国家的无差异曲线连接图,用于决定彼此交换的结果。

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

基于购买力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需求弹性(elasticity of demand):

消费者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与商品价格变化的百分比的比值。这一概念表示商品销售量因价格变化而反映出来的变动程度。

替代弹性(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衡量投入成本的变化引起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变化的程度。若替代弹性为0,则无论投入成本怎样昂贵,生产要素的使用量总保持固定比例。若替代弹性大于0,则高工资将导致厂商更多地使用机器而少用劳动力。

交易方程(equation of exchange):

$MV = PQ$, 或货币供给(M)乘以每块美元被消费的次数(V)等于经济产出(价格乘以数量)。

事前和事后(ex ante - ex post):

将计划中的事件(ex ante)与实际发生的(ex post)事件区别开来。

消费支出税(expenditure tax):

一种所得税,若储蓄则免税。

剥削(exploitation):

指资本所有者对剩余价值的占用。

外部性(externalities):

消费品的生产成本(或效益)未得到最终消费者的补偿(或接受)。例如,污染给全社会带来了成本,而这些成本并未包括在造成污染的商品价格内。

要素价格均衡定理(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商品自由贸易导致贸易伙伴的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相等。

男女平等主义者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揭示妇女遭受经济压迫的原因与结果的男女平等主义者理论。

财政政策(fiscal policy):

运用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政策来调控经济。

免费乘车的问题(free rider problem):

每个人都可以享受某些商品或利益(例如国防支出以及因联合而导致的高额工资),但是人们并不愿为此付款,因此只有迫使人们偿付这些公共产品,这些产品才能被生产出来。

博弈论(game theory):

对相互依赖的决策的研究。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

整个经济市场同时处于均衡的状态。

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

“劣等货币驱逐优等货币”。该法则基于以下事实:人们乐于持有价值更高的货币(包括贵金属),而将其他价值较低的货币传递给他人。

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

消费者收入的增长引起某种商品需求数量的增长。

收入政策(incomes policy):

政府试图通过控制工资与价格增长来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

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当工人增加时比以前雇佣较少工人时实现更大产出(指平均产出水平)。

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

一系列点的轨迹,代表两种商品为消费者提供同等效用满足水平的不同组合。

幼稚工业保护说(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主张保护本国新兴的产业,避免外国商品的竞争的学说。

投入—产出分析(input-output analysis):

经济的一种数学表述方法,表明每种商品每增加一个单位产量需要多少各类投入。

IS-LM 模型(IS-LM model):

一种阐明商品市场(IS)和货币市场(LM)如何同时达到均衡的宏观经济学模型。

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f waves):

经济活动中的长期周期(45~60年)。

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

该理论认为商品的相对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相对劳动量。

需求法则(law of demand):

认为(其他是均衡的)某种商品的价格越低,消费者购买的需求量越大。

供给法则(law of supply):

认为若某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厂商将会生产和销售更多的该产品。

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拥有雄厚资本的美国出口的却是耗费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大而资本额相对较小的商品。

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

认为个体根据他们预期的一生的平均收入而不是当前收入来决定年消费水平。

可贷资金利率论(loable funds theory of interest):

主张利率由储蓄供给和贷款需求来决定。

卢卡斯评论(Lucas Critique):

认为大规模的宏观经济模型无助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因为任何政策变动都将改变宏观经济模型。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研究经济整体运行情况。

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

生产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出所支付的追加成本。

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

因多雇佣一个工人(或增加一单位的投入量)而引起的产出增量。

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 (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 of distribution):

认为生产过程中的每个投入所获得的收入等于其创造的边际生产力的理论。

边际消费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消费者支出的额外收入的比例。

边际收益 (marginal revenue):

指生产厂商或销售厂商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品获得的额外收益。

边际效用 (marginal utility):

消费者在享用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时所获得的效用。

市场社会主义 (market socialism):

试图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特征联系起来,由市场定价和配置资源,但国家占有绝大多数的大企业。

成本加成定价 (mark-up pricing):

认为厂商通过在成本上加成(百分比)的方式定价的观点。

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该早期经济学说强调,国家必须通过贸易顺差和货币积累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增长。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信奉经济现象只能根据个体选择的结果来解释。

方法论 (methodology):

用于解读经济如何运作和经济规律如何起作用的方法的研究。

货币主义(monetarism):

认为通货膨胀源于经济领域中货币过多的学说。

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央行试图通过控制利率和(或)国内货币供给的能力来影响经济结果。

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

指个体对名义上的收入变化(他们因收入上涨而高兴)的反应胜过对实际收入变化(由于价格同时上涨,增加的收入并不比以前的收入水平具有更高的购买力)的反应。

买方垄断(monopsony):

指对于某种商品的生产只有一家买方的市场结构。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一个由保险体制引发的问题。保险促使投保人采取更冒险的行为,从而增加了他们从保险基金中领取保险赔偿金的机会。

乘数(multiplier):

支出的变化与该变化对经济整体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

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在不造成通货膨胀加速的前提下,允许失业可达到的最低比率。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

20 世纪的宏观经济学派,将理性预期和所有经济中均存在自然失业率的主张结合在一起。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研究经济制度(如产权、市场与国家)怎样形成及存在的

原因。

名义利率(nominal interest rate):

现行价格水平下的利率或忽视通货膨胀的影响(参见实际利率)。

职业分离(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指主要雇佣妇女或少数民族成员从事某种类型的工作,而白种男性则受雇从事完全不同的另一系列工作。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

放弃其他选择而付出的成本。

序数效应(ordinal utility):

认为消费者只能够分辨自己偏好一种商品甚过另一些商品(参见基数效应)。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指经济资源的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只有在其他人的福利恶化的情况下才能提高自己的福利。

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

将经济领域中的一个市场看成是孤立于其他所有市场的一种经济学分析方法。

永久性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该消费理论主张,消费者支出依赖于数年的平均预期收入,而不是当前收入水平。

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体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换关系。曲线显示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失业率下降,反之亦然。

重农主义(physiocracy):

由弗朗索瓦·魁奈创建的早期经济学派。重农学派主张

只有农业是生产性的行业。

重农学派的地租理论(physiocratic theory of rent):

该观点认为地租是由一块土地的产出盈余所决定的。

庇古效应(Pigou Effect):

该理论认为在经济衰退期价格的下降会导致消费者实际财富的增加,支出也因此增加。

人头税(poll taxes):

每个人都必须支付的固定税额的税种,不考虑个人的收入及支出习惯。

人口法则(population principle):

该学说(马尔萨斯提出的)认为人口增长将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

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

以赶走行业内的竞争者为目的,按无利可图的低价销售商品。

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

就某种商品对不同的消费者收取不同的销售价格。

囚徒的困境(prisoner's dilemma):

博弈论中一个著名的结论,表明个人出于考虑自身利益而可能无法作出最优选择。

累进税(progressive tax):

指对富裕家庭的征税重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一种税制。所得税就是一种累进税。

比例税(proportional tax):

所有家庭按收入的相同比例缴税给政府的一种税制。

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对政治的经济学研究。

公共财政(public finance):

政府支出与税收政策的研究。

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该观点认为汇率将趋向于两种货币在各自国家购买相同系列商品的水平。

货币数量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该理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直接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化。

激进的主观主义(radical subjectivism):

信奉只有个体自身才能知道什么对自己最为有利。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

认为厂商和个体将了解政府政策的影响,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抵制政府政策。

实际余额效应(real balance effect):

见庇古效应。

实际利率(real interest rates):

即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代表贷方赚取的购买力以及借方失去的购买力。

累退税(regressive tax):

贫困家庭的纳税在其收入中的比例大于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的税制。销售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ion):

该生产方式需投入更多机器设备和资本,且从作出生产决策到商品完工留待出售之间需要很长的时间。

萨缪尔森-斯托尔珀定理(Samuelson-Stolper Theorem):

表明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提高了某些投入的收益。这

些投入主要被用于国内产品的生产中,那些被征收关税的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构成了竞争。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主张在所有的社会和经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适者生存”或优胜劣汰。

硬币流动机制(specie flow mechanism):

贸易失衡因之而自动纠正的过程,因为失衡会导致国内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的变化。

滞胀(stagflation):

高失业率(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发生。

最低生活工资理论(subsistence theory of wages):

该观点认为工资将趋于下降到刚好足够维持工人生存的水平

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

由于价格的变化对某些商品销售产生的影响。某些商品价格上涨将促使人们购买(替代)其他商品。

盈余(surplus):

指某种经济的产出与为达到这种产出所需的投入之间的差额

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

指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该产品所耗费的工资和折旧成本的部分

卖方喊价(tâtonnement):

所有市场通过这个摸索的过程能够立即达到平衡。

总效用(total utility):

消费者消费一定数量商品所获得的全部效用。

高利贷(法) usury (laws):

规范或禁止收取(高利率)利息的法律。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该哲学学说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追求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

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

该学说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应通过建立合作社来解决,而不是为利润动因所支配。

工资基金学说(wage fund doctrine):

一种劳动力需求理论,主张雇佣方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必须在可获得的资本中设置基金以支付工人工资。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

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怎样通过增加产出和改变其配置实现国家福利的最大化。

收益曲线(yield curve):

该图表显示,当某种资产到期时利率变化的轨迹。